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七章（中）

2020年9月

目录

韩国、新加坡、日本、东南亚等地。。。。。。。。。。第　5　页

欧洲、亚洲、南美洲、印度、中东、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境况。。。。。。。。。。。。。。。。。。。。。。。第　84 页

新中国经济建设、大炼钢铁、大跃进、超英赶美、三年自然灾害、大鸣大放、百花齐放、反右。。。。。。。。。。。。。。。。第 226 页

中国宪法、人大、政协、政府组织架构。。。。。。。。第 612 页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

第七章

1949年-1966年

____

韩国、新加坡、日本、东南亚等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A9%E6%B0%91%E5%9B%BD

韩国历史

大韩民国，简称韩国，港台民间亦有称南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之为南朝鲜，是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南部的共和制国家，首都为首尔。韩国国土三面环海，西南濒临韩国西海（黄海），东南紧接大韩海峡（朝鲜海峡），东边是韩国东海（日本海），北面隔着三八线（朝韩非军事区），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临，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约占韩半岛总面积45%），人口5170万。

韩国是二十国集团和经合组织（OECD）成员之一、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亚峰会的创始国，亦是亚洲四小龙和未来11国之一。20世纪60－90年代，韩国经济在政府“出口主导”经济战略的推动下，飞速发展，创造出“汉江奇迹”。目前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国际汇率计算在世界排名第11，按相对

购买力指针计算世界排名第1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1,396美元，名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发达国家名录。

韩国政治体系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韩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拥有最高行政权，有权任命国务总理等政府官员，自1987年起由韩国国民直接选举产生，一届任期为5年，只能担任一届。韩国国会为一院制立法机关，通过单一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结合的方法选举，每届任期为四年。韩国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其最高司法机构是韩国大法院，成员由总统任命并由国会批准。另外韩国还设有宪法法院，用于保护宪法和保障国民的基本权利。

韩国实行多党制，其中中间偏右的国民力量和中间偏左的共同民主党是韩国最大的主流政党，左右着韩国的政坛。

国名

大韩民国声称其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权，自称“韩国”，得名于古代的三韩，而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做“北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亦声称其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的政权，自称“朝鲜”，而将大韩民国称为“南朝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92年与韩国建交以前，一直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视为代表全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拒绝承认大韩民国政权，将其称为“南朝鲜”，指其为傀儡政权，认为其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待解放的一个地区；直至1992年两国建交以后，才改以“韩国”称之。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与韩国断交以前，将大韩民国视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权并拒绝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台湾、香港、澳门民间及海外华人亦有习惯称大韩民国为“韩国”或“南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朝鲜”或“北韩”。不过韩国驻台代表部曾发公函致台湾各大媒体要求使用“韩国”勿称呼“南韩”。而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太司副司长李宗芬则表示尊重韩国意见，并称外交部一直都是以“韩国”或“Republic of Korea”称呼。

由于“朝鲜”和“韩”在西方语言中皆使用来自朝鲜半岛古代王朝国名的高丽（Korea、Corea、Coree等），因此没有类似汉字文化圈在使用“朝鲜”和“韩”上的问题。大韩民国正式英文名为Republic of Korea，通称South Korea（南韩）。在西方的朝鲜半岛移民绝大多数来自韩国，故有时亦简称为Korea。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文通称North Korea（北朝鲜），但极少简称Korea。

历史

朝韩分治前

根据考古所得，早在远古时期朝鲜半岛就已有原始人类居住。平壤祥原郡黑隅里遗址、忠清南道公州石壮里和马岩里遗址、忠清北道上诗里和浦田

里遗址相继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朝鲜半岛南北部都有人类生息。朝鲜半岛历史最初的奴隶制国家是古朝鲜。“朝鲜”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古籍《山海经·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尚书大传》对其含义的解释为“朝日鲜明”。对于古朝鲜的建国存在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两种说法。由于文献中箕子朝鲜内容的矛盾，加之考古发现的不足和朝韩民族主义因素等原因，箕子朝鲜的说法已被朝韩主流所否定。有人甚至认为箕子朝鲜是汉四郡时期的汉人或是后世慕华者编造出来的。公元前194年，卫满发动政变推翻古朝鲜准王即位，但继续沿用古朝鲜的国号，史称“卫满朝鲜”。公元前108年，卫满朝鲜被西汉所灭。

进入四世纪以后，高句丽在鸭绿江流域兴起，统一北部的各部落国家及灭亡汉四郡。在西南部，百济灭马韩54国。东南部的辰韩也由12国合并为新罗。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史称“三国时代”。公元7世纪新罗联合唐朝先后灭百济和高句丽。676年罗唐战争后，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大同江以北的高句丽故地被唐朝渤海国等继承。十世纪初，统一新罗分裂成为后三国（后高句丽、后百济、新罗）。918年，高句丽大将王建统一后三国，改国号“高丽”（高丽时代阿拉伯商人将此名称传播到欧洲世界，欧洲语言Korea、Corea的语源就是“高丽”）。

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政权改元建国，史称“朝鲜王朝”。朝鲜王朝以儒教治国，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国家统治理念。世宗大王时期，王朝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谚文的发明也为国内平民的文化普及提供了条件。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朝鲜王朝由于遭到后金和倭的攻击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19世纪后开始日益衰落。1876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依靠西方先进武器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获取自由勘测朝鲜半岛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权利。

清在甲午战争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高宗闵妃欲联合沙俄牵制日本，推翻朴泳孝亲日内阁，组建亲俄内阁，遭日本右翼杀害，史称“乙未事变”。此后的金弘集亲日内阁颁布“断发令”等改革法令，遭到朝鲜民众反对。以乙未事变和断发令为导火线，朝鲜爆发全国性大规模反日义兵运动，金弘集内阁垮台。俄馆播迁后，沙俄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而日本则在失去辽东之后，再次遭到重挫。俄日两国的对峙为朝鲜的独立提供了良机。为进一步实现独立，朝鲜群臣纷纷上奏高宗创建与中国和日本一样的帝制。在群臣多次建议下，高宗最终接受了文武众臣的建议，并于1897年10月12日在圜丘坛祭天并登基称帝，成立大韩帝国，改年号为“光武”，并开始进行适应工业化的光武改革。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战败后，日本在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势力进一步加强。1905年11月日本逼迫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使其成为保护国后，朝鲜半岛反日义兵运动再次高涨。1909年10月，朝鲜独立运动义兵参谋中将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将日本首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击毙。

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日本吞并朝鲜半岛。1919年，高宗暴毙，广大民众认为高宗是被日本人暗中投毒至死，全国各地纷纷酝酿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1919年3月1日，韩国独立人士在京城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向世界宣布韩国的独立，引发京城和朝鲜半岛其他多地民众的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是为“三一运动”。三一运动的独立浪潮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装起义。根据日本官方缩小的统计数字，三一运动期间被杀害的韩国人数有近8000人，1.6万人受伤，数万人被捕。三一运动被日本人镇压后，韩国独立人士纷纷流亡中华民国或者苏俄远东地区继续从事独立复国运动。1919年4月1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后随当时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于

1940年到达重庆。

南北分治后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年初雅尔塔会议的安排，原日占朝鲜由苏联和美国共同托管，苏联红军和美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朝鲜北部和南部。此后朝鲜半岛先后被划分为南北两块势力范围：由苏联军事政府管理的北部以及美军政厅统治的南部，两者在1948年后分别独立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大韩民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因苏联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缺席，导致当时美国等主导的联合国投票发动联合国军支持韩国。联合国军支持的韩国同苏联和抗美援朝方针指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议。朝鲜半岛沿三十八度线非军事区划分为两个国家。

1950年9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仁川，攻陷朝鲜占领的区域。

朝韩分治后，韩国经历民主与独裁统治的反复交替。第一共和国处于李承晚的独裁统治之下，直至1960年爆发四一九革命，民主的第二共和国创建。1961年5月16日，少将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推翻仅存在8个月的第二共和国，创建第三共和国，开始长达十八年的威权统治。朴正熙上台后致力于发展经济使韩国经济走上振兴之路。1972年，朴正熙通过公布“维新宪法”确立其任期终身制并创建第四共和国。1979年，朴正熙被暗杀后，陆军少将全斗焕发动“双十二政变”，夺取全国政权。1980年，全斗焕武力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将金大中和金泳三拘捕。1981年，韩国在全斗焕操纵下修改宪法，使全斗焕登上总统宝座，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1987年6月，韩国爆发大规模六月民主运动，其后经过公民投票。10月27日韩国国会通过第六共和国宪法，创建目前的第六共和国。12月19日卢

泰愚成为首位公正透明下的民选总统。1992年12月19日，金泳三当选韩国第14届总统，开启文人政府时代。

1997年12月19日，金大中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当选韩国总统，实现首次政党轮替。他开始改革韩国的经济体制，改善韩国与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对北问题上，金大中采取“阳光政策”，在2000年成功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在平壤进行首次南北双边会谈，并签署《北南共同宣言》。金大中因此于同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3]:98-99。金大中后的卢武铉政府基本延续前任政府的对朝友好政策。2007年10月2日至4日卢武铉步行穿过38度线进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然后乘车抵达平壤与金正日举行第二次朝韩首脑会晤。双方签署《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

2007年12月19日，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达成第二次政党轮替。2008年2月25日，李明博就任总统后开始调整对朝韩的政策。同年7月，一名韩国游客在金刚山遭朝鲜士兵枪击身亡。随着之后2010年天安号沉没事件、朝鲜核问题以及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发生朝韩关系一直紧张。2012年12月19日，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当选韩国史上首位女性总统，新世界党继续执政。2016年12月9日，崔顺实事件引发朴槿惠遭韩国国会弹劾，2017年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了朴槿惠的弹劾案。同年5月9日，韩国提前举行总统大选，文在寅当选第19任总统，并于次日宣誓就职。

地理

韩国地形

韩国地处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南段，三面环海，北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壤，西与中国隔着韩国西海（黄海）相望，东部和东南部与日本隔着韩国东海（日本海）相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约占半岛面积的45%。

地貌

韩国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其中三分之二是山地。北起黄龙山纵贯东海岸的太白山脉是韩国最长的山脉，全长约500公里，平均海拔1000米，构成韩半岛南部的脊梁。由于东海波涛的侵蚀，太白山脉东坡是悬崖峭壁和岩石小岛，西坡和南部较缓，形成平原和许多近海岛屿和小港湾。位于太白山脉北部的雪岳山是韩国东部山地的最高峰，高达1708米，因山顶一年有五六个月被白雪覆盖而得名。太白山脉中部耸立着五座相似的高峰被称为五台山，最高峰飞卢峰海拔1563米。太白山脉向西南延伸的部分被称作小白山脉，长约350公里，主要山峰有智异山（1915米）、俗离山（1058米）、德裕山（1614米）、伽倻山（1430米）等。以五台山为始点向西南延伸到忠清南道的山脉是车岭山脉，长约220公里。位于济州岛中部的汉拏山是韩国的最高峰，海拔1950米。汉拏山与金刚山和智异山被称为三大神山。

韩国的平原主要分布在南部和西部的河流及海岸地带，海拔多在200米以下。主要平原包括湖南平原（约500平方公里），全南平原（约300平方公里）、金海平原（约220平方公里）等。这些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是韩国的粮仓。

韩国雪岳山国立公园

蟾津江

由于韩国的地貌，韩国的河流一般是从北向南或从东向西入海。洛东江是韩国最大的河流，北起太白山脉流经大邱南至釜山入大韩海峡，长525公里。汉江长514公里是韩国的第二大河流。流经韩国首都首尔的汉江自古就是韩国人民发展生息的生命线。

韩国的湖泊较少，位于济州岛汉拏山山顶火山口的白鹿潭是韩国最大的天然湖泊，海拔1950米，湖面直径约300米，周长1公里，深约6米。位于江原道春川市东北13公里的昭阳湖是韩国最大的人工湖，面积6930万平方米，1973年建成。

韩国拥有3,000个大小岛屿。其中济州岛（1840平方公里）是韩国面积最大的岛屿，也是韩国主要的旅游热点之一。济州火山岛和熔岩洞200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列表。韩国的其它主要岛屿包括巨济岛（383.44平方公里）、江华岛（319.83平方公里）、珍岛（319.65平方公里）和南海岛（297.75平方公里）等。

气候

韩国属温带大陆性湿润和副热带湿润气候。一年四季分明，春、秋两季较短；夏季炎热潮湿；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韩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都会超过

30℃。冬季气温寒冷，内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20℃。首尔1月份的平均气温范围是-7℃到1℃。首尔8月份的平均气温范围是22℃到30℃。南部沿海地区冬季的温度会高些，而内陆山区的气温则非常低。

韩国年平均降水量为1500毫米左右，由南向北逐步减少。受东南季风影响，夏季雨水多而集中，6月底至7月底有“梅雨”。6-8月的降雨量为全年的70%。南部沿海地区在夏末时常有台风。首尔的年平均降雨量为1370毫米；釜山1470毫米。

韩国大部分地区为中温带，植被以韩松，阔叶落叶植物为主。韩国南部海岸和济州岛为暖温带。植被为阔叶常绿植被。

自然资源

韩国矿产资源种类繁多，但有开采价值的矿物数量很少。工业原料主要依靠进口，自给率仅为10%。由于缺乏中生代以后的海相沉积，韩国至今没有发现油田。能源矿产主要是无烟煤，但储量小。韩国储量相对较多的金属类矿物主要有金、银、铜、钼、铅、锌、镁、钨、锑、锡等。韩国非金属类矿物的储量很丰富。重晶石、云母、萤石和高岭土的储量很高。

韩国的植被以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主要植物有槭树、枥树、枫桦、紫椴、榆树等。南部沿海和济州岛的植被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植物有山茶、狭叶栎、竹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区如雪岳山、智异山、汉拏山等属于寒温带针叶林带，主要植物有落叶松、偃松、冷杉、红松、红皮云

杉、红豆杉等。

韩国高原地区的动物分布与中国东北、西伯利亚、库页岛和北海道北部地区类似，主要动物有鹿、狍、斑羚、褐熊、虎、猞猁、兔、麋鹿等；低地地区与中国东北南部和华北地区的动物分布相似。济州岛和郁陵岛与日本的动物种群有密切的关系，主要动物有黑熊、河狍、田鼠、白腹黑啄木鸟、环颈雉鸡等。

法律

宪法

韩国宪法法院

1948年，韩国公布第一部宪法并按宪法原则建国。在建国后的几个十年中，韩国对宪法进行了九次修订。最新的一次宪法修订时间是在1987年的第六共和国。《韩国宪法》包括序言、130项条款和6个补充规定，共分总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会、政府、法院、宪法法院、选举管理、地方自治、经济和修宪10章，主要有“国民主权”，实行“三权分立”和“总统中心制”，增加国民民主权利，和实行违宪审查制定四方面的核心内容。其基本原则包括国民主权、三权分立、寻求南北和平民主统一、寻求国际和平与合作、依法治国以及国家负责促进国计民生。

《宪法》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宪法》第103和106条明确规定“法官依据宪法和法律及其良知，独立做出审判”，法官“除被宣告为弹劾或禁锢以上的刑之外”不得被罢免。修改宪法只能由总统或国会大多数议员提出。修改的宪法需经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会议员和全民公决半数以上同意方能生效。

韩国宪法法院于1988年依据韩国第六共和国宪法第六章创建。韩国宪法法院是韩国的独立司法裁判机构，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创建特别的宪法裁决程序对有关宪法的问题进行裁决，以保护宪法和保障国民的基本权利。韩国宪法法院成员由韩国总统任命的9名法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来自韩国国会的候选人，三分之一来自大法院院长提名候选人，三分之一来自韩国总统的候选人。宪法法院的法官必须年满40周岁且符合十分严格的任职资格。

司法制度

韩国司法制度由最高法院大法院、宪法法院、高等法院、地区法院和一些特殊法院构成，为三审终审制。

地区法院是可以受理任何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一审法院。地区法院上诉小组有权处理由单一地区法院或分院处理的案件的上诉。市级法院只能负责金额在2000万韩圆以下、刑期在30天以内或罚金在200万韩圆以下的小案件的初审。地区法院分院的职能与地区法院基本相同，但没有处理上诉的权力。高等法院是处理地区法院和特殊法院上诉的二审法院。高等法院的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韩国大法院是韩国的最高法院，负责处理对二审法院判决的上诉。大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当事人对大法院的判决不能上诉只能服从。

政治

韩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及选举制度示意图

韩国政体由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组成。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韩国已经成功发展自由民主制。1987年，韩国举行第一次公平开放的总统选举，成为东亚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之一。《政体资料集》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世界概况》将韩国列为民主国家。

行政机构

韩国的行政部门实行总统制，是韩国三权分立制度的核心体制。韩国总统由韩国国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5年。为避免任何个人长期掌握国家权力，《韩国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连任。韩国总统通过由15-30人组成的国务会议行使行政权。

韩国总统的主要职能包括：作为国家元首负责接见外国使节，颁发嘉奖令、授勋和实施大赦；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的连续性和维护宪法；作为最高行政首长，负责推行国会通过的各项法律，并全权领导国务会议、各类咨询机构和行政部门，并有权任命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部长在内的官员；作为国军统帅，拥有包括宣战权在内的广泛军事政策制定权；作为国家的最高对外代表和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有权任命和派

遣外交使节，与外国签订条约；作为主要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者，可以向国会提出立法议案，并亲自或以书面形式向立法人员说明自己的观点。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但国会可以通过弹劾程序限制总统。总统任命的国务总理需由国会批准。

韩国目前的中央行政机关包括17部、3处、17厅、2院、5室、6委员会共计50个机构。1988年，韩国修订了《地方自治法》，恢复了地方自治制度；1991年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1995年举行了道知事和市长的选举。

立法机构

韩国国会是韩国一院制立法机关，按法律规定应由至少200个议席组成，每届任期四年，其中80%以上的席位由国民投票选举产生，其余的5%以上的席位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

韩国国会具有立法权、修宪权、财政审查权、外交和战争权、人事权、监督权和弹劾权等权力，负责审议并通过或否决各项法案；审核和批准政府财政预算；检查政府工作；批准对外条约以及同意宣战或媾和；审核宪法裁判所所长、大法院院长、国务总理、检察长和大法官的任命；弹劾总统和主要政府官员、否决总统的紧急命令等。

韩国国会机构包括议长1人、副议长2人及各专门委员会。韩国国会议长与副议长由国会议员匿名选举产生，负责主持国会会议。议长的任期按规定不能超出2年。议长和副议长职能上独立于其所在政党，而且不必是政府官

员。

司法机构

韩国司法机构独立于韩国行政和立法机构。韩国法院分为大法院、高等法院和包括专门性的专利法院、家庭法院和行政法院在内的地方法院三个级别。

大法院是韩国最高司法机构，也是管理韩国司法系统的行政权力机构。大法院成员由院长和13名大法官组成。大法院长由韩国总统任命并经韩国国会批准，任期6年，不得连任。韩国大法院长是韩国司法机构的首领，有权推荐大法官提名和任命下级法院的法官。高等法院是地方法院的二审法院。韩国在首尔、仁川、水原、春川、大田、清州、大邱、釜山、昌原、蔚山、光州、全州和济州13个城市设有地方法院。地方法院下设分院和市郡法院。

政党与选举

韩国实行多党制。目前的政党主要有国民力量、共同民主党等。国民力量和共同民主党是韩国的两大政党，左右韩国政治。

韩国选举包括总统大选、国会普选、地方自治团体以及地方议会的地方选举。韩国总统由韩国国民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任期为5年，而且不能连任。每个政党都可推荐一名候选人，无党派人士只要集齐5,000至7,000

名选民推荐就可参选。韩国国会议席每届任期四年，其中80%以上的席位通过简单多数制的国民投票选举产生，其余5%以上的席位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

行政区划

出于历史、人文以及地理方面的原因，韩国习惯上被划分为关东地方、首都圈、大田圈、湖南地方、岭南地方和济州地方6大区域[注 4]。关东地方是韩国东部大关岭以东地区，即韩国江原道的称呼。湖南地区是锦江以南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的别称。岭南地区是小白山脉的竹岭和鸟岭以南地区，即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大田圈指忠清南道和忠清北道。首都圈和济州地方分别指京畿道和济州岛。这些被沿用1000多年的地区说法与韩国的行政区划的界限不一定完全吻合。

韩国全国目前划分为一个特别市、一个特别自治市、六个广域市，以上八个皆为中央直接管辖的直辖市、八个道及一个特别自治道；以上一级行政区称为“广域自治团体”，共有十七个。广域自治团体以下之二级行政区则称为“基础自治团体”，全国共有73个自治市、86个郡、69个自治区。基础自治团体以下又分为面、邑、洞；再分为里、统以及最基层的班。

经济

韩国是20国集团成员之一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是拥有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经合组织发达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按国际汇率计算在世界排名第11，按

相对购买力指标计算世界排名第13。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未来11国中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在韩国GDP占有很大的比重，是世界第7大出口国和第7大进口国。自2002年10月与智利签署了首个自由贸易协定后，韩国目前已经先后与美国（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韩欧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韩加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中韩自贸协定）等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韩国经济的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1953年，韩国人均GNP只有67美元，到2007年达到20045美元成为发达国家，增长高达298倍。韩国在经济发展上所获取的成就在当初朝鲜战争结束时是不可想象的。韩国的基础建设在朝鲜战争中已被摧毁，百万计的韩国人当时在贫困和失业之中挣扎。1963年，朴正熙掌权后将发展经济列为头等大事，按照韩国国情开展韩国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朴正熙在当时提出的“对待工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的口号，成为当时韩国人的精神力量，使得韩国工人以当时美国工人十分之一的成本创造出美国工人2.5倍生产率。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韩国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则是发展 重工业、军工和化学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击韩国。韩国外汇储备锐减到39亿美元。汉江奇迹创造的财富大幅缩水。韩国财阀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也突现出来。许多数人将1997年当作是汉江奇迹的结束。1998年2月，金大中续金泳三执掌韩国政权后，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开展了企业、金融、公共事业和劳动保障四个领域的改革。韩国经济在1998年缩水7%之后，在1999年迅速增长9.5％。2001年8月15日，韩国的外汇储备已由危机时的39亿美元恢复到978亿美元，外汇储备量世界第五。金大中的改革同时也使韩国经济从低级产品出口型经济转变成信息高科技型经济。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袭击韩国。韩国一度被认为可能步冰岛后尘，成为第二个破产的国家。但不到一年，局势就反转，韩国竟成为OECD30个会员国中，复苏最快的国家。2009年，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呈现负增长的情况下，韩国经济实现了0.2%的正增长。2010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1%，时隔3年重新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人均GDP时隔3年后重新超过2万美元，外汇储备达2915.7亿美元，外汇储量世界第六。

金融

韩国的金融业由韩国的中央银行以及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构成。韩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负责执行韩国货币政策并发行韩国流通货币韩圆。除韩国银行外，韩国还有数个政策性银行比如产业银行、中小企业银行、水产协会银行等。韩国的主要全国性商业银行包括韩亚银行、国民银行、友利银行、新韩银行等。其中新韩银行创立于1897年，是韩国历史上第一家商业银行，而目前国民银行是韩国最大的银行。

成立于1897年的新韩银行是韩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民间银行，总部位于韩国首尔南大门旁边。

韩国交易所（简称KRX）是韩国唯一的证券交易所，总部设在韩国釜山广域市，2005年1月由原韩国证券交易所（KSE）、韩国期货交易所（KOFEX）和韩国创业板市场（KOSDAQ）合并而成，其主要指数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49]。韩国交易所的证券期货及其它派生产品交易量位居世界首位。2010年，韩国交易所派生产品合约交易量为37.52亿手，占全世界交易量的16.8%。据世界交易所联盟2008年的统计，韩国创业板市场KOSDAQ的成交量及换手率仅次于美国纳斯达克，其上市公司总市值位居世界第四。

交通

韩国从1967年开始兴建高速公路，连接首尔与仁川和釜山的京仁、京釜高速公路使韩国进入“高速公路时代”。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韩国目前已经建成纵横全国的高速公路网络“一日生活圈”。韩国国民可以通过高速公路在一天之内到达韩国任何一个城市。目前韩国有高速公路32条，总长4044公里，国道51条，总长13432公里。

截至2012年9月底，韩国铁路系统共有90条铁路线，总运行长度为3569.5公里，其中复线1904.4公里，电气化铁路2385.2公里。连接韩国主要城市的铁路运输由韩国铁道公社运营。2004年，京釜高速线的开通开始了韩国的高速铁路时代。继日本、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之后韩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高速铁路的国家。韩国高速铁道（KTX）是韩国高速铁路系统的运营商。韩国高铁设定时速为每小时350公里，实际运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300公里。从首尔至釜山乘韩国高铁仅需2小时40分。韩国高铁将高速公路形成的“一日生活圈”变成了“半日生活圈”，即半日内可到达韩国主要地区。

韩国现代Rotem生产的KTX-II高铁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 / 小时

韩国的主要港口包括釜山港、仁川港、群山港、马山港、木浦港、浦项港、东海港、蔚山港、丽水港和济州港。釜山港为韩国最大港口。1986年，釜山港开始跻身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2000年开始，釜山港曾连续3年稳坐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的地位，后逐渐滑落至第五大集装箱港。仁川港是韩国第二大港，也是韩国西海岸最大港口。光阳港是韩国第二大集装箱港。位于韩国东南部的蔚山港是韩国最大的油类货物进出口港。

2001年建成的仁川国际机场是韩国最大的机场，2014年旅客吞吐量为4491万人次。韩国其它的国际空港包括金海国际机场、济州国际机场、大邱国际机场、光州务安国际机场、清州国际机场、襄阳国际机场等。国内航线主要机场包括蔚山机场、丽水机场、木浦机场、泗川机场、浦项机场、群山机场、原州机场等。

大韩航空成立于1962年，是韩国最大的，也是亚洲最具规模的航空公司之一，“天合联盟”航空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韩国的第二家航空公司是韩亚航空，成立于1988年提供韩国国内和国际航班。韩国的航空公司一共运营297条国际航线。韩国其它的航空公司比如济州航空、釜山航空等以提供韩国国内航线为主，价格相比也稍低。

能源

韩国是能源消费大国，占世界能源消费的2.1%，居第八位。韩国95%的电力都由韩国电力公社供应，主要是火力发电和核电。2012年韩国能源消费中煤炭占28%，原油41%，天然气17%，核能12%，可再生能源1%。由于能源资源匮乏，韩国9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韩国是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和第二大煤炭进口国。韩国石油消费居世界第七位。2007年人年均石油消费16桶，居世界第五位。韩国有很大规模的原油加工工业，但是所有原油都需进口，因为韩国境内目前没有勘测到油田的存在，是世界第四大石油进口国。

韩国很重视核能的发展，是世界第五大核电生产国。韩国目前拥有23个核反应堆，总共十亿瓦电功率的装机容量。这是韩国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22%。韩国政府计划到2035年将核电的装机容量增加到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29%。

韩国也很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早在1987年韩国国会就制定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法》。2009年7月，韩国公布《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明确了发展绿色产业 ，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自立等战略，使韩国在2020年底成为全球七大“绿色大国”，2050年跻身全球五大“绿色强国”之一。此外 ，韩国还公布了《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和《绿色能源技术开发战略路线图》。

通信

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

韩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通信设施是1885年9月28日投入使用的连接首尔和仁川的一条长30公里的电报线。1896年，朝鲜王宫安装韩国第一批电话。民用电话是1902年开始本引入韩国的。1924年，首尔和中国沈阳开通国际长途电话。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实施，韩国开始设计比较完备的现代通信基础设施前景。20世纪80年代以前，电信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被人充分认识，韩国在电信方面的投资也很少。1979年

底，韩国全国仅有24万个电话用户，每100人只有6.3部电话，打电话要排长队。大部分的国内外长途电话都需要通过总机转接。进入80年代后，韩国的电信业开始得到长足的发展。1982年1月1日，韩国通过公共合作的形式成立韩国电信公社（KT），从通信部接管的电报、电话业务。与此同时，韩国还设立韩国数据通信公司，并修改相关电信领域的法律、法规。

在1982年开始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中，韩国加大对电信领域的投资，使韩国电话线路达到754万条，用户达652万，每100人拥有电话的数量增加到16部。使用电磁或电子交换系统的自动电话占到总电话线路的96.6%。为纪念1885至1985年韩国电信事业100周年，韩国在1985年建成全国公用数据电信网络。1986年，韩国成为世界第十个开发出TDX-1电子交换系统的国家。利用这项技术，韩国每年可增加100万条电话线路。1987年，韩国的电话线路已经超过1000万条，使每户都有一部电话。国际直拨服务也在1987年开通。2000年，韩国电话线路增加到2900万条，每100人拥有电话的数量上升到58部。

自1984年开通移动通信业务以来，韩国移动电话用户的数量在不断增长。2001年4月，韩国开展商用CDMA业务，使多媒体在移动通信上得到应用。2002年5月，韩国开展3G移动通信业务。2001-2004年，韩国移动电话用户的数量从2906万爆炸式地增长到3658万，几乎每个12岁以上的人都拥有一部手机。

制造业

韩国制造业作为韩国经济的主导产业经历了1962-1971年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1972-1981年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1982-1991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目前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转换与升级。韩国在钢铁、造船、汽车、半导体及数码产品等制造业有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多数产品拥有自主品牌，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钢铁工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为韩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韩国目前人均钢铁消费量居世界第一位。从1980年代后期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的钢铁工业主要是生产棒型钢、钢筋、线材等低附加值产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韩国钢铁企业致力于发展新技术，船用钢板、汽车用钢板等高附加值产品增长加快，低附加值产品开始出现负增长。韩国主要的钢铁生产商有浦项钢铁、现代钢铁、东国制钢等，其中浦项钢铁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也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制造商。

韩国是世界造船强国，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世界第一大造船国。全球船厂前十强中韩国占有七席，包揽前六位，其中现代重工、三星重工、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和STX造船海洋是世界前四大造船厂。韩国在建造高附加值船舶方面有显著优势。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是现代重工业的长项；在海洋勘探船方面，三星重工业则独占鳌头，占有世界市场60％的份额；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是世界大型油船的主要生产商，世界约有10%的大型油船由大宇公司出产。2007年5月，韩国独自建造出第一艘宙斯盾驱逐舰“世宗大王级驱逐舰”，使韩国成为继美国、日本、西班牙、挪威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宙斯盾驱逐舰的国家。

汽车制造业是韩国另一个支柱产业。2014年，韩国汽车产量为452万辆，占全球汽车总产量的5%。自2005年以来，韩国已经起连续10年蝉联世界第五

大汽车生产国。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是韩国最大，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商。韩国汽车是世界汽车制造业的后起之秀，现代汽车从1975年推出自己设计的第一款汽车到全球累计销售5000万辆的业绩只用了38年，而丰田达到这一数字用了超过50年的时间。汽车配件产业在韩国也颇具规模。2012年韩国三大轮胎制造商韩泰轮胎、锦湖轮胎、耐克森轮胎在全球轮胎75强排名中分别列第8、第11和第23位。

韩国是世界电子产品的佼佼者，内存、液晶显示器及等离子显示屏等平面显示设备和移动电话都在世界市场中具领导地位。世界知名的韩国电子产品制造商有三星、LG、SK等，其中三星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

农业

韩国农业资源禀赋非常稀缺，现有耕地面积1835.6千公顷（18.4%是农耕地），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韩国农产品因此较多依赖国外进口。除了大米和薯类能基本自给外，其他粮食85％需要进口。另外韩国60％以上的牛肉、鱼贝类，20%水果、禽肉和奶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只有砂糖和蛋可以完全自给。

韩国农业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业在韩国GDP的比重不断快速下降。1970年农业在GDP的比重为20.7%，而到2004年这一比例就已经下降到4.0%。韩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农业劳动力流失和老龄化问题严重。1970至2000年间，韩国农业就业人口比例由50%降到了8.5%。韩国农民的收入水平较高，人均年收入1.35万美元（2005年）。城乡收入差距小，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例是0.84:1。

韩国农业生产结构中种植业特别是大米的比例较高，而畜牧业等的比重小。不过粮食作物的面积有减少的趋势，高附加值作物、蔬菜和水果的面积在种植业中的比重在增加高经济附加值的作物高丽参和芝麻占韩国农业生产的1.6%。

韩国政府对农业一直采取保护扶植政策，农业补贴占韩国GDP的4.7%，居世界前列。韩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实行许可制和高关税制以保护本国农业发展。韩国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农产品价格平均高2.85倍。不过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韩国也不得不逐步开放农业市场。这使得相应的国内生产大幅度地减少。韩国农民经常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开放农产品市场。此外，作为农民合作组织的韩国农业协会还宣扬“身土不二”的理念，劝诫韩国人要吃本国米、果蔬和肉类等，以抵制外国农产品。

科技

韩国三星电子是世界最大的储式半导体生产商

20世纪60年代，韩国开始倡导“科技立国”，1966年成立了首个综合性科研机构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经过对本国科技的培育与扶植，20世纪80年代，韩国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到技术创新的跨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韩国经济。执政的金大中政府为应对危机，将发展高科技信息产业确定为国家战略。2003年，韩国开始实施“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2006年，韩国已经在半导体、手机、液晶显示器、互联网普及率和造船业的竞争力在IMD科技竞争力排名中世界第一，技术竞争力世界第六，科学竞争力世界第7。在彭博社《2015年全球创新力排名》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

学和英士国际商学院联合发布的《2015年环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韩国分别位居榜首和第十一位。

20世纪90年代，韩国开始成为世界半导体存储技术的领跑者，半导体也开始发展成为韩国最具竞争力和主导产业之一。1994年、1996年和2001年，韩国分别在世界上率先研发出256M、1G和4G的DRAM。2014年四季度，韩国在世界半导体DRAM市场的份额超过了70%，创下历史新高。韩国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是目前世界最大的两个DRAM生产商。2015年，三星电子又在世界率先开发出256GB V-Nand半导体。

韩国是世界核能的后起之秀。2007年，韩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具备自行研发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韩国核电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运行效率，核电厂容量因子、平均功率损失率、非计划停堆率等指标世界领先。2009年底，韩国力压美国、法国等世界老牌核电出口国，成功赢得阿联酋价值200亿美元的四座轻水核反应堆核电站建设合同，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核电站出口国。此外，韩国还致力于发展比核裂变能量更大，而且近乎零污染的核聚变发电技术。1995年，韩国投资3090亿韩圆（25亿人民币）建造了世界上首一个采用新型超导磁体材料产生磁场的全超导聚变设备KSTAR。2010年11月8日，KSTAR首次成功实现了等离子体约束状态的H模式。这是世界首次用超导热核实验设备实现H模式，对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项目的进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价值。

外交

韩国2013年已与世界上192个国家创建外交关系，是联合国、世贸组织、经合组织、东盟十加三、20国集团的成员国，也是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创始国之一，在国际舞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韩国是1996-1997年，2013-2014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2001年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国。韩国还成功举办了2000年第三次亚欧会议、2005年APEC会议以及2010年的20国集团第5次峰会。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世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韩国调整其以往只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外交政策，开始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接触。1988年，卢泰愚当选韩国总统后，借助198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有利时机推行“北方政策”，积极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在其执政期间，韩国先后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和越南创建了正式外交关系，为韩国外交拓宽了更大的空间。1993年，金泳三文人政府开始提出“世界化、民间化、多边化、多元化、区域合作和面向未来”的外交政策。在金泳三之后的韩国各界政府也都积极推行了多边外交政策。

韩国政府将朝鲜半岛和解与合作当成国家政策的重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政府就开始试图推动韩朝和解。1991年9月17日，韩国和朝鲜最终同时加入联合国。1998年，金大中执政后对朝鲜实行了“阳光政策”，并在2000年6月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举行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首次韩朝首脑会谈，南北关系得到空前缓和与发展。卢武铉执政时期，南北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但李明博上台后，韩朝关系开始走向对峙。朴槿惠执政后，对朝推行“朝鲜半岛信任进程”，韩朝关系略有改善，后因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和发射“光明星4号”卫星后，双方关系陷入僵局。2018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韩朝关系得到缓和。 同年4月27日，文在寅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韩朝边境的板门店“和平之家”举行了首脑会谈，并

签署了《板门店宣言》。

军事

由于韩国历史上饱受战争之苦以及韩半岛的南北对峙，韩国GDP的2.6%和政府开支的15%都用于国防建设。韩国拥有世界第6大的现役军人人数和第2大预备役队伍。韩国目前现役军人人数为63万和预备役部队297万，这相对与韩国5000万的人口总数来说是个庞大的数字。韩国国军由陆军 、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预备军构成。韩国总统是韩国三军统帅。韩国实行义务役征兵制，依照韩国法律，20到30岁之间身体健康、无残疾的韩国男性需要服义务兵役，一般服役期限为两年。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为适应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制定了“适当压缩陆军，大力加强空海军，使三军协调发展”的军队建设方针。20世纪末，韩国《战略空军建设发展规划》提出发展空天一体化的“战略空军”的构想。韩国海军正致力于打造一个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战略机动舰队，从而使韩国海军加入世界蓝水海军之列。

朝鲜战争停战后，韩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此后，美国在韩国驻军帮助韩国维护国防。1994年12月1日，韩国收回了除战时指挥权之外的军事主权。驻韩美军由主导角色转变为支持角色。1967年2月韩美签署《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后，韩国开始拥有对驻韩美军名义审判权。2002年2、3月以后，驻韩美军恶性犯罪引渡给韩国警方。韩国警方对杀人、强奸等恶性犯罪在逮捕嫌疑犯时可以持续拘留而不必先交给美军。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先后参加了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1991年以来，韩国开始积极展开以多国部队维和活动及国防合作活动为目的的海外派兵，先后向索马里、黎巴嫩、南苏丹等18个联合国任务团派兵13000多名，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2014年12月，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通过了

《海外派兵法》，使韩国除“根据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决议的维持治安及稳定、人道主义援助、恢复重建等活动外”，“获得联合国、多国联合部队或特定国家的邀请”也可以对外派兵。

人口

韩国是单一民族国家，2015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为5106.9万。韩国是高人口密度国家，2015年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509人，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口分布在韩国很不均匀，人口大多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为82.5%。2015年，包括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人口总计为2527.4万，占到总人口的49.5%。

韩国人口出生率为每千人8.26，生育率为1.25，是世界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世界概况》发布的韩国人预期寿命在2014年是79.8岁，世界排名第39。韩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是OECD国家中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下降最快的国家。

韩国的官方语言为韩语（朝鲜语）和韩国手语。包括整个朝鲜半岛在内，全球约有7560万人使用韩语。随着韩国在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学习韩语的人数也不断增长。目前许多国家的大学和高中都教授韩语。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韩语可以作为大学入学考试中的一门外国语。

韩语使用的韩文是表音文字，每个字可以根据其构成拼读出来，不需要另

外单独的拼音系统。韩语共有40个字母，包括21个元音和19个辅音。元音又分为单元音（10个）和双元音（11个）。元音是韩语音节的中心，辅音只有和元音结合才能构成文字。

韩语的词汇类型可分为固有词、汉字词和外来语三种。固有词是韩民族自古流传下来的本民族自己固有的词汇，是韩语词汇的核心部分。韩语日常用语绝大多数用的都是固有词。绝大部分汉字词来源于汉语。汉字词读音遵照韩国汉字的读音规则，词义大部分与汉语相同，但也有些差异。汉字词在数量上要占到韩语词汇一半以上。外来语是指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借鉴过来的词语，以英语居多。

韩语（朝鲜语）的方言按地区分布可以分为西北部方言、东北部方言、中部方言、西南方言、东南方言、济州方言6种。除了济州方言以外，其它地区的方言都很相似，彼此可以听得懂。今天的“标准韩国语”是以中部方言的首尔话为基础的。由于首尔是朝鲜王朝的国都，因此“标准韩国语”更接近于朝鲜半岛分裂前的官方语言。

宗教

依韩国宪法，韩国人有宗教信仰自由。根据2015年的统计，27.6%的韩国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占全国19.7%，天主教7.9%），15.5%信奉佛教。其它宗教包括儒教、伊斯兰教和各种新兴宗教比如甑山教、天道教和圆佛教。韩国本土原始宗教是萨满教。

基督教是韩国最大的宗教，占总人口27.6%，约有1356万人，包括970万新教徒和390万天主教徒。2005年以来，新教徒的人数在慢慢增加，而天主教徒则开始渐渐减少。佛教372年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成为高丽的国教，直到朝鲜王朝时期被儒教所取替。韩国目前有1100多万的佛教信徒，其中90%的信徒是曹溪宗。儒家思想在现代的韩国社会依然起着广泛的影响。

天道教前身是19世纪中叶西学东进时期出现于朝鲜半岛的东学教，1906年由东学第三任教主孙秉熙改组为近代宗教。与其它大多数宗教不同，天道教否定来世的存在。教祖水云大神师认为天堂与地狱不是存在于相互分离的遥远来世。天主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人之初都是一样的，并无社会阶级上的差异。每个人通过自身修行“侍天主”，就可以成为“君子”、“地上神仙”，从而“同归一体”。天道教第二任教主海月神师将水云的“侍天主”发展成为“人是天”，“事人如天”，即像对待天主一样对待人。到第三任教主义庵圣师时期，这种理念发展成为“人乃天”，天道教的核心教理。不过天道教的“人乃天”并不是将人视为至高无上。天道教还有“三敬思想”，即敬天、敬人、敬物。天道教的“地上天国”是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道教的目的是通过“辅国安民”“布德天下”“广济苍生”解救民众于混沌的现状，通过“后天开辟”，创造一个万物和谐、“同归一体”的“地上天国”。

社会

教育

教育在韩国被称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二经济。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创造“汉江奇迹”。在韩国成功的背后，“教育立国”战略是根本原因之一。1961年，韩国人均GDP仅为80美元，80%的人口为文盲。韩国政府将15-20%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1975-1985年间，韩国的教育经费从

2.2亿韩圆增加到35.3亿韩圆，增长近16倍。不仅如此，韩国每年还从世界银行贷款6000万美元用于教育。目前韩国已经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消除文盲，是世界识字人口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和科学竞赛中一直保持着出色的成绩。2011年，韩国23-34年龄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凭的比例达到64%，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 39% 的水平。在2014年英国培生集团（Pearson）第二次实施的“全球教育强国”调查中，韩国超越2012年排名第一的芬兰，综合排名第一，成为世界教育强国。

《韩国宪法》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20世纪80年代，终身教育写入《韩国宪法》。韩国学制为6-3-3-4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小学和初中是免费义务教育，并将在2021年全面实施高中免费义务教育。韩国的大学根据设立的主体不同可分为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及私立大学，其中私立大学的数目占到80%以上。所有高校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要接受韩国教育部的监督。韩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是成均馆大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398年成立的朝鲜王朝最高学府成均馆。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三所著名高校在韩国很有影响。因其英文缩写首字母为“SKY”，被称为韩国大学一片天[143]。许多韩国政要都是SKY大学的校友。另外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和浦项工科大学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传媒

韩国报刊有100余年的历史。1896年，徐载弼创办的《独立新闻》是韩国近代第一份民营韩文报纸。目前韩国的传统媒体主要是韩国的三大报纸（《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和韩联社。《朝鲜日

报》和《东亚日报》创办于三一独立运动之后的1920年，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两份报纸。韩联社成立于1981年，是韩国国家通讯社。韩联社在欧洲、北美、中东、东南亚和南美设有42家分社，发挥着韩国与世界间的桥梁作用。韩联社还拥有韩国最大的地方新闻采集网。

韩国的第一家电视台是成立于1956年的一家首尔私营商业电视台。韩国目前主要的全国性电视台包括韩国放送公社（KBS）、教育放送公社（EBS）、文化广播公司（MBC）和SBS股份有限公司（SBS）。KBS-TV于1961年12月由韩国政府创立，是韩国最早的公营电视台。EBS是韩国国营教育电视台兼广播电台

NAVER和DAUM是韩国两大门户网站，基本垄断了韩国的网络媒体业务（NAVER的市场份额占到73%，DAUM20%）。NAVER成立于1999年，是韩国最大的网站，也是其最大的搜索引擎，年收入大约为100亿元人民币，比三大报业总收入还多出3000亿韩元。

社会保障

韩国自1960年以来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法规。在全斗焕执政期间，“福利国家”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来。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有待进一步完善，但韩国创建起福利国家所用的时间却是很短的。韩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服务三方面。

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雇佣保险、产业灾害保险。1988年韩国修定《国民养老保险法》，首次实施了国民养老保险制度。1999年养老保险和退休金制度惠及到全国国民。医疗保险从1977年开始实行。医疗保险以投保人的保险费为主，国库补助或其他利息收入为补充。雇佣保险于1995年开始实行。与失业保险不同，雇佣保险不仅对失业者进行救济，而且用积极的政策手段尽可能防止失业的发生。雇佣保险费分为失业保险费和雇佣安定与职业能力开发事业保险费两类。失业保险费由雇主和被雇人各负担一半，雇佣安定和职业能力开发事业保险费则由雇主全部负担。产业灾害保险是最早普遍实行的社会保险，保险费由雇主一方负担，保险对象是因工而伤、疾病、残废、死亡。

公共救济是通过国家财政资助低收入阶层来保障国民最低生活标准和支持国民自立的制度，主要分为生活保护、有功人员津贴和灾害灾难救济三种。生活保护分为自救保护（有劳动能力）、居宅保护（无生活能力而在家受保护者）和设施保护（需要收容到社会福利设施内）。有功人员津贴是韩国政府对殉职或公伤的军人、警察和公务员，爱国志士等有功人员及遗属发放的各类津贴、抚恤金以及公共费用减免等。依照韩国1962年颁布的《灾害救护法》，韩国政府对因自然灾害等而集体发生多数罹灾者时进行灾害灾难救济，所需费用由国库负担70%，地方政府负担30%。

社会福利服务主要以社会化的老年人、儿童、妇女和残疾人福利等为主，包括建设老年福利设施、减免65岁以上老年人公共费用、设立有儿童咨询所、婴幼儿设施、母子保护设施、妇女职业辅导设施、女性会馆等。另外依照相关保障残疾人福利的法律，韩国政府通过设立残疾人福利设施、特殊学校为残疾人提供福利，并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便利。

文化

韩国文化由韩国传统文化派生而来。韩国战争后韩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北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韩半岛在历史上与古代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韩半岛传统文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不过韩半岛传统文化仍保留有其独特的特征。韩国现代文化是韩国现代化的产物。随着韩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韩国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而构筑了现代韩国文化。韩国文化在亚洲和世界的流行被称为韩流。

建筑

韩国的传统建筑与中国和日本的传统建筑有很多相似之处，受到阴阳、天地五行、风水、佛教、道教和儒教等的影响。自然是韩国建筑最重要的因素。韩国建筑不追求高大雄伟，而是讲究建筑对自然的尊重，和谐于自然。传统的韩国建筑很少在规模和装饰上有铺张炫耀。房间相对较小，装饰也比较简单。据认为，富有修养和君子风度的人的房间主要是用于读书和谈论学术的，不应在装饰上显得浮华。

19世纪末，西方建筑开始传入韩国。西方和日本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在这一时期在韩国修建了教堂和办公楼，例如哥特式的天主教堂明洞圣堂（1898年）、文艺复兴式的韩国银行总行大楼（1912年）和首尔火车站（1925

年）以及罗马式的圣公会教堂贞洞堂（1916年）和首尔市政厅大楼（1925年）。1916年，韩国的学校开始教授西方建筑学和工程学。活跃于30年代初的韩国建筑师包括设计和信百货公司大楼的朴吉龙和设计高丽大学校主楼的朴东镇，是韩国现代建筑的早期开拓者。

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建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韩国建筑师在这一时期将韩国建筑引入了博采众长的境界。一位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金重业，另一位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金寿根。1960年代，金重业设计的法国驻韩大使馆和金寿根设计的自由中心为当时的首尔建筑添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象。其它一些有影响的建筑包括金重业设计的三一路大楼，严德纹设计的世宗文化会馆，朴春鸣设计的大韩生命保险公司大楼；金寿根设计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堂京东堂和设计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等。

文学

韩国古代早期文学作品大多在战火中被焚毁，很少留世。现存最早的古代诗歌是载于《三国遗事》的《龟旨歌》，最早的汉诗是《黄鸟歌》。统一新罗时期，韩国古典文学出现空前的兴盛。国语诗歌“乡歌”在八九世纪达到高峰，同时也出现了强首、薛聪、金大问、崔致远等儒学大家。文学体裁形式也开始多样化，出现了史传文学、传奇文学《崔致远传》，长篇纪行散文《往五天竺国传》，寓言《花王戒》。

高丽时期，时调发展成为国语诗歌正统体裁。汉文诗、词、骚、赋、传记文学均有名作出现。朝鲜文学史上的三大诗人中的两位李奎报和李齐贤都是出自高丽时期。高丽后期还出现稗说体散文，为后世小说的出现产生积极的影响。朝鲜王朝时期，时调从最初的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此同时，歌辞作为“长歌”形式也成为与时调并行发展的国语诗歌体裁。汉文诗歌的创作也蓬勃发展。散文在朝鲜王朝时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出现国语散文。朝鲜叙事文学的发展，训民正音的发明，城市平民读者群的形成，以及中国小说的流入，促使小说文学兴起，出现了《金鳌新话》、《洪吉童传》、《九云梦》、《玉楼梦》、《春香传》、《沈清传》、《兴夫传》等名作。

19世纪末，西方文明开始冲击朝鲜半岛，拉开韩国近现代文学的序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近代的侵略，韩国近代文学因此有着反帝、反封建的一面。1950年代的韩国文学作品主要是揭示朝鲜战争给人民物质和精神上造成的创伤。1960-70年代的韩国文学主要是表现南北问题的认识、农民生活、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病、经济发展后的富裕生活等。朴景利的《土地》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小说。这一时期的其它代表作包括崔仁熏的《广场》、安寿吉的《北间岛》、黄皙暎的《去三浦的路》、吴贞姬的《火的江》等。1980年代，大河小说焕发生机，代表作有黄皙暎的《张吉山》等。1990年代，大量商业小说开始出现，比如洪盛原的《月和刀》。另外许多女性作家开始在韩国文坛出现。

陶瓷

高丽青瓷之镶嵌青瓷

韩国在铁器时代就能用龙窑制做质量上乘的陶器。三国时期，韩国陶器传

入日本，是为日本古坟时代的须惠器。9世纪后期，统一新罗从中国引进制瓷技术，成为世界上最早引进制瓷技术的国家之一。

韩国高丽时期的制瓷技术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创造出翡色青瓷、镶嵌青瓷等独具特色的高丽青瓷，并出口到包括青瓷发祥地中国在内世界其它国家。学术界有观点认为高丽青瓷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其母体宋代青瓷。朝鲜王朝时期，韩国陶瓷在“尚白”的风尚下由青瓷经粉青沙器过渡到朝鲜白瓷。通过学习、借鉴中国瓷器，朝鲜烧制出纯白瓷、镶嵌白瓷、铁画白瓷等具有本土特色的瓷器品种，并结合本民族审美艺术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风格。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制瓷技术从韩国传入日本，使日本从陶器时代进入瓷器时代。日本有田烧、萨摩烧等都是从韩国传入日本。

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日本的侵略，韩国陶瓷走向衰落。韩国光复后，首尔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弘益大学等高等院校纷纷陆续开始教授陶瓷课程。1955年，韩国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成立了复兴传统陶瓷文化的首家研究机构——造型文化研究所。进入21世纪后，韩国在京畿道利川，创建了陶瓷财团。韩国每年以利川为中心举行世界陶瓷博览会。

电影

自19世纪末电影首次被引入韩国以来，韩国电影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朝鲜战争后，韩国电影进入繁荣期，数量和质量都获取较大的进步。1970年代，由于朴正熙的独裁统治，韩国电影很快从繁荣走向萧条。朴正熙维新体制解体后的198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出现转机。进入1990年代后，特别是1996年废除电影审查制度后，韩国电影再次进入快速发展期。1993年-

2005年，韩国电影在本国市场的占有率从15.9%上升到60%，票房翻了两番。1993年，林权泽执导的有关韩国传统艺术盘索里的视频《西便制》获取历史性的成功，突破100万观众的大关。1999年，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放映仅21天就突破《西便制》的百万票房纪录，最终创下580万的票房，超过当时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在韩的票房纪录，引发韩国大片的热潮。2003年和2004年，《实尾岛》和《太极旗飘扬》两部大片使韩国电影开启1000万观众的新纪元。在电影观众数目几何级增长的同时，韩国在2002至2004年的两年内收获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世界三大影展的最佳导演奖。2020年2月，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在获2019年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后，又在2020年2月斩获奥斯卡最佳视频、最佳导演、最佳原创、最佳国际视频4项大奖，成为首部赢得奥斯卡最佳视频的非英语电影。

韩国每年举行包括釜山国际电影节、富川国际电影节、全州国际电影节、光州国际电影节等20多个国际电影节。其中，开始于1996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韩国主要的电影奖项有大钟奖、青龙奖、春史电影艺术奖。其中，春史电影艺术奖由韩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为纪念电影开拓者春史罗云奎导演（1904-1937年）于1990年创建，完全由电影人来经营。为了收集、保存韩国电影，韩国从1996年开始实施电影义务纳本制度，电影公司义务向韩国映像资料院提供电影拷贝。1997年以后制作的韩国电影全部保存。

电视剧

韩剧在1980年代随着彩色电视的普及而兴起。1987年，韩国实现民主化后颁布了新的《电视法》，后又在1990年做了修订，允许民营电视台和有线

电视台进入电视广播产业。1991年，民营商业电视台SBS的成立使韩剧产业形成KBS、MBC和SBS三足鼎立的格局，各电台间的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电视剧市场开始出现分化，电视剧类型也开始多样化，出现了家庭剧、青春偶像剧、历史剧、时代反思剧、情景喜剧等各种类型。1997年，韩剧《爱情是什么》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热播，使韩剧开始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流行，成为“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开始，韩剧与韩流在世界更大范围流行，进入兴盛期。

传统的韩剧采用“PD合一”的制作模式，即制片人与导演的职责由一个人来担任，被称为PD（Producer和Director的首字母组合）。此外，韩剧采取“边写、边拍、边播”的体制。电视剧开拍前一般只需三分之一的剧本和梗概。电视剧的播放一般也只需30%左右的完成片。为追求收视率，剧组人员可根据观众的需求确定剧情的发展和最后的结局。韩剧在制作上普遍采用双机位或三机位拍摄，而且不会打乱顺序在同一个场景拍摄多个剧情，为演员情绪和表演的连贯性提供保证。此外，韩剧还非常重视后期的调色。

韩剧体现着韩国东西合璧混合文化的特点，通过挖掘人性之美，褒扬真、善、美，塑造执著、坚忍、充满朝气的人物形象，倡导夫妻恩爱、孝敬父母、诚实守信，珍惜亲情等传统儒家思想。曾风靡一时的Fusion史剧《大长今》在湖南卫视播出的时候，甚至被冠以了“青春励志片”的宣传口号。《天国的阶梯》、《冬季恋歌》等爱情剧则演绎的是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韩剧大多很“洁净”，正面人物多斯文有礼、遵章守纪，即使是热恋的情侣也很少有过火的镜头，可以在任何时段播出，适合全家人一起观看。

音乐

韩国当代音乐分为传统音乐和西洋音乐。传统音乐又称为“国乐”，主要包括唱剧、板唱和民俗音乐。韩国第一个交响乐团是1945年9月成立的韩国交响乐团，之后又出现了首尔市立交响乐团（1957年）、KBS交响乐团（1956年）等交响乐团。韩国乐坛有个著名的郑氏家族，包括“东洋魔女”小提琴演奏家姐姐郑京和、大提琴演奏家妹妹郑明和、世界级指挥家哥哥郑明勋。韩国女童大提琴家张汉娜在12岁时获得罗斯特罗维奇国际大提琴比赛大奖和当代音乐奖。男中音歌唱家崔铉洙在1990年莫斯科举行的第九届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声音组得到最高奖，并获得了柴可夫斯基奖。其它韩国歌唱家还包括曹秀美、申英玉等。

国民歌手赵容弼是20世纪70-80年代韩国流行音乐的巨星。他1972年出道发行的单曲专辑《回到釜山港》，销量达到100万张。这在当时人口只有3300万人的韩国是个天文数字。1992年出道的徐太志和孩子们通过融合西方音乐与韩国文化，成为韩国流行音乐的分水岭。2000年2月，韩国组合H.O.T在中国北京成功举行韩国流行乐首个海外音乐会。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Baby V.O.X的单曲《Coincidence》开始走红亚洲。同年，宝儿在日本发行的专辑《Listen to My Heart》荣登日本Oricon排行榜首位，成为韩国首位获得Oricon排行榜冠军的艺人。2006年歌手Rain成为韩国首位入选美国《时代杂志》百大人物。2008年1月16日，韩国组合东方神起的单曲《Purple Line》登上日本Oricon排行榜首位，成为首个荣登日本Oricon排行榜首位的非日本男子组合。在此之后，大量的韩国流行乐开始进入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2011年，BIGBANG获得欧洲主要音乐奖项MTV欧洲音乐大奖。2012年PSY的单曲《江南Style》借助YouTube迅速红遍全球，西方领导人甚至在外交场合聊侃PSY和韩国流行文化。2017年5月21日，防弹少年团在第24届《美国告示牌音乐奖》获颁最佳社交媒体艺人，并以3亿的投票数

打破了Billboard纪录，成为此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亚洲歌手。

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业在韩国是个发展迅速的产业，1998－2008年间，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产业规模在十年间增加八倍。韩国网络游戏的兴起开始于1996年《风之国度》上市。《风之国度》超越了基于图形网络游戏的象征性意义，从而改变了韩国游戏市场的样式。对遭遇非法复制的的游戏市场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作用，成为游戏市场新诞生的典范。《风之国度》的成功使网络游戏迅速商业化。1998年《天堂》上市后获取巨大商业成功，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者进入网络游戏行业。韩国目前已是世界网络游戏出口大国，2012年韩国游戏出口额达到26.39亿美元，是2012年韩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46.11亿美元）的57%远超音乐、电影、电视剧等。2017年韩国蓝洞推出了绝地求生 PUBG 广受全球好评

饮食文化

韩国料理口味以清淡为主。稻米是韩国人最普遍的主食。石锅拌饭、紫菜包饭、韩式炒年糕、泡菜炒饭、韩国烧烤等都是韩国料理中常见的主食。在韩国，牛肉是肉类中最贵的，而猪肉和鸡肉的价格都相对便宜。韩国本地产的牛肉被称为“韩牛”。“韩牛”经精心饲养肉质鲜美，在韩国是价格最贵的牛肉，也是上乘的礼品。

与其他饮食文化不同，汤在韩国料理中不是饭前或饭后的配菜，而是与主食一起食用的主菜。韩国料理中的汤一般放有肉或海鲜，汤水较少。常见

的汤有参鸡汤、大酱汤、先农汤、水饺汤、泡菜锅、纯豆腐汤、海带汤等。泡菜是韩国料理中的重要成员。韩式泡菜种类繁多，其类别在韩国各地有所不同。韩国人在不同的季节也食用不同的泡菜。由于韩国泡菜卡路里含量低、富含纤维素、维生素和一种对人体有益的乳杆益生菌，韩式泡菜被美国时代华纳《健康杂志》评为世界5大最健康食品之一。韩国料理中常见的面条有韩国冷面、骨董面、杂菜等。韩国代表性的甜点小吃包括打糕、韩菓等。

与中国、日本和越南的餐桌礼仪不同，盛米饭和汤的碗是不应该被拿起的。韩国人使用金属作的长柄匙来吃饭喝汤。韩式的筷子是扁平的金属筷子，只用来夹菜，不用来吃米饭。年轻人不应该在长辈或客人之前拿起筷子吃饭，也不应该在长辈或客人之前吃完饭。

韩国酒文化

韩国料理与韩国酒

韩国是酒精饮料的消费大国，人均酒精消耗量位居世界前列。韩国烧酒是韩国国内消费量最大的酒精饮品，也是世界上最畅销的酒，其中韩国著名的烧酒品牌真露居世界烈酒销量之首。韩国烧酒口感清新、酒精度数低、价格便宜在欧美是非常受欢迎的白酒。2008年，美国著名的韦珀斯特字典已将韩国烧酒“Soju”一词正式收录其中。除烧酒外，韩国常见的酒还有清酒、浊酒、果酒、花酒、药酒等。啤酒在韩国也越来越受欢迎。海特啤酒是韩国最大的啤酒生产商。2005年，海特啤酒与真露合并成为海特真露集团。

韩国人喝酒很讲究，要相互倒酒以表示友谊。为别人斟酒，一定要用右手拿瓶，左手要扶着右手，以示尊重。用左手斟酒被认为是不礼貌的。接受者也要双手捧杯，以示谢意。与中国人不断地为客人续酒有很大的不同，韩国人喝酒不喜欢续酒，而喜欢一杯喝完再倒。晚辈与长辈喝酒时，晚辈要先向长辈倒酒。在长辈先喝酒后，才能饮酒。饮酒时不能面对着长辈而要把脸稍转向左侧再喝。

韩国茶文化

水正果和韩菓

韩国的茶叶最初是在朝鲜三国时期从中国引入，历史上曾盛行。朝鲜王朝中后期茶叶开始在朝鲜半岛衰退，不过1980年代以来，茶叶茶开始在韩国复兴。韩国茶礼作为韩国茶仪式有千年的历史。韩国茶礼以“和、敬、俭、真”为宗旨。“和”，即善良之心地；“敬”，即敬重、礼遇；“俭”，即俭朴、清廉；“真”，即以诚相待。韩国的茶礼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按名茶类型区分，可分为“末茶法”、“饼茶法”、“钱茶法”、“叶茶法”四种。

与茶叶茶不同，韩国传统茶在韩国非常流行。传统茶不使用茶叶，可以放几百种材料，大多数会加入蜂蜜。“传统茶”不用开水冲泡，而是将原料长时间浸泡、发酵或熬制而成，是一种天然与健康的饮品。常见的韩国传统茶有人参茶、菩提茶、五味子茶、柚子茶、水正果、红枣茶等。

体育

韩国政府非常注重国民体育，鼓励体育相关的产业发展，提高体育设施水准，逐步提升国家在对外竞技上的实力。韩国已经成功举办了198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2003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1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2018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多个世界体育赛事和数个亚运会，并获取很好的成绩。

跆拳道

跆拳道是韩国的国技，有“腿击术王中王”的美誉。“跆拳道”一词是1955年由崔泓熙创造，其中“跆”指踢击、“拳”指拳击、“道”则是代表道行和自身对礼仪的修练。成立于1973年的世界跆拳道联盟总部设在韩国首尔，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锦标赛。跆拳道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国广为推广并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棒球是在韩国最受大众喜欢的球类运动。韩国从1982年开始组建职业棒球队，目前有LG双子、NC恐龙、韩华鹰、起亚虎、三星狮、罗德巨人、斗山熊、SK飞龙、KT巫师、耐克森英雄10支职业棒球队。200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韩国获取了棒球比赛冠军的好成绩。

足球是另一种在韩国广受欢迎的球类运动。韩国顶级足球联赛是K联赛，成立于1983年是亚洲最早创建的职业足球联赛。目前韩国已经9次入选世界杯足球赛。2002年，韩国与日本联合举办了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并获取殿

军的成绩。

节假日

韩国的节假日分为“国庆日”、“国旗揭阳日”和“公休日”三种。三一节（3月1日）、制宪节（7月17日）、光复节（8月15日）、开天节（10月3日）和韩文日（10月9日）是韩国的五个“国庆日”。“国庆日”在韩国是指全民共同庆祝的重要节日，与中国的国庆节有所区别。根据韩国国旗法，韩国各家各户和道路两旁鼓励在“国庆日”、显忠日（降半旗）和国军日悬挂韩国国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新加坡历史

新加坡共和国，别称狮城，通称星国、新加坡或星加坡，是位于东南亚的城邦岛国、城市国家。该国位于中南半岛最南端，扼守马六甲海峡最南端出口，其南面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隔，北面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隔，并以新柔长堤与第二通道两座桥梁相连于新马两岸之间。新加坡的国

土除了新加坡本岛之外，还包括周围所属岛屿，新加坡最大的外岛为德光岛。从新加坡独立以来，大规模的填海已经为新加坡增加了23%的面积，相等于增加了130平方公里。

1819年，任职于英国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斯坦福·莱佛士与柔佛苏丹签订条约，获准在新加坡建立交易站和殖民地，经莱佛士的努力，逐渐发展成繁荣的转口港。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据点。1942年至1945年间，新加坡曾被日本占领三年半之久，其后回归英国管理，并从海峡殖民地独立出来，1959年成立自治邦，1963年以独立城邦的形式加入马来西亚，称为新加坡州（简称星州）。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隔日，新加坡独立建国，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

自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从穷困潦倒中，依靠着国际贸易和人力资本的操作，迅速转变成为富裕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时凭借著地理优势，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凭借教育素质良好的国民，新加坡现今也是亚洲政治和科学文化的纽带，大多数的新加坡人都通晓至少两种语言，分别是英语以及自己的母语。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种族的社会，也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虽然人口组成以华人为多数，但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与马来人及印度人所组成的移民国家，其中华人文化以福建移民为大宗。在国内居住的居民有38%为永久居民、持有工作签证的国际移工以及持有学生签证的学生，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外劳比例分别为80%和50%。整个城市在绿化和环境卫生方面效果显著，故有花园城市之美称。

国名

“新加坡”〔sin-ka-pho〕源自于闽南语对于英语名称“Singapore”的音译。其英文名则来自马来语“Singapura”，继而来自梵语，其中siṃha意为狮子，pura意为城市，因此新加坡又被称为“狮城”，其国徽和著名象征鱼尾狮也源于此。过去，“新加坡”一直用“新嘉坡”作为其独立初期的通用国名。

1967年新加坡政府成立统一街名翻译委员会，开始对新加坡的地名、街名进行统一工作。1972年4月25日，“新加坡”正式成为国家的华文译名。新加坡独立之前出现不少衍生的国名称谓，例如“星嘉坡”、“星加坡”、“新架坡”、“星架坡”、“石叻”、“叻埠”、“石叻埠”和“实叻埠”等，而外界也普遍以“星洲”、“狮城”或“星国”作为简称来描述新加坡

早期新加坡名为淡马锡，新加坡的别名有新嘉坡、星架坡、星加坡、星洲、星港、星岛、星国、狮城、石叻、叻埠、昭南等。最早的名称为“Pulau Ujong”（命名于三世纪），在马来语中意思为“（马来半岛）末端的岛屿”。

中国三国时期吴国康泰在出使南海诸国后写成的《扶南土俗》中记载“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许云樵据此在《马来亚史》中提出“蒲罗中国”为马来语“Pulau Ujong”的音译，其马来语意为“极端的岛国”也和记载中“极崎头海边”相符，是当时新加坡的名称，官方的《新加坡年鉴》在1999至2005年间也采信了该说法；但饶宗颐、陈育崧等学者认为其证据不足，并提出康泰出使时初具雏形的

古马来语尚未出现，且“拘利正东行”的记载也与拘利和新加坡实际的地理位置不符等反对意见。

历史

新加坡在3世纪已有马来人居住，其最早的文献记载源自3世纪东吴将领康泰所著的《吴时外国传》记载“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名蒲罗中国”。据新加坡学者许云樵考证，蒲罗中是马来语Pulau Ujong之对音，指半岛南端的岛国。蒲罗中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名称。比淡马锡早一千多年。

14世纪，明朝把新加坡称作“淡马锡”（爪哇语：Temasek）、莫干岛。

1819年1月29日，英国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雇员斯坦福·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开始管辖该地区。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最初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当局管辖。1867年，新加坡升格为海峡殖民地，和槟城、马六甲并列一个辖区，受英国直接统治。

1942年2月15日（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占领新加坡，并将之更名为“昭南岛”，行政上称作“昭南特别市”，其中“昭南”一词取自“昭和年间所得之南地”一文，同时也有“南方之光”和“昭和天皇在南洋之领土”的意思。

1945年9月1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重新管辖新加坡，并恢复其名为“Singapore”，翌年把新加坡从海峡殖民地分离。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的地位，李光耀成为首任总理。

1963年，新加坡连同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砂拉越以及北婆罗洲（现沙巴）共组成立马来西亚联邦，进而完全脱离英国统治。在马来西亚期间，李光耀和当时的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在种族权利分配上意见不合，李光耀主张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民族平等方式，反对“马来人至上”的保护政策。人民行动党与执政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的政治较量更在1964年7月及9月两次引发新加坡种族骚乱。

最后，首相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以避免局势恶化为由，在1965年8月7日下令将新加坡州自马来西亚联邦中除名。于是，8月9日，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在马来西亚国会紧急修宪并通过，解除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使其被迫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后，新加坡寻求国际承认，深怕有朝一日会被马来西亚再次强行合并或被印尼攻击（印尼对抗新马的活动还没结束），所以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新加坡加入英联邦。1967年8月8日，新加坡协助成立了东盟组织。

政治

根据《新加坡宪法》，新加坡实行的是一院议会制（内阁制）政府，为代

议民主制单一制体系，分类上属威斯敏斯特体系。

国家的政府机构三权分立，新加坡总统由直接民选产生，为国家元首，任期六年，可以连任一次。新加坡国会议员也是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总理从国会多数党中产生，其领导的内阁拥有行政权，并由独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管理公务员的聘用以及处分。新加坡总理从议员中选出内阁部长。

自建国后，人民行动党一直是唯一的执政党（一党独大状态），在议会中也鲜少有能够形成监督力量的反对党（部分反对党成员是被委任，以免议会里100%的意见都是支持人民行动党，议会在1991年改变选举制度后设有反对党的保障名额，最多有9席）。现在新加坡工人党是国会中的最大在野党。

新加坡自1991年起创造了一套独特的选区划分制度（集选区，每个选区产生4-6名议员）。人民行动党目前确实在新加坡民众中仍然拥有较高的支持度，在建国后的历次选举中该党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60%，但近年因各种因素例如就业和经济而逐渐下降，2011年新加坡大选的60%得票率远低于独立初期。

一般认为，新加坡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自独立之后就一直被压制，虽然近年为鼓励创意产业发展以及展现更开明的政府，已经在言论这方面有所放松。但在媒体、新闻自由方面，新加坡在记者无国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发布的2014年新闻自由指数显示，新加坡仅排名第150

位，为中后半段，其严苛的法治与高压的政治环境也为许多人权组织诟病。有些人认为，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政府持股的方式间接控制了该国两大媒体集团，反对声音也因为种种限制很难通过其他私人出版机构出版其著作或发表言论。而一直以来“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度排名显示新加坡为无新闻自由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往往会告批评它的外国传媒诽谤，或限制他们在新加坡的发行量。此外，个人或民间组织也禁止自行安装卫星天线接收器。21世纪以来网络兴起，政府也对部分网络进行管制，虽然不进行主动封锁，但有时会针对异议人士，打上传声筒或公民媒体的标签，便能加以引据法条径行监看，而对付一般人则实施自我审查与举报制度，任意复制散布还须面对法律责任，使得高调的批评言论不多见，而文章往往被迅速删除。

在新加坡，当局对一切集会活动都非常关注，达到一定人数的户外集会都须向警方备案。新加坡内部安全局拥有非常大的权力，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内部安全法授权可在必要时无限期拘留任何怀疑对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人士，并可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扣押多年，这法律在人民行动党政府过去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时候应用，现在依然会以反恐怖主义的借口进行起诉。

此外新加坡的高道德标准管制还表现在对日常行为的监督上，新加坡实行严刑峻法管控：禁止口香糖在新加坡境内销售（医疗用口香糖除外），但近年来在美方的压力之下，逐步有条件的开放；使用厕所后未冲水、浪费食物、在非吸烟区吸烟、乱过马路（不在指定的过路处过马路，如不利用天桥或隧道过马路）、地铁上喝水或进食都会导致罚款；随地乱丢垃圾则可能面对强制服务令，如被罚在公园打扫。甚至有过胖过瘦的小学生会被老师强迫喝牛奶。

新加坡还严禁所有国人和旅客携带香烟入境。很多人误以为新加坡法律准许携带19根，但这其实是错误的。由于新加坡对于香烟的税务非常高，许多国人出国都会企图携带香烟回国。

该国还拥有可能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禁毒法律，携带毒品入境或藏毒作贩卖用途的主要刑罚为绞刑，根据现行新加坡法律第一百八十五章《滥用药物法》，未经许可而进出口多于15克的海洛因、或多于30克吗啡或可卡因、或多于500克的大麻者，又或未经许可而制造任何数量之海洛因、吗啡或可卡因者，均属违法，而触犯该等罪行者会全部判处死刑。此外对于成人男性犯罪者（16岁以上50岁以下）还可使用鞭刑处罚（英国遗留的传统，但已判处死刑者不会鞭刑）。大多数外国人无法理解这些严厉的刑法，一些新加坡人认为严刑可有效制止罪案或破坏行为。

行政区划

新加坡土地面积仅724.4平方公里，以符合都市规划的方式将全国划分为五个社区（行政区），中区社区（人口120万），东北社区（人口130万），西北社区（人口83万），东南社区（人口84万），西南社区（人口83万），由相应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简称社理会）管理，其首长原为新加坡国会议员兼任之主席，2002年起首长改制为专职称市长，市长级别相当于部长。在新加坡，市长指的就是社区发展理事会的最高行政首长。这五社区进一步分为选区。

地理

新加坡共有大小岛屿63个，地势起伏和缓，主岛新加坡岛的面积占到90%以上。于北部建有新柔长堤，西部有第二通道，两者成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柔佛间的通联系道。新加坡岛以外较大的有岛屿裕廊岛、德光岛、乌敏岛及圣淘沙，地理最高点为武吉知马，海拔163.63米（537英尺）。

新加坡很多国土都是填海产生，建国后曾经进行多次填海工程。至2013年3月，填海土地面积达到逾13,000公顷，占据新加坡原有国家土地面积达约1/4。1950年至今，约20%的国土面积由填海产生，新加坡国土面积于1960年代时为581.5平方千米（224.5平方英里），现在约为728平方千米（281平方英里），至2030年以前，将会增加100平方千米（40平方英里），部分计划则连结比较小的岛屿，包括裕廊岛。尽管都市化缩减了雨林面积，新加坡约有23%的国土属于森林或自然保护区，森林主要分布于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新加坡在城市绿化方面相当成功，境内共有逾300座公园及4个自然保护区，有“花园城市”之称。

新加坡并无采行夏时制，新加坡标准时间为UTC+8，较其地理位置时间快1小时。

新加坡地处热带，长年受赤道低压带控制，为赤道多雨气候，长夏无冬，气温年温差和日温差小，年平均温度在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之间：最冷月为1月，受来自中国的东北季风影响，加上低压带的南移，较干燥的东北风

会令新加坡的平均低温徘徊在摄氏23至24度左右。在此期间，新加坡的天气也会比较好；而到了4月至5月这段期间， 在低压带的北移和东亚大陆高压带的减弱的影响下，气温会有轻微回升，而且雨量也会增多，湿度较高，每日平均相对湿度早上为79%，下午为73%。降雨充足，也常有雷暴，年均降雨量在2,400毫米左右，每年11月到1月为雨季，受较潮湿的季风影响，雨水较多。而每年的6月至9月，吹西南季候风，较为干燥少雨。

新加坡是个靠近印尼的国家，由于印尼经常地震，因此新加坡也不时有余震。2007年9月印尼苏门答腊发生8级地震，全新加坡有震感。2016年3月，印尼苏门答腊西南发生7.8级地震，之后新加坡开始有震感。2016年6月，印尼苏门答腊6.5级地震，全新加坡确定有感受到地震的地区包括榜鹅、蔡厝港、宏茂桥、大巴窑、武吉班让、黄埔、实乞纳、马林百列、花拉公园、盛港等，只剩东部地区没有传来感受到地震的消息。

文化

人口

根据新加坡政府2011年统计数据，目前新加坡常住人口已达518万人，其中325万人（63%）属于本国公民，其他则属永久居民或外籍劳工，有23%本国公民在新加坡以外地区出生，永久居民约有50万人。

新加坡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7岁，每户平均人口为3.5人，由于土地不足，约五分之四的新加坡人居住于一般称为组屋的公共房屋（政府部分资助购买的廉价质房屋）。至2010年，已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于4房或以上的组屋

或私有住宅，住宅自给率则达87.2%。移动电话普及率则高达每千人拥有1,400支移动电话，约十分之一的居民拥有汽车。

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低水平，于2012年估计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为0.78名婴儿，小于人口置换的2.1；为了解决此项问题，新加坡政府在过去数十年鼓励外国人民移居新加坡，而大量移民也使新加坡人口并未减少。

新加坡为世界上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过去十年间失业率未曾超过4%，失业率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高峰，失业率为3%，至2011年降回1.9%。

于2009年时，约四成的居民为外国移民，为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外国移民对于国家经济相当重要，但政府考虑限制外国劳动力，外国劳动力组成了80%的建造业及50%的服务业劳动力。

2009年，在本地居民（本国公民及永久居民的总称）中，华人占74.2%，而欧亚混血人口和其他族群（包括峇峇娘惹）则占3.2%，马来人占13.4%，印度裔（以泰米尔人居多）占9.2%。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大部分源自中国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地。

语言

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其官方语言包括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

基于和马来西亚的历史渊源，《新加坡宪法》清楚定明：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政府一直采用英语作为不同种族社群之间的主要通行语和教学语，并将之定位成“第一语言”，新加坡宪法及法律也以英语书写，在法院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也会翻译成英语；然而仅有三分之一的人以英语为母语，约三分之一的新加坡华人、四分之一马来人及二分之一印度人以英语为母语，且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无法理解英语。

新加坡有相当多人能使用两种语言，大多为英语及其它官方语言，不过在流利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曾经受到英国的管理，新加坡英语也多以英语为标准，新加坡式英语则介于标准英语与皮钦语之间，但政府并不鼓励使用新加坡式英语。

新加坡因为在1980年代全面废除华校制度，将原来的华校改成全英校制度，所以英语是新加坡华人的最主要语言，多数人在家里已说英文，但保留华语能力。

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双语教育即成为主流教育体系的基石。所有新加坡学生除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外，还必须修读所属族群的“母语”课程。新加坡推行以英语为主、族群“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基于国家发展和族群团结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但是，经过40多年的推动后，英语不但已成为本地强势主导工作语言、跨族群语言、“国家语言”，未来还可能取代族群“母语”，成为新加坡第一语言。

在新加坡的华族社群里，华裔学生必须接受“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体制，在基础教育阶段修读十到十二年的华语课程。但相对于英语应用能力，华语在新加坡听说能力还行，“读写能力”却不断弱化。新加坡是个闽南人（当地称福建人）为主的社会，民间普遍使用闽台闽南语，能与中国大陆的厦门、泉州、漳州人，以及台湾的闽南人沟通无碍。但自从1980年代由新加坡政府主导的“讲华语运动”之后，华语成为新加坡华裔的通用语，新加坡媒体使用方言受到了诸多限制，从而导致大部分的年轻新加坡华人无法有效地使用华语方言。此外政府对电视、电台的华语节目也有严格的限制：例如从港台进口的方言影视剧就必须用华语重新配音后才可以在本地两家无线中文频道（8频道和U频道）播出或上映。在海外，尽管母语一般指的是第一语言，新加坡则使用母语来指民族语或第二语言。虽然新加坡多年来努力不懈地推展讲华语运动，但政府仍保留方言新闻这一块，听众至今仍可从城市频道，收听到6种方言新闻播报，让听不懂标准华语的年长者，能掌握国家大事或时事新闻，不至于脱节。

新加坡官方使用与中国一致的简体汉字。但在1969年至1979年间曾短暂拥有自己的汉字简化标准，民间以简体字为主但偶尔也会出现繁体字与简体字混用的现象。新加坡的官方文字为英文，因此公函、商务往来和其他经济业务性质的书信通常以英语为主。

宗教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也因此汇集了世界上多种宗教。

佛教为新加坡第一大宗教，其他宗教依人口多寡分别为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印度教。从2000年至2010年间，基督宗教、无宗教信仰及道教比例分别增长了3%，佛教比例略微下降，其他信仰则仍保持稳定。各宗教信仰情况大致如下：

佛教占总人口的33.3%，信徒多为华人；基督宗教（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及其他教派）占总人口的18.3%，10岁以上的信徒36.4万人（占14.6%），有266座教堂。新加坡最早的教堂是禧街（Hill Street）的亚美尼亚教堂（Armenian Church）和圣安德烈路的圣安德烈教堂；伊斯兰教总人口的占14.7%，具有马来西亚或巴基斯坦血统的民众基本为穆斯林，另外也有一部分印度血统的穆斯林，全国现共有穆斯林约34.8万人，并建有清真寺约80座，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花蒂玛清真寺和苏丹清真寺；道教占总人口的10.9%，信徒基本上为华人；印度教占总人口5.1%，教徒超过8万人，基本上是印度族裔，寺庙约共22座。

据统计，将近86%的新加坡人有宗教信仰。相对以上主要宗教而言，其他宗教人数较少，合计只有1.1万余人。锡克教是19世纪从印度传入的，在新加坡有7间锡克庙，如奎因街的锡克庙等，教徒主要是锡克族警察、保安员。犹太教在新加坡有两个会堂。拜火教在新加坡则没有庙宇。

新加坡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但对少数宗教派系（如耶和华见证人）仍有所禁制。该教教徒曾因反对兵役获罪。

经济

1965年独立以前，新加坡为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首都，是英国当时于东南亚最主要的海军基地加坡海军基地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的干船坞。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带动全球贸易迅速成长，新加坡成为世界主要贸易据点，新加坡港也成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前记者Chin Kah Chongrong说："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新加坡经济受益于美国远征军在越南的必需品，燃料，武器和战车供应。特别是燃料和燃料，新加坡供应价值6亿美元的新加坡 每个月，美国军方的物流收入是帮助新加坡建设国家经济的初始资源。"每个月新加坡提供价值6亿美元的商品，连续近10年，总销售额达到 700亿美元。

于独立前的1965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11美元，居东亚国家第三位，不过虽位于东亚和东南亚第三，但当年的东亚和东南亚除日本外，几乎都是未开发国家，状况和今日的非洲相似，故511美元在当年不只是比南非和北非的利比亚低，也不如中南美洲的委内瑞拉、阿根廷，更只有约欧洲富裕国家的20%~30%。因此即便是东亚东南亚第三高，但概念上其实和今日的"非洲第三"相似，所以当时新加坡仍属于贫穷经济体。

自从马来西亚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始得以自由主导经济发展方向，外商直接投资、李光耀、吴庆瑞及荷兰经济学家阿尔伯特・魏森梅斯的国家主导经济政策刺激了经济成长。今日的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国民所得至2013年为止已是遥遥领先东南亚周边各国至少有六倍以上的差距，如果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新加坡更在全球最富有国家内名列第四。

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经济迅速成长，使之逐渐发展成为新兴的发达国

家，并因此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重工业方面，主要包括了区内最大的炼油中心、化工、造船、电子和机械等，拥有著名的裕廊工业区。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在机场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此外，新加坡也是亚洲的区域教育枢纽，每年吸引不少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地的留学生前来升学，为国家带来丰厚的外汇和吸纳许多人才。旅游业也在总体经济结构中占重要比例，游客主要来自日本、中国、欧美地区和东南亚其他国家。

早期的新加坡是个众多跨国公司在东南亚投资的首选地，得益于新加坡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以及较低的成本。但是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工商发展，新加坡逐渐丧失这些优势，许多工业、制造业纷纷外迁。然而受限于自身环境，易受全球经济萧条影响，尤其2003年肇于SARS因素，新加坡当年GDP负增长率达2.2%，迫使政府开始考虑其他的发展政策。新加坡政府长期鼓励私人创业，以及依靠中国的崛起调整经济结构，鼓励企业到新兴工业国家拓展投资，但还未见成效。

成立于1974年的淡马锡控股是新加坡政府所全资拥有的几家公司中知名度最高的，却始终保持神秘，自成立起到2004年9月期间从未公布过财务报表。作为豁免私人企业，淡马锡控股不必像上市公司一样公开每年的财务报表，因此一直以来对该公司的传闻都不断。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新加坡电力、吉宝集团和莱佛士酒店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此外，该公司也参股新加坡两家媒体——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因此可能间接进行言论管制。曾有国外媒体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是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也因如此，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称作是“国家资本主义”，即通过国

家控制的私人企业来进行投资，主导以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市场。

淡马锡控股除了投资新加坡本地市场外，也把亚洲市场和发达国家市场视为投资终点，目前大约一半的资产是在新加坡以外地区。其中主要的投资包括马来西亚电讯、印度的ICICI银行、澳大利亚第二大电信公司Optus。近年来该公司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对中国的首家私营银行民生银行表现出兴趣。2010年11月1日淡马锡控股宣布注资4亿美元，入股巴西石油与天然气服务公司（Odebrecht Oil and Gas，简称OOG），将持有该公司14.3%的股权。Odebrecht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旗下石油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自1950年代起即持续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维持伙伴关系。《经济学人资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2014公布最新"全球生活费用调查"（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Survey），因新元强势和物价上涨，新加坡成为全世界对外派人员和商务客来说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城市。

但《经济学人》所调查的对象为"外派人员和商务客"，此两类人士的消费商品偏向高端奢侈产品，而对"一般市民而言"，根据《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发布的'城市生活费指数'新加坡的2015年一般市民生活费排名为全球48名。

产业

新加坡拥有数项表现突出的产业，为第三大炼油及交易中心，钻油平台制造及船舶修复则居第一，且为世界最大物流枢纽。

新加坡产业多元，以金融业、制造业、炼油业最为主要产业。主要出口产品为精炼石油、电脑及集成电路，占2010年全国27%的国内生产总值。另外，化学、机械、生物医学亦为重要产业。

新加坡的旅游业十分发达，每年来访本地的外国游客约150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人数增长最显著，主要是由于政府减少了中国的公民签证程序、以及延长停留的时间所致。为进一步鼓励旅游业的发展，新加坡也非常重视廉价航空的发展趋势；除了建立两家私营的廉价航空公司外，也鼓励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廉价航空公司将新加坡列为目的地之一，也表示愿意降低樟宜国际机场的费用。

主权基金

新加坡有两家全资国有企业，一间是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另一间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

淡马锡控股公司是成立于1974年的一家新加坡的半政府豁免私人企业投资公司，新加坡政府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截至2013年3月31日的财政年度，全年盈利106亿坡元（83亿美元），股东回报率8.9%。集团投资组合价值约2,150亿坡元（1.318万亿港元）（约1690亿美元）

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吉宝集团和莱佛士饭店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曾有国外媒体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

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是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另外淡马锡也持有其他国家的企业股份如下一：

建设银行 – 6.15%，132.07亿H股；

民生银行 – 10%，以4亿美元购入；

中国银行 – 13.79%，合共104.8亿股，2006年2月17日以15.2亿美元购入；

渣打银行 – 19.11%，3.695亿股；

巴克莱银行 – 2.1%；

中信资源 – 11.47%，合共6.94亿股；

ICICI – 7.28%，印度第二大商业银行；

富敦资金管理公司（Fullerton Fund Management）；

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印尼Bank Danamon69•5%股份；

印尼国际银行56•9%股份；

屈臣氏25%股份；

印尼Permata银行64%。截至2011年3月底止，集团投资组合价值约1930亿新元。

另一家投资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成立于1981年5月22日，简称GIC，是新加坡最大的国际投资机构，负责管理新加坡政府大部分海外资产，成立之初由李光耀亲自担任主席，吴庆瑞担任副主席，但李光耀依然担任公

司董事长。现任总裁为李一添，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曾被邀请担任GIC顾问。GIC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它的投资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2000多家上市及未上市公司。其中北美占50％、欧洲占25％，东亚及东南亚占25％。GIC于1995年即进入中国大陆，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发起股东之一。GIC也是台湾的“外国专业投资机构（QFII)”制度史上最大的投资人之一（该制度于2003年废除）。由于公司也非上市公司，虽然负责管理政府资产却从不公布财务报表、高层管理人员薪资等基本情况，引起一些批评人士的担忧与指责，特别是李光耀本人曾担任该公司最高管理职务，更引发外界猜疑。

交通

新加坡交通发达便利，交通产业占到全国GDP总产值的10%左右。截至2010年，新加坡的集装箱港口吞吐量年吨位为标准箱2843万个，领先于香港，仅次于上海，居世界第二位。

航空

目前，新加坡拥有5个机场，其中新加坡樟宜机场及实里达机场是国际民航机场；另外的巴耶利峇机场、三巴旺机场及登加机场3个则为空军基地。

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也是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也是澳新至欧洲的袋鼠航线的最重要的一个中途站。作为亚洲最繁忙的5个机场之一，樟宜机场的年旅客数已经突破3000万人次。樟宜机场虽然已有38年的历史，却依然被评为全世界最舒适的机场之一，目前拥有4个航厦和两条跑道，樟宜机场的年过境旅客人数将达到6670万人次。

此外，新加坡北部的实里达机场目前拥有一条长达1620米的跑道，专门连接邻近国家的旅游景点的定期航班、团体包机或接待私人飞机，在2005年，有关当局计划扩展跑道到2000米，以接待波音737级数的客机，它是新加坡第一个国际民用机场。

巴耶利峇空军基地，拥有一条长达3760米的跑道，允许外国空军到访时使用。据了解，美国空军经常在此空军基地停留。新加坡另外还有三巴旺空军基地及登加空军基地。

港口

公共运输

公路

新加坡本岛的公路完善，目前拥有10条高速公路贯穿全岛。新加坡的高速公路分别为泛岛快速公路、中央快速公路、武吉知马快速公路、实里达快速公路、淡滨尼快速公路、克兰芝快速公路、加冷-巴耶利峇快速公路、东海岸公园大道、亚逸拉惹快速公路、滨海快速公路及建设未完成的南北快速公路。此外公共交通同样发达，以地铁、公共汽车与出租车为主。目前开通了5条地铁线路，另有一条正在建造中；公共汽车路线上百条，由两家公交公司经营，分别为新捷运及SMRT地铁有限公司。

丹戎巴葛火车总站是马来亚铁路网的最南端，由马来亚铁道公司特许经营，每日有班车往返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各城市。2011年7月1日起，新加坡的兀兰火车关卡成为马来亚铁道公司路网的最南端。

得力于公共交通的发达，私家车在新加坡的使用率不高。在新加坡购买私家车首先竞标取得数量有限的拥车证，一张拥车证的价格在3到5万新币，有效期为十年。一辆车仅限一张拥车证。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新加坡的新拥车证数量等同于二手车处理的数量。全新加坡的车辆数量将控制在一个不再增长的范围之内。此外基础设施的发达，意味着使用成本的增加，车主购买车之后每月缴纳的各项基础设施使用费也相当高。购买私家车，如果仅一人使用，低使用度也就面临更高的边际成本。此外，新加坡也是

全球第一个采用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国家，在进入市中心的道路上架设自动电子收费系统，在高峰时段进入市中心的车辆将自动付费。由于购买私家车的成本太高，再加上完善、方便的公共交通网络，使得大多数新加坡人选择不购买汽车，这也有效地解决了其他都市普遍存在的交通堵塞问题。

住宅

在住房方面，84%的新加坡人口居住在由政府（建屋发展局HDB）建造的组屋中（即公共住宅）。因为“居者有其屋”的要求，所以组屋的价格保持低价，能够让每一个新加坡人负担的起。政府提供购买组屋津贴，也让更多的新加坡人能够有房可住。组屋分新组屋BTO，转售组屋Resale.新组屋BTO只有新加坡公民才可以申请购买。购买也需具备相应的条件，比如35岁以下不能单人购买，35岁以上个人只能购买2房式BTO。转售组屋没有限制，但是仍然只有公民和新加坡永久居民PR.永久居民购买最新政策：必须是两人，均属于永久居民，并且永久居民的年限超过5年。购买的区域对于不同族群有一定居住数量上限的要求。超过上限，无法购买。组屋之外最多人居住的是共管式公寓和私人公寓。私人公寓属于私人性质的住宅楼房，物业管理公寓居住者自行解决。共管公寓5年之内，物业管理归HDB新加坡建屋局，5年之后和私人公寓相同，并按照私人公寓的方式处理和买卖。首次买卖仅限新加坡公民。此外还有少部分的排屋，独立或半独立洋房，按照地契限制，大部分只开放新加坡公民购买。

教育

新加坡很重视教育，教育部是仅次于国防部的第二大财政开支部门，新加坡奉行精英教育，教育制度类似英国式制度，除了各语文类科外，均以英语为媒介语言。一般修读完十到十一年的中小学后能选择到初级学院、高

中或理工学院就读，前两者半数以上能升上国内大学。新加坡有五所理工学院与三所大专学府，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都是亚洲颇具盛名的学府。由于采用英国式教育系统，因此不少学生亦选择前往英国或澳大利亚升学，学校亦能直接协助同学以UCAS系统申请英国院校。

新加坡每年吸引不少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地的留学生前来升学，令该国成为亚洲的区域教育枢纽。

新加坡教育制度常被批评为过分依赖制式教材，不鼓励个人独立思想空间，强调以考试方式来区别学生素质（升学至上主义），贬低其他的学习方式及职业的贡献，新加坡本土电影《小孩不笨》即以讨论该制度可能扼杀其他新加坡各类型人才发展，及因个人无独立思考的习惯将无法回应社会变迁挑战为电影主题。

体育

新加坡休闲体育设施完善，民众爱好足球，在各大集选区都设有专业的足球场。在足球方面，新加坡自1996年起设有新加坡职业足球联赛，其国家队也曾三度获得东南亚足球锦标赛冠军，并在海外体育赛事（如英超联赛）拥有广泛支持者。另外，新加坡体育城包含原址位于旧的新加坡国家体育场，而新的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是一座位于新加坡加冷（Kallang）室内体育场，于2014年4月启用，可容纳55,000人。那是未来为新加坡国家足球队的新主场，2019年世界杯橄榄球赛有些赛事也将于此举行。

在传统水上活动如游泳、帆船、水球等是东南亚地区的佼佼者。近年来在乒乓球、射击等运动也有不俗的表现。政府在培育体育人才方面，如开办体育学校，引进外来教练与体育员，也计划在近期开埠国际级的体育学院。

新加坡比较知名的运动员有：四届全英羽毛球超级赛男单冠军黄秉璇，以及乒乓球选手井浚泓、李佳薇、冯天薇等等。

2008年2月21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克·罗格宣布，2010年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城市为新加坡。

2016年8月13日（巴西时间8月12日），新加坡泳手史高宁（Joseph Schooling）参加第31届夏季奥运会，在男子100米蝶泳决赛以打破奥运纪录的50秒39，赢得新加坡历来首面奥运金牌。同场的美国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与南非泳手查德·拉·克洛斯及匈牙利泳手切赫·拉斯洛（László Cseh），以51秒14并列第二。

军事

新加坡拥有堪称东南亚科技最先进的军队，军队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军队也被认为是维持城市独立的保证。而警察部队也属兵役制。

新加坡的军人称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新加坡武装部队分为三类，包括：正规军人，现役军人以及战备军人。正规军人指的是职业军人，现役军人指的是十六岁到二十余岁不等为了保护国家而强制服两年兵役的军人，战备军人指的是从现役中役满退伍，进入十年回营训练周期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动员起来的的后备军人。新加坡法律规定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服兵役2年半，拒绝服役属违法。服役前须接受为期九个月的基础军事训练课程。新加坡军队分陆、海、空三军，具体数量未知，但是一般认为整体数量有超过五万以上，但是正规军人和现役军人总数应该不超过五万，新加坡是马六甲海峡边的小国，周边被许多国家及几千万马来人围绕，以华人为主体族群的新加坡天然安全警觉高腾。新加坡有五个空军基地，樟宜空军基地（西），樟宜空军基地（东），巴耶利峇空军基地，三巴旺空军基地，登加空军基地，24架F-15SG多用途战斗机，70架F-16多用途战斗机，为新加坡空军目前的主力战机。三个海军基地，布拉尼海军基地，大士海

军基地，樟宜海军基地常驻美海军自由号等（USS Freedom，LCS-1），濒海战斗舰共4艘，亦可停美海军航空母舰。

新加坡是五国联防（FPDA）组织的成员国之一。该组织的成员国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协议规定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任何一方遭受到攻击，英澳纽三国都有义务给予军事援助。

新加坡军队与中华民国国军有合作关系，新加坡的建军就受到中华民国大量的资源与帮助，其中不乏退役将领在新加坡任职武官，自蒋经国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就将其军队移至中华民国（台湾）训练，由于新加坡地狭，而军队也不能送交邻国马来西亚训练，这样也有造成军情外泄疑虑，而移至中华民国（台湾）训练，一方面是因为蒋李两人私交匪浅，另一方面新加坡与中华民国友好，于是促成新加坡移到中华民国（台湾）训练的星光部队，其驻地在台湾新竹县湖口乡、台湾云林县斗六市、台湾屏东县恒春镇。

饮食

由于新加坡的战略位置，新加坡菜反映出新加坡文化起源于马来西亚的种族多样性，为百年文化互动而成的产物。

食物主要受到当地马来人的影响，加上来自中国、印尼、印度、土生华人、和自十九世纪英国所带来的西方（特别是英语和一些葡萄牙语影响的欧亚，被称为基斯）的移民传统。而在当地的饮食文化也同样存在于其他领域，如：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和中东地区的影响。

新加坡小贩摊档中，例如：具有中国华裔背景的厨师受到由印度文化的影响，可能会尝试多样化的调味品及配料，如罗望子，姜黄，和酥油；而印度厨师则可能也能提供炒面等菜，但有些印度裔厨师不提供猪肉与牛肉类。随着来自各种不同国家的影响，它足以显示全球化的现象，进一步影响新加坡的料理。

当地食物

虾面、叻沙、海南鸡饭、肉骨茶、炒粿条、沙嗲、椰浆饭、辣椒螃蟹、咖椰烤吐司、黑咖啡、螃蟹米粉、肉脞面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D%97%E4%BA%9A%E5%9B%BD%E5%AE%B6%E8%81%94%E7%9B%9F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英语：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英文简称ASEAN），中文简称东盟、亚细安、东南亚国协或东协，是集合东南亚区域国家的一个政府性国际组织。

东盟成立初期，基于冷战背景立场反共，主要任务之一为防止区域内共产

主义势力扩张，合作侧重在军事安全与政治中立。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政经情势趋稳，并接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加入。

成员国

东盟目前共有10个正式的成员国，另外还有一个候选国和一个观察国：

成员国（合称东盟十国）

印尼（创始国）

马来西亚（创始国）

菲律宾（创始国）

泰国（创始国）

新加坡（创始国）

文莱

柬埔寨

老挝

缅甸

越南

候选国

东帝汶

观察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自1976年起）

历史

1961年7月31日，马来亚、泰国和菲律宾成立“东南亚联盟”(ASA)。1963年，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因为领土问题断交。1965年8月，新加坡、马来西亚分治，联盟由此陷于瘫痪。 1967年8月6日，立场反共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五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于8月8日发表了《东盟宣言》，正式宣告东盟恢复运作并更名为“东南亚国家联盟”。 1976年，在巴厘岛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第一次首脑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协调一致宣言》，也就是《巴厘第一协约》，确定了东盟的宗旨和原则，成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977年8月，第二次东盟首脑会议在吉隆坡举行。1984年1月8日，文莱独立后加入东盟，至此，东盟有6个成员国。由于后来其他东南亚4个国家加入东盟，这6个成员称为原东盟成员，或东盟老成员。 1995年7月28日，越南加入。 1997年7月23日，缅甸加入。 1997年7月23日，老挝加入。 1999年4月30日，柬埔寨加入。 2006年7月，东帝汶提出申请加入东盟。另巴布亚新几内亚因领土在东南亚之外被列为东盟观察员。 2007年8月8日，为庆祝东盟成立40周年，特定当天为东盟日。11月20日，东盟十国元首在新加坡签署《东盟宪章》。 2009年4月11日，芭堤雅东盟会议成员所下榻两间酒店遭亲他信反阿披实红衫军群众严重干扰而腰斩。 2010年，与中国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东盟加一”规模为全球人口数最多，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012年11月18日，东盟十国签署了象征人权领域合作成果的《东盟人权宣言》。《宣言》旨在保障本区域人民的人权，以作为未来人权合作的基本框架。2015年11月22日，东盟十国于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二十七届高峰会签署共同声明，成立东南亚经济共同体（AEC）。共同体将于同年12月31日正式上路。

东盟会议

正式会议

东盟正式会议

届　日期　国家　城市/地点　主持

1　1976年2月23－24日　印尼 巴厘

2　1977年8月4－5日　马来西亚　吉隆坡

3　1987年12月14－15日　菲律宾　马尼拉

4　1992年1月27－29日　新加坡　新加坡

5　1995月12月14－15日　泰国 曼谷

6　1998年12月15－16日　越南 河内

7　2001年11月5－6日　文莱 斯里巴加湾

8　2002年11月4－5日　柬埔寨　金边

9　2003年10月7－8日　印尼 巴厘

10　2004年11月29－30日　老挝 万象

11　2005年12月12－14日　马来西亚　吉隆坡

12　2007年1月11－14日1　菲律宾2　曼达维市

13　2007年11月18－22日　新加坡　新加坡

14　2009年2月27日－3月1日

2009年4月10－11日　泰国 清迈、华欣

芭达雅克　　阿披实·威差奇瓦

15　　2009年10月23日　　泰国 清迈、华欣　阿披实·威差奇瓦

16　　2010年4月8－9日　　越南 河内　阮晋勇

17　　2010年10月28－31日　　越南 河内　阮晋勇

18　　2011年5月7－8日　　印尼 雅加达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19　　2011年10月21－23日　　印尼 巴厘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20　　2012年4月3－4日　　柬埔寨　　金边　洪森

21　　2012年11月17－20日　　柬埔寨　　金边　洪森

22　　2013年4月24－25日　文莱 斯里巴加湾　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23　　2013年10月9日　　文莱 斯里巴加湾　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24　　2014年5月10－13日　缅甸 内比都　　登盛

25　　2014年11月10－12日　　缅甸 内比都　　登盛

26　　2015年4月26－27日　马来西亚　吉隆坡、浮罗交怡　纳吉布·阿卜杜勒·拉扎克

27　　2015年11月18－22日　　马来西亚　吉隆坡　　纳吉布·阿卜杜勒·拉扎克

28　　2016年9月6－8日　　老挝 万象　通伦·西苏里

29　　2016年9月6－8日　　老挝 万象　通伦·西苏里

30　　2017年4月28－29日　菲律宾　　帕赛市　　杜特蒂

31　2017年11月10－14日　菲律宾　帕赛市　杜特蒂

32　2018年4月25－28日　新加坡　新加坡　李显龙

33　2018年11月11－15日　新加坡　新加坡　李显龙

34　2019年6月20－23日　泰国 曼谷　巴育

35　2019年11月1－4日　泰国 曼谷　巴育

36　2020年6月26日　越南 河内　阮春福

37　2020年11月11日　越南 河内　阮春福

38　2021年4月　文莱 斯里巴加湾　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39　2021年10月　文莱 斯里巴加湾　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区域论坛

东盟区域论坛（英文:ASEAN Regional Forum，简称ARF）是亚太地区正式的，官方的，多边的对话。截至2007年7月，它包括二十七名参加者。 ARF的目标是促进对话和磋商，并促进该地区的建立信任和预防性外交。ARF第一次在1994年举行会议。ARF目前的参与者是：所有东盟成员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欧盟，印度，日本，朝鲜，韩国，蒙古，新西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东帝汶，美国和斯里兰卡。

东盟成员国

人类发展指数

主权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2018）

新加坡　　0.935（最高）　　非常高

文莱 0.845 非常高

马来西亚　0.804 非常高

泰国 0.765 高

东盟　0.723（中等）　　高

菲律宾　　0.712 高

印尼 0.707 高

越南 0.693 中等

老挝 0.604 中等

缅甸 0.584 中等

柬埔寨　　0.581（最低）　　中等

东盟十加三

东盟成立之初，视正处于“文革”浪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共产主义扩展的严重威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视东盟为反共集团，但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各成员国亦开始陆续追随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解除对华贸易禁令。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6年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与日本、韩国和一样透过“东盟十加三会议”与东盟成员国进行共同协商。

东亚自由贸易区

2004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在老挝首都万象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朝推动成立自由贸易协议区（东盟十加一）的方向推进。为达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零关税的目标，双方决定自2005年开始，针对部分货品开始协商免税，再逐渐扩大到2010年时达到全面免税的目标。另一方面，日本与韩国也宣布将自2005年开始，与东盟十国协商自由贸易区谈判，以作为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十加三）的起步。

体育

东南亚运动会

东南亚运动会是一项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大型综合性地区体育赛事，参赛的国家包括了东南亚地区的11个国家，赛事由国际奥委会和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监督的东南亚运动会联盟管理。东南亚运动会目前已具有相当规模，对整个东南亚地区体育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南亚足球锦标赛

东南亚足球锦标赛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东南亚地区足球锦标赛，由东盟足球协会主办，参赛国来自东南亚地区，首届赛事于1996年举行，当时获得啤酒品牌虎牌啤酒的赞助，因此赛事被冠名为虎牌杯，直至2006年起赛事更名为东南亚足球锦标赛。

成效与局限

至20世纪末，东盟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成效不算明显，因为各成员国主要关心对自己国家有利的经济计划，对本国无利益的计划都不大关心，事实上，东盟部分成员国财富差距甚大（例如新加坡、文莱和缅甸、老挝、柬埔寨的经济状况各走极端），因而难以制订一个能顾全全部成员国的经济合作计划。

此外，东盟规条规定不干涉成员国内政，1990年缅甸军政府不承认选举落败的结果，更软禁了昂山素季，但是缅甸仍可于1997年加入东盟。

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方面取得较大成效，早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时，东盟五个始创成员国（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已不定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最终更成功使越南于1989年从柬埔寨撤兵。

1984年1月1日，文莱独立，1月7日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六个成员国，六国于1986年合作，举办东盟旅游年，推广东南亚旅游业，其后合作增大，容纳过往关系疏离的成员国（老挝、缅甸、柬埔寨）甚至是曾经敌对的越南，至今除东帝汶外，所有东南亚国家已经加入东盟，东盟也不再满足于区域合作，找寻新的合作伙伴，例如印度、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地位也大幅提高，此为东盟的成效。

==================

本书前面章节已经讲述了日本战后的一些情况；这里不再赘述。

____

欧洲、亚洲、南美洲、印度、中东、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境况

二战以后，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等西欧国家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等的大规模援助下，迅速重建起生机勃勃的自由经贸体系，很快就实现了经济腾飞，并为世界整体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信息革命、计算机革命、高级制造业革命、交通运输革命、等等日新月异的发展，把整个人类带入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丰富时代。波兰、匈牙利、乌克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在苏联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淫威之下，经济长期停滞，社会上充满了各种专制极权迫害的统治；人民长期生活在思想、经济、人身禁锢的状态下。经过几十年以后，在西欧与东欧的经济发展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鸿沟。西欧国家多为富裕自由的发达国家，而东欧国家则与苏联一样多为贫穷而专制的共产主义政党制度国家。

直到19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这种经济发展上的鸿沟仍然无法愈合。到二十一世纪，东欧许多国家仍然是欧洲的最贫穷落后的国家。

二战以后，中国大陆彻底沦陷在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极权统治之下。北朝鲜、越南、柬埔寨，也相继沦落于更为残暴野蛮的马克思主义暴君屠戮之下。这些国家地区都在二战以后的数十年中处于极其贫穷落后悲惨的状态之中。在这些国家社会中，人民的被奴役禁锢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古代的许多奴隶制社会。在很多地方，人们没有迁徙、择业、经营、嫁娶、言论、思想等等自由；在很多社会，充满了野蛮、杀戮、不公、不义、腐败、贫穷、落后、愚昧。在这些国家中，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都发生了大规模杀戮或是非正常死亡的事情。在中国，数百万人在1949年建国以后死于中国共产党的杀戮；数千万人死于人为谬误愚昧政治政策而导致的大规模饥荒；数百万家庭遭到残酷的、非人道的、不公不义的政治迫害；亿万人民生活在窒息的社会经济禁锢制度环境下，一直到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1980年代以后，中国虽然在经济制度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在政治领域层面，仍然充满了专制极权、禁锢奴役；人民不知道历史、真相，失去言论、书籍、出版、新闻、思想等等重要的精神自由。在北朝鲜、越南，数百万人死于共产主义所导致的战乱；经济一塌糊涂、极端贫困落后。在柬埔寨波尔布特领导下，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口被其本国共产主义极权政府所屠杀；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死在了共产主义屠刀之下。

然而，美国所主导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的战争，以及美军在越南丛林中的艰

苦越战，对于共产主义极权政治在亚洲的蔓延，起到了重要的遏制作用，——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在国内政治【国内的反战情绪，促进了美国国内的左翼政治的发展和壮大】、军事人员伤亡等方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在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分别实现了经济上的飞跃性发展；在那些社会中，短短几十年内，经济生活面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快步入了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在东南亚，东盟组织的建立，有效地遏制了共产主义思想在这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在中国，由于在其1949年建国仅仅大约十年以后，中苏关系就转为极度恶化，甚至面对中苏全面战争、乃至核战争【苏联差一点就准备向中国共产党投射原子弹】的危险，因而，自从1960年代以后，其共产主义思想扩张的势头大为减弱【从1960年代初开始，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就不再注重于输出革命，而是为了自身经济免于崩溃而挣扎努力】。

整体而言，以1960年代初为分水岭、转捩点，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趋势逐渐停顿，由攻势转为守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tin_America_during_World_War_II

二战中的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的二战期间历史很重要，这是因为，二战给这一地区带来了许多

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变化。战争在拉丁美洲引起了严重的经济恐慌，因为该地区很大一部分经济依赖于欧洲的投资资本；二战使得那些欧洲投资资本都消退了。拉丁美洲试图保持中立，但欧洲交战国家不断威胁其中立性。为了更好地保护巴拿马运河，与轴心国作战，并为战争努力优化商品生产，美国通过“租借租赁”和类似计划大大扩展了其在拉丁美洲的利益，从而在当地实现了大规模现代化，并为参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

从战略上讲，巴拿马是盟国最重要的拉丁美洲国家，因为巴拿马运河提供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联系，这对贸易和国防都至关重要。巴西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因为它在美洲与非洲距离最近。在非洲，盟国积极参与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战斗。轴心国在阿根廷和智利那里找到了大部分支持；并通过干涉那里的内政，进行间谍活动和散布宣传，来最大程度地利用阿根廷、智利。

巴西是唯一向欧洲战区派兵的国家，在为战斗人员补给提供空军基地方面发挥了作用，并且在大西洋反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其他一些南美国家也有与德国U艇和巡洋舰发生小规模冲突。墨西哥向太平洋派遣了300名志愿者组成的战斗机中队Escuadrón201，被称为阿兹台克老鹰队（ÁguilasAztecas）。

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巴西积极参加欧洲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他从摩洛哥回来的路上会见了巴西总统热图利奥·巴尔加斯；这次会议被称为Potenji河会议，并确定了要创建巴西远征军。

历史

美国的角色

1940年，来自著名洛克菲勒家族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表达了他对于纳粹在拉丁美洲的影响的强烈关注。此后，他被美国政府任命为美洲事务协调员（CIAA）。他负责监管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计划，以帮助其提高生活水平，实现西半球国家之间的更好关系，以及应对纳粹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反法西斯宣传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一个重要项目，由洛克菲勒办公室负责。它在广播和电影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希望能吸引当地大量观众；除了宣传外，还拨出大笔资金用于经济支持和发展。总体而言，罗斯福政策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阿根廷除外，因为那里更为容忍德国纳粹的影响；阿根廷拒绝跟随华盛顿的领导，直到战争实际上结束为止。

经济

根据托马斯·伦纳德（Thomas M. Leonard）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拉丁美洲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国家提高其出口产品的价格，以便它们能够在经济上收支平衡。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之后，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要么中断了与轴心国的关系，要么对它们宣战。结果，许多国家（包括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智利，秘鲁，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所有国家））突然发现，他们现在必须依赖美国进行贸

易。战争期间美国对特定产品和商品的高需求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例如，美国需要哥伦比亚生产的所有铂金，智利的所有铜和秘鲁的所有棉花。双方商定的价格通常很高，但各国却丧失了在公开市场进行议价和交易的能力。

在战争年代，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短缺也是一个问题。由于美国战争工业的需求和运输的匮乏，导致拉丁美洲无法获得许多商品，因此，可用物品的价格上涨了。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昂贵且难以获得。粮食短缺是城市中的一个问题。最终，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通货膨胀。

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与美国站在一边并获得援助，从而利用了战争的优势。但是，秘鲁是一个例外。在秘鲁，政府对各种产品实行价格管制；因此，它的外汇储备没有像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增加。它失去了急需的资本。阿根廷尽管支持德国，而且对美国怀有敌意，但由于贸易迅速增长，所以表现很好。巴拿马也从经济上受益，主要是因为增加了船舶运输量和通过运河的货物。

在波多黎各，由于缺乏欧洲酒精的进口，其本土酒精行业蓬勃发展。石油资源丰富的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从石油价格上涨中受益。墨西哥在1938年利用其在石油商品上的优势地位，强制与美国和欧洲的石油公司达成协议，将其石油工业国有化。此外，在战争期间，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ManuelÁvilaCamacho）总统利用这种情况改善了墨西哥在美国的议价地位。

租借

1941年3月22日，美国政府制定了《租借协议》，该计划使相关国家从美国得到战争物资和其他援助。英国以及其他相关欧洲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得到美国的援助最多，因为那些国家受到纳粹战争的威胁或摧残最为严重。不过，拉丁美洲也从美国得到四亿美元的援助；这只是美国对外援助中的很少一部分。

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巴西在战争期间从租借中受益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其在南美东北角的地理位置，可以在南美和西非之间巡逻，并提供将美国制造的战争物资转移到在北非作战的同盟国的渡口；另外，这也是因为，巴西被视为德国可能的入侵路线，因而盟国必须对巴西加以捍卫。巴西与美国签署了新的有利贸易条约，该条约提供了贷款和军事援助，但更重要的是巴西制造业受惠。巴西获得了美国在拉丁美洲分发的四分之三的租借援助。厄瓜多尔也获得了一些援助，主要是为了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建立空军基地；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利用借租对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以换取他们参与保卫巴拿马运河和加勒比海航线。

相比之下，阿根廷和智利获得的军事援助很少，因为在战争中的大多数时间，它们都不愿意按照美国的要求而切断与轴心国的所有关系。秘鲁得到了一些援助，但到1943年，南美西海岸已经失去了所有战略意义，因为它距离主要战区太远了，因此秘鲁失去了租借武器的直接理由。中美洲国家的命运与秘鲁类似。到1943年，美国为国防目的而修建的泛美公路已不再是当务之急，因此停止了道路上的建设工作以及军事援助。

根据伦纳德的说法，美国租赁法案改变了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并“重新点燃了旧的竞争”。例如，智利政府非常担心其缺乏军事援助，并不是出于担心轴心国军队的袭击，而是因为担心玻利维亚和秘鲁可能试图使用其新购置的武器来夺回六十年前曾经失去的领土。厄瓜多尔也感到忧心，因为在1941年厄瓜多尔-秘鲁战争爆发后，它刚刚输给了秘鲁。最终，阿根廷受到其老对手巴西的威胁；这两个国家在获得独立后都进行了数场战争；在所有这些战争中，巴西获胜，主要原因是它获得了现代化美国武器。伦纳德说，阿根廷独裁者胡安•佩隆（JuanPerón）上台，部分原因是他声称，将“纠正这种军事地位的变化”。

轴心国在南美洲的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法西斯主义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和团体视为积极的思想，这给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日本的裕仁天皇，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尽管西班牙在整个战争中保持中立），以及其他轴心国体系中较次要国家的法西斯独裁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赞扬希特勒的作风和军事集会。危地马拉的独裁者豪尔赫•乌比科（Jorge Ubico）和萨尔瓦多的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持类似观点。根据伦纳德的说法，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法西斯主义所产生的强烈的团结感和目标感非常诱人。这三个国家都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法西斯政治集团势力。巴西的整合主义者穿着长靴和绿色军旅风衬衫，对墨索里尼（Mussolini）持尊敬态度。

在战前几年，德国通过使用严格的双边贸易协定来确保与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从而获得了越来越高的经济渗透率。巴西，墨西哥，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都与纳粹德国签署了贸易协定。例如，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至1938年，即战争爆发前一年，巴西与德国的贸易翻了一番。随着1939年9月战争的爆发，轴心国的船只再也无法越过大西洋进行贸易，因此拉丁美洲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贸易也就停止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对外贸易而言，美国是唯一能够取代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国家。

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必须对轴心国的间谍活动作出回应。墨西哥和巴西与美国合作侦破并阻断了纳粹间谍小组。另一方面，智利和阿根廷在整个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允许敌方特工在自己国家内部行动；这是两国与美国之间相当不和谐的根源原因。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不得不与来自轴心国的大量移民打交道。例如，哥伦比亚曾在1941年拥有约4000德国移民人口，以及一些来自日本的农民。哥伦比亚的许多德国人都是SCADTA的雇员，参与了航空运输业，因此美国担心他们可能从事间谍活动，甚至担心他们阴谋将民用飞机改装成轰炸机，以袭击巴拿马运河。结果，美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施加压力，要求其监视和拘留德国移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将其驱逐回。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相较于移民人口而言，德国和西班牙间谍活动的威胁更加真实。在整个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在该地区所有最著名的国家/地区经营间谍网络，包括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巴西，古巴，墨西哥等。代号为“玻利瓦尔行动”的德国间谍活动，从其阿根廷基地到柏林进行秘密无线电通信；它也利用西班牙商船将纸质情报运回欧洲。后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战争期间西班牙与德国情报机构的合作。尽管阿根廷和智利最终在1944年初对在

其本国开展业务的轴心国特工进行了“镇压”，但一些“玻利瓦尔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欧洲战争结束为止。

除了针对、防止德国人在拉丁美洲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外，美国还关注纳粹的宣传。例如，德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是中美洲纳粹宣传的集散地。在1939年战争爆发之前，纳粹宣传着重于德国制成品的优越性，并宣称德国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体系”。在1939年9月至1943年末之间，纳粹宣传集中在德国的胜利及其军事装备的优越性上。

苏联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希特勒于1941年6月的入侵，导致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通常是通过志愿组织或工会组织）为苏联提供了支持和援助。古巴向苏联红军发送了4万支雪茄，并于1942年10月成为第一个在外交上承认苏联的拉美国家。战争导致了更广泛的外交解冻：到1945年，包括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和中美洲各个共和国在内的11个拉丁美洲国家与莫斯科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的时候，墨西哥总统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宣称：“在听到德军最终失败的消息后，我和我的国家一起回想起英勇的苏联人民在与法西斯部队的斗争中所做的令人钦佩的努力。”

犹太护照-萨尔瓦多

犹太人试图逃脱在轴心国的迫害时，萨尔瓦多驻瑞士日内瓦总领事若泽·卡斯特拉诺斯·孔特雷拉斯上校通过向他们提供可以用作政治庇护形式的萨尔瓦多护照，拯救了25,000名犹太人。但是，这是萨尔瓦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中非常不为人知的部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South_America#1930%E2%80%931960

南美洲1930年后历史

1930-1960年

大萧条给拉丁美洲带来了严重挑战。世界经济的崩溃意味着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下降，从而破坏了南美的许多经济体。

南美的知识分子和政府领导人放弃了旧的经济政策，转向了进口替代工业

化。目标是创建自给自足的经济，拥有自己的工业部门和庞大的中产阶级，并且不受全球经济的起伏影响。虽然南美的这种经济政策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商业利益，但是，罗斯福政府（1933-1945）理解，美国不能完全反对南美的这种“进口替代”经济政策。罗斯福实施了一项睦邻政策，并允许在南美的一些美国公司被南美各国政府实行国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汇聚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美历史非常重要，因为战争导致整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变化。为了更好地保护巴拿马运河，抵抗轴心国的影响，并优化战争屋物资的货物生产，美国通过租借协议和类似计划大大扩展了其在拉丁美洲的利益，从而实现了南美各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和重大经济增长。

冷战

该大陆在20世纪后期成为冷战的战场。1960年代和197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和巴拉圭的一些民主选举政府被军事独裁政权推翻或流放。为了减少反对派，他们的政府拘留了数万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被以叛国罪定罪并遭到酷刑和/或杀害。从经济上讲，这些南美国家开始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过渡。他们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镇压内部的颠覆叛乱。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秘鲁发生内部冲突。与其他许多大洲一样，南美洲在20世纪后期的冷战期间成为超级大国的战场。在战后时期，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美国和该地区政府最大的政治问题。冷战迫使南美国家政府在美国与苏联之间做出选择。

20世纪末军事政权和革命

到1970年代，左派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促使右翼、教会权威和国家上层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支持政变，以避免他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古巴和美国的干预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两极分化。多数南美国家在某些时期受到美利坚合众国支持的军事独裁者的统治。

同样在1970年代左右，智利、阿根廷等“南锥体政权国家【他们在南美洲的最南端，地理形状在地图上看似一个锥体】”在“秃鹰行动”中进行了合作，杀死了许多左翼持不同政见者，包括一些城市游击队。但是，到1990年代初，所有国家都恢复了民主。

哥伦比亚的内部冲突一直在持续进行着【尽管这种情况有所减少】；该内部冲突始于1964年，最初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游击队（FARC-EP），然后又卷入了几个左倾意识形态的非法武装团体、以及强大的毒品走私的私人军队。现在，其中许多队伍已经不存在了；仅保留了很小一部分的ELN，以及稍微强大一些、但也大大减少了的FARC。这些左翼团体通过走私哥伦比亚的毒品来为其行动提供资金，同时还使用绑架，轰炸，地雷和暗杀来针对民选官员和普通民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革命运动和右翼军事独裁成为普遍现象，但自1980年代以来，南美洲大陆掀起了一波民主化浪潮，如今民主政治已广泛存在。尽管如此，关于腐败的指控仍然很普遍；有几个国家发生了危机，迫使其政府辞职，——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定期的平民继承、民主选举仍在继续。

国际债务成为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例如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19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阿根廷的2001年违约。

21世纪

向左转

尽管存在许多自称拥护左派意识形态的拉美政府，但是这种政治转变很难量化；然而其影响已广为人知。

自2000年代或19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已经上台。查韦斯在委内瑞拉，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和迪尔玛·罗塞夫在巴西，费尔南多·卢戈在巴拉圭，内斯托尔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在阿根廷，巴斯克斯和何塞·穆希卡在乌拉圭，拉各斯和巴切莱特在智利政府，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都是左翼政治人物浪潮的一部分，这些人也经常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拉丁美洲主义者。

根据选举日期，左派南美总统名单如下：

1998年：委内瑞拉的雨果·查韦斯

1999年：智利里卡多·拉各斯

2002年：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2002年：厄瓜多尔的卢西奥·古铁雷斯

2003年：内斯特·基希纳（NéstorKirchner），阿根廷

2004年：塔巴雷·巴斯克斯（TabaréVázquez）乌拉圭

2005：玻利维亚Evo Morales 玻利维亚

2006年：智利的米歇尔·巴切莱特 智利

2006年：厄瓜多尔拉斐尔·科雷亚 厄瓜多尔

2007年：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希纳（阿根廷）

2008年：巴拉圭的费尔南多·卢戈

2009年：何塞·穆吉卡（JoséMujica），乌拉圭

2010年：巴西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

2011：秘鲁Ollanta Humala

2013年：委内瑞拉尼古拉斯·马杜罗

2017：厄瓜多尔列宁·莫雷诺

2019：阿根廷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Fernández）

2020年：玻利维亚路易斯•阿斯（Luis Arce）

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南美各国政府向政治左翼移动，在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选举产生了左翼领导人。南美大多数国家/地区越来越多地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破坏了更大的全球一体化，但有助于地方发展。

2008年，南美洲国家联盟（USAN）成立，其目的是合并两个现有的关税同盟，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从而形成世界上第三大贸易集团。该组织正在计划以欧洲联盟的方式进行政治整合，力求建立人的自由流动，经济发展，共同的国防政策以及取消关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India_(1947%E2%80%93present)

印度历史

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在此之前，英国自从1858年以来管理印度次大

陆，对于印度次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深具影响。

1947年英国统治结束时，该次大陆沿宗教界线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印度（占印度教徒的大多数）和巴基斯坦（占穆斯林教徒的大多数）。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成为第一个印度总理。1950年通过的《宪法》使印度成为民主国家，此后一直保持这种民主。印度的持续民主自由在世界上新独立的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国家面临着宗教暴力，种姓制度，纳粹主义，恐怖主义和区域分裂主义叛乱。印度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尚未解决（1962年升级为中印战争），与巴基斯坦的领土争端导致1947年，1965年，1971年和1999年的战争。印度在冷战中是中立的，并且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当巴基斯坦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结盟时，印度在很短的时代里与前苏联结盟。

印度是一个核武器国家，于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随后在1998年又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印度一直遵循社会主义的政策。经济受到广泛的法规管制，保护主义和公有制的影响，导致普遍的腐败现象和缓慢的经济增长。从1991年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从相对贫穷的国家开始，印度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快速成长的G20国家中具有高军费开支的主要经济体，并正在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鉴于其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和人口，印度有时被称为大国和潜在

的超级大国。

1947年至1950年：印度自治领

印度独立以后的头几年，充满了动荡事件：——与巴基斯坦的大量人口置换；1947年的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以及500多个郡王国家的合并；最终，印度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的政治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印度副总理）；他联手尼赫鲁和甘地，以确保独立印度的宪法将是政教分离的。

印度分区

估计有350万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生活在旁遮普邦西部，西北边境省，俾路支斯坦省，东孟加拉邦和信德省。他们担心在穆斯林巴基斯坦的统治下受到压制，因而迁移到印度。社区之间的暴力造成约100万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丧生，并使旁遮普邦和孟加拉邦边界以及加尔各答，德里和拉合尔等城市的统治严重不稳定。1947年9月初，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由于甘地的努力，这些暴力活动开始平息。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政府都为移入或离开的难民建造了大型救济营，并动员了印度军队大规模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1948年1月30日，甘地被暗杀。刺杀者名叫Nathuram维纳亚克Godse，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甘地导致了印度的分裂，并偏袒穆斯林。为甘地送葬时，超过100万人挤满了德里的街道，跟随游行队伍、前往火葬场、并表示最后的敬意。

1949年，由于社区暴力，恐吓和穆斯林当局的镇压，印度接收了将近100万印度教难民；这些难民从东巴基斯坦进入西孟加拉邦和其他州。难民的困境激怒了印度教徒和印度民族主义者；难民人口耗尽了那些无法吸收他们的印度各州的资源。总理尼赫鲁（Nehru）和萨达尔·帕特尔（Sardar Patel）在不排除战争的情况下，邀请利亚夸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在德里进行会谈。尽管许多印度人把这些会谈看作是绥靖政策，但尼赫鲁（Nehru）成功地与利亚夸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签署了一项条约，其中承诺两国保护少数族裔、并成立少数族裔委员会。尽管反对该条约的原则，但是，帕特尔还是为了和平而决定支持该协议，并且在获得西孟加拉邦和整个印度的支持以及执行该协议的规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汗和尼赫鲁还签署了贸易协定，并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双边争端。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返回了东巴基斯坦。但印巴之间的关系的解冻并没有持续多久，主要是由于克什米尔争端。

郡王制国家的整合

印度的政治整合

内政和国务大臣萨达尔·瓦尔拉比·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负责将英属印度各省和诸侯诸州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印度。

英属印度由17个省和565个郡王州组成；这些省份在分区后被分配给印度或

巴基斯坦，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旁遮普邦和孟加拉邦；——但是，赋予了诸侯制国家的诸侯权，使其可以保持独立、或加入任何一个统治权体系。

印度独立以后，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面临着继承一个复杂的国家局面；这些国家的独立省份和王国遍布整个印度次大陆。在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的领导下，印度新政府采用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并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政治谈判，以确保随后起草中央政府、以及宪法的首要地位。萨达尔·帕特尔（Sardar Patel）和副总统梅农（Menon）说服与印度毗连的郡王制国家的统治者们加入印度。郡王统治者的许多权利和特权，特别是其个人财产，都被保证；这有效地说服了他们加入印度联邦。其中一些郡王成为了合并州的总督与副总督。许多小的郡王国家合并、形成了可行的行政州，例如绍拉什拉（Saurashra），PEPSU，温迪亚邦（Vindhya Pradesh）和中央邦（Madhya Bharat）。特里普拉（Tripura）和曼尼普尔（Manipur）等一些郡王州于1949年后期加入。

有三个郡王州比其他州更难整合：

贾纳加德（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州，但为穆斯林统治者）-1947年12月，全民投票以99%的选票与印度合并，废除了穆斯林统治者想要加入巴基斯坦的愿望。这个州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印度教徒。

海得拉巴（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州，但为穆斯林统治者）–谈判失败后，帕特尔下令印度军队攻击并废除穆斯林统治者的王位；随后，谈判于1948年9月13日至29日完成。第二年加入印度。

印度次大陆最北端的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占多数的州，但其郡王是印度教徒）迅速成为争议的源头；这场争议爆发后导致了1947年至1949年的第

一次印巴战争。最终，由联合国监督达成停火协议，使印度控制了有争议地区的三分之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最初同意蒙巴顿（Mountbatten）提议停止敌对行动后在全州举行全民投票；并于1949年1月1日双方达成联合国支持的停火协议。然而，全州公民投票一直没有举行。《印度宪法》于1950年1月26日在克什米尔生效，其中特别规定了该州的条款。

宪法

1949年11月26日，制宪议会通过了印度宪法；宪法由安贝德卡博士为首的委员会起草；1950年1月26日宪法生效以后，印度成为一个主权的民主共和国。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博士成为第一个印度的总统。后来在1976年第42号宪法修正案中添加了“社会主义者”，“世俗”和“廉正”这三个词。

1947–1948年的印巴战争

1947 – 1948年的印巴战争，由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土邦的克什米尔查谟地区展开。这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四次战争中的第一次。巴基斯坦独立后几周，通过从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发动了战争，以确保克什米尔的安全。至今，战争的不确定结果仍然影响着两国的地缘政治。

1950和1960年代

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管理了印度从殖民地到共和国的过渡时期；同时培育了多元化的多党制。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在不结盟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同时使印度成为南亚的区域霸权。

印度于1952年根据《宪法》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选，投票率超过60％。全国大会党赢得压倒性多数；尼赫鲁开始第二任期的总理。印度第一届议会选举团还选举普拉萨德为第二任期继任总统。

尼赫鲁政府（1952–1964）

尼赫鲁总理带领国会于1957年和1962年取得重大选举胜利。议会通过了广泛的改革，提高了印度教社会中妇女的合法权利，并进一步立法禁止种姓歧视和相关种姓制度文化。尼赫鲁（Nehru）提出了一项强有力的倡议，招募印度的孩子接受初等教育，并且全国各地都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学校，学院和高等学府，例如印度技术学院。尼赫鲁倡导印度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其经济建设五年计划，是由印度政府制定的、模仿苏联模式的、基于集中和综合的国家经济计划；对印度农民不征税；对蓝领工人设置最低工资和福利；对钢铁，航空，航运，电力和采矿等重工业实行国有化；没收了村庄的公共土地，并进行了广泛的公共工程和工业化运动，从而修建了大坝，灌溉渠，道路，火力发电厂和水力发电站，等等。

州重组

1952年引发了印度联邦的主要的重新塑造。尼赫鲁任命了国家重组委员

会，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印度于1956年通过了《国家重组法》。旧州被解散；在语言和族裔人口统计的共同点基础上，新州建立。

外交政策与军事冲突

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是以不结盟运动为主线；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联合创始人。尼赫鲁与美国和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并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全球国际社会。1956年，当埃及政府占领苏伊士运河公司时，国际会议以18票对4票对埃及采取行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以及苏联，是埃及的四大支持国。印度反对巴勒斯坦的分治和1956年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对西奈的入侵，但并不反对中国的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苏联对匈牙利民主运动的镇压。尼赫鲁（Nehru）否认了印度的核野心，但加拿大和法国在印度发展核电站的过程中向印度提供了帮助。印度还于1960年与巴基斯坦就公平使用两国共享的七条河流的水域达成了一项协议。尼赫鲁（Nehru）于1953年访问了巴基斯坦，但由于巴基斯坦的政治动荡，克什米尔争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印度与其竞争对手巴基斯坦共进行了四次战争或军事冲突；在尼赫鲁期间发生了两次。1947年的印巴战争中，双方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领土上进行了战斗；巴基斯坦占领了克什米尔的三分之一（印度称其为领土），印度占领了五分之三（巴基斯坦称其为领土）。在1965年的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军队企图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之间的事实上边界渗透进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后，印度跨越国际边界袭击了巴基斯坦。

1961年，在不断要求和平移交之后，印度入侵并吞并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葡萄牙殖民地。

1962年，中国和印度在喜马拉雅山边界上进行了短暂的中印战争。这场战争对印度来说是一场彻底的溃败，导致印度随后将重心转移到军备建设上，并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战后，中国从有争议的中国南西藏和印度东北边境撤离了有争议的领土地区。印度对中国在中印边界西部控制的较小的阿克赛钦地区的主权提出异议。

后尼赫鲁时代的印度

尼赫鲁（Nehru）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连续三届（1966–77）和第四届（1980–84）担任总理。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于1964年5月27日去世；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继任总理。196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再次对克什米尔进行战争；但没有任何明确的结果，克什米尔边界也没有发生变化。《塔什干协议》是在苏维埃政府的调解下签署的，但沙斯特里在签署仪式后的第二晚就去世了。领导层选举导致尼赫鲁（Nehru）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时任新闻和广播部长）担任第三任总理。在选举过程中，她击败了右翼领袖摩拉吉·德赛（Morarji Desai）。

由于人民对商品价格上涨，失业，经济停滞和粮食危机的普遍不满，国大

党在1967年的选举中虽然仍取得多数党地位，但其所获得的选票比以前有所减少。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同意卢比贬值后，政绩开始表现不佳；卢比贬值给印度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并且由于政治纠纷，从美国进口的小麦也减少了。

莫拉吉·德赛（Morarji Desai）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身份进入甘地政府；国会高级政客试图限制甘地的权力。但是，在甘地听取了政治顾问PN哈萨尔（PN Haksar）的忠告之后，她通过向社会主义政策的重大转变来恢复了她的公众支持度。她成功地针对印度银行的国有化对党内等级制度开展了大规模攻势。尽管受到Desai和印度商业界的抵制，但该政策还是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当国会政客试图通过取消甘地的国会成员资格而罢免甘地时，甘地获得了大量其他国会议员的支持。印度自由斗争的堡垒，印度国民大会在1969年分裂。甘地继续以微弱的多数执政。

1970年代

1971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她的国会党团（R）以多数席位重新当政。她实行银行国有化，并制定了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业政策。在数百万难民逃离巴基斯坦军队的迫害之后，印度干预了孟加拉国独立战争；这是一场发生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一半地区内的、巴基斯坦内战。冲突导致东巴基斯坦独立，该国被称为孟加拉国。这场冲突也导致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声望的崛起；她在印度国内的威信与声誉大增。同一时期，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印度与苏联签署了为期20年的友好条约；这是印度在独立以后首次打破了不结盟运动的传统。
1974年，印度在波赫兰（Pokhran）附近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沙漠

中测试了其第一枚核武器。

吞并锡金

1973年，锡金王国发生了反皇室暴动。1975年，锡金总理向印度议会提出上诉，要求锡金成为印度一个州。那年4月，印度军队接管了甘托克市，并解除了Chogyal的宫殿护卫的武装。此后，举行了一次全民投票，其中97.5%的选民支持废除君主制，有效地批准了与印度的联盟。

据说印度在全民投票期间在这个只有200,000人的国家中派驻了20,000–40,000人的部队。1975年5月16日，锡金成为印度联盟的第22个州；其君主制被废除了。为了使新的州合并，印度议会修改了印度宪法。首先，第35条修正案规定了一系列条件，使锡金成为“联系国”，这是其他任何州都未使用的特殊称呼。一个月后，第36条修正案废除了第35条修正案，使锡金州成为一个完整的州，将其名称添加到宪法第一附表中。

东北各州的形成

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Assam）州从1970年开始在当时的阿萨姆邦（Assam）边界内分为几个州。1963年，纳迦山地区以纳迦兰（Nagaland）的名义成为印度的第16个州。部分图埃恩桑格加入那加兰邦。1970年，为响应梅加拉亚高原（Meghalaya Plateau）的Khasi，Jaintia和Garo人民的

要求，将包含Khasi Hills，Jaintia Hills和Garo Hills的地区合并为阿萨姆邦的自治州。1972年，该州成为梅加拉亚邦（Meghalaya）。1972年，阿鲁纳恰尔邦和米佐拉姆（来自南部的米佐山）与阿萨姆邦分开，成为联合区域；它们在1986年成为州。

绿色革命

旁遮普州领导了印度的绿色革命，并赢得了作为全国的产粮大州的荣誉名称。

印度的人口在1970年代初突破了5亿大关；但由于“绿色革命”的影响，印度长期的粮食危机得到了解决，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政府向农民赞助了现代农业工具，新品种的普通种子，并增加了对农民的财政援助；农民增加了粮食作物的产量，例如小麦，大米和玉米，以及商业作物，例如棉花，茶，烟草和咖啡。大幅增加的农业生产力在印度恒河平原和旁遮普邦之间扩展。

在“洪水行动”下，政府鼓励生产牛奶（产量大幅提高），并改善了印度各地的牲畜饲养。这使印度能够自给自足地养活自己的人口，从而结束了过去二十年中的粮食进口。

1971年的印巴战争

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所打的四场战争中的第三场。这场战争为解决东巴基斯坦的自治问题而战；印度果断地击败了巴基斯坦，从而导致了孟加拉国独立。

印度紧急情况

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对腐败的指控导致整个印度的政治动荡加剧，最终导致比哈尔运动。1974年，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裁定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犯有滥用政府机构进行选举的罪行。反对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罢工和抗议，要求她立即辞职。各种政党在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 Prakash Narayan）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抵制他所谓的甘地独裁统治。纳拉扬（Narayan）甚至在印度各地发动罢工，瘫痪了其经济和行政管理，甚至要求陆军将甘地赶下台。1975年，甘地建议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Fakhruddin Ali Ahmed）总统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印度宪法，在紧急状态期间，中央政府可以享有捍卫国家治安的广泛权力。甘地提出，法律和秩序的崩溃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使得印度处于国家紧急状态；随后，印度中止了许多公民自由，并推迟了国家和州一级的选举。印度各州的非国会政府被解散，将近1,000名反对派政治领导人和维权人士被监禁，并实行了强制性节育计划。各种形式的罢工和公众抗议均被取缔。

罢工和政治动荡的终结，使得印度的经济受益。印度宣布了一项20点计划；该计划提高了农业和工业生产，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生产力和就业增长。但是许多政府机构和许多国会政治人物被指控犯有腐败和威权行

为。警察被指控逮捕和折磨无辜的人。英迪拉的儿子兼政治顾问桑杰・甘地（Sanjay Gandhi）被指控犯有严重的罪行；——桑杰被指控其导致卫生部对男人进行强制性输精管切除术和对妇女进行绝育、以此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举措的一部分，并拆除在德里、土库曼门附近的贫民窟，造成数千人死亡，更多人流离失所。

英迪拉・甘地的国大党在1977年召集大选；但是，该党令人羞耻地在选举中败给了反对党。莫拉吉・德赛（Morarji Desai）成为印度第一位非国会总理。德赛政府成立了法庭，调查紧急时期的虐待行为，在沙阿委员会（Shah Commission）报告后，英迪拉（Indira）和桑杰・甘地（Sanjay Gandhi）被捕。

1979年，反对党联盟崩溃；查兰・辛格（Charan Singh）成立了临时政府。Janata党由于其内部的争斗而变得非常不受欢迎；而且人们认为，他们在解决印度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缺乏领导能力。

1980年代

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她的国会党分裂组织，印度国民议会或简称为“国会（I）”，于1980年1月以多数席位重新执政。

但是旁遮普邦叛乱的兴起将危害印度的安全。在阿萨姆邦，当地村民与孟

加拉国难民以及印度其他地区的定居者之间发生了许多社区暴力事件。印度军队进行“蓝星行动”时，突袭了自治武装分子的藏身之处；他们在阿姆利则的锡克教徒最神圣的圣殿金殿中镇压了khalistan激进分子；平民的意外伤亡和对圣殿建筑的破坏加剧了印度锡克教徒社区的紧张局势。政府使用密集的警察行动镇压了好战分子的行动，但这导致了许多关于破坏公民自由的指控。由于ULFA与政府军的冲突，印度东北陷入瘫痪。

1984年10月31日，甘地总理自己的锡克教徒保镖将她暗杀；1984年在德里和旁遮普邦的部分地区爆发了反锡克教徒暴动，造成数千名锡克教徒死亡，并造成可怕的抢劫，纵火和强奸。国会党的高级成员被卷入煽动针对锡克教徒的暴力行为。迄今为止，政府的调查未能发现原因并惩处肇事者，但舆论指责国会领导人直接袭击了德里的锡克教徒。

拉吉夫·甘地政府

国会党选择了英迪拉的大儿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担任下一任总理。拉吉夫刚刚于1982年当选议员、进入国会；此时年仅42岁，是印度独立以后最年轻的总理和国家政治领袖。但是，在那些厌倦了职业政治家之无能和腐败的公民眼里，他的年轻和缺乏经验是一种财富；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政策和解决该国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新起点。议会被解散、重新选举；拉吉夫率领国大党取得了历史上最大的多数（在545个席位中，席位超过415个）；人民对他母亲的被暗杀事件表示同情。

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发起了一系列改革：放宽政府的约束政策；政府对外汇，旅行，外国投资和进口的限制大大减少。这使私营企业可以在不涉及政府官僚机构的情况下使用资源和生产商品；外国投资的涌入增加了印度的国家储备。作为总理，拉吉夫打破了母亲的政策先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从而增加了经济援助和科学合作。拉吉夫对科学技术的鼓励导致电信业和印度航天计划的大规模扩张，并催生了软件业和信息技术业。

1984年12月，瓦斯在印度中部城市博帕尔的联合碳化物农药厂泄漏。数以千计的人立即死亡，而更多人随后伤亡或致残。

印度于1987年与斯里兰卡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并同意为猛虎组织领导的斯里兰卡民族冲突中的维持和平行动部署部队。拉吉夫派遣印度军队执行该协议并解除泰米尔叛军的武装；但众所周知，印度维和部队陷入了暴力事件，最终与泰米尔叛军本身作战，并成为斯里兰卡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目标。辛格在1990年撤出了IPKF，但成千上万的印度士兵已经丧生。

拉吉夫脱离社会主义政策的做法使之与群众相处得不好；百姓没有从创新经济中受益。失业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印度的人口迅速增长，对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作为诚实政客的形象（在新闻界被昵称为“清洁先生”）在博福斯丑闻爆发时破灭；在印度国防合同中，其政府高级

官员贿赂了瑞典枪支生产商。

在1989年大选中，拉吉夫的支持党团虽然仍然引得了多数席位，但这与拉吉夫刚上台时所拥有的国会压倒性席位相去甚远。

执掌实权的是拉吉夫的前财政和国防部长、来自贾纳塔·达尔联盟（Janata Dal）的副总理辛格（Singh）。早前，辛格（Singh）揭露了一些丑闻，使国会领导成员感到不舒服之后，就被迫从财政部长转任国防部长。辛格随后揭露了博福斯丑闻，并被开除出党团办公室。辛格成为改革和廉政的受欢迎的讨伐军象征性人物，率领贾纳塔·达尔联盟，在政府中占据多数。他得到了人民党和其他的左派政党的支持。担任总理后，辛格（Singh）对金庙（Golden Temple）神社进行了重要访问，以治愈过去的政治伤口。他实施了曼达尔委员会政策报告，增加对低种姓印度教徒的保留配额。1990年11月，由于一些政治斗争事件，贾纳塔·达尔联盟（Janata Dal）不再支持辛格；这导致辛格政府在1990年11月7日失去议会的信任投票。

1990年代

1991年5月21日，前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代表国会（英迪拉）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竞选时，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TTE）的女性自杀炸弹手刺杀了他和其他许多人。在选举中，国会（英迪拉）赢得了244个议会席位，并组成了一个联盟，在PV Narasimha Rao的

领导下重新掌权。这个由国会领导的政府任满了整整五年的任期，开始了逐步的经济自由化和改革进程；这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打开了大门。印度的国内政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等级、信条和种族的传统统一，让位给了许多小型的，以地区为基础的政党。

经济改革

1991年，印度总理PV·纳拉辛哈·（PV Narasimha Rao）和当时的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博士发起了印度的经济自由化。拉奥经常被称为Chanakya，是因为他在领导少数派政府时有能力通过议会指导严格的经济和政治立法。

在已故总理纳拉辛哈·（PV Narasimha Rao）和时任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博士发起的政策下，印度的经济迅速增长。经济改革是对即将到来的国际收支危机的一种反应。拉奥政府启动了大型私有化改革；效率低下和导致亏损的政府公司经历了私有化变革。政府曾尝试采用渐进式预算来鼓励改革，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政治动荡造成了经济停滞。瓦杰帕伊政府继续实行私有化；减税和健全的财政政策旨在减少赤字和债务；并增加公共工程项目。班加罗尔，海得拉巴，浦那和艾哈迈达巴德等城市的地位和经济重要性日益提高，成为工业崛起的中心以及外国投资和公司的目的地。诸如设立经济特区，税收便利，良好的通讯基础设施，低监管等战略政策，使得工业在该国许多地区都得到了发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信息技术产业在印度各地占有一席之地；该行业科学领域中受过良好教育和熟练的专业人才的崛起开始推动印度经济的发展。新技术提高了几乎每种行业的活动效率，这也得益于熟练工人的可用性。外国投资和将工作外包给印度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促进了印度的经济

增长。印度各地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这增加了需求，从而增加了各种消费品的生产。失业人数稳步下降，贫困已经下降到约2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7%。尽管仍然存在严峻挑战，但印度正处于一段经济扩张时期，这使其已跻身世界经济的前列，并相应地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增加了其影响力。

联盟时代

1997年11月，国大党再次撤回了对统一战线的支持。1998年2月的新大选使人民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数量最多（182个），但这远远少于多数。1998年3月20日，总统成立了由人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瓦杰帕伊再次担任总理。1998年5月11日至13日，该国政府进行了五次地下核武器试验，统称为Pokhran-II，这使巴基斯坦在同一年进行了自己的试验。印度的核试验促使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根据1994年《防止核扩散法》对印度进行了制裁；印度核试验引起了广泛的国际谴责。

1999年前几个月，总理瓦杰帕伊（Vajpayee）历史性地访问巴基斯坦，并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签署了双边拉合尔和平宣言。

1999年4月，由巴拉蒂亚·贾纳塔党（BJP）领导的联合政府瓦解，导致9月份举行了新的选举。1999年5月和1999年6月，印度破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恐怖主义渗透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克什米尔的卡吉尔战争；这破坏了一

个充满希望的和平进程；和平进程始于三个月前瓦杰帕伊总理访问巴基斯坦，为德里-拉合尔巴士服务揭幕。印度军队杀死了巴基斯坦支持的渗透者，并在高空作战中夺回了重要的边境哨所。

在成功赢得卡吉尔冲突之后，人民党的声望一飞冲天；由人民党领导的新联盟、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多数席位，并在1999年10月由瓦杰帕伊（Vajpayee）担任总理。

2000年代

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成为首位完成整个任期的非国会总理。在他的任期内，基础设施迅速发展，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得到改善；取得了经济改革，核试验，多项外交政策和军事胜利。

2000年5月，印度人口超过10亿。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印度进行了开创性访问，以改善两国之间的联系。一月，古吉拉特邦州发生大地震，造成至少30,000人死亡。

瓦杰帕伊总理在2001年年中举行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两年多来的首次峰会上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但是，由于克什米尔地区的分歧，这次会议没有取得突破，甚至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2000年11月成立了三个新的州（邦），分别是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和

北阿坎德邦。

一系列政治丑闻（例如，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受贿的指控），以及因情报失败导致卡尔吉尔入侵未被发现的报道，以及瓦杰帕伊总理与巴基斯坦总统会谈的明显失败，都对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的信誉造成了不利影响。911袭击之后，美国取消了1998年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实施的制裁。此举被视为对他们支持反恐战争的一种奖励。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的紧张局势因以下因素而再次加剧：——印度对控制线沿线的巴基斯坦军事哨兵开火；以及随后致命的印度议会袭击；和2001-02印巴对峙僵局。

2002年，从阿约提亚（Ayodhya）返回的印度教朝圣者在古吉拉特邦（Goghra）的一次火车大火中丧生。这引发了2002年古吉拉特邦的暴力事件，导致790名穆斯林和254名印度教徒丧生，据报失踪者有223人。

在整个2003年中，印度快速的经济进步，政治稳定以及与巴基斯坦振兴的和平倡议增加了政府的声望。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意恢复直接的空中联系；印度政府和温和的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者举行了开创性会议。黄金四边形项目旨在对印度的四角采用现代化高速公路网络链接。

重返国会党的统治

2004年1月，瓦杰帕伊（Vajpayee）总理建议早日解散国会并举行大选。由国会党领导的同盟在2004年5月举行的选举中取得了意外的胜利。在前总理

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的遗孀索尼亚·甘地（Sonia Gandhi）拒绝担任总理后（因为，关于她的外国出生是否应被视为取消总理职位资格而存在争议），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成为总理。

国会与社会党和地区政党组成了一个名为联合进步联盟的组织，并得到了印度共产党的外部支持。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成为第一个拥有印度最强大职位的锡克教徒，和非印度教徒的总理。辛格（Singh）继续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辛格为得到印度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而阻止了进一步的私有化政策。

到2004年底，印度开始从克什米尔撤出部分部队。到2005年年中，Srinagar-Muzaffarabad巴士服务正式启用，这是60年来在印度管理的和巴基斯坦管理的克什米尔之间运行的第一个公共汽车服务。但是，在2006年5月，被怀疑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武装分子在印度管理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数月来最严重的袭击中杀死了35名印度教徒。

在美国总统布什于2006年3月访问美国期间，美国和印度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核合作协议。根据该核协议，美国将向印度提供民用核技术，而印度则同意对其核计划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后来，美国批准了一项有争议的法律，允许印度30年来首次购买其核反应堆和燃料。

2008年10月，印度成功向月球发射了探测器，这是一种名为Chandrayaan-1的无人月球探测器。之前，印度发射了第一枚商业航天火箭，运载一颗意

大利卫星。

2008年11月，发生了孟买袭击。印度将袭击事件归咎于巴基斯坦的好战分子，并宣布了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中的“暂停”。

在2009年的印度大选中，联合进步联盟赢得令人信服的262个席位，仅国会党就赢得206个席位。但是，由国会党领导的政府面临着许多腐败指控。通货膨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引起广泛的骚动。

（以下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C%E5%8E%86%E5%8F%B
2

中东历史

中东历史叙述了今西亚地区的历史。主要包括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和伊朗高原的历史。中东是人类历史的摇篮，她见证

了几大古老的文明。

古代近东

古代近东是最早实行密集的全年农业和通货贸易（而非以物易物）的地区，为世界留下了最早的书写系统，发明了陶轮、车辆和磨轮，创造了第一个集中的政府和法典。作为第一批城邦国家的出生地，具有高度的分工，并为天文学和数学领域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帝国也引入了严格的社会阶层、奴隶制度和有组织的战争。

文明摇篮，苏美尔和阿卡德

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前，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诞生在今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获公认为文明摇篮之一。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后来称为巴比伦尼亚人和亚述人）都在此蓬勃发展。

在公元前四千年的过程中，苏美尔城邦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发展起来，由代表城市守护神的寺庙主导，其祭司是守护神的代表。苏美尔将语言赋予该地区，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种书写语言，并成为人类第一个伟大文明。大概前2340年左右，萨尔贡大帝（约公元前2360年-前2305年）统一南部城邦并建立了阿卡德帝国 – 世界上第一个帝国。

同时，萨尔贡大帝任命他的女儿安海度亚娜在乌尔担任女神伊南娜的高级女祭司。她的著作使她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知名作家，亦有助于巩固萨尔贡在该地区的地位。

埃及

苏美尔文明开始后不久，下埃及和上埃及的尼罗河谷在公元前3150年左右统一在法老美尼斯统治下。 从那以后，古埃及经历了3个文明的高点，即所谓的“王国”时期：

古王国时期（前2686年–前2181年）

中王国时期（前2055年–前1650年）

新王国时期（前1550年–前1069年）

古埃及的历史在晚期（公元前664-332）走向结束，紧接着古典时代的埃及就是托勒密王朝。

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

此后，文明很快地从新月沃土蔓延到地中海东岸和整个黎凡特，以及古代

安纳托利亚。古代的黎凡特国家包括埃勃拉、乌加里特、亚兰大马士革、以色列、犹大、亚扪、摩押、以东和纳巴泰。腓尼基文明的多个城邦建立了一个海上贸易帝国，在地中海盆地创立了各个殖民地，当中以前814年建立的迦太基最为著名。

在美索不达米亚城邦长期的内斗之中，埃及和安那托利亚人建立的赫梯帝国开始争夺中东，并引发埃及-赫梯战争，其中卡叠石战役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车战。

腓尼基人最大的遗产是他们的字母，演化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字母系统，而以色列人最大的遗产是一神论宗教，现时世界上最主要的一神论信仰都可追溯到犹太教。

亚述帝国

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个强国几乎统治了整个中东地区，其中有前1365年 – 前1076年的亚述国家和前911年 – 前605年的新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在鼎盛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它统治了现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科威特、约旦、埃及、塞浦路斯和巴林全境 – 以及大片伊朗、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苏丹和阿拉伯。亚述帝国，尤其是新亚述帝国，对近东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亚述霸权结束之前，亚述人将最强大的文明带到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从裹海到塞浦路斯，从安纳托利亚到埃及，亚述帝国的扩张将游牧和野蛮社区带入亚述领

域，并向他们赋予文明的礼物。

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

前612年亚述被新巴比伦王国和伊朗人建立的米底王国瓜分。此后他们的继承者，被称为波斯第一帝国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征服了两国和埃及，成为中东的霸主。公元前4世纪末，阿契美尼德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短暂的马其顿帝国征服，又被其继业者国家如托勒密埃及和西亚的塞琉古帝国瓜分。

经过一个世纪的中断，公元前3世纪安息人重拾波斯帝国的概念，并由他们的继承者，即公元3世纪的萨珊王朝延续。这个帝国占据了现在中东亚洲部分的相当大部分，并继续影响其他亚洲和非洲中东的地区直到公元7世纪中期伊斯兰对波斯的征服。在前1世纪至7世纪初期间，中东地区完全由罗马人，安息人和萨珊人主导，七个世纪以来经常牵起多场罗马－波斯战争。东方基督教教会在波斯统治的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从公元1世纪开始在亚述站稳阵脚，让该地区成为叙利亚 – 亚述文学传统的中心。

希腊和罗马帝国

前66年 – 前63年，罗马将军庞培征服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罗马帝国把欧洲和非洲的多数地区统一于同一政府和经济体系之下。即使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都受到罗马的庞大影响，因罗马是当代最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实体

之一。虽然罗马文化遍及当地，但是由马其顿帝国留下的希腊文化在罗马时代还保持着强势。中东城市，尤其是亚历山大港，成为帝国的主要城市中心，而当地亦成为了帝国的“粮仓”。埃及行省是帝国最富裕的省份。

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蔓延，它在中东立下据点，亚历山大港和叙利亚埃德萨成为基督教学者的中心。到了5世纪，基督教是中东的主流宗教，而其他宗教（逐渐包括基督教的异端）受到积极的压制。随着帝国分裂为东西方，中东与罗马城的关系逐渐切断，并与新的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逐渐亲近。因此，随后西罗马帝国的陷落对当地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

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亦即是俗称的拜占庭帝国，统治著从巴尔干到幼发拉底河的土地，日渐被基督教所界定和教条化，引起了政府建制派和中东信徒在教义释义之间的宗教分歧。当时，希腊语已成为该地区的“通用语”，尽管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等继续存在。在拜占庭/希腊统治下，黎凡特地区经历了一个繁荣安定的时代。

中世纪早期

在公元5世纪，中东被分裂成各个弱小的国家；主宰当地的两个大国是控制今伊朗和伊拉克的波斯萨珊帝国，以及控制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的拜

占庭帝国。两国在五百年以来处于敌对关系，甚至两者的敌对亦显于文化方面。拜占庭帝国代表了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而萨珊波斯代表了传统波斯文化、祆教文化。

阿拉伯地区亦无可幸免地卷入两国的斗争中。拜占庭支持的非洲之角国家阿克苏姆帝国与波斯支持的也门国家希木叶尔为了争夺红海贸易路线在525年爆发战争。拜占庭和波斯为了争夺上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以及与阿拉伯，印度和中国贸易的重要城市，经常开战。作为罗马帝国的延续，拜占庭帝国继续控制着中东的罗马领土。自527年起，这包括了小亚细亚、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埃及。603年，萨珊帝国侵占了大马士革和埃及。希拉克略击退了波斯人，并在628年替其换了一个温顺的君主。不过战争削弱了两国，使中东舞台向新的势力开放。

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以部落形式主导著阿拉伯沙漠，他们崇拜著偶像，并以亲缘关系维系小型的部落。阿拉伯的城市化和农业有限，只有部分沿岸地区。麦加和麦地那是当时两个重要的贸易枢纽，借助欧亚地区和非洲的贸易。城市生活的核心就是商业活动，大多数居民都是商人。尽管如此，一些阿拉伯人都向北迁入新月沃土，因当地在提供肥沃土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而得名。这包括整个部落国家，例如在波斯松散统治地区的拉赫姆，以及在拜占庭类似区域的伽珊尼德。这些阿拉伯国家出奇地提供了中东罕见的，相对安稳的地区，并让阿拉伯人进一步与世界接轨。拉赫姆首都希拉赫是基督教的中心，犹太工匠、商人和农民在阿拉伯西部很常见，阿拉伯中部的基督教僧侣也是如此。

伊斯兰帝国

哈里发时代

穆罕默德的扩张，622–632年

正统哈里发的扩张，632–661年

倭马亚王朝的扩张，661–750年

7世纪，随着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之间的僵持和衰弱，一个新兴的力量: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出现在中东。经过一系列快速的穆斯林征服，由哈里发和哈立德·伊本·瓦利德等技术娴熟的军事指挥官所领导的阿拉伯军队，横扫了中东大部分地区，夺走了拜占庭领土的一半以上并完全征服了波斯。在安纳托利亚，他们的攻击在717-718的君士坦丁堡围攻战中被拜占庭军队和其保加利亚援兵拦住了。

阿拉伯人攻下了拜占庭的叙利亚、北非、西西里岛等省份。到了西方，他们渡海征服了西哥特王国直到在今日法国南部被法兰克人在图尔战役截著。在版图鼎盛之时，阿拉伯帝国首次统治整个中东，兼地中海地区的四分之三，仅次于完全统治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哈里发国首次把全中东地区统一，并形成至今仍存的主体民族身份。之后的突厥人塞尔柱帝国亦会雄霸中东。

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哈里发国的边陲地区，相对于中东的中心地区。然而，安达鲁斯和摩洛哥脱离了哈里发国的遥距统治后却发展出与巴格达相当的先进社会。831年至1071年间，西西里埃米尔国是地中海伊斯兰文化的主要中心之一。在诺曼人征服之后，该岛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融合了

阿拉伯，西方和拜占庭的影响。 巴勒莫在中世纪里持续是地中海的主要艺术和商业中心。

非洲正在复兴，然而因为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后的中世纪后期开始形成更有组织和更集中的国家。在宗教和征服的激励下，欧洲国王发起了一系列十字军东征，试图摧毁穆斯林势力并夺回圣地。十字军东征并没有成功，但在削弱已经蹒跚的拜占庭帝国这方面更有效。他们还改变了伊斯兰世界的权力平衡，因为埃及再次成为一个大国。

伊斯兰文化和科学

宗教在中东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影响了教育、建筑和文化交流。当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时，它开动了中东文化，激发了建筑成就，古代科学和科技成就的复兴，和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模式。伊斯兰教主要由五功组成，包括证信、礼拜、斋戒、天课和朝觐。伊斯兰教还创造了对壮观清真寺的建筑需求，这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一些更宏伟的清真寺包括阿克萨清真寺和前科尔多瓦清真寺。伊斯兰教统一了中东并为帝国带来稳定。传教士和战士将宗教从阿拉伯传播到北非和苏丹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创造了各种文化的交融，特别是在非洲和马瓦里人口。虽然马瓦里在倭马亚王朝受到歧视，但在阿拔斯王朝却得到广泛包容，因为这有助外地人大规模盼依。“圣书之民”或迪米通常都会得到礼待，他们包括基督徒、犹太人、印度教徒和祆教徒。然而，十字军东征使伊斯兰帝国出现了新想法，觉得非伊斯兰的思想是不道德或低劣的。这想法主要是由乌理玛（علماء）学者实施的。

阿拉伯文化在阿拔斯王朝的早期起飞，尽管有普遍的政治问题。穆斯林保留和传播了希腊在医学、代数、几何学、天文学、解剖学和伦理学的成就，并在后来重新传入西欧。以这种方式，亚里士多德、盖伦、希波克拉底、托勒密和欧几里德的作品得以保存并传遍整个帝国（并最终传回欧洲）。穆斯林学者亦在出征南亚时发现了印度-阿拉伯数字系统。这一数字系统在穆斯林贸易和政治机构中使用，使其最终在全世界普及。而这数字系统亦有助欧洲的科学革命。穆斯林学者在阿拔斯王朝时期成为了化学、光学和地图学的专家。在艺术方面，阿拔斯王朝的建筑在倭马亚王朝的基础上拓展，拥有更大，更奢华的清真寺。波斯文学以道德价值观为基础得到发展。天文学被强调到艺术当中。这些知识大部分都会传入西方。尤其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战士会带走穆斯林的宝藏，武器和医疗方法。

突厥人、十字军和蒙古人

阿拉伯人的霸权在11世纪突然停止，来自中亚的塞尔柱突厥人进入了中东。他们征服了伊朗、伊拉克（1055年攻下巴格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和汉志地区。埃及在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统治下得以保存，直到1169年亦落入突厥人之手。

虽然在7世纪丧失了大量地盘，基督教势力的拜占庭帝国依然是地中海有力的军事和经济强国，阻止了阿拉伯人扩张入欧洲大部。塞尔柱人在11世纪于曼齐刻尔特战役打败了拜占庭军队，并迁入了安纳托利亚，正式表示拜占庭势力的结束。塞尔柱人在随后二百年统治了中东大部分地区，但他们

的帝国之后分裂成一系列小型苏丹国。

自7世纪的低潮以来，基督教西欧在11世纪有了显著的经济和人口复苏。中东的分裂允许了联合军队，主要来自英格兰、法国和新兴的神圣罗马帝国，去进入当地。1095年，教宗乌尔巴诺二世回应了萎靡不振的拜占庭帝国的请求，并召集欧洲贵族去重夺基督教的圣地。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士夺得耶路撒冷，并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直到1187年萨拉丁重夺这座城市。较小的十字军领地则幸存至1291年。

蒙古统治

1258年对巴格达的征服和哈里发的死亡标志着阿拔斯王朝的灭亡，并被蒙古帝国吞并，除了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和阿拉伯的大部分。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死后，旭烈兀的任何进一步扩张都停止了，要返回首都哈拉和林选出新可汗。他的缺席导致了1260年阿音札鲁特战役蒙古人首次败仗（败给了马木留克王朝）。问题出现了，蒙古人逐渐无法就可汗人选达成共识，加上希望保留游牧文化的传统主义者与走向定居农业的蒙古人之间发生了社会矛盾。结果1260年蒙古帝国走向分裂。旭烈兀将他的中东领土划分为独立的伊儿汗国，包括了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阿塞拜疆、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大部分地区。

蒙古人最终在1335年撤退，但随之而来，丧失国家的塞尔柱突厥人为整个帝国带来了混乱。1401年，当地进一步受到突厥 – 蒙古混血帖木儿及其凶

猛侵略的困扰。在当时，另一支突厥人亦崛起了 – 奥斯曼人。他们以安纳托利亚为基地，到1566年他们征服伊拉克-伊朗地区、巴尔干半岛、希腊、拜占庭、埃及大部分、北非大部分以及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统一于奥斯曼帝国的旗帜下。奥斯曼苏丹的统治标志着中东地区中世纪（后古典）时代的结束。

近世近东

奥斯曼帝国 (1299年—1918年)

到了15世纪初，安纳托利亚西部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可汗于1453年占领基督教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并自立为苏丹。马木留克王朝将奥斯曼人维持出中东一个世纪，但在1514年塞利姆一世开始了系统性的中东扩张。叙利亚在1516年被占领，埃及则在1517年，毁灭了马木留克王朝的防线。几乎在40年后从白羊王朝的接班人，伊朗萨非王朝手上征服了伊拉克。

继10世纪的阿拔斯王朝之后，奥斯曼帝国再次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维持了400年，中间亦受到伊朗萨非王朝和阿夫沙尔王朝的挑战。当时奥斯曼帝国亦控制了希腊、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大部分，在东方和远至多瑙河北部的西方之间建立新的边界。

在西方，欧洲文明在人口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不断扩张。到了1700年，奥斯曼帝国已被踢出匈牙利。虽然奥斯曼欧洲部分地区例如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已经有大规模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口，但是未能在文化上把他们同化。从1768年 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不断丧失土地。到了19世纪，欧洲文明已经在财富上、人口上和最重要的科技上超越了伊斯兰世界。工业革命助长了经济高速增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9世纪，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奥斯曼帝国沦为“欧洲病夫”，越来越受欧洲列强的财政控制。垄断很快就变成了彻底的征服：1830年法国吞并了阿尔及利亚，1878年吞并了突尼斯，1882年英国占领了埃及，尽管它名义上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主权之下。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被彻底驱逐出欧洲，除了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之外。

英国也建立了对波斯湾的有效控制，而法国亦将其影响扩大到黎巴嫩和叙利亚。1912年，意大利人占领了利比亚和奥斯曼核心安纳托利亚附近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奥斯曼帝国转向德国以求免受西方列强的侵害，但结果却加剧了对德国的金融和军事依赖。

奥斯曼改革的尝试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东统治者试图使他们的国家现代化，以便与欧洲更有效地竞争。在奥斯曼帝国，坦志麦特改革重新激活了奥斯曼统治，并在19世纪后期由新奥斯曼人进一步推动，进入帝国的第一次立宪时期，其中包括1876年宪法的编写和奥斯曼议会的建立。1906年波斯革命的发起人都试图将西方宪政、民法、世俗教育和工业发展的模式引入他们的国家。在整个地区，铁路和电报线获得了建造，学校和大学获得了开放，一

批新的军官、律师、教师和行政官员出现了，挑战了伊斯兰学者的传统领导地位。

但是第一次立宪时期很快就结束了。专制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废除了议会和宪法，并支持了独裁统治。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之后30年以政令进行统治，激起了人民的不满。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改革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反对他的统治，其中包括对少数民族的屠杀。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中夺取政权并开始第二次立宪时期，使帝国在1908年首次举行多元和多党选举。青年土耳其党分裂为两个政党，亲德和支持集权的联合进步委员会以及亲英和支持权力下放的自由协和党。前者由一群雄心勃勃的军官伊斯麦尔·恩维尔酋长（后来的帕夏）和艾哈迈德·杰马尔帕夏，还有激进的律师穆罕默德·塔拉特酋长（后来的帕夏）领导。经过两党的权力斗争，联合进步委员会胜出并建立军政府统治，塔拉特帕夏成为首相（大维齐尔），而恩维尔帕夏成为国防部长，并在整个帝国建立了德国资助的现代化计划。

恩维尔帕夏与德国结盟，他认为德国是欧洲最先进的军事力量。原先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结盟来制衡俄罗斯，但由于英国要求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战败后将其正式首都埃迪尔内（阿德里安堡）交给保加利亚，土耳其人视之为英国的背叛。这断送了土耳其人对英国的支持，因亲英的自由协和党现在因为，用恩维尔的话来说，“无耻地卖国给敌人（英国）”，同意放弃埃迪尔内的要求，而处在亲德联合进步委员会的压制之下。

阿拉伯半岛

在18世纪，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领导了伊斯兰信仰的复兴运动，后来演变为19世纪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派 – 瓦哈比派。瓦哈比派与沙特家族一起合作，促成沙特阿拉伯的建国。早期奥斯曼帝国还有效地压制沙特家族的势力，消灭了第一沙特王国，但奥斯曼帝国自身的丧落，以及沙特王国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结盟，无可避免地削弱了土耳其人在阿拉伯的影响力。

现代中东

奥斯曼帝国末年

1878年，作为塞浦路斯条约的结果，英国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取得塞浦路斯。虽然塞浦路斯人最初欢迎英国统治，希望他们逐步得到繁荣，民主和民族解放，但他们很快就幻想破灭了。英国征收重税以支付他们获得塞浦路斯而对奥斯曼帝国作出的赔偿金。而且，当地人没有权利参与地区的政务，因为权力都集中在英国委任的高级专员和伦敦政府里。

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战败和盟军对安纳托利亚的瓜分引起了土耳其人的反抗。在土耳其国民运动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带领下，土耳其人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打败了入侵的列强，于1923年建立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作为开国元首，阿塔图尔克开始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他废除了哈里发国，解放了妇女，强制推行了西方服饰以及使用了基于拉丁

字母的新土耳其语字母来代替阿拉伯字母，并废除了伊斯兰法院的司法权。实际上，放弃了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后，土耳其现在决心脱离中东，文化上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另一个转折点发生于石油被发现时，首先是在伊朗（1908年），后来在沙特阿拉伯（1938年），以及其他波斯湾国家，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事实证明，中东拥有世界上最易提取的原油储备，20世纪最重要的商品。当西方石油公司抽出并出口了几乎所有的石油，以促进快速发展的汽车工业和其他开发项目，这些石油国家的国王和酋长就变得非常富裕，使他们能够巩固权力，使他们乐于维护当地的西方霸权。

西方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以及英国影响力的衰退提升了美国对当地的兴趣。原先石油生产和提取是被西方石油公司所垄断，但是石油资产和共享权的本土国有化运动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出现确保了权力平衡倒向阿拉伯石油国家。石油财富也窒息了在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的影响下在阿拉伯世界可能出现的任何经济，政治或社会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奥斯曼帝国恩维尔·帕夏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看到奥斯曼帝国的薄弱环节，并试图使之退出战争。当在1915年加里波利的直接攻击失败之后，英国将目光转向利用民族觉醒的阿

拉伯、亚美尼亚和叙利亚人，来对抗奥斯曼帝国统治。

英国找到哈希姆家族的帮助，汉志王国国王侯赛因・本・阿里发动了阿拉伯大起义，以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

由英国领导的盟军赢得了战争并夺取了大部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只有土耳其能苟存。战争改变了英国和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参与；由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构成的中东国家体系形成；明显更多的民族主义政治出现，例如在土耳其和埃及；以及中东石油工业的迅速增长。

奥斯曼帝国的战败和瓜分（1918年至1922年）

1918年，当奥斯曼帝国被阿拉伯起义和1918年在西奈及巴勒斯坦战役被英军击溃之后，阿拉伯人却未能得偿所愿。英国和法国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把中东地区瓜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英国于1917年宣布“贝尔福宣言”，承诺支持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历史悠久的犹太人家园巴勒斯坦重建国家。

当奥斯曼帝国被逐时，阿拉伯人在大马士革宣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军事和经济上太过弱小，无法抵抗欧洲列强得太久，英国和法国很快就建立起控制权并重划中东以得自己所需。

叙利亚成为法国保护国，作为国际联盟托管地。基督教的沿海地区则划分成为另一个法国保护国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托管地。伊拉克成为“伊拉克王国”，侯赛因·本·阿里的儿子费萨尔获任命为伊拉克国王。伊拉克包含了大量库尔德人、亚述人和土库曼人，其中许多民族曾获许有自己的独立国家。

巴勒斯坦成为“巴勒斯坦托管地”，并被分成两半。巴勒斯坦东半部成为“外约旦酋长国”，为侯赛因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提供王位。巴勒斯坦的西半部被置于英国直接管理之下。1918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数量不到8%，他们可以自由移民，从缺席的地主那里购买土地，在等待复国期间建立一个影子政府，并在英国军队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国家的核心；英军镇压了1936年巴勒斯坦起义。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则落入了另一个英国盟国，伊本·沙特在1932年建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国手上。

1920年–1945年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叙利亚和埃及逐步走向独立。1919年，埃及的萨德·扎格卢勒在埃及发动了大型示威活动，是为“第一次革命”。当扎格卢勒后来成为埃及首相时，英国镇压反殖民骚乱导致大约800人死亡。1920年，叙利亚军队在Maysalun战役中被法国人击败，伊拉克军队起义时都被英国人击败。1922年，（名义上）独立的埃及王国在英国政府发布“单方面埃及独立宣言”之后创立。

虽然埃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名义上是“中立国”，但很快首都开罗就成为了主要的英军基地，全国亦被英军占领。英国表明1936年的条约容许英国在埃及驻军以保护苏伊士运河。1941年，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盖拉尼政变迫使英国入侵，英国伊拉克战争爆发。接着又爆发盟军入侵叙利亚-黎巴嫩和英苏入侵伊朗。

在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冲突造成了英国既无法解决也无法摆脱困境的局面。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为犹太复国主义寻求移民巴勒斯坦和建立犹太国家创造了新的紧迫性。巴勒斯坦国也是阿拉伯和波斯领导人具吸引力的替代品，而不是事实上的英国、法国和犹太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在“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逻辑下。

二战之后的新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英国、法国和苏联离开了中东的许多地方。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半岛的国家一般都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战争结束后，七个中东国家获得（或重新获得）独立：

1943年11月22日 – 黎巴嫩

1944年1月1日 – 叙利亚

1946年5月22日 – 约旦（英国托管结束）

1947年 – 伊拉克（英国撤军）

1947年 – 埃及（英国撤军到苏伊士运河区）

1948年 – 以色列（英国撤军）

1960年8月16日 – 塞浦路斯

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1947年联合国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狭窄的空间中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分离的犹太国家。犹太领导人接受了它，但阿拉伯领导人拒绝了这一计划。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期结束，犹太人宣布以色列国成立。这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埃及、叙利亚、外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军队入侵以色列并被击败。大约80万巴勒斯坦人逃离以色列吞并的地区，成为邻国的难民，从而造成了“巴勒斯坦问题”，并在此后一直困扰著当地。在1948年以后被驱逐或逃离阿拉伯土地的758000至866000犹太人中约有三分之二被以色列国接收和归化。

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从英国独立。具有超凡魅力的宗教和政治领袖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当选为独立后第一位总统，并于1961年使塞浦路斯成为联合国第99个成员。

现代国家

现代中东由三件事塑造出来：欧洲列强的离开，以色列的建立，以及石油工业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这些影响引致美国更多地介入中东事务。美国是当地稳定的终极担保者，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石油工业的主导力量。当革命使激进的反西方政权在埃及（1954年）、叙利亚（1963年）、伊拉克（1968年）和利比亚（1969年）掌权时，寻求开辟冷战新战场的苏联，与埃及的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等阿拉伯社会主义统治者结盟。

这些政权借由承诺摧毁以色列，击败美国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者”，和为广大阿拉伯群众带来繁荣，来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当1967年与以色列的六日战争以穆斯林方面的决定性战败告终时，许多人认为战败代表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失败。这转捩点使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开始填补留下的政治真空”。

于是，美国觉得有责任去保护它剩余的盟友，——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朗和波斯湾酋长国的保守君主制政权；但它们的统治方式在西方眼中几乎与反西方政权一样没有吸引力。伊朗成为当时最关键的美国盟友，直到1979年由什叶派神职人员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并建立了一个比伊拉克或叙利亚的世俗政权更加反西方的政教合一政权。这迫使美国转为以沙特阿拉伯为亲密盟友。阿以战争的名单包括许多重大战争，如1948年阿以战争，1956年苏伊士战争，1967年六日战争，1970年消耗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1982年黎巴嫩战争，以及一众小型冲突。

在1955年至1974年的塞浦路斯，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和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之间发生的冲突导致了民族之间的暴力和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塞浦路斯

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米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丁·比塔尔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掌权。伊拉克首先由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统治，但在1979年由萨达姆·侯赛因继承，叙利亚首先由萨拉赫·贾迪德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和后来的哈菲兹·阿萨德统治，直到2000年他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继承。

1979年，埃及在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条约，结束了阿拉伯联合军事阵线的希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带领着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以及美国、犹太人和西方目标人物进行了长期的暴力运动，以求削弱以色列决心和破坏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叙利亚，利比亚，伊朗和伊拉克政权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巴解组织。运动的最高潮，是在1975年联合国大会第3379号决议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也是联合国大会对阿拉法特的接受。1991年联合国大会第4686号决议撤销了第3379号决议。

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中东的许多疯狂事件，它最终导致相邻的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两伊战争。战争由伊拉克挑起，它在1980年入侵伊朗胡齐斯坦，因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使得国家混乱；最终战争导致双方数十万人死亡并陷入胶着。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垮台和共产主义的崩溃对中东产生了一些影响。它

允许大量苏联犹太人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移民到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犹太国家。它切断了反西方阿拉伯政权最简单的信贷来源、军备和外交支持，削弱了它们的地位。它开辟了俄罗斯廉价石油的前景，压低了石油价格，并减少了西方对阿拉伯国家石油的依赖。它显示了通过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发展模式的败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埃及（在纳赛尔之下），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都遵循这种模式，使这些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陷入困境。像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统治者日益依赖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替代品。

萨达姆・侯赛因率领伊拉克从1980年到1988年与伊朗进行了长期而代价高昂的战争，然后又在1990年对科威特大规模入侵。科威特在1918年以前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部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尽管伊拉克在1961年已经承认其独立。于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叙利亚结盟，在获得了联合国的批准后，在波斯湾战争中以武力驱逐伊拉克。但是美国总统老布什并未有打算推翻侯赛因政权，使美国之后要付出代价。波斯湾战争使美国在波斯湾有了永久的军事存在，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并引起了穆斯林的不满，成为了奥萨马・本・拉登发动九一一袭击事件经常引用的理由。

1990年代 – 现代

在苏联解体后，东欧，拉丁美洲，东亚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全球性政权变化并未在中东发生。 在整个地区，只有以色列、土耳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视为民主国家。一些国家有立法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权力据说很小。在波斯湾国家，大多数人是不能投票的，因为他们是外国

劳工而不是公民。

在大多数中东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系列限制，包括政治限制、腐败和用人唯亲、武器和声望项目超支以及过度依赖石油收入。那些成功的经济体都是那些拥有石油财富和低人口的国家，例如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允许一些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自由化，但并不放弃任何自己的权力。经过多年内战，黎巴嫩经济亦得到了可观的恢复。

在21世纪初，所有这些因素加剧了中东的冲突，更影响了全世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未能在2000年戴维营首脑会谈上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这直接导致阿里埃勒·沙龙当选为以色列总理和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者对以色列平民进行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这是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以来首次爆发的重大暴力事件。

与此同时，大多数阿拉伯政府的失败和世俗阿拉伯激进主义的破产导致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开始支持伊斯兰主义，一个由伊朗的什叶派神职人员和沙特阿拉伯强大的瓦哈比派推动的意识形态。很多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在苏联－阿富汗战争期间获得了军事训练，当中的圣战者经旋风行动获得了美国资助，旋风行动是中情局迄今为止进行的最长，也是最昂贵的隐蔽行动之一。

其中一名阿拉伯武装分子是富有的沙特阿拉伯人，名叫奥萨马·本·拉

登。在20世纪80年代与阿富汗的苏联人作战后，他组建了盖达组织，负责了1998年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美国科尔号轰炸和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的袭击。九一一袭击导致乔治·布什政府于2001年入侵阿富汗，推翻了一直庇护本拉登和盖达组织的塔利班政权。美国及其盟国将此行动描述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

2002年，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制定了入侵伊拉克的计划，计划要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将伊拉克变成一个既民主又拥有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他们希望这将成为中东其他地区的典范。美国及其主要盟国 – 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澳大利亚 – 无法获得联合国批准执行联合国众多决议，因此他们独自于2003年4月发动入侵并毫不困难地推翻了萨达姆。

西方国家在中东的新一轮军事占领再次把当地带入历史的拐点。纵然2005年1月举行的选举很成功（虽然受到伊拉克逊尼派的杯葛），当地的秩序已经土崩瓦解，因为美军无法平息战后叛乱演变成的民族冲突。伊拉克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商业精英逃离该国，许多伊拉克难民亦因为内乱而离开，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的稳定。美国快速的增兵在控制叛乱和稳定国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美军于2011年12月撤出了伊拉克。

到2005年，乔治·布什总统介入之下的以巴和平进程已经停滞不前，尽管情况早在亚西尔·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后开始发生变化。因此，以色列采取了单边解决方案，推出了以色列西岸隔离墙以保护以色列免受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攻击，并单方面撤出了加沙。如果完成隔离墙将构成以色列事实上吞并西岸地区。2006年，以色列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什叶派民兵之间爆发了新的冲突，进一步挫败了任何"和平前景"。

在2010年初，一个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为几个中东国家带来了大型抗议、起义和革命，随后出现了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漫长的内战。2014年，一个名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自封为哈里发国，在伊拉克西部和叙利亚东部迅速扩张领土，迫使世界各国进行军事干预。在最高峰时，该组织控制了一个估计有280万至800万人口的区域，其中98％在2017年12月之前已丢失。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Africa

非洲历史

非洲的历史始于出现在东非的原始人类，并持续不间断到现在变得多样化和政治发展的错落有致各个民族国家。最早的已知记录历史出现在古埃及，后来出现在努比亚，萨赫勒，马格里布和非洲之角。

继撒哈拉大沙漠地区的荒漠化过程以后，北非历史与中东和南欧历史缠绕在一起；公元前1000年左右至公元元年，几波班图扩张从现代喀麦隆（中非）横跨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使得非洲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语言具有一定共同性。

在中世纪期间，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延伸到埃及，穿过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地区。在非洲一些著名的前殖民地的国家和社会包括Ajuran帝国，德山，阿达尔苏丹国，Alodia，Warsangali苏丹国，NRI王国，诺克文化，马里帝国，博诺州，桑海帝国，贝宁帝国，奥约帝国，王国隆达，加纳帝国，莫

西志，Mutapa帝国，马蓬古布韦，正弦王国，森纳尔王国，萨卢姆王国，Baol王国，王国Cayor，津巴布韦的王国，刚果王国，帝国Kaabu，王国岛伊费，古迦太基，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和阿克苏美帝国。据估计，在欧洲殖民主义出现之前的最高峰时期，非洲有多达10,000个具有不同语言和习俗的不同州和自治团体。

从15世纪末开始，欧洲人加入了奴隶贸易。可以说葡萄牙人与其他欧洲人一起领导。这包括三角贸易，葡萄牙人最初是通过贸易获取奴隶，后来又以武力作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一部分。他们将被奴役的西非、中非和南部非洲人运送到海外。随后，在非洲争夺战中，欧洲对非洲的殖民统治从大约10％（1870年）迅速发展到90％以上（1914年）（1881-1914）。然而，在非洲大陆许多地区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至1945年）之后欧洲的衰弱之后，整个非洲大陆都实现了非殖民化，并在1960年的非洲达到高潮。

记录口述历史，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等学科对重新发现非洲古代文明至关重要。

上古

北非的古代历史与古代近东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埃及和努比亚尤其如此。在非洲之角的阿克苏姆帝国统治现代厄立特里亚，北部埃塞俄比亚和西部沿海地区阿拉伯半岛。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350年与邦特土地建

立了联系。邦特（Punt）是古埃及的贸易伙伴，据信它位于现代的索马里，吉布提或厄立特里亚。迦太基等腓尼基城市是地中海铁器时代和古典时期的一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那个时代或多或少地独立发展。

古埃及

上埃及和下埃及开始将酋长合并为更广泛的政治实体，最终导致纳默（Mennes）在公元前3100年将埃及统一为一个政治实体。他没有被视为圣酋长，而是成为了神圣的国王。该henotheism，或者多神教系统内一个单一的神，沿上下埃及酝酋邦实行的崇拜，成为多神教古埃及宗教。官僚机构在法老王的统治下变得更加集中，由州长，收税员，将军，艺术家和技术人员管理。他们从事税收工作，为大型公共工程安排劳力，并建造灌溉系统，金字塔，庙宇和运河。在第四王朝（公元前2,620-2,480），远距离贸易得到发展。在旧王国大多数时期，埃及始终通过中央官僚机构和法老的神职来发展自己的基本系统，制度和文化。

公元前四千年后，埃及开始对其南部和西部邻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到公元前2200年，旧王国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法老势力的各州州长之间的竞争以及亚细亚人入侵尼罗河三角洲的破坏。第一个中级时期已经开始，这是一个政治分裂和动荡不安的时期。

十一世代的门图霍特普二世在公元前2041年至2016年之间再次统一埃及；这始于公元前2041年征服第十个世代王朝；埃及中王国由此产生。金字塔建设工程恢复了；长途贸易重新出现；并且权力的中心从孟菲斯移到了底比斯。在第二个阶段时，与库什（Kush），瓦瓦特（Wawat）和伊尔特

（Irthet）南部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随后赶来的第二中间期，出现了入侵希克索斯时所用的马拉战车以及青铜武器；这是埃及在此之前未曾出现的技术。马拉的战车很快就在可居住的撒哈拉沙漠和北非向西部蔓延。Hyksos未能守住其埃及领土，并被埃及社会所吸收。这最终导致了埃及最强大的阶段之一，即新王国（公元前1,580–1,080年）和第18个王朝。埃及成为控制努比亚和犹太地的超级大国，同时对西方的利比亚人和地中海施加政治影响。

和以前一样，新王国以利比亚王子从西方入侵而结束，进入了第三中期。从Shoshenq I始，第二十二王朝成立。它统治了两个世纪。

在南部，努比亚的独立性和实力得到了重新巩固。这导致努比亚（Nubia）征服了埃及；该部落由卡什塔（Kashta）开始，皮耶（Pianhky，公元前751-730年）和沙巴卡（Shabaka，公元前716-695年）完成。这是埃及第二十五王朝的诞生。努比亚人试图重建埃及的传统和习俗。他们统治了埃及一百年。这是由于亚述人入侵而结束的；塔哈卡（Taharqa）经历了亚述人铁器武器的全部威力。努比亚法老坦塔玛尼（Tantamani）是第二十五个王朝的最后一个。

亚述人和努比亚人离开后，塞伊斯诞生了新的第二十六王朝。它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人入侵。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留下了。332年，埃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这是托勒密王朝的开端，在公元前30年被罗马人征服而告终。法老的埃及已经走到了尽头。

努比亚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尼罗河上最早出现的族王国之一是位于努比亚北部的塔塞提（Ta-Seti）。塔塞提（Ta-Seti）是尼罗河谷第1和第2阶段强大的族王国；根据上埃及统治的情况表示，它对附近的酋长领地产生了影响。Ta-Seti贸易至远至Syro-Palestine以及埃及。塔塞提（Ta-Seti）向旧王国出口了金，铜，鸵鸟毛，乌木和象牙。到公元前32世纪，塔塞提（Ta-Seti）逐渐衰落。公元前3100年，纳默尔统一埃及后，塔塞提（Ta-Seti）被第一王朝的法老王阿哈（Ahara）入侵；这摧毁了王国的最后残余部分。

一些小型的王国在公元前3,000年后的数个世纪中一直点缀着尼罗河的努比亚地区。在第三个千年的后半期，这些王国有了进一步的巩固。特别是出现了两个王国：埃及南部的赛伊王国和第三次阶段的科尔马王国。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的某个时候，科尔马王国征服了塞伊王国，成为埃及的重要竞争对手。从第一阶段到蓝尼罗河，白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的汇合，科尔马占领了一块领土。大约在公元前1,575至1,550年，在十七王朝后期，科尔马王国入侵了埃及。其与希克索斯在入侵埃及的过程中结盟。

埃及最终在十八王朝下重新充满活力，并征服了科尔马或库什王国，统治了将近500年。在此期间，库什特人被埃及化。到公元前1100年，埃及人从库什撤出。该地区重新获得独立并恢复了其文化。库什（Kush）在阿蒙（Amun）附近建立了新的宗教，并使纳帕塔（Natapat）成为其精神中心。公元前730年，库什王国入侵埃及，占领了底比斯，并开始建立努比亚帝国。帝国从巴勒斯坦延伸到青尼罗河，白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的交汇处。

公元前664年，挥舞铁器的亚述人驱逐了库什人。后来，行政首都从纳帕塔迁至梅罗，发展了新的努比亚文化。最初，Meroites被高度埃及化，但随后开始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努比亚成为炼铁和棉布制造的中心。埃及文字被Meroitic字母代替。狮子神Apedemak被添加到埃及众神万神殿中。埃及与努比亚和地中海希腊的贸易往来增加了；与红海也有贸易往来。它的建筑和艺术种类繁多，有狮子，鸵鸟，长颈鹿和大象的图像。最终，随着阿克苏姆（Aksum），努比亚（Nubia）的贸易联系中断，并且因铁生产所需的砍伐树木而使环境恶化。公元350年，阿克苏姆派国王埃萨娜（Ezana）终结了梅罗（Meröe）。

迦太基

迦太基帝国

埃及人将尼泊尔西部的柏柏尔人称为利比亚人。利比亚人是农业种植者，例如摩洛哥的毛利人以及阿尔及利亚中部和东部以及突尼斯的努米德人。他们也是游牧民族，骑马，并像盖埃图里（Gaetuli）一样占领着干旱的牧场和沙漠。柏柏尔沙漠的游牧民族通常与柏柏尔沿海的农业种植者发生冲突。

腓尼基人是地中海的航海者；他们在不断搜索贵重金属如铜，金，锡，铅。他们开始在北非海岸定居，并与当地的柏柏尔人进行交易和交往。公

元前814年，来自提尔的腓尼基人建立了迦太基城。到公元前600年，迦太基已成为地中海的主要贸易实体和力量；这主要是通过与热带非洲的贸易来实现的。迦太基的繁荣促进了柏柏尔王国，努米迪亚和毛里塔尼亚的发展。约在公元前500年，迦太基为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自沙漠干旱以来一直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保持联系的柏柏尔中间商利用牲畜动物将产品从一个绿洲运送到另一个绿洲。商人们面临路上强盗的危险。盐和金属商品被与黄金，奴隶，珠子和象牙交易。

迦太基人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竞争对手。迦太基与罗马进行了三场布匿战争，分别是：西西里岛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至241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218至201 BC），其中汉尼拔入侵欧洲；以及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年至146年）。迦太基在前两次战争中失败，在第三次战争中被摧毁，成为非洲的罗马省；努美底亚的柏柏尔王国协助了罗马。非洲的罗马省成为小麦、橄榄和橄榄油的主要供应者；罗马帝国在那里征收高昂的税收。两个世纪后，罗马将努美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柏柏尔王国归其统治。公元420年，VANDALS【来自北欧，自今天法国、西班牙、进入北非的古维京人或古日耳曼民族】入侵北非，罗马失去了领土。柏柏尔王国随后恢复了独立。

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在亚历山大的非洲立足，并传播到西北非洲。到313年，根据《米兰E令》，整个北非罗马人都是基督教徒。埃及人采用了单物论基督教，并成立了独立的科普特教会。柏柏尔人采纳了多纳主义基督教。两者都拒绝接受罗马天主教会的授权。

柏柏尔人的作用

随着迦太基力量的发展，它对土著人口的影响急剧增加。柏柏尔文明已经处于农业，制造业，贸易和政治组织支持多个州的阶段。内部的迦太基人与柏柏尔人之间的贸易联系有所增长，但迦太基领土的扩张也导致某些柏柏尔人被奴役或军事征募，并从其他柏柏尔人中提取了贡品。到公元前4世纪初，柏柏尔人与迦勒人组成了迦太基军队中最大的一员。

在雇佣军战争（公元前241-238年）中，迦太基和非洲盟友的雇佣军煽动了叛乱。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战败后，柏柏尔士兵无偿参加战斗。柏柏尔人成功地获得了迦太基北非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他们铸造了名为利比亚的硬币，该硬币在希腊语中用来描述北非人。由于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的胜利，迦太基国家衰落；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市被毁。随着迦太基力量的减弱，柏柏尔领导人在内地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到公元前2世纪，出现了几个大型但管理松散的柏柏尔王国。其中两个是在迦太基控制的沿海地区背后的努米迪亚建立的。Nuredia西面是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横跨摩洛哥的莫洛亚河（Moulouya River）到达大西洋。在马西尼萨王朝统治期间，柏柏尔人的文明高峰达到了最高点，直到Almohads和Almoravid王朝在一个多世纪后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马西尼萨（Masinissa）在148年去世后，柏柏尔王国分裂并统一了好几次。Masinissa的防线一直存活到公元24年，当时剩余的柏柏尔领土被罗马帝国吞并。

马克罗比亚和巴巴里市国

Macrobia是一个古老的王国，位于非洲之角（今索马里），在公元前5世纪曾被提及。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波斯皇帝 坎比西斯二世在征服埃及后（公元前525年）派遣大使前往马克罗比亚，为马克罗比亚国王带来了豪华礼物，以吸引他的投降。至少部分基于身高选举产生的马克罗比亚统治者以不系弓的形式对波斯同行提出了挑战：如果波斯人能够设法将其拉弦，他们将有权入侵他的国家；否则，他们应该感谢众神从未使马克罗比亚人决定入侵波斯帝国。

马克罗比亚是一个以其先进的建筑和黄金财富而著称的区域大国；黄金是如此之丰富，以至于他们将囚犯束缚在金链中。

罗马北非

罗马统治下的北非

“罗马统治时期，城市化进程和耕地面积的增加导致柏柏尔人社会全面错位，迫使游牧部落定居或从其传统牧场迁移。部落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和自治。柏柏尔人几乎是不变地反对罗马人的存在。罗马皇帝 图拉真 环绕奥雷斯建立了南部边境Nemencha山，建设堡垒，从Vescera（现代一行比斯克拉）到Majores（Hennchir Besseriani，比斯克拉的东南）的防守线延伸至少到Castellum Dimmidi（现代Messaâd）、位于比斯克拉（Biskra）西南）、罗马阿尔及利亚最南端的堡垒。罗马人在2世纪定居并开发了Sitifis（现代Sétif）周围的地区；但在更远的西部，罗马的影响并没有

延伸到沿海和主要军事道路上，直到很晚为止。”

罗马人在北非的军事存在仍然相对较小，在Numidia和两个毛里塔尼亚省中约有28,000名士兵和辅助人员。从公元2世纪开始，这些驻军大多由当地居民组成。

除迦太基外，北非的城市化部分是由于在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Claudius）（41-54年在位），涅尔瓦（96-98）和图拉真（98-117）统治下建立了退伍军人居住区。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定居点包括提帕萨，Cuicul或Curculum（现代杰米拉，东北塞提夫的），Thamugadi（现代提姆加德塞提夫的东南），和Sitifis（现代塞提夫）。大多数城镇的繁荣取决于农业。北非被称为“帝国的粮仓”，成为该帝国最大的谷物出口国之一，运往意大利、希腊等不生产谷物的省份。其他农作物包括水果，无花果，葡萄和豆类。到公元2世纪，橄榄油已成为谷物的出口产品。

在北非，罗马帝国衰落的开始似乎没有其他地方那么严重。但是，起义确实发生了。公元238年，土地所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财政政策；但起义者失败了。在三世纪的危机中，毛里塔尼亚山脉的零星部落起义从253年持续到288年。这些城镇也遭受了经济困难；建筑活动几乎停止了。

罗马北非的城镇有大量的犹太人。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一些犹太人因叛乱罗马统治而被驱逐出犹太地或巴勒斯坦。其他人则是早于布匿（Punic）移民者来的。此外，许多柏柏尔部落都皈依了犹太教。

基督教在2世纪到达这里；不久就在城里和奴隶中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256年，八十多个主教，其中一些来自遥远的边境地区的努米迪亚，参加了迦太基会议。到了四世纪末，定居地区已基督教化；一些柏柏尔部落也大规模地皈依了。

313年，北非基督教徒开始了教会中被称为多纳派 异端的分裂。

有时会发生激烈的多纳主义争议，是罗马体系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斗争。

北非最清楚表达对多纳主义立场（后来被称为异端）的批评者，是河马里吉斯（Hippo Regius）的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奥古斯丁被认为是基督教教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讲道和著作影响巨大。

贸易下降削弱了罗马人的控制。独立的王国出现在山区和沙漠地区，城镇被淹没，先前被推到罗马帝国边缘的柏柏尔人返回了。

533年，在VANDAL战争中，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属下的将军、贝利萨留，率领16000人来到北非，一年之内摧毁了VANDAL王国【VANDAL人的祖先是北欧人；他们经西欧、西班牙、进入北非】。然而，当地的反对派把拜占庭帝国对该地区的全面控制推迟了十二年；即使后来

当拜占庭帝国的控制实现时，它的控制也远小于罗马帝国时所曾经达到的控制状态。尽管建立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防御工事，但拜占庭的统治却因官方腐败，无能，军事软弱，以及君士坦丁堡对非洲事务的不在意，而受到损害；这使得后来阿拉伯人在穆斯林早期征服期间很容易攻击北非。结果，许多农村地区恢复了柏柏尔统治。

阿克苏姆

阿克苏姆帝国

在厄立特里亚和北部埃塞俄比亚，最早的国家D'mt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8世纪。D'mt通过红海与埃及和地中海进行贸易，提供了乳香。到了5世纪和3世纪，D'mt衰落了，几个继承国取代了它。后来与阿拉伯南部（主要是与萨巴港）的贸易增多。阿杜里斯成为埃塞俄比亚高地的重要商业中心。阿拉伯南部的萨巴亚人和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这两个地区的人民互动，导致了盖伊兹文化和语言以及盖兹文字的最终发展。贸易联系从红海到地中海，再到埃及，以色列，腓尼基，希腊和罗马，再到黑海，再到波斯，印度和中国，都在扩大和扩展。阿克苏姆（Aksum）在这些土地上广为人知。到公元前5世纪，该地区非常繁荣，出口了象牙，河马皮，金粉，香料和活象。它进口了银，金，橄榄油和葡萄酒。Aksum生产用于出口的玻璃晶体，黄铜和铜。强大的Aksum出现了，统一了苏丹东部，埃塞俄比亚北部（Tigre）和厄立特里亚的部分地区。它的国王建造了石制宫殿建筑；国王们去世后被埋葬在巨石纪念碑下。到公元300年，阿克苏姆（Aksum）铸造了自己的银和金币。

在公元331年，王Ezana（公元320-350）皈依Miaphysite基督教。350年，叙利亚修道院的传统在埃塞俄比亚教堂中扎根。

在六世纪，阿克苏姆（Aksum）强大到足以将阿拉伯半岛上的萨巴（Saba）加入她的帝国。6世纪末，萨萨尼亚帝国将阿克苏姆（Aksum）赶出了半岛。随着伊斯兰教在西亚和北非的蔓延，阿克苏姆在地中海的贸易网络摇摇欲坠。红海贸易转移到波斯湾并由阿拉伯人控制后，贸易减少了，导致阿克苏姆（Aksum）地位下降。到了公元800年，首都从南部迁至内陆高地，阿克苏姆（Aksum）的人数大大减少了。

西非

在萨赫勒西部地区，小米和高粱的种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定居社区的兴起。考古学指出，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西非的城市人口众多。共生贸易关系是在跨撒哈拉贸易之前发展起来的，以应对横跨沙漠，草原和森林的生态系统的南北多样性所提供的机会。农业种植者从沙漠游牧民族那里得到盐分。沙漠游牧民族从牧民和草原农民以及尼日尔河的渔民那里获得肉类和其他食物。森林居民提供毛皮和肉类。

今天的毛里塔尼亚所在地的Dhar Tichitt和Oualata在早期的城市中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在撒哈拉沙漠的前大草原上，约有500个石头定居点。它的居民钓鱼并种植粟。公元前300年左右，该地区变得更加干燥，定居点开始减少，最有可能迁至库姆比·萨利赫

（Koumbi Saleh）。建筑证据和陶器风格的比较表明，Dhar Tichitt与后来的加纳帝国有关。Djenné-Djenno（今马里）定居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该镇逐渐发展壮大，可容纳大量铁器时代的人口；墓地拥挤证明了这一点。居住的房屋结构由晒干的泥浆制成。到公元前250年，杰纳・杰诺（Djenné-Djenno）已成为一个繁荣的大型集镇。与Djenne-Jeno相似的城镇也从约公元前900年左右在尼日尔河沿岸的马里的迪亚遗址发展。

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尼日利亚中部的更南端，诺克斯文化在乔斯高原发展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社区。诺克人在兵马俑中制作了栩栩如生的作品，包括人的头部和人物，大象和其他动物。到公元前500年，他们在冶炼铁。到了公元200年，诺克文化消失了。基于与Nok兵马俑的风格上的相似性，现在伊费（Ire）的约鲁巴（Yoruba）王国和贝宁（Binin）的比尼（Bini）王国的青铜雕像据认为是早期Nok文化传统的延续。

班图扩展

班图扩展，涉及到非洲的历史和在非洲大陆的稳定的人口显著迁移。讲班图语的人（尼日尔-刚果家族的一个分支）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从喀麦隆向东传播到大湖地区。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班图语从大湖传播到非洲南部和东部。公元前2世纪，一个早期的运动向南延伸到赞比西河上游。公元1世纪，讲班图语的人向西推进到今天的安哥拉的大草原，向东推进到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大湖区的第二次推进是在2000年前向东，扩展到印度洋沿岸，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东部团体最终遇到了来自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大湖的南方移民。两组人员都继续向南；东部组继续到莫桑比克，并在公元2世纪到达马普托，然后扩展到德班。

到公元后第一个千禧年，扩张行为已扩展到当今的南非大溪河。科伊桑人居住在南部非洲的其余地区。

中世纪和近现代（6至18世纪）

SAO文明

SAO文明从大约公元前六世纪蓬勃发展，在中非持续至公元16世纪。SAO人生活在乍得湖以南的Chari河旁，后来成为今天的喀麦隆和乍得的一部分。他们是最早在现代喀麦隆领土上留下清晰痕迹的人。如今，喀麦隆北部和乍得南部的几个种族群体-特别是萨拉人-声称从SAO文明中来。SAO的文物表明他们是青铜，铜和铁的技术工人。发现的内容包括人类和动物人物的青铜雕塑和兵马俑雕像，硬币，丧葬,、家用器具，珠宝，装饰精美的陶器和矛。最大的SAO考古发现发生在乍得湖以南。

卡内姆帝国

卡内姆帝国是在乍得盆地的中心。从公元9世纪开始，它被称为卡内姆帝国（Kanem Empire），并一直作为独立的博尔努王国（Bornu）延续到1893年。在它的鼎盛时期，它不仅覆盖乍得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覆盖了现代利比亚南部，尼日尔东部，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尼日利亚，喀麦隆北部，南苏丹的部分地区和中非共和国。帝国的历史主要从1851年德国旅行者海因里希·巴特（Heinrich Barth）发现的皇家纪事或吉尔伽姆中得知。卡内姆（Kanem）于8世纪在乍得湖以北和以东地区崛起。后来，它进入衰落，萎缩，并在14世纪被从菲特里湖区域来的Bilala侵略者打败。

大约在公元9世纪的中央苏丹帝国加涅姆，首府在Njimi，是由卡努里-speaking游牧民族成立。卡内姆通过从事跨撒哈拉贸易而崛起。它用突袭南部捕获的奴隶交换了北非的马匹，这反过来又帮助了获得更多的奴隶。到11世纪后期，Humai（Hummay ）ibn Salamna建立了伊斯兰Sayfawa（Saifawa）王朝。Sayfawa王朝统治了771年，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王朝之一。除了贸易以外，卡内姆（Kanem）附近的地方农场的税收也成为国家收入的来源。卡内姆（Kanem）在迈伊（Mai）（国王）杜纳马·迪巴勒米·伊本·萨尔玛（1210–1248）统治下达到顶峰。据报道，该帝国能够部署4万名骑兵，从北部的费赞（Fezzan）延伸到南部的圣州。伊斯兰教在帝国中根深蒂固。麦加朝圣很普遍；开罗有专门为卡内姆（Kanem）朝圣者准备的旅馆。

博尔努帝国

由赛富瓦（Sayfuwa）领导的卡努里人（Kanuri）迁移到该湖的西部和南部，在那里建立了博尔努（Bornu）帝国。到16世纪后期，Bornu帝国已扩张并重新占领了被布拉拉征服的卡内姆地区。博尔努的卫星州包括西部的达玛伽拉姆（Damagaram）和乍得湖东南部的巴吉米尔（Baguirmi）。大约在1400年，Sayfawa王朝将首都迁至乍得湖西南的一个支流州博尔努（Bornu），新的首都比尔尼·恩加扎加穆（Birni Ngarzagamu）。过度放牧导致卡内姆（Kanem）的牧场变得过于干燥。此外，来自比拉拉（Bilala）的政治竞争氏族变得越来越激烈。搬到博尔努（Bornu）可以使帝国处于更好的位置，以开发跨撒哈拉贸易并扩大其在该贸易中的网络。还建立了与豪萨州之间的联系，为比尔马提供了马鹿和盐，以购买波诺曼

黄金。Mai Ali Gazi ibn Dunama（c。1475 – 1503）击败了Bilala，重新建立了对Kanem的完全控制。在16世纪初期，塞法瓦王朝在多次叛乱后巩固了对博尔努族的控制。在16世纪后半叶，与松海帝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麦 •伊德里斯•阿卢玛（Mai Idris Alooma）对其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土耳其雇佣军被用来训练军队。Sayfawa王朝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第一批进口枪支的君主。帝国控制着所有的萨赫勒，从边界达尔富尔东部到Hausaland到西部。通过的黎波里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友好关系。麦与奥斯曼帝国苏丹交换了礼物。

17和18世纪的博尔努（Bornu）历史不太为人所知。在18世纪，它成为学习伊斯兰的中心。然而，博尔努的军队由于不进口新武器而变得过时了，而且Kamembu也开始衰落。麦的力量因干旱和饥荒的加剧而受到破坏；北部的牧民内部叛乱，豪萨（Hausa）力量的增强以及枪支的进口使战争更加血腥。到1841年，最后一个mai被废黜，结束了长寿的Sayfawa王朝。舍胡的al-Kanemi王朝取而代之。

希鲁克王国

希卢克王国（Shilluk Kingdom）从15世纪起就集中在南苏丹，沿着白尼罗河西岸的一片土地，从No湖到北纬12°左右。首都和皇室住所在Fashoda镇。王国是在15世纪中叶由其首位统治者尼康建立的。在19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进攻以及后来英国和苏丹在盎格鲁-埃及苏丹的殖民统治，希卢克王国面临衰败。

巴吉米尔王国

在乍得湖东南的16世纪和17世纪时，Baguirmi王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现在是乍得国家。巴吉米尔出现在卡内姆·博尔努帝国的东南方。王国的第一位统治者是姆邦·比尔尼·贝斯（Mbang Birni Besse）。在他的统治后期，博尔努帝国（Bornu Empire）征服了该国并将其作为附属国。

1918年法国人接管后，瓦代的首府阿贝歇（Abéché）

瓦代帝国

从17世纪，瓦代帝国集中于乍得和中非共和国。Tunjur人建立的瓦代王国在16世纪达到博尔努的东部。在17世纪，马巴人起义，建立了穆斯林王朝。

起初，瓦代（Wadai）向博尔努（Bornu）和杜尔富（Durfur）进贡，但到18世纪，瓦代（Wadai）完全独立，并成为其邻国的侵略者。在博尔努（Bornu）的西边，到15世纪，卡诺（Kano）王国已成为豪萨（Husa）王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北部卡特森（Katsina）王国处于不稳定的休战状态。两者都在1805年的富拉尼圣战中被吸收到了索古托哈里发特地区，这对博尔努本身构成了威胁。

卢巴帝国

公元1300年至1400年间，来自Balopwe氏族的Kongolo Mwamba（Nkongolo）统一了基萨莱湖附近的各种卢巴人。他建立了孔戈洛王朝，后来被卡拉拉·伊伦加（Kalala Ilunga）赶下了王位。卡拉拉（Kiala）将王国扩展到了基萨莱湖（Lake Kisale）西部。一个新的集中化的精神国王政治体系（balopwe），由首长级官员和次要首长组成的理事会，直达村长。该balopwe声称是直接与祖先灵魂沟通，并被他们拣选。被征服的国家被集成到系统中，并以其头衔在理事会代表。balopwe的权威依靠他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他的军事权威。军队相对较小。卢巴人能够控制区域贸易，并为重新分配收集贡品。其创始人声称从卢巴（Luba）血统传承，形成了许多分支状态。卢巴族的政治体系遍布中非，乌干达南部，卢旺达，布隆迪，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刚果西部。宣称卢巴人血统的两个主要帝国是隆达帝国和马拉维帝国。本巴人与Basimba人、赞比亚北部的许多人是卢巴族移民的后裔，他们是在17世纪到达赞比亚的。

隆达帝国

在1450年代，来自王室艾伦加·齐宾达（Ilunga Tshibinda）的卢巴族与隆达皇后Rweej结婚，并团结了所有隆达人民。他们的儿子穆卢普韦·卢森（Mulopwe Luseeng）扩大了王国。他的儿子纳威（Naweej）进一步扩展了帝国，并被称为首位隆达皇帝，头衔是毒蛇之王mwato yamvo。保留了卢巴（Luba）政治体系，并将被征服的人民纳入了该体系。

许多州声称从隆达（Lunda）传承。安哥拉内陆的伊姆班巴拉（Imbangala）声称是卢威王后（Queen Rweej）的哥哥金杜里（Kinguri）的后裔，他无法容忍穆鲁普韦·津布达（Mullopwe Tshibunda）的统治。金杜里（Kinguri）成为由露易妮女王（Rweej）的兄弟创立的国家国王的

头衔。赞比亚的卢埃纳（Lwena）和洛兹（Luyani）也自金杜里（Kinguri）继承血统。在17世纪，一个叫做Mwata Kazembe的隆达酋长和战士在卢阿普拉河谷建立了一个东部隆达王国。隆达（Lunda）的西部扩张也使雅卡（Yaka）和彭德（Pende）血统传承。隆达将中非与西部沿海贸易联系起来。隆达王国在19世纪由持枪的Chokwe入侵时结束。

刚果王国

到公元15世纪，在一个名为Manikongo的统治者的统治下，居住在刚果河下游肥沃的Pool Bole地区，从事农业的Bakongo人（ba为复数前缀）统一为Kongo王国。首都是姆班扎-孔戈（M'banza-Kongo）。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他们能够征服邻居，并使他们进贡。他们是金属制品，陶器，和编织酒椰纤维布的专家。他们通过manikongo控制的朝贡制度刺激了区域间贸易。后来，玉米和木薯（manioc）将通过与葡萄牙人在罗安达和本格拉的港口进行贸易而被引入该地区。玉米和木薯将导致该地区和非洲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取代小米成为主要主食。

到16世纪，马尼孔戈人从西方的大西洋到东方的Kwango河拥有统治权。每个领土被分配了一个嘛呢- mpembe（省长）。在1506年，基督徒阿方索一世（1506-1542）继位。随着阿方索（Afonso）的征服战争，奴隶交易增加。约1568年至1569年，贾加（Jaga）入侵孔戈，并迫使马尼孔戈流放。1574年，在葡萄牙雇佣军的帮助下，曼尼孔戈·阿尔瓦罗一世得以恢复。在1660年代后期，葡萄牙人试图控制孔戈。

在征服战争中，刚果从恩东戈王国得到俘虏。恩东戈（Ndongo）被恩哥拉

统治。Ndongo还将与葡萄牙人进行奴隶贸易，而圣多美是巴西的中转站。16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试图控制Ndongo，但被姆本杜（Mbundu）击败。葡萄牙人以贸易商的身份定居在沿海地区，没有冒险征服内陆。奴隶制在内陆造成了严重破坏，各州发起了征服俘虏的战争。

非洲之角

索马里

在索马里对面的红海沿岸，伊斯兰教的诞生意味着，索马里商人和水手渐渐受到阿拉伯穆斯林的贸易伙伴的宗教的影响。在伊斯兰教初期几个世纪，随着穆斯林家庭从伊斯兰世界迁移到索马里，以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索马里穆斯林学者和平地改造了索马里人口，古城邦最终转变为伊斯兰的摩加迪沙，柏培拉，蔡拉，巴拉瓦（Barawa）和默卡（Merka）；他们是柏柏尔人（中世纪阿拉伯语所称的索马里人祖先）。摩加迪沙市后来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它控制了东非的黄金贸易长达几个世纪。

在此期间，苏丹王国如Ajuran帝国和摩加迪沙的苏丹国，巴拉韦，马尔卡和霍比奥通过它们各自的港口蓬勃发展贸易；利润丰厚的国外贸易与船舶航行，直到阿拉伯，印度，威尼斯，波斯，埃及，葡萄牙，甚至远至中国。瓦加斯杜（Vagadishu）在15世纪曾经到达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他记述，那里有一座大房子，中心有四到五层楼高的宫殿，中间还有许多宫殿，此外还有许多带有圆柱形尖塔的清真寺。

在16世纪，Duarte Barbosa指出，许多来自现代印度的坎巴亚王国的船只都把布和香料航运到摩加迪沙，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金，蜡和象牙。巴博萨（Barbosa）还强调了沿海市场上丰富的肉，小麦，大麦，马和水果；这为商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摩加迪沙，一个蓬勃发展的纺织工业的中心，被称为TOOB贝纳迪尔（专门用于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市场）；来自霍尔木兹海峡的犹太商人将他们的印度纺织品和水果带到索马里海岸，以换取谷物和木材。

与马六甲的贸易关系是在15世纪建立的；布，龙涎香和瓷器是贸易的主要商品。长颈鹿，斑马和熏香出口到明朝中国；这使索马里商人成为亚洲和非洲之间贸易的领导者；并在此过程中，索马里语的语言影响了中文。来自苏拉特的印度商人和来自帕特的东南非洲商人为了绕开葡萄牙的封锁和阿曼干预，使用了索马里的默卡和巴拉瓦港口（这不在葡萄牙和阿曼两个大国管辖范围内）进行安全贸易，而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埃塞俄比亚

扎格维王朝统治时间从大约1137年到1270年。从公元1270年开始，数百年来，所罗门王朝统治了埃塞俄比亚帝国。

自15世纪初以来，埃塞俄比亚就寻求与欧洲诸国进行外交接触。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给阿比西尼亚皇帝的信得以保存。1428年，叶萨克一世皇帝向

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派遣了两名使节，但使者未能回返旅程。

埃塞俄比亚与欧洲国家的首次连续关系，始于1508年；埃塞俄比亚与葡萄牙的、刚刚从父亲继承王位的皇帝勒布纳·登格尔（Lebna Dengel）统治下的葡萄牙王国，建立了联系。这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当埃塞俄比亚帝国受到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加齐（称为“左撇子”）的攻击的时候，葡萄牙向埃塞俄比亚皇帝派出武器和四百名士兵，帮助他的儿子Gelawdewos击败了艾哈迈德，并重新确立了埃塞俄比亚统治。这场阿比西尼亚-阿达尔战争也是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在该地区的最早的战争之一；而葡萄牙则参与了冲突。

Susenyos皇帝于1624年皈依罗马天主教后，之后多年的反叛和内乱导致数千人死亡。耶稣会传教士得罪了当地埃塞俄比亚人的东正教信仰传统；在1632年6月25日，Susenyos的儿子，皇帝法西尔兹，宣布国家宗教再次成为传统的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并驱逐传教士和其他欧洲人。

北非

马格里布

在凯鲁万的大清真寺（又称Uqba清真寺），由倭马亚将军巴·伊本·纳菲最早建于670年；是马格里布和北非最古老，最负盛名的清真寺；位于突尼

斯的凯鲁万城市；到公元711年，乌马雅德哈里发已征服了整个北非。到10世纪，北非的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

到公元9世纪，伊斯兰对北非的征服和伊斯兰文化的扩展所带来的团结宣告结束。关于谁应该成为先知默罕默德的继任者，伊斯兰内部发生了冲突。最初，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的首都在大马士革。后来，阿拔斯人控制了那里，将首都迁至巴格达。

10世纪初，来自叙利亚的什叶派团体声称具有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Fatimah）的血统；他们在马格里布（Maghreb）建立了法提米王朝。到950年他们征服了整个马格里布；969年，他们征服了整个埃及国度。他们立即与巴格达分裂。

为了在Sanhaja Berbers带来纯正的伊斯兰教形式，Abdallah ibn Yasin在当今的毛里塔尼亚和西撒哈拉发起了Almoravid运动。Sanhaja Berbers和Soninke一样，与伊斯兰教一起实行土著宗教。阿卜杜拉·伊本·亚辛（Abdallah ibn Yasin）在拉姆图纳·桑哈贾（Lamtuna Sanhaja）发现了现成的伊斯兰皈依者；他们由南部的Soninke和北部的Zenata Berbers主导。到1040年代，所有的拉姆图纳政权都转变为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在Yahya ibn Umar和他的兄弟Abu Bakr ibn Umar的帮助下，拉姆图纳酋长的儿子，阿尔莫拉维德建立了一个从萨赫勒地区延伸到地中海的帝国。阿卜杜拉·伊本·亚辛（Abdallah ibn Yassin）和Yahya ibn Umar去世后，因为帝国太大而无法由一个人统治，阿布·巴克尔（Abu Bakr）将帝国分为两半，他本人和优素福·本·塔什芬（Yusuf ibn Tashfin）分别统治一半。

阿布·巴克尔（Abu Bakr）率领南部继续与Soninke作战，而优素福·本·塔什芬（Yusuf ibn Tashfin）占领了北部，将其扩展到西班牙南部。阿布·巴克尔（Abu Bakr）于1087年去世，团结破裂，并加剧了南部的军事分歧。这导致了Soninke的重新扩张。

在10到13世纪，贝都因人大举迁出阿拉伯半岛。大约在1050年，来自埃及的100万阿拉伯游牧民族中有四分之一迁入了马格里布（Maghreb）。那些北海岸的人被称为Banu Hilal。那些在阿特拉斯山脉以南的人被称为是Banu Sulaym。该迁徙运动增大了阿拉伯语的使用与传播，并加速了柏柏尔语的衰落和北非的阿拉伯化。后来，一个阿拉伯化的柏柏尔人团体（Hawwara）通过埃及南下到努比亚（Nubia）。

在1140年代，阿卜杜勒·穆敏（Abd al-Mu'min）向Almoravids宣布圣战，指控他们颓废腐败。他团结了北部的柏柏尔人对抗阿尔莫拉维德，推翻了他们，形成了阿尔莫哈德帝国。在此期间，马格里布（Maghreb）彻底被伊斯兰化了；这也导致了识字的普及，代数的发展以及数字零和小数的使用。到13世纪，Almohad州已分为三个对立州。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半岛】，穆斯林国家大部分被卡斯蒂利亚的基督教王国阿拉贡和葡萄牙灭绝。大约1415年，葡萄牙通过捕获休达而收复了北非失地；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北非海岸其他港口。1492年，在格拉纳达战争结束时，西班牙在格拉纳达酋长国击败了穆斯林，有效地结束了伊比利亚【西班牙半岛】南部八个世纪以来穆斯林的

统治。

葡萄牙和西班牙进入了丹吉尔，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的港口。这使他们与奥斯曼帝国直接竞争，后者利用土耳其海盗船（海盗和私人船员）重新占领了港口。土耳其海盗将利用这些港口来袭击基督教船只；这是他们城镇战利品的主要来源。

从名义上讲，北非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但只有沿海城镇完全被伊斯坦布尔控制。的黎波里从与博尔诺的贸易中受益。的黎波里的帕夏族人通过非斯与博尔努帝国的苏丹进行贸易，用马匹，枪支和盔甲交换奴隶。

在16世纪，一个阿拉伯游牧部落自称为穆罕默德的女儿萨迪斯（Saadis）的后裔；他们征服了摩洛哥。他们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到达大西洋，并将葡萄牙从摩洛哥的西海岸驱逐出境。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 al-Mansur）使国家发展到了最高水平。他于1591年入侵Songhay，以控制黄金贸易；黄金贸易被转移到非洲的西海岸以利欧洲船只，并转移到东部的突尼斯。摩洛哥在Songhay的控制权在17世纪减弱。艾哈迈德（Ahmad）死后，在1603年，王国分裂为非斯和马拉喀什两个苏丹国。后来，它被穆莱·拉希德（Moulay al-Rashid）统一；他是阿拉乌特王朝的创始人。他的兄弟、继任者伊斯梅尔·本·谢里夫（Ismail ibn Sharif，1672-1727年）通过从苏丹进口奴隶来建立军队，从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性。

尼罗河谷

埃及

法蒂玛·哈里发特统治下的埃及繁荣昌盛。大坝和运河得到修复；小麦，大麦，亚麻和棉花产量增加。埃及成为亚麻和棉布的主要生产国。它的地中海和红海贸易增加了。埃及还铸造了一种叫做Fatimid第纳尔的黄金货币，用于国际贸易。收入的大部分来自于向fellahin（农民农户）征收的沉重税收。收税过程由柏柏尔霸主负责；他们是公元969年参加法蒂米德征服战争的士兵。他们向哈里上交一部分征税，并保留剩下的部分。最终，他们成为地主，并形成了定居的土地贵族制。

为了填补士兵数量，哈里发使用了马穆鲁克土耳其奴隶骑兵和苏丹奴隶步兵。柏柏尔自由人也被招募。在1150年代，农场的税收减少了。士兵起义在农村造成严重破坏，减缓了贸易，并削弱了法蒂米德·哈里发的力量和权威。

1160年代，法蒂玛（Fatimid）统治下的埃及受到欧洲十字军的威胁。在这种威胁下，一位名叫Ṣalāḥad-DīnYūsufibnAyyūb（萨拉丁）的库尔德将军带着一小撮专业士兵成为杰出的穆斯林捍卫者。萨拉丁（Salatin）在1187年击败了埃及边境的基督教十字军并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1171年，法蒂米德·哈里发统治体系中的最后一名哈里发Al-Adid逝世；萨拉丁（Salatin）成为埃及的统治者；这迎来了阿尤比德王朝。在他的统治下，埃及回到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开罗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学习的重要中心；越来越多的人被从土耳其和俄罗斯南部被抓来，成为马穆鲁克的奴隶士兵。

这些士兵可以通过在战争中做出贡献而获得土地拥有权。

随着时间的流逝，马穆鲁克的奴隶士兵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到1250年，他们摆脱阿尤比德王朝的统治，并建立了马穆鲁克王朝。实力更强大的马穆鲁克人被称为埃米尔人。250年来，马穆鲁克人在军事独裁统治下控制着整个埃及。埃及在1260年的艾因贾鲁特战役中，将领土扩展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他们挫败了十字军，并制止了蒙古人的入侵。马穆鲁克（埃及）被视为伊斯兰教，麦地那（Medina）和麦加（Mecca）的保护者。最终，马穆鲁克人开始将他们的土地视为世袭，并开始适应城市生活；他们的农田产量下降，大坝和运河失修。马穆鲁克的军事技能和技术在欧洲手枪和大炮的新技术面前，已经无法匹敌。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埃及很容易被击败。1517年，在奥斯曼帝国与马穆鲁克战争结束时，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17世纪和18世纪，世袭的马穆鲁克人重新掌权。领先的马穆鲁克人被称为贝斯。帕夏斯（Pashas）或总督只是名义上代表伊斯坦布尔政府，独立运作。在18世纪，巴夏王朝建立了。政府软弱而腐败。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当地部队抵抗法国征服的能力很弱。但是，大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于1801年抵制了法国的占领。这些事件标志着19世纪英法在埃及的对抗的开始。

苏丹

基督教和伊斯兰努比亚

Ezana阿克苏姆摧毁MEROE（麦罗埃）以后，Ballana人迁移到努比亚，建立了三国Makuria，Nobatia和Alodia。他们将统治200年。Makuria位于第三阶段之上，沿Dongola河段，首都在Dongola。诺巴底首都法拉斯（Faras）在北部，而阿洛迪亚（Alodia）首都Soba在南部。Makuria最终吸收了Nobadia。该地区的人民大约在公元500到600年皈依基督教。教会最初以科普特文字（Coptic）开始写作，然后以希腊语写作，最后以尼罗撒哈拉沙漠人老努比亚语（Old Nubian）写作。教会与埃及科普特教会一致。

到641年，埃及被哈里发征服。这有效地阻止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努比亚和阿克苏姆的影响。651–652年，来自埃及的阿拉伯人入侵了基督教努比亚。努比亚弓箭手击败了入侵者。双方签订了《Baqt（或Bakt）条约》，承认基督教努比亚人的地位，并规范贸易。该条约定义了基督教努比亚人与伊斯兰埃及之间的关系，达到近六百年的历史。

到13世纪，基督教努比亚（Christian Nubia）开始衰落。教会和贵族衰败削弱了君主制的权威。阿拉伯的贝都因部落开始渗透到努比亚，造成进一步的破坏。伊斯兰教被引入了努比亚。到1366年，努比亚（Nubia）被马姆鲁克（Mamluks）入侵时，被划分为小规模的领地。在15世纪，努比亚向阿拉伯移民开放。阿拉伯游牧民族与人口融合在一起，并引入了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语言。到16世纪，马库里亚（Makuria）和诺巴底（Nobadia）已被伊斯兰化。在16世纪，阿卜杜拉·贾马（Abdallah Jamma）领导了一个

阿拉伯联合会，摧毁了阿卢迪亚（Alodia）的首都索巴（Soba），这是基督教努比亚（Christian Nubia）的最后堡垒。后来，阿洛迪亚（Alodia）将沦为Funj苏丹国（Funj Sultanate）的统治之下。

在15世纪，Funj牧民向北迁移到Alodia并占领了它。1504和1505年之间，王国扩大，达到峰值，并在巴迪II阿布Daqn（C 1644 – 1680）的统治下，在森纳尔建立了首都。到16世纪末，Funj 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将帝国向西推进到科尔多凡。他们向东扩张，但被埃塞俄比亚阻止。他们控制了努比亚。他们在经济上依赖被俘虏的敌人的劳动，也依赖于穿越Sennar的商人。在巴迪四世（1724–1762）时期，军队推翻了国王统治，使其成为一个傀儡。1821年，Funj被埃及帕夏（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805-1849年）征服。

南部非洲

早在公元4世纪，林波波河以南便已建立起了以铁器农业和牧民为主的班图语族聚居地；他们取代并吸收了最初的科伊桑人。他们慢慢地向南移动。最南端的人群是科萨人，他们的语言融合了早期科伊-桑族人的某些语言特征，并到达了如今东开普省的大鱼河。

大津巴布韦和马彭布威

马彭古布王国是南部非洲的第一个国，首都为马彭古布威。该国始建于公元12世纪。它的财富来自控制林波波河流域的象牙贸易，北部德兰士瓦山区的铜贸易，以及津巴布韦平原的黄金贸易。到13世纪中叶，Mapungubwe被废弃了。

马彭布圭（Mapungubwe）衰落后，大津巴布韦国在津巴布韦高原崛起。津巴布韦意为石材建筑。大津巴布韦是南部非洲的第一个城市，并且是帝国的中心；它吸收了较小的绍纳政体。石材建筑是从Mapungubwe继承而来的。这些建筑技术得到了增强，并在以大围墙为代表的大津巴布韦逐渐成熟。干堆砌石技术还被用来在该地区建造较小的建筑物。大津巴布韦通过与斯瓦希里语的基尔瓦和索法拉的贸易而繁荣起来。大津巴布韦的崛起与基尔瓦的崛起平行。大津巴布韦是黄金的主要来源地。它的王室生活在豪华之中，穿着印度棉，周围环绕着铜和金饰；他们的餐具甚至来自印度和中国。在1420年代和1430年代，大津巴布韦呈下降趋势。这座城市在1450年被废弃。有人将其衰落归因于贸易市镇Ingombe Ilede的崛起。

随之而来的是绍纳历史的新篇章。卡兰加北部的绍纳国王Nyatsimba Mutota对之进行了征服。他和儿子穆托普（Mutope）征服了津巴布韦高原；该国穿过莫桑比克到达东海岸，将帝国与沿海贸易联系起来。他们称自己的帝国为“ Wilayatu'l Mu'anamutapah”或“ mwanamutapa”（被掠夺之地的领主），或Mutapa王国。Monomotapa是葡萄牙语的变音。他们没有建造石头建筑。北部的绍纳国没有用石头建造的传统。1480年马托佩（Matope）逝世后，该帝国分裂为两个小帝国：托尔瓦（Torwa）在南部，Mutapa在北部。两个Shona领主Changa和Togwa关于mwanamutapa线的竞争，导致了这场分裂。昌加占领南部，以首都卡米（Khami）成立布图亚王国。

Mutapa帝国继续在mwenemutapa线以北。在16世纪，葡萄牙人能够在赞比西河上建立永久性市场，以试图获得对Mutapa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他们取得了部分成功。

纳米比亚

埃雷罗和纳马地区

到公元1500年，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国。在纳米比亚西北部，奥万博（Ovambo）从事耕种，而埃雷罗（Herero）从事放牧。随着牲畜数量的增加，埃雷罗人向南移至纳米比亚中部以放牧土地。Ovambanderu人向西北延展到博茨瓦纳。纳马人，一个讲科伊语的放牧族落，向北迁移，与埃雷罗人有所接触；这将导致两个群体之间的许多冲突。不断扩张的LOZI人把Mbukushu，Subiya和Yei排挤到博茨瓦纳北部的Botei，Okavango和Chobe地区。

南非和博茨瓦纳

索托・茨瓦纳

以林波波河以南的高地为基础的索托-茨瓦纳州的发展始于公元1000年左

右。酋长的权力掌握在牛身上，以及他与祖先的关系。这可以在Toutswemogala山定居点看到；该定居点在高地以北和Vaal河以南具有石头基础和石墙。瓦尔河的西北部，发展出早期的茨瓦纳州。当出现分歧或竞争时，不同的人群便组成了自己的国家。

乌尼人

在德拉肯斯堡山脉的东南部，居住着讲尼古尼语的民族（祖鲁族，科萨族，斯威士族和恩德贝勒族）。他们也开始建国；新的国家因竞争、分歧和人口压力而发展，并迁移到新地区。这个19世纪的战争、国家建立和移民过程，后来被称为Mfecane（Nguni）或Difaqane（Sotho）。它的主要催化剂是祖鲁王国的巩固。他们是金属加工工人，小米的耕种者和牧民。

科伊桑和布尔人

科伊桑人住在西南开普省，其中冬季雨量充沛。早期的Khoisan人口被班图人吸收，例如Sotho和Nguni；但随着冬季降雨，班图人的扩张在该地区停止了。一些班图语种结合了Khoisan语言的辅音。科伊桑人与他们的班图人邻居进行贸易，提供牛、羊和被捕获的物品；作为回报，他们说班图语的邻居买卖铜，铁和烟草。

到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桌湾建立了补给站，用于补给水和从

Khoikhoi购买肉类。Khoikhoi收到了铜，铁，烟草和珠子作为交换。为了控制肉类和肉类的价格并提高服务质量，荷兰人于1652年在桌湾建立了永久定居点。他们种植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并为患病的水手建立了医院。为了增加产量，荷兰人决定通过鼓励增加最初在西非奴隶工作的土地上的自由人（农民）的数量，来增加桌湾的农场数量。这片土地是从科伊科伊（Khoikhoi）放牧的土地上夺走的；这引发了1659年第一次科伊科伊（Khoikhoi）荷兰战争。没有胜利者出现，但荷兰人承担了"征服权"，据此他们夺取了所有海角。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布尔人占领了科伊科伊所有土地，并夺走了他们所有的牲畜。第二次Khoikoi-Dutch战争（1673–1677）是一次牲畜袭击。Khoikhoi还因欧洲疾病而死于数千人。

到18世纪，海角殖民地已经发展壮大，奴隶来自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和印度尼西亚。定居点也开始向北扩展，但科伊科伊的抵抗，突袭和游击战在18世纪减缓了扩展。开始实行牧民主义的布尔人被称为迷途者。

东南部非洲

班图族移民之后，在非洲东南沿海地区，通过与阿拉伯穆斯林和波斯商人接触，发展起了一个班图族混合社区，从而导致了阿拉伯、波斯和非洲斯瓦希里语城市国家的发展。从这些交流中涌现出的斯瓦希里语文化表明，在传统的班图文化中没有看到许多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影响；班图斯瓦希里人的许多非洲阿拉伯成员也是如此。最初的社区以坦桑尼亚（尤其是桑给巴尔）和肯尼亚的沿海地区为中心-被称为斯瓦希里海岸。

这些后来的阿拉伯和波斯定居者遇到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东南沿海的班图人是最早的居民；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早期著作（公元50至500年）中都提到了Rhapta，Azania和Menouthias的贸易定居点。这些早期的著作也许记录了班图人定居者在其移民期间到达东南非洲的第一波浪潮。

从历史上看，斯瓦希里人位于莫桑比克北部的肯尼亚北部和南部的鲁伍马河。阿拉伯地理学家将斯瓦希里海岸称为zanj（黑人）的土地。

尽管曾经被认为是波斯殖民者的后裔，但古代史瓦西里人现在已被大多数历史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认可为班图人；他们与穆斯林商人之间保持着重要的交往，始于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斯瓦希里王国拥有岛屿贸易港口（希腊历史学家称其为“大都市”），并与伊斯兰世界和亚洲建立了常规贸易路线。蒙巴萨，桑给巴尔和基尔瓦等港口，对于郑和领导下的中国水手，和中世纪的伊斯兰地理学家，如柏柏尔旅行者Abu Abdullah ibn Battuta来说，是众所周知的。斯瓦希里语的主要出口商品是象牙，奴隶和黄金。他们与阿拉伯，印度，波斯和中国进行了贸易。

葡萄牙人于1498年到达这里。为了执行经济控制和斯瓦希里海岸基督教化的使命，葡萄牙人于1505年首先袭击了基尔瓦，随后又袭击了其他城市。由于斯瓦希里人的抵抗，葡萄牙建立商业控制权的尝试从未成功。到17世纪末，斯瓦希里语海岸的葡萄牙权威开始减少。在阿曼阿拉伯人的帮助

下，到1729年，葡萄牙人的存在已被消除。斯瓦希里语海岸最终成为阿曼苏丹国的一部分。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但没有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乌雷威

在非洲铁器时代，乌雷威文化在非洲的维多利亚湖地区及其周围发展并传播。文化的最早时期的文物位于卡盖拉区的坦桑尼亚；乌雷威文化的遗址可以追溯到铁器时代初期，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6世纪。乌雷威文化的起源于喀麦隆的班图人。

马达加斯加和梅里纳

根据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数据，马达加斯加最早是在公元6世纪之前由东南亚的讲南洋语的人定居，然后在6或7世纪是由东非大陆的班图语的人定居。南方人引入了香蕉和水稻的种植，班图人引入了牛和其他耕作方式。大约在公元1000年，在马达加斯加北部开始了阿拉伯和印度贸易；印度洋贸易发展起来。到14世纪，伊斯兰教由商人引入。马达加斯加在东非中世纪时期起着联系其他斯瓦希里海港城市国（例如索法拉，基尔瓦，蒙巴萨和桑给巴尔）的联络港口的作用。

15世纪后出现了几个王国：西海岸的Sakalava王国（16世纪），东海岸的Tsitambala王国（17世纪）和中部高地的梅里纳（15世纪）。到19世纪，

梅里纳（Merina）控制了整个岛屿。1500年，葡萄牙人成为岛上最早的欧洲人并袭击了贸易定居点。

随后是英国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到达这里。在17世纪后期，马达加斯加是海盗的热门中转站。拉达玛一世（1810–1828）在19世纪初期邀请基督教传教士来到这里。女王腊纳瓦洛娜一世的残忍地（1828年至1861年）禁止基督教；估计15万个基督徒中丧生。在拉达玛二世（1861-1863）的领导下，马达加斯加采取了法国化的方针，并给予法国很大的商业让步。1895年，在第二次佛朗哥-霍瓦战争中，法国入侵马达加斯加，接管了安齐拉纳纳（迭戈・苏亚雷斯），并宣布马达加斯加为保护地。

高原湖州和帝国

在14至15世纪之间，出现了大型的南非王国和国家，例如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Buganda 和Karagwe 王国。

Kitara和Bunyoro

到公元1000年，东非大湖地区之间的高原湖上出现了许多州。牛群饲养，谷物种植和香蕉种植是这些州的经济支柱。Ntusi和Bigo土方工程代表了最早的邦尼罗王国之一。

Bito家族由据说统治过Kitara帝国的Bachwezi家族的后裔宣称合法性。但是，人们对Kitara知之甚少。一些学者甚至质疑它的历史存在。湖区各种政体的大多数创始领导人似乎都声称是巴赫维兹人的后裔。

卢旺达

卢旺达王国成立于大约17世纪，在西裂谷底部的基伍湖附近的Bunyoro东南。图西（BaTutsi）牧民与在胡图（巴胡图族）的农民组成了精英阶层，国王叫姆瓦米（mwami）。两组人都说相同的语言，但是有严格的社会规范禁止彼此结婚和互动。根据口头传统，卢旺达王国由姆瓦米·鲁甘祖二世（Ruganzu Ndori）（约1600年– 1624年）建立，首都设在基加利附近。在Mwami Kigeli IV的统治下，花了200年才建立了真正的中央集权王国（Kigeri Rwabugiri）（1840-1895）。征服胡图族比征服图西人更困难。最后一位图西族首领在1852年投降于姆瓦米·穆塔拉二世（Mutara Rwogera）（1802-1853），但最后一个胡图人的首领在1920年代才被Mwami Yuhi V（Yuli Musinga）（1896-1931）征服。

布隆迪

卢旺达王国以南是布隆迪王国。它是由图西族族长Ntare Rushatsi（约1657年至1705年）创立的。像卢旺达一样，布隆迪是建立在图西族牧民饲养的牲畜，胡图族农民的农作物，征服和政治创新之上的。在姆瓦米·恩塔雷·鲁甘巴（Mwami Ntare Rugaamba）（c。1795 – 1852）的统治下，布隆迪奉行侵略性扩张主义政策；该政策更多地基于外交而非武力。

马拉维

马拉维王国

马拉维（Maravi）与斯瓦希里人（Swahili Kilwa）将中非与东部沿海贸易联系起来。17世纪，马拉维帝国已涵盖了马拉维湖和赞比西河入海口之间的所有地区。到18世纪，它已经分裂。

西非

萨赫勒帝国和州

加纳

加纳帝国

早在公元8世纪时，加纳帝国可能已经建立。加纳是8世纪后期由阿拉伯地理学家法拉齐（Al-Farazi）首次提及的。加纳有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居住。城市居民是帝国的管理者，他们是穆斯林，而加纳国王则是传统宗教信仰者。存在两个城镇，其中一个是穆斯林行政管理人员和柏柏尔－阿拉伯人居住的城镇，该城镇通过一条石砌路与国王的住所相连。农村居民居住在村庄中，这些村庄团结成更广泛的群体，他们对加纳表现出忠诚。加纳被认为是神圣的，他的身体健康对整个社会都有影响。加纳在征服了Aoudaghost之后，于1050年左右皈依了伊斯兰教。

加纳帝国通过对将提亚雷特（Tiaret）和西吉尔马萨（Sijilmasa）与Aoudaghost相连的跨撒哈拉贸易征税，从而致富。加纳控制了通往库姆比

萨利赫（Koumbi Saleh）东南的班博克（Bambouk）金矿的通道；征收了穿过其领土的一定比例的盐和金。帝国没有参与那些东西的生产。

到11世纪，加纳处于衰落状态。曾经有人认为1076年阿尔伯拉德王朝下柏柏尔（Berbers）洗劫了Koumbi Saleh是原因。这不再被接受；引用了几种替代解释。一个重要原因是黄金交易向东转移至尼日尔河和塔加扎小径，导致加纳随之而来的经济下滑。提到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不同世袭政体之间的竞争而引起的政治不稳定。1230年，塞内加尔北部的塔库尔（Takrur）接管首都，帝国宣告灭亡。

马里

马里帝国开始于公元13世纪；1235年，曼德（曼丁哥族）的领导者，桑蒂埃塔凯塔家族（主狮），在Kirina战役中击败索马罗・卡特以及南部索宁克。桑迪亚塔继续向肥沃的森林和尼日尔河谷征服，东至尼日尔河弯，北至撒哈拉沙漠，西至大西洋，吸收了加纳帝国的部分。桑迪亚塔（Sundiata）取了曼萨（Mansa）头衔。他在尼亚尼建立了帝国的首都。

尽管盐和黄金贸易对马里帝国仍然很重要，但农业和畜牧业也至关重要。高粱，小米和大米的生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萨赫勒地区的北部边界，放牧牛，羊，山羊和骆驼是主要活动。曼德人学会在村庄和土地周围组织起来。一群村庄被称为卡夫（kafu），由法玛统治。法玛向曼萨进贡。由皇家宫廷指挥的一支精锐的骑兵和步兵部队维持着秩序。如有必要，可以从支流地区兴起强大的军队力量。

皈依伊斯兰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曼萨的权力取决于坚持传统信仰和权力的精神基础。Sundiata最初将伊斯兰教拒之门外。后来的曼萨斯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仍然承认传统神灵，并参加了对曼德族很重要的传统仪式和节日。伊斯兰教在Sundiata的儿子Uli I（1225-1270）的统治下成为宫廷宗教。曼萨・乌里（Mansa Uli）向麦加朝圣，并在穆斯林世界中得到认可。宫廷配备有识字的穆斯林，担任秘书和会计师。穆斯林旅行者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留下了对帝国的生动描述。

马里达到了在14世纪的权力和范围的高峰期；曼萨・穆萨（1312年至1337年）带着500个奴隶去朝觐麦加；他邀请像Ishal al-Tuedjin（al-Sahili）这样的学者和建筑师将马里进一步融入伊斯兰世界。

马里帝国见证了学习和识字的扩展。1285年，Sakura，一个被释放的奴隶，篡夺了王位。这个曼萨人将图阿雷格人赶出了廷巴克图，并将其建立为学习和商业中心。图书交易量增加了，图书复制成为了一个非常受人尊敬且有利可图的职业。廷巴克图（Timbuktu）和丹尼（Djenné）成为伊斯兰世界中重要的学习中心。

曼萨・苏莱曼（Mansa Suleyman）（1341-1360）统治之后，马里开始呈螺旋式下降。莫西骑兵突袭了暴露的南部边界。图阿雷格人骚扰了北部边界，以夺回廷巴克图。Serer和Wolof的联盟破裂了。1545年至1546年，松海帝国占领了尼亚尼。1599年后，帝国失去了Bambouk金矿，并瓦解为小政体。

松海

松海的桑尼•阿里（Sonni Ali）于1468年从图阿雷格（Tuareg）占领了廷巴克图（Timbuktu），开始了自己的征服之旅。他将帝国扩展到北部，深入沙漠，将MOSSI推到尼日尔以南，然后向西南扩展到Djenne。他的军队由骑兵和独木舟组成。桑尼•阿里（Sonni Ali）不是穆斯林，受到柏柏尔-阿拉伯学者的负面评价，尤其是因为他袭击了穆斯林廷巴克图（Timbuktu）。在1492年去世后，他的继承人被Soninke的穆斯林Muhammad Ture将军废黜。

穆罕默德•图尔（Muhammad Ture ，1493-1528年）建立了阿斯基亚王朝，阿斯基亚是国王的头衔。他巩固了对桑尼•阿里（Sonni Ali）的征服。伊斯兰通过宣扬对MOSSI的圣战，恢复跨撒哈拉的贸易以及在开罗让阿巴斯王朝的"影子"哈里发宣布他为苏丹的哈里发，从而扩大了他的权威。他将廷巴克图确立为伊斯兰学习的重要中心。穆罕默德•图尔（Muhammad Ture）通过将图阿雷格（Tuareg）推向北，占领了东部的艾尔（Aïr）和占领了产盐的塔格萨（Taghaza）来扩大了整个帝国。他通过从忠诚的仆人和家庭中选拔行政人员并将他们分配给被征服的领土，从而进一步集中了整个帝国的管理。他们负责培养当地民兵。中央集权制使得即使在朝代纠纷期间，松海也非常稳定。Leo Africanus留下了关于该帝国在阿斯基亚•穆罕默德（Askiya Muhammad）的领导下的生动描述。阿斯基亚•穆罕默德（Askiya Muhammad）在1528年被他的儿子废黜。经过多次竞争，穆罕默德•图尔（Muhammad Ture）的最后一个儿子阿斯基亚•达乌德（Askiya Daoud（1529–1582））继承了王位。

1591年，摩洛哥入侵萨阿迪王朝的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 al-Mansur）统治下的松海帝国，以夺取萨赫勒（Sahel）的金矿。在通迪比战役中，松海军队被击败。摩洛哥人占领了Djenne，Gao和Timbuktu，但他们无法确保整个地区的安全。Askiya Nuhu和Songhay军队在松海地区中心的Dendi聚集；那里充满活力的游击队抵抗力消耗了摩洛哥人的资源；而摩洛哥人一直需要摩洛哥的补给。松海在17世纪分裂为几个州。

摩洛哥发现其征服行动无利可图。黄金贸易已转移给沿海的欧洲人。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贸易现在都转移到了东部的博尔努（Bornu）。用黄金购买的昂贵设备必须送往整个撒哈拉沙漠，这是不可持续的。摩洛哥人仍然与该人群结婚，被称为Arma或Ruma。他们在廷巴克图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拥有各种各样的独立于摩洛哥的小岛。1737年，图阿雷格人屠杀了Arma。

索科托哈里发

富拉尼人是四处迁徙的人。他们从毛里塔尼亚移动到——富塔Tooro，富塔贾隆，随后整个西非的其余部分。到公元14世纪，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在16世纪，他们在马里南部的Macina建立了自己的住所。在1670年代，他们宣布对非穆斯林进行圣战。这些圣战战争在福塔托罗，福塔贾隆，马西纳，瓦利亚和本杜形成了几个州。这些州中最重要的州是索科托哈里发或富拉尼帝国。

乌斯曼·丹·佛迪奥（Usman dan Fodio，1754– 1817年）在哥比尔（Gobir）市指责豪萨（Hausa）领导人实行不纯正的伊斯兰教，并在道义上腐败。1804年，他发动了富兰尼战争（Fulani War），作为针对那些对

高税率不满且对其领导人不满的民众的圣战。在富拉尼和豪萨人的大力支持下，圣战热潮席卷了尼日利亚北部。乌斯曼创建了一个帝国，其中包括尼日利亚北部的部分地区贝宁和喀麦隆；以索科托为首都。他退休后从事教学和写作，并将帝国交给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贝洛（Muhammed Bello）。索科托哈里发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03年，当时英国人征服了尼日利亚北部。

森林帝国和州

阿肯王国与阿桑特帝国的兴起

阿肯王国讲土瓜湾语言。据信讲土瓜湾语的人来自东非/中非，然后定居萨赫勒地区。到12世纪，建立了阿坎波诺曼王国（波诺州）。在13世纪，当现代马里的金矿开始枯竭时，波诺曼和后来的其他阿肯邦开始在黄金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Bonoman和其他阿肯王国，例如Denkyira，Akyem，Akwamu它们的前身，后来导致阿散蒂帝国的出现。众所周知，到17世纪，阿肯族人被确定生活在一个名为夸阿曼（Kwaaman）的州。该州的位置在Bosomtwe湖以北。该州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黄金和可乐果的交易以及从砍伐森林到种植山药的交易。他们在Pra河和Ofin河之间建造了城镇。他们组建了防卫同盟，并向当时最强大的阿肯州之一登基拉（Denkyira）和阿丹西（Adansi）以及阿夸姆（Akwamu）进贡。在16世纪，Ashante社会经历了突然的变化，包括由于木薯和玉米等新世界植物的种植以及沿海与北部之间的黄金贸易增加而导致的人口增长。

到17世纪，Osei Kofi Tutu I（约1695年至1717年）在Okomfo Anokye的帮助下，将后来的Ashante变成了一个以金凳作为其统一精神的象征的邦联。奥塞图图（Osei Tutu）进行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他在阿肯州阿克瓦木州

建立了Ashante军队，引入了新的组织，并将纪律严明的民兵变成了有效的战斗机器。1701年，阿散特人（Ashante）征服了登基拉（Denkyira），使他们得以与欧洲人，尤其是荷兰人进行沿海贸易。Opoku Ware I（1720年至1745年）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张，将其他阿肯南部州加入了这个不断壮大的帝国。他转向北扩张到塔奇曼，班达亚齐，Gyaaman和Gonja。在1744年到1745年之间，Asantehene Opoku进攻了强大的北部达戈巴州，从而控制了重要的尼日尔中部贸易路线。Kusi Obodom（1750–1764）继承了Opoku。他巩固了所有新获得的领土。奥塞・夸德沃（Osei Kwadwo，1777年至1803年）进行了行政改革，使该帝国得以得到有效治理，并继续进行军事扩张。Osei Kwame Panyin（1777–1803），Osei Tutu Kwame（1804–1807）和Osei Bonsu（1807–1824）继续领土合并和扩张。阿散特帝国包括当今所有的加纳和象牙海岸的大部分地区。

Ashantehene继承他的母亲的位置。在首都库马西，有一位在贸易，外交和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担任行政员，他的头衔叫Gyaasehene。来自阿拉伯，苏丹和欧洲的人员受聘担任行政员，所有人员均由Ashantehene任命。在首都和其他城镇，安科比亚人或特警被用作Ashantehene的保镖，作为情报来源并镇压叛乱。整个帝国的通讯都通过从沿海到尼日尔中部以及连接其他贸易城市的通畅道路网络来维持。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散特帝国（Ashante Empire）仍然强大。后来在四次盎格鲁-阿尚蒂战争之后，它被英国高级武器和组织摧毁，并于1900年被摧毁。

达荷美

反对妇女的达荷美·亚马逊（Dahomey Amazons）

达荷美王国始建于17世纪初；阿加人的的Allada王国向北迁移并定居之中丰；几年后，他们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建立了达荷美王国，首都设在阿格博姆。霍格巴贾国王（约1645年至1685年）将达荷美组织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宣布所有土地归国王所有，并征税。长子继承制建立了王权，废除了村长们的所有意见。建立了"王权崇拜"。每年将牺牲一名俘虏奴隶，以纪念皇家祖先。在1720年代，怀达（Whydah）和阿拉达（Allada）成为奴隶贸易州；达荷美（Dahomey）直接进入奴隶海岸并与欧洲人进行贸易。Agadja国王（1708–1740）试图通过将奴隶留在生产棕榈油的种植园中来结束奴隶贸易，但是欧洲从奴隶上获利，而达荷美对枪支的依赖也太大了。1730年，在阿加哈国王（Agaja）的统治下，达荷美被奥约帝国（Oyo Empire）征服；达荷美不得不进贡。对奴隶的税收大多是用贝壳支付的。在19世纪，棕榈油是主要的贸易商品。法国在第二次法兰西-达荷美战争（1892-1894年）期间征服了达荷美，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政府。与达荷美作战的大多数士兵是非洲本地人。

约鲁巴

传统上，约鲁巴人把自己视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居民，而今天的情况则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约鲁巴"是尼日尔-刚果大家庭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称呼。这个名字来自豪萨语，指的是Oyo帝国。约鲁巴的第一个州是埃勒-伊夫（Ile-Ife），据说它是由一位超自然人物奥尼杜瓦（ Oniduwa）建立的。奥杜杜瓦的儿子将是约鲁巴人的不同城邦的创始人；他的女儿将成为各种约鲁巴语的母亲OBAS，或国王。约鲁巴城邦通常由一个地方政府管辖还有一个iwarefa，一个为奥巴提供建议的酋长理事会。到18世纪，约鲁巴城邦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以伊费岛的Oni为首，伊费岛为首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各个城邦变得更加强大，他们的oba占据了更强大的精神地位，

并削弱了Ife Oni的权威。城邦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Oyo帝国于16世纪崛起。1550年，努佩王国（Nupe）占领了奥约（Oyo）州，该国拥有骑兵，这是重要的战术优势。Oyo的alafin（国王）被放逐到国外。回国后，阿拉芬• 奥罗姆波托（Alafin Orompoto，约1560年-1580年）建立了一支由全副武装的骑兵和长期服务部队组成的部队。这使得它们在北部草原和森林茂密的森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到16世纪末，奥约（Oyo）将尼日尔的西部地区添加到了多哥（Togo），克图（Ketu）的约鲁巴（Yoruba），达荷美（Dahomey）和丰国（Fon）。

一个管理委员会为帝国服务，并设有明确的行政部门。每个获取的区域都分配了一个本地管理员。家庭以王的身份任职。奥约是北部的约鲁巴王国，在南北贸易中担任中间人，并将几内亚的东部森林与苏丹的中西部，撒哈拉以南和北非连接起来。约鲁巴（Yoruba）生产的布料，铁器和陶器被用来交换盐，皮革，最重要的是来自苏丹的马匹来维护骑兵。Oyo保持了200年的强大实力。1888年，它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在进一步分裂为交战派系之前。奥约州（Oyo state）在1896年不再以任何形式的权力存在。

贝宁

拥有尼日尔–刚果语的人民到15世纪中叶建立了贝宁帝国。它从一开始就从事政治扩张和巩固。在奥巴（国王）埃乌瓦雷（约1450年至1480年）的统治下，该州进行了征服战争。他巩固了中央权威，并与邻居展开了30年的战争。贝宁帝国去世时，其领土一直延伸到西部的达荷美，东部的尼日尔三角洲，西非海岸和北部的约鲁巴镇。

正如艾伦·赖德（Alan Ryder）的著作《贝宁和欧洲人》所表明的那样，贝宁从来不是奴隶的重要出口国。到18世纪初，它已因王朝纠纷和内战而毁于一旦。但是，它在Oba Eresoyen和Oba Akengbuda的统治下重新获得了以前的大部分权力。16世纪以后，贝宁主要将胡椒，象牙，口香糖和棉布出口到葡萄牙和荷兰，然后再转售给沿海的其他非洲国家。1897年，英国人袭击了这座城市。

尼日尔三角洲和伊博河

尼日尔三角洲由众多城邦与政府的各种形式组成。这些城市国家受到三角洲水道和茂密植被的保护。该地区在17世纪因贸易而发生了变化。三角洲的城市国家与东非的斯瓦希里人相当。有些人，例如Bonny，Kalabari和Warri，有国王。像布拉斯这样的其他国家则是拥有小参议院的共和国，而克罗斯河和旧卡拉巴尔的那些则是由ekpe社会的商人统治的。

十九世纪

南部非洲

到185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了当今的纳米比亚。Herero和Nama争夺枪支弹药，提供牛，象牙和鸵鸟毛。在该地区，德国人的影响比英国人更牢固。到1884年，德国人宣布从奥兰治河到库内内河的沿海地区为德国的保护国，是德国西南非洲的一部分。他们奉行侵略性的白人定居点土地扩张政策。他们利用了纳马和赫雷罗之间的竞争。

赫雷罗人与德国人结成了同盟，认为他们可以在纳马上占上风。德国人在埃雷罗首都设立驻军，开始分配埃雷罗土地用于白人住区，包括中部高原最好的牧场，并提出了税收和劳动力需求。赫雷罗人和奥万曼德鲁人起义，但叛乱遭到镇压，领导人被处决。在1896年至1897年之间，牛瘟严重削弱了Herero和Nama经济的经济支柱，并减缓了白人的扩张。德国人继续通过夺取土地和牲畜，甚至试图将埃雷罗的劳动力出口到南非，来使纳米比亚成为白色定居点的政策。

恩古尼兰

祖鲁族战士

南部非洲的一个大混乱时刻是Mfecane，“粉碎者”。它是由北部的Nguni王国Mththwa，Ndwandwe和斯威士兰因稀缺的资源和饥荒而发起的。当Mthethwa的Dingiswayo死后，祖鲁人的Shaka接管了那里。他建立了祖鲁王国，宣称对Ndwandwe有统治权威，并将斯威士族向北驱赶。Ndwandwe和Swazi的逃逸导致Mfecane扩散。在1820年代，Shaka在整个Drakensberg山麓扩展了帝国。

1828年，Shaka被他的同父异母兄弟Dingane暗杀；Dingane缺乏Shaka的军事天才和领导才能。Voortrekkers试图在1838年占领祖鲁人的土地。在最初的几个月中，他们被击败，但幸存者在Ncome河重新集结，并击败了祖鲁人。但是，Voortrekkers不敢定居祖鲁人的土地。Dingane在内战期间于1840年被杀。他的兄弟姆潘德（Mpande）接管并巩固了北部的祖鲁人（Zulu）领土。1879年，祖鲁王国被英国入侵，以控制整个南非。祖鲁王国在伊桑德拉瓦纳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在伊桑德拉瓦纳战役中被击败。

Mfecane崛起的主要国家之一是1821年至1822年由Moshoeshoe I于Thaba Bosiu建立的Sotho王国。这是一个接受Moshoeshoe绝对权威的不同政体的联合会。在1830年代，王国邀请传教士，作为从开普（Cape）购入枪支和马匹的战略手段。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逐渐削弱了这个王国，但从未彻底击败它。1868年，Moshoeshoe要求Sotho王国被英国吞并，以保存残余物。它成为了巴苏托兰的英国保护国。

索沃·茨瓦纳

茨瓦纳语祖先到来以后，他们开始控制该地区（从瓦尔河到博茨瓦纳）；尽管公元600年似乎是一个共识性的估计，但确切的日期尚未确定。这个庞大的畜牧场一直繁荣到公元1300年左右。所有这些不同的民族都与通过林波波河流向印度洋的贸易路线有关，而亚洲的贸易商品（例如珠子）很可能进入博茨瓦纳，以换取象牙，黄金和犀牛角。有关现代博茨瓦纳的第一批书面记录出现在1824年。这些记录表明，孟加邦（Bangwaketse）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力量。在马卡巴二世（Makaba II）的统治下，孟加邦（Bangwaketse）将大量牛群饲养在受到良好保护的沙漠地区，并利用他们的军事实力突袭邻居。到这个时候，该地区的其他酋长国的首都大约有10,000人，并且相当繁荣。这种平衡在1823年至1843年的姆费卡内时期结束；此期间，一系列入侵的南非人进入该国。尽管Bangwaketse能够在1826年击败入侵的Bakololo，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博茨瓦纳的所有主要酋长国遭到攻击，削弱和贫穷。巴科洛洛（Bakololo）和阿曼德贝勒（Amandebele）多次突袭，并从巴茨瓦纳（Batswana）夺走了大批牛，妇女和儿童；其中大部分人被驱赶到沙漠或避难所，例如山顶和洞穴。仅在

1843年之后，当Amandebele移居津巴布韦西部时，这种威胁才平息。变弱和贫穷。巴科洛洛（Bakololo）和阿曼德贝勒（Amandebele）多次突袭，并从巴茨瓦纳（Batswana）夺走了大批牛，妇女和儿童，其中大部分人被驱赶到沙漠或避难所，例如山顶和洞穴。仅在1843年之后，当Amandebele移居津巴布韦西部时，这种威胁才平息。

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与以开普殖民地为基地的商人进行贸易往来，使巴茨瓦纳酋长制得以重建。Bakwena，Bangwaketse，Bangwato和Batawana合作控制了利润丰厚的象牙贸易，然后将所得收入用于进口马枪，这反过来又使他们能够控制现在的博茨瓦纳。这个过程到1880年已基本完成，因此布须曼人，巴卡兰加人，巴卡拉加迪人，巴兹瓦蓬人以及其他目前的少数族裔被Batswana征服了。大跋涉之后，来自开普殖民地的南非荷兰人在特兰瓦瓦尔州的博茨瓦纳边界上立足。1852年，以塞舌尔一世为首的茨瓦纳酋长联盟抵抗了南非荷兰人的入侵，经过大约八年的间歇性紧张和敌对行动，最终于1860年在波切夫斯特鲁姆达成了和平协议。

从那时起，南非与博茨瓦纳之间的现代边界达成了协议，南非荷兰人和巴茨瓦纳人进行交易并和平地合作。在1820年代，来自沙鲁（Shaka）统治下的祖鲁人扩展的难民与居住在草原上的巴索托人接触。1823年，这些压力导致一组巴索索人（科索洛）向北迁移，经过奥卡万戈沼泽（Okavango Swamp），然后跨过赞比西河（Zambezi）进入现在是赞比亚一部分的巴罗瑟兰（Barotseland）。1845年，科洛洛（Kololo）征服了巴罗塞兰（Barotseland）。大约在同一时间，布尔人开始侵占巴索托领土。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开普殖民地被割让给英国之后，voortrekkers（“先驱者”）是农民，他们选择离开前荷兰殖民地并迁入内陆，并最终建立了独立的政体。

在这些事态发展之时，Moshoeshoe一世控制了南部Highveld的Basotho王国。他以举世闻名的熟练外交官和战略家身份而受到称赞，能够操纵分散的难民团体逃离Difaqane，成为一个团结的国家。1822年，Moshoeshoe的首府建立在Butha-Buthe上；Butha-Buthe是北部Drakensberg山脉中容易保卫的山脉，为最终的莱索托王国奠定了基础。他的首都后来移到塔巴波修（Thaba Bosiu）。为了应对激进的voortrekker团体，Moshoeshoe鼓励法国在他的王国传教活动。巴黎福音派宣教会派遣的传教士为国王提供了外交事务顾问，并帮助促进了现代武器的购买。除了担任国务大臣外，传教士（主要是卡萨利斯和阿布赛特）在勾勒Sesotho拼字法和印刷Sesotho语言资料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78年，Sesotho圣经的第一版翻译出现了。

1868年，在自由邦—巴索托战争期间，Moshoeshoe败于布尔人之后，Moshoeshoe成功地呼吁维多利亚女王宣布莱索托（当时称为Basutoland）为英国的保护国，而英国政府部门则被置于莱索托目前的首都马塞卢。地方首领保留对内政的权力，而英国则负责对外事务和保护国的防御。1869年，英国人发起了一个程序，通过该程序最终划定了Basutoland的边界。尽管许多氏族在巴苏托兰群岛拥有领土，但大量的塞索托人居住在分配给与巴索托王国接壤的维特克共和国奥兰治自由州的地区。

到19世纪，大部分Khoikhoi领土都处于Boer的控制之下。Khoikhoi失去了经济和政治独立，被Boer社会所吸收。布尔人讲荷兰语，这是一种源自荷兰语的语言或方言；他们不再称自己为布尔人，而是南非人。1795年，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接管了海角殖民地。

在1830年代，布尔人开始了从大鱼河以东进入Zuurveld的扩张之旅。他们被称为Voortrekkers。他们建立了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奥兰治自由州（Orange Free State）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大多位于Mfecane / Difaqane所减少的人口稀少的地区。与科伊桑人不同，班图人州没有被南非荷兰人征服，因为人口密度大且团结一致。此外，他们开始用在海角交易获得的枪械武装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科萨（Xhosa）/布尔战争（Boer Wars）中，布尔人被从科萨（Xhosa）移走了土地。它需要一支敬业的帝国军事力量来制服说班图语的国家。1901年，波尔共和国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被英国击败。然而，失败激起了许多南非荷兰人的野心：南非将处于白人统治之下。英国人将所有权力（立法，行政，行政）交予英国人和南非人掌握。

欧洲贸易，勘探和征服

在1878年至1898年之间，欧洲国家分割并征服了非洲大部分地区。400年来，欧洲国家主要将其参与范围限制在非洲沿岸的贸易站。很少有人敢冒险从沿海进入内陆；像葡萄牙人那样的人经常遭到失败，不得不撤退到沿海地区。多项技术创新帮助克服了这种400年的格局。一种是重复步枪的研制，这种步枪比步枪更容易，更快地装填。大炮的使用越来越多。1885年，希拉姆·马克西姆（Hiram S. Maxim）开发了现代机枪的模型马克西姆枪。欧洲国家拒绝将这些武器出售给非洲领导人，从而将这些武器大部分保留在自己手中。

非洲细菌夺走了无数欧洲人的生命，并阻止了永久定居点。疾病，如黄热病，昏睡病，雅司病和麻风病使得非洲的欧洲人非常挫败。最致命的疾病

是疟疾，是整个非洲热带地区的流行病。1854年，奎宁的发现和其他医学创新帮助使在非洲的征服和殖民化成为可能。

征服非洲的强烈动机正在发挥作用。欧洲工厂需要原材料。在19世纪初期，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民族主义的竞争和声望在起作用。获得非洲殖民地将向竞争对手表明一个国家强大而重要。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争夺非洲”。

对非洲的了解增加了。许多欧洲探险家开始探索非洲大陆。芒戈（Mungo Park）横穿尼日尔河（Niger River）。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穿越埃塞俄比亚，找到了青尼罗河的源头。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是到达尼喀湖的第一个欧洲人。塞缪尔·怀特·贝克（Samuel White Baker）探索了上尼罗河。约翰·汉宁·斯佩克（John Hanning Speke）在维多利亚湖上找到了尼罗河的发源地。欧洲其他重要的探险家包括——海因里希·巴特（Heinrich Barth），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非洲的黑暗大陆》（1878年出版），席尔瓦·波尔图，亚历山大·德·塞尔帕·平托，里内·卡耶，弗里德里希·格哈德·罗尔夫斯，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乔治·施韦因富斯和约瑟夫·汤姆森。最著名的探险家是探索南部非洲的大卫·利文斯通。欧洲探险家利用非洲的向导和仆人，建立了长途贸易路线，并从罗安达的大西洋穿越到克利马内的印度洋。

试图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增加了欧洲对非洲的了解。在1884年和1885年之间，欧洲国家在柏林西非会议上开会，讨论了非洲的划分。商定，只有欧洲人提供有效占领，欧洲才会承认对非洲部分地区的要求。在1890–1891

年的一系列条约中，殖民边界被完全划定。除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和利比里亚外，欧洲所有国家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主权。

欧洲大国在非洲建立了各种不同的政府机构，反映了不同的野心和权力程度。在某些地区，例如英属西非的某些地区，殖民地控制权是微弱的，其目的是为了简单地贸易经济，具有战略实力或作为长期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在其他地区，欧洲人被鼓励定居，建立了以欧洲少数民族为主的定居者国家。定居者只到了几个殖民地，就足以产生强大的影响。英国移民殖民地包括英属东非（现为肯尼亚），北罗得西亚和南罗得西亚（分别为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和南非，那里已经有大量的欧洲定居者，布尔人。法国计划定居阿尔及利亚，并最终在与欧洲各省平等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法国国家。阿尔及利亚靠近地中海，因此可以进行如此规模的计划。

在大多数地区，殖民地行政当局没有人力或财力来全面管理该领土，因此不得不依靠当地的权力机构来帮助他们。社会中的各个派系和团体出于自身目的利用了欧洲的这一要求，试图通过与欧洲人的合作来获得自己社区内的权力地位。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包括特伦斯·兰格（Terence Ranger）所说的“传统的发明”。为了使殖民地行政人员和自己的人民都认为自己的权力主张合法化，土著精英基本上会制造“传统”的权力主张或仪式。结果，新秩序使许多社会陷入混乱。

在非洲争夺战之后，大多数殖民地政权的早期但次要关注点是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压制。到殖民时期结束时，尽管奴隶制在非洲仍然十分活跃，但他们在这一目标上大多取得了成功。

法国与英国：1898年的Fashoda危机

作为对非洲争夺战的一部分，法国以一个连续的东西方向的非洲大陆轴线为目标，与英国的南北轴形成鲜明对比。英法之间的紧张局势在非洲达到了微妙阶段。在某些时候，战争是可能的，但从未发生过。最严重的事件是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法国军队试图占领苏丹南部地区，而一支更强大的英国部队则声称是为了埃及的Khedive利益而行动。在沉重的压力下，法国撤军，以确保英国对该地区的控制。两国之间的一项协议承认了这一现状，两国承认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权，而法国则成为摩洛哥的主要大国，但法国在总体上遭受了屈辱性的失败。

欧洲殖民地

法属西非：

毛里塔尼亚

塞内加尔

法属苏丹（现为马里）

法属几内亚（现为几内亚）

象牙海岸

尼日尔

法国上沃尔特（现布基纳法索）

法国达荷美（现贝宁）

法国阿尔及利亚（现为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法国摩洛哥

法国索马里兰（现吉布提）

马达加斯加

科摩罗

法国赤道非洲：

加蓬

刚果中部（现为刚果共和国）

Oubangi-Chari（现为中非共和国）

乍得

德国

德国喀麦隆（今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一部分）

德国东非（现为卢旺达，布隆迪和坦桑尼亚大部分地区）

德国西南非洲（现纳米比亚）

德国多哥兰（现在是多哥和加纳东部）

意大利北部非洲（现为利比亚）

厄立特里亚

意大利索马里兰（现为索马里的一部分）

葡萄牙

葡萄牙语西非（现为安哥拉）

安哥拉大陆

葡萄牙刚果（现卡宾达省的安哥拉）

葡萄牙东非（现莫桑比克）

葡萄牙几内亚（现为几内亚比绍）

佛得角群岛

圣多美与普林西比

圣多美岛

普林西比岛

SãoJoãoBaptista deAjudá堡垒（现为贝宁的Ouidah）

西班牙

西班牙撒哈拉（现在是西撒哈拉）

里奥·奥罗（Ríode Oro）

Saguia el-Hamra

西班牙摩洛哥

塔法雅地带

伊夫尼

西班牙几内亚（现为赤道几内亚）

费尔南多·波

里奥·穆尼（RíoMuni）

Annobón

英国

埃及

盎格鲁埃及苏丹（现为苏丹）

不列颠索马里兰（现为索马里的一部分）

英属东非：

肯尼亚

乌干达保护国（现为乌干达）

坦any尼喀（1919—1961，现在坦桑尼亚的一部分）

桑给巴尔（现在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

Bechuanaland（现为博茨瓦纳）

南罗得西亚（现为津巴布韦）

北罗得西亚（现为赞比亚）

英属南非（现为南非）

德兰士瓦（现在是南非的一部分）

开普殖民地（现在是南非的一部分）

纳塔尔殖民地（现在是南非的一部分）

奥兰治自由州（现在是南非的一部分）

冈比亚

塞拉利昂

奈及利亚

喀麦隆（现在是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一部分）

英属黄金海岸（现为加纳）

Nyasaland（现为马拉维）

巴苏托兰（今莱索托）

斯威士兰

独立国家

利比里亚，由美国美国殖民协会于1821年建立；1847年宣布独立

埃塞俄比亚帝国（阿比西尼亚）与意大利厄立特里亚和法国索马里兰（现代吉布提）重新划定了边界，在阿比西尼亚危机期间，意大利于1936年至1941年短暂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帝国；

苏丹，于1885年至1899年间在马赫迪（Mahdi）统治下独立。从1899年至1956年，它在英国的统治下。

20世纪

在1880年代，欧洲大国几乎将整个非洲分裂（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是独立的）。他们统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力量才变得更加强大。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殖民地变成了独立国家。这个过程通常是和平的，但有几次长期的血腥内战，例如在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和其他地方。在整个非洲，民族主义的强大新力量借鉴了当地人在英国和法国以及世界大战中其他军队中学习到的组织技能。它导致的组织不受殖民势力的控制，也不受与殖民势力合作的传统地方权力结构的控制。民族主义组织开始挑战传统和新的殖民结构，并最终使它们被驱逐。欧洲当局退出时，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控制了局势；然后，许多人统治了几十年，或者一直掌权、直到自己去世。这些统治结构包括政治，教育，宗教和其他社会组织。近几十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经历了民族主义热情的胜利和失败，在此过程中改变了中央集权国家和世袭国家的所在地。

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非洲大陆绝大多数地区处于欧洲政府的殖民统治之下，因此，世界大战是非洲地缘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非洲是战争的舞台，在两次战争中都看到了战斗。在大多数地区更重要的是，殖民力量的全部战争基础通过资源分配，征兵和税收影响了非洲殖民地的治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几个非洲战役，包括属多哥战役，喀麦隆战役，西南非洲战役，以及东部非洲战役。在盟军中，主要是英军，也包括法国人，比利时人，南非人和葡萄牙人；他们试图将德国人赶出非洲殖民地。盟军最终征服了所有德国殖民地。东非的德军设法避免了在整个战争中的投降，尽管他们在1917年之后无法占领任何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比利时和大英帝国接管了德国的前非洲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大国继续巩固其对非洲领土的控制权。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和东非，大量定居者成功地敦促进一步的管理下放，这是白人定居者所谓的“本国统治”。在许多情况下，定居者政权对非洲人口更加严厉，倾向于将其更多地视为对政治权力的威胁，而殖民地政权则通常努力使当地人口参与经济生产。大萧条严重影响非洲的非自给经济，其中大部分是基于为西方市场生产商品。随着1930年代后期需求的增长，非洲经济也出现了反弹。

非洲是1930年代法西斯领土扩张的最早实例之一。意大利在1890年代曾试图征服埃塞俄比亚，但在第一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中遭到挫败。埃塞俄比亚介于两个意大利殖民地之间，即意大利索马里兰和厄立特里亚，并于1935年10月被入侵。意大利在装甲和飞机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到1936年5月，意大利部队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首都，并宣告胜利。埃塞俄比亚及其其他殖民地合并为意大利东非。

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

非洲是一个广阔的大陆，其地理位置在战争期间具有战略重要性。北非是英美两国对意大利和德国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地方。东非是英国对意大利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地方。广阔的地理环境提供了连接美国与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主要运输路线。尽管增加了40天的航行时间，但南非周围的海路还是被大量使用，以避开危险的苏伊士地区。向俄罗斯的供应通常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在内部，长途公路和铁路连接为英国的战争努力提供了便利。在南非的联盟拥有统治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其他英国领地则由殖民地统治，通常与当地酋长和国王有密切联系。意大利的领地是成功的英国军事行动的目标。比利时刚果和其他两个比利时殖民地是主要出口国。在数量和财富方面，英国人控制了非洲最富裕的地区，不仅广泛使用了地理，而且广泛使用了人力和自然资源。殖民地平民官员做出了特殊努力，以升级非洲的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发展，使殖民地非洲与世界经济融合，并招募超过50万士兵。

战前，英国没有制定任何利用非洲的计划，但很快建立了指挥机构。陆军成立了西非司令部，招募了20万士兵。东非司令部成立于1941年9月，以支持过度扩张的中东司令部。它提供了最多的男人，超过32万，主要来自肯尼亚，坦Tang尼喀和乌干达。南部司令部是南非的领土。皇家海军在塞拉利昂建立了南大西洋司令部，这成为车队的主要集结地之一。皇家空军沿海司令部在西非设有主要的潜艇狩猎行动，而较小的皇家空军司令部则在印度洋负责潜艇。来自北美和英国的渡轮飞机是西方沙漠空军的主要力量。

1939年之前，整个英属非洲的军事机构很小，主要由白人组成，这些人占南非境外人口的2%以下。战争一开始，主要是由陆军建立了新成立的非洲部队。新兵几乎总是志愿者，通常是与当地部落首领密切合作提供的。在战争期间，军事薪金表远远超过了平民的收入，特别是在包括食物，住房和衣服津贴的情况下。人数最多的是建筑单位，即先锋部队，有超过82,000名士兵。皇家空军和海军也进行了一些招募。志愿者们进行了一些战斗，大量的警卫职责和建筑工作。80,000人在中东服役。士兵们经过组织并按照欧洲标准训练，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并学习了领导力和组织技能，这些事实证明对1945年以后的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的形成至关重要。阿夫里卡纳族的民族主义是南非的一个因素，但亲德裔阿夫里卡纳族的总理在1939年被扬·斯穆特斯（ Jan Smuts）取代，后者是大英帝国的热情支持者。他的政府与伦敦密切合作，筹集了340,000名志愿者（190,000名白人，约占合格白人的三分之一）。

法属非洲

早在1857年，法国人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了黑人士兵志愿部队，称其为“长尾ira蛇”。他们在整个帝国的军事行动中服役，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71,000名士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60,000名士兵。约有90,000人成为德国的战俘。退伍军人在战后非洲法属独立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西非当局宣布效忠维希政权，法国加蓬 维希军队的殖民地在1940年7月和9月的达喀尔两战中击败法国自由军入侵法国西非 的战役。维希部队试图抵制1942年11月在北非的压倒性盟军登陆（火炬行动）。盟军让达伦控制了

北非法国部队，换来了法国北非和法国西非的支持。达兰（Darlan）于12月被暗杀，由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亨利·吉罗（Henri Giraud）领导的自由法国两派争夺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

由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了非洲殖民地，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加入战争、控制了利比亚和意大利东非之后，才到达非洲。随着法国6月25日沦陷于纳粹德国之手以后，大部分的法国在北非和西非的殖民地由维希政府控制。法国沦陷后，直到10月意大利入侵希腊，非洲才是重要的地面战斗战场。在西部沙漠战役中来自利比亚的意大利部队试图占领由英国控制的埃及。同时，在东非战役中，意大利东非军队占领了英属索马里兰和在肯尼亚和英埃及苏丹的一些英国哨所。当意大利征服埃及（包括至关重要的苏伊士运河）和苏丹的努力落空时，他们无法为意大利东非重新建立供应网络。由于无法加强补给、并被盟军包围，意大利东非在1941年被英国和南非军队征服。在北非，意大利人很快向德国人寻求帮助；德国军队在隆美尔将军率领下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德国人的帮助下，轴心国军队重新占据了上风；但在两次对El Alamein的进攻尝试中未能突破英国的防御。1942年末，盟军（主要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在火炬行动中入侵了法属北非，维希法国部队最初与他们进行战斗，但三天后停止交战。第二战线缓解了对埃及英军的压力，他们开始向西进攻，最终将德国和意大利部队在突尼斯击败；1943年5月的突尼斯战役结束了非洲战争。唯一的其他军事重大行动发生在马达加斯加的法国殖民地；该殖民地于1942年5月被英国入侵，封锁其通往轴心国的港口。1942年11月，法国驻马达加斯加的驻军投降。

战后非洲：非殖民化

非洲的非殖民化始于1951年的利比亚，尽管利比里亚，南非，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此前已经独立。许多国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紧随其后，在1960年的非洲年达到顶峰，非洲国家宣布独立，其中包括法国西非的大部分地区，达到了17个。剩下的大多数国家在整个1960年代都获得了独立，尽管一些殖民者（尤其是葡萄牙）不愿放弃主权，导致了长达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激烈的独立战争。最后获得正式独立的非洲国家是葡萄牙的几内亚比绍（1974），莫桑比克（1975）和安哥拉（1975）；1977年法国的吉布提；1980年英国的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于1990年从南非独立。厄立特里亚后来于1993年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出来。

东非

1960年代初期，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了重大冲突。1994年，这场冲突以卢旺达种族灭绝为高潮；这场冲突导致80万人被谋杀。

北非

1930年代发展了摩洛哥民族主义。1953年，摩洛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呼吁

独立。1956年3月2日，摩洛哥脱离法国独立。穆罕默德五世成为独立摩洛哥的统治者。

1954年，阿尔及利亚从法国分离出来，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FLN）。这导致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谈判。Muhammad Ahmed Ben Bella被选举为阿尔及利亚总统。超过一百万法国人（主要是黑皮德族人）离开了该国；这严重打击了当地经济。

1934年，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成立了"新宪法"（Neo Destour）政党，争取突尼斯独立。1955年，突尼斯独立。

1954年，加玛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在1952年的埃及革命中废除了埃及君主制，并担任埃及总理。卡扎菲（Muammar Gaddafi）领导了1969年利比亚政变，罢免了利比亚的伊德里斯（Idris）。卡扎菲一直掌权直到他在2011年利比亚内战中去世。

埃及参与了多次针对以色列的战争，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结盟。第一次是在以色列国成立后的1948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埃及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再次发起战争，并把西奈半岛输给了以色列。他们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再次参战。1979年，埃及总统 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 梅纳赫姆开始签署戴维营协议，该协议将西奈半岛交还给埃及，以换取对以色列的承认。这些协定今天仍然有效。1981年，萨达特被哈立德伊斯兰堡统治下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暗杀。刺客是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以反对萨

达特所签署之《协定》为目标。

南非

1948年，主要的国家党在南非开始实行种族隔离法律。这些基本上是当时既有政策的延续；区别在于"独立发展"（Apartheid）的政策。1994年，这些法律结束，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

中非

非洲的中部地区传统上被认为是介于基尔瓦和赞比西河河口之间的地区。由于其与沿海地区的地理位置隔离，因此该地区受到与非洲有关的历史学家的关注很少。它也是欧洲殖民帝国主义者的最多样化来源之一，包括喀麦隆的德国，喀麦隆北部的英国，刚果的比利时和CAF的法国。自1982年以来，中部非洲旷日持久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正在继续的分离政权运动，即Ambazonia实体。喀麦隆与安巴祖尼亚之间的僵局在1992年激增，当时冯·高尔吉·丁卡（Fon Gorji-Dinka）对喀麦隆提起国际诉讼，并将喀麦隆人对阿姆巴宗的领土控制状态描述为非法。十五年后，当Abmazonia正式宣布自己为Ambazonia联邦共和国时，这种僵局升级。

西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运动在西非各地兴起，最著名的是在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领导下的加纳。1957年，加纳成为第一个实现独立的、撒哈拉以南殖民地。到1974年，西非国家完全是自治的。自独立以来，许多西非国家饱受腐败和不稳定的困扰；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象牙海岸爆发了明显的内战；加纳和布基纳法索接连发生了军事政变。尽管拥有令人羡慕的自然资源，许多国家仍未能发展其经济，政治动荡常常伴随着不民主的政府。

新中国经济建设、大炼钢铁、大跃进、超英赶美、三年自然灾害、大鸣大放、百花齐放、反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7%BB%8F%E6%B5%8E

中人民共和国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计划经济模式，1978年改革开放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1年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力发展出口贸易，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2019年GDP超过14万亿美元，人均GDP为10,276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在2020年仍保持了经济正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大陆经历长期战乱，经济波动和受创极大。中国在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466亿元，重工业仅占总产值7.9%，而被视为农业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1953年到1957年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在苏联帮助下开始恢复，以苏联援建156项工程为标志，优先快速发展重化工业替代进口巩固国防，而轻工业和农业处于一个次要地位。期间轻重工业投资比例为1∶7.3，严重向重化工业倾斜，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文章说法是："基本奠定工业基础"。又1955年出现经济过热冒进的苗头，后来"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其中一个主题。毛泽东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表达对反冒进若干做法的不满，称："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并要求要恢复促进委员会，"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文章称："这个批评，实际上是后来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发动"大跃进"的开端。"

但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并导致大面积饥荒和死亡，同时中苏关系大幅恶化，经济协助完全终止。经济在1963年到1965年国家主席刘少奇领导下短暂恢复后，后来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冲击。到了文革结束后，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文章说法是“我们才不得不承认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国家统计局称：“1978年轻重工业比例为43.1：56.9，轻工业产品严重匮乏。”长期物资短缺的状况下，政府不得不依赖计划配给体制，维持社会运行。

第二阶段（1978－1998）

改革开放后朝向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混合经济。政府在1980年代废除集体耕作、设立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虽产生大量失业人口、但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2007年平均实质增长9.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近十倍，人口贫困率从1970年代末的64%下降至2004年的10%以下。1990年代中国籍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包括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和深圳市）深化改革开放。

1978年，华国锋的“学习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经验”路线被打倒，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访问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将中国大陆经济从旧有的缓慢、低效率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但政府依然有某种程度上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改革的背景下，人民公社经济体制在1978年被取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代了这一制度，土地由农民承包，并且农民可以自由在市场贩卖自己的农产品。工商业上，1978年12月22日发表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作为标志，强调下放更多的经

营自主权。在1979年6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宣布调整工业重心，从重工业转向农业和轻工，要求重视农业、轻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将其作为经济首要的重点纺织品是最大的项目。1979年重工业的计划增长率调整为7.6%，比当年轻工业的8.3%的计划增长率要低。重工业的投资也开始下降，从1978年占总投资的54.7%压缩到1979年的46.8%，并重视出口。其结果是1979—1981年，出口增长率名义上是原来增长率以年均29%的速度增长，出口产品以纺织品是最大的项目，还有自行车、缝纫机等轻工业产品，另外还有一些矿产，并在1981年贸易赤字消失和1982年出现了大量顺差。又因为中国能源开采总量已经停滞，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单位耗能较少的消费品工业部门，并对高效能源设备进行投资。值得一提，1980年代中国开始大量向国外借款并吸纳投资，又利用旅游业赚取外汇，更多企业开始自组筹措资金和自主制定战略发展。

1980年代，中国基本处于农业和工业快速增长时期，工业结构开始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调整，出口大增，市场经济开始萌芽，又长三角地、珠三角等地区开始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以及1985年中国开始贬值货币以利于出口。1981年到1986年的工业产值增长年均值为13.6%，工业产值为10300亿，比中国1981年翻倍。GDP年均增长率大约为9.75%。但是这个年代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大量商品价格依然为国家制定，而不是市场，也就是价格双轨制，有关系者从中牟利，价格闯关的改革到1990年才宣告完成。其次，垄断依旧大量存在。再者，物价不稳，1980年代曾经出现过通货膨胀高企的时期，1987年大幅度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启动价格闯关改革后,出现了大幅度物价上涨，1987年CPI上涨7.3%，1988年CPI上涨8.8%，1990年CPI上涨18%。

1989年六四事件后，由于外国制裁，中国GDP增长率在1989和1990年大幅下跌，分别为4.1%和3.8%。在1991年开始反弹，为9.2%。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政策，在1998年前继续延续1980年代政策，并在启动中国1994年税制改革。这次改革后中央政府税后大幅增加，但是地方财源开始枯竭，土地财政开始成为地方重要财源，又这次改革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1993年到1994年曾出现过经济过热的情况，1994年CPI上涨达到24.1%，创下1949年有记录以来新高。

第三阶段（1998至今）

1998年后中国政府调整经济增长战略，首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对抗亚洲金融危机。其次，将资金投入到新技术和新产业研发。其三、中国政策国企大幅度改革，关停一批效益不佳的国企，但这个政策导致大量国企员工下岗。其四，住房改革，商品房开始大量进入市场，房贷大量出现。又中国政府再次开始向重化工行业投入资金。这段时期地区经济差距开始放大，一些内陆省份日渐被抛离。

2000年代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高速增长。2000到2010年GDP增速为11%，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2010年GDP换算成美元后超过日本，又因房地产泡沫的出现，伴随着官僚主义、贫富差距、城镇居民收入低，农民工户籍福利等矛盾显现。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出动四万亿刺激计划，大力推动基建特别是高铁建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大力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2007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当于其他八国集团国家总和。2009年，中国

于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名第29位。花旗银行在2011年的全球增长生成国家亦有极高的评级，同年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第136位。中国从1990年的8家上市公司加至2010年的2,062家，另有1.3亿户投资者、106家证券公司、62家基金公司和163家期货公司。2013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国内生产毛额的10%、44%、46%，另外电子讯息产业占4%、文化产业占2.85%。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工业转向第三产业。

2008年家庭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最低的10%为3.5%；最高的10%为15.0%。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分配的基尼指数为0.5。2014年中国通货膨胀率（零售价格）为2.0%。2014年劳动力总数共9.1643亿，其中农业占31.4%，工业占30.1%，服务业占38.5%。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51兆2761亿元人民币，占GDP80%。其中第一产业投资1兆1983亿元人民币，第二产业投资20兆8107亿元人民币，第三产业投资28兆1915亿元人民币。

2010年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减速，2011年GDP增长为9.2%，2012年为7.8%，2013年为7.7%，2014年为7.3%。又前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之一的中国内地廉价劳动力开始下跌，内需不足等问题。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缩小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实现东西部发展的平衡，并克服日益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府以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作为刺激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中国大陆政府正面临着国际上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对人民币重新估价，这可能影响到中国内地十分倚赖的出口增长。另外，许多人也曾担心中国内地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大陆的第三产业在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最大比重。

2012年3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报告称，如果中国进行金融业、建筑业、运输业、教育业、健康、电信和公共事业领域等垄断行业的改革，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均GDP将增长10倍。2012年中国中产阶级达3亿人，并拥有251名亿万富翁，是世界上富豪第二多的国家。2012年国内零售市场超过20兆元，自2013年年增长率超过12%；奢侈品市场也大大扩张，占全球27.5%。经济发展亦造成贫富差距，在数十年来不断增加，2012年的吉尼系数为0.474。经济快速增長及消费市场扩张造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因而加强监管。麦肯锡公司估计未偿还债务从2007年的7.4兆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28.2兆美元，比国内生产毛额多出228%。 2017年中国遇上与美国的贸易战，经济成长逐渐放缓，2018年经济成长率为6.6%，保持中高速增长，为三十年来最低。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1%，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目前中国正在经历全方位的产业升级阶段，包括中高端制造业、电子科技、5G商用、人工智能等产业，如果产业升级顺利，中国将会在2023年跨入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2020年一季度受COVID-19疫情波及，同比下降6.8%。是1992开始公布季GDP以来，首度季度同比数据出现负增长。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后，按惯例出席了总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李克强交代了中国当前有6亿人口的每个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2020年正值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脱贫收官之年，李克强的言论引发外界广泛争议。李克强在记者会上首亦次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尽管受到疫情的波动，在全球各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依据后三个季度的反弹，实现了2020年全年GDP逆势增长2.3%，并首破100万亿人民币。

经济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最高决策机关为中国共产党下属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前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主任，下设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国务院是经济政策的最高执行机关，由国务院总理领导。具体政策由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执行。

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破百万亿元大关，达到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2020年中国GDP约14.7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17%。其中，第一产业（农业）77,754亿元，增加值占比7.7%；第二级产业（工业和建筑业）384,255亿元，增加值占比37.8%，第三级产业（服务业）553,977亿元，增加值占比54.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若依购买力平价则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农业国和第二大服务业国。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最大贸易国（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超过200多种制品产量和出口量排行首位、数十种出口产品占世界70%以上。中国经济成长仰赖投资和出口收益，2010年后增长明显趋缓，中国政府为此调整经济结构，改以消费带动经济成长，2016年时消费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达64.6%。

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开放私人财产的所有权，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例子。政府主导能源生产、重工业等战略工业，视制造业为重要的经济基础。《财富》杂志的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中，中国有120家公司上榜。《福布斯》报导的前十大上市公司中则有5家中国企业，包括银行总资产最多的中国工商银行。今日中国股票总市值为全球第二名、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居世界首位。

但中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经济较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东北地区也在改革开放之后遇到了发展瓶颈。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亿764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亿2462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四成以上。197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约97.5%，以乡村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2017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1%，贫困人口规模为3046万人，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中国每年减少贫困人口近2000万。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而2019年，中国大陆人均GDP将突破一万美元，对于14亿人口能够达到这个数值，表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消费市场巨大。

货币及汇率政策

中国大陆的货币是人民币，分为元、角、分，货币符号为￥，代码为CNY，但离岸人民币使用的货币代码为CNH。不过，国际上更常用的缩写是RMB。2009年开始，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包括建立人民币债券市场、扩大贸易量化测试等，以促进海外人民币流动。2010年后，包括俄罗斯卢布、日圆、澳洲元、新西兰元、新加坡元、英镑、加拿大元等同意能与人民币直接兑换，在2013年成为交易量第八大的货币。

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需求上升，2013年4月10日，人民币与澳元开始直接兑换。2014年3月19日，人民币和新西兰元实行直接兑换。6月19日，人民币和英镑实现直接兑换。9月30日，人民币与欧元开始直接兑换，截至到2016年5月底，人民币继续保持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曾经一度在2015年8月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此为人民币的最佳成绩。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该决议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

一直以来人民币汇率都受到政府的调控，人民银行设定作为基准汇率，境内市场人民币的日波幅被限制在中间价上下2%的区间内交易，而离岸市场人民币可自由交易。人民币汇率经历了挂牌价和调剂价的双轨制阶段、汇率并轨后的柔性盯住美元制阶段、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刚性盯住美元制阶段、2005年7月21日的汇率制度改革。从1979年至1994年汇率双轨制阶段是人民币贬值幅度最大的时期，由1979年的1.555元（1美元兑换）贬至1994年的8.619元（年度均价），贬值幅度达4.5倍。在汇率双轨制期间，还存在表面上面额与人民币等值的外汇兑换券。由于外汇汇率与官方挂牌价格存在极大的利差，期间存在被政府禁止的外汇黑市。初期以炒卖外汇兑换券为主，之后直接炒卖外币。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币定价过高，外汇（外汇兑换券与外币）黑市价大大高于官方规定的汇率，前期最高相差近一倍；随着官方对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渐渐回落直至接近官方挂牌价；进入1990年以后，场外交易的（黑市价）外汇价格转向弱低于官方挂牌价，与此同时，外汇兑换券渐渐淡出市场。从1994年开始到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前，人民币兑美元一直维持在8.27元以上（1美元兑换）。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兑美元他进入一波长线大升值阶段，直到2015年下半年进入市场化浮动阶段。

财政制度

财政分权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的重点。在1978-1992年间，由于中央对地方财政权力的激励下放，省级行政拥有了剩余财政的支配权，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例也又原来的35%降低到12%。自1994年开始，中央和地方开展了分税制度改革，将财政收入重新划为中央收入、地方收入

和共享收入，在削弱地方财政的同时也切断地方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联系，而地方所需要负担的社会保障、经济建设等责任并没有减轻，反而由于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等原因加重，因而越发依靠诸如土地财政、地方债等预算外收入。中央财政对于地方财政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以2014年为例，中央向地方发放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预算的近69%，中央财政支持可以占到地方一般性公共财政预算的39%，客观上均衡了各省的财政水平，同时也严重挤占了中央本级的财政政策空间。总体而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责任和权力方面处于不均衡状态，仍需进一步改革引导。

相关数据显示，在2010年代中国所有33个省级行政区中，不计香港澳门特区外的25个省需要中央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的财政平衡。由福建、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广东（含计划单列市的深圳市）六省市为中央政府提供财政盈余。这种地方财政失衡现象的背后，是地方经济、城市化、人口流动等方面的失衡。

区域经济

1970年代，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在缺少对外经济交往经验、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设立经济特区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以及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

条例》，标志着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的法律授权。设立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特区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一定时期内通过中央政府给予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二者合力，经济以超出一般地区很多的速度成长，其人均经济实力接近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后来更衍生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

2005年6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提出，“十一五”期间内地经济划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板块。国家统计局亦按此方法划分中国的经济区域。

2014年3月16日发改委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除以往的三大国家级都会区：珠三角都会区、长三角都会区、以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之外，将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都会区、成渝都会区、哈长都会区四大区域列入国家级城市群之列，使之成为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对外经济合作

2015年度中国贸易伙伴

国家/地区	出口	进口	合计
欧盟	15.6%	12.4%	14.3%
美国	18.0%	8.8%	14.1%

东盟 12.2% 11.6% 11.9%

香港 14.6% 0.8% 8.7%

日本 6.0% 8.5% 7.0%

韩国 4.5% 10.4% 7.0%

其他 37.0% 29.2% 33.7%

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亦是金砖国家之一。中国为贸易总额最大国家，分别出口额第一大与进口额第二大，也是货物进出口最大的国家。1980年代，超过一半的出口为原料等初级产品，机电产品只占7.7%。2012年国际贸易总额中，一般贸易占52%、加工贸易占48%；出口美国最多的商品，依序为手机与广播设备、电脑、电脑设备、影音设备、玩具等。但中国压低汇率而与其他经济体间有所摩擦，也被批评制造假冒的伪劣商品。2010年代初，中国因国内贷款问题而经济增长放缓。在全球经济因次贷危机陷入困境后，中国出口量与国际市场需求亦遭削弱。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累积出口额为25906亿美元，进口额为20556亿美元。

2013年，各类出口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是：机电产品48%，纺织品11%，金属7.1%，化工产品4.6%，塑料橡胶3.9%，仪器3.6%，交通工具3.1%，鞋帽2.9%，石材玻璃1.7%等；进口产品占比分别是：矿产27%，机电产品24%，化学制品7.3%，运输工具6.4%，金属6.2%，仪器5.7%，贵金属5.5%，塑料橡胶5.2%，蔬菜3.4%等。

2014年，全年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3778家，比2013年增长4.4%。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7364亿元，按美元计价为1196亿美元，增长1.7%。2014年，中国在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额1029亿美元，增长14.1%。

产业结构

三次产业分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修订制度和国际通行作法，在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对2016年及以前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修订。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总值按产业百份比分布图（生产总值：82.71万亿元人民币）

第三产业（51.62%）

第二产业（40.46%）

第一产业（7.92%）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力总人口按产业百份比分布图（劳动力总人口：7.764亿人）

第三产业（44.9%）

第二产业（28.1%）

第一产业（27.0%）

第三产业

现时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以第三产业替换旧有的第二产业经济模式，改以第三产业带动经济成长，并自动化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以提升生产效率，满足国内持续成长的第三产业对基础工业的需求。大陆的第三产业在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最大比重，主导了中国的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软件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这领域最近十几年发展迅速，规模从2000年的593亿人民币增长到2010年的18400亿人民币。复合年均增长率为36.65%。现时中国软件产业首要面对的挑战是填补自身的核心工业软件领域的缺陷，例如对编程语言、系统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的研发，减少依赖外国工业软件，去降低外部压力造成的生产风险，以满足未来中国在复杂工业的自动化控制需求。

软件、互联网及电信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软件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中国软件产业近来发展快速，从2000年的人民币593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1,3364亿元。2011年，中国软件

业务收入超过1.84兆元[150]，2014年则增加至3.6379兆元。而软件出口地区分布广泛，包括日本、韩国、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其中日本占总额的60%。中国电子游戏产业于1980年代初期兴起，今日电子游戏对社会有着种种影响。2015年，中国游戏用户数达5.34亿人，销售收入达人民币1407亿元；上市游戏企业有171家，市值达4,7605.84亿元；同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则批准750款游戏，客户端游戏占11.2%、网页游戏占32.8%、移动游戏占49.7%、及电视游戏占6.3%。2012年，中国开发出包含亚洲地区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计划在2020年成为遍及全球的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电子游戏开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随着电脑、掌机、家用游戏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推广，PC游戏、掌机游戏、电视游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至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4.9亿游戏玩家，实际销售收入达到831.7亿元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电子游戏消费大国。2014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政府解禁自2000年起施行的游戏机禁令，促使微软的Xbox One与索尼的Play Station 4游戏机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中国大陆电子游戏产业2014年产值为17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台湾以产值6.43亿位居第15位。2015年，中国游戏用户数达到5.34亿人，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407亿元人民币；国家版权局批准出版游戏约750款，其中客户端游戏占11.2%，网页游戏占32.8%，移动游戏占49.7%，电视游戏占6.3%；中国上市游戏企业171家，企业市值47605.84亿元。

2015年，中国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平均连接速度达3.14Mbps。互联网使用者规模达7.31亿人，普及率为53.2%；其中手机互联网用户达6.95亿人，而农村互联网用户达1.86亿人。2012年，约有59%使用者在华东、约24%使用者在华中、及约16%使用者在西部地区，广东省则占中使用者总数的15%。

2015年第三季末，中国物联网终端用户达6,011万户，IPTV用户则有4,219万户。电子商务自2009年开始显著增长，发展速度快于欧洲联盟、但比美国略慢，2014年时发展成人民币12.3兆元的产业。当前主要网络支付市场有支付宝、财付通（含微信支付）、中国银联等，中国市场比例依序为61.9%、14.5%和9.2%。

2014年，中国电信业规模达1兆8150亿元人民币，手机交换机容量为20亿4537万户，电话用户数量达15亿3552万户，其中固定电话为2亿4943万户，移动电话为12亿8609万户；宽频用户为5亿8254万户，网民人数达6.49亿人，而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数为5.57亿人，网络普及率为47.9%。

2015年，中国电子讯息产业总收入达人民币5.6兆元。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是中国三大电讯供应商，而华为、中兴通讯等电信公司亦参与5G标准的制定。中国是移动电话数量最多的国家，在2015年第三季末共有13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智能手机出货量达1.19亿部。中国还有世界最多的互联网和宽频互联网使用者，除了占全球24%的互联网装置，并占全球宽频使用者的20%。固定和移动宽频用户分别为2.11亿户与7.3亿户，4G用户则有3.02亿户。

运输业

中国拥有由铁路系统、公路系统、航空系统、船运系统、管道构成的交通运输网。2014年公路和高速公路总里程分别为446万公里及11万公里。中国拥有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系统与高速铁路系统，并计划在2030年增加至11.8万公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估计汽车销售量在2020年达到

4,000万辆，城市地区则盛行自行车。但近来交通事故亦显著上升，2011年便有6.2万人因此丧生。

中国铁路总公司经营的铁路里程数共计10.3万公里，为全世界客运和货运最繁忙的网络，每年春节等假期都会出现人潮。2009年各国铁路利用列表显示中国占世界25%，运输周转量则占世界24%。中国在21世纪初建立世界最长的高速铁路。2016年9月，随着郑徐高铁的开通，中国高铁里程突破2万公里，形成四纵四横格局并向八纵八横发展，主要线路由京广高速铁路、京沪高速铁路等。中国还向泰国、欧洲联盟、老挝、美国等输出高铁技术。中国有21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总里程数达2.8万公里，其中上海地铁、北京地铁、广州地铁、港铁和深圳地铁等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通车里程位居世界前列。另有时速431公里的上海磁浮示范营运线，为世界上最快的商业轨道。

2011年，中国大陆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577.44亿吨公里。截至2011年底中国大陆共有运输机场180个，定期航班航线2290条。2014年中国航空业共有222座民航运输机场，2015年机场旅客达9.15亿人次、货邮达1409万吨、飞机起降856.6万架次。“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将新建至少50个机场。中国最繁忙机场依序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全球客运吞吐量第二）、香港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波音公司估计中国的民航机数量从2014年的2570架增加到2034年的7210架，但因80%领空为军事管制而有严重误点的问题。

中国有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渤海湾、东南沿海、西南沿海共五大港口群，2,116座沿海港口、2,052个深水泊位。2014年，上海港、香港港

口、深圳港、宁波舟山港、广州港、青岛港、天津港、大连港、厦门港、营口港、连云港港和苏州港在集装箱吞吐量和吨数名列世界前50名，上海港更在2010年超越新加坡港成为世界大港。中国还拥有世界第一长的河流航道，航运里程达12.63万公里，水路客运量达2.63亿人、旅客周转量74.34亿人公里。

2015年中国邮政企业和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4039.3亿元。邮政函件业务累计完成45.8亿件，包裹业务累计完成4243.4万件，报纸业务累计完成188亿份，杂志业务累计完成10亿份，汇兑业务累计完成8271.2万笔。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206.7亿件。

金融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银行成为仅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其他商业银行成立之后又被取消，在此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1978年底，中国金融体制开始进行改革，成立了多家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95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颁布，明确了商业银行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 以效益性、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确立了商业银行的企业法人地位。2003年4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随着海外需求增加，中国银行业积极向外扩张。2007年，联邦储备系统批准招商银行设立纽约分局的申请。2010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进入世界银行前十名，并有111家银行列入世界前千家银行。

在保险业方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是成立之后又被取消。从1979年恢复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130家保险公司[221]，较大的保险公司有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在证券业方面，截止2010年12月31日，中国资本市场已有上市公司2062家，投资者1.3亿户，证券公司106家，基金公司62家，期货公司163家，股票总市值全球第二，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居世界第一位。

其他服务业

中国旅游业在过去30年内高速成长，逐渐形成一个大产业 ,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上次报告中的第45位升至第17位。2014年，入境游客达1.285亿人次（含港澳台游客），入境过夜游客5,562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569亿美元；国内游客36.1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312万亿元人民币。

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为26.239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其中城市为22.637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乡村为3.603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网上零售额为2.790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

2014年餐饮业收入为2.786万亿元人民币。

房地产业2014年的销售面积达1206.49平方公里，其中住宅面积为1051.82平方公里。

201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27,235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7%。其

中文化制造业增加值11,053亿元，文化批发零售业增加值2,542亿元，文化服务业增加值13,640亿元。

第二产业

中国主要的工业有采矿业、制造业、钢铁，纺织业和服装业、水泥、化肥、鞋、玩具、食品加工，汽车，高铁，机床，工程机械，航天，电子设备，半导体。2014年，工业生产增长率为7.0%。其中国有企业增长4.9%，集体企业增长1.7%，股份制企业增长9.7%，外资企业增长6.3%，私营企业增长10.2%，采矿业增长4.5%，制造业增长9.4%。

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中国汽车制造业增势迅猛，中国于2011年汽车销量，达1850万辆；2009年，中国生产的汽车销量突破1300万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2015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中国制造2025计划，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达成从“制造大国”变身为“制造强国”的目标，而到2035年，中国的制造业将达成赶超德国和日本的目标。

建筑用料生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和混凝土的消费国，分别消耗三分之一和超过一半的全球供应量。2014年，建筑用料生产总投资额为9兆5036亿元人民币，

其中住宅6兆4352亿元人民币，办公楼5641亿元人民币，商业营业用房1兆4346亿元人民币。房屋施工面积7264.82平方公里，其中住宅5150.96平方公里。2014年房屋新开工面积1795.92平方公里，其中住宅面积1248.77平方公里；房屋竣工面积1074.59平方公里，其中住宅面积808.68平方公里。2014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住房511万套，新开工740万套。

第一产业

中国是农业生产大国。2006年农业总产值为2.5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GDP的12.5%。中国人口的40%从事农业生产。2006年中国农业出口额为2480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4.1 %。中国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为日本、欧盟、韩国、美国、香港和东盟国家。2013年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9.7万亿元人民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也称第一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其中种植业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湿润和半湿润的平原地区，80年代起大量利用地膜技术增产。主要产品有稻米、小麦、高粱、花生、茶、大麦、玉米、棉花、油料作物等。林业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和西南的天然林区，以及东南部的人工林区。畜牧业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等地区。渔业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地区。

能源产业

中国经济具高度能源密集和耗能倾向，为能源消耗量最大（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及能源生产最多的国家。2014年生产约5.523兆千瓦·时电力，

发电装机容量有13.6亿千瓦（火力发电915吉瓦、水力发电301吉瓦、风力发电96吉瓦、太阳能发电27吉瓦、核子动力20吉瓦），220千伏以上的电力线路达57.2万公里，发电量与电网规模都为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商业化，积极发展水力、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能源、生物燃料等技术。

中国水能蕴藏量达6.8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政府在长江流域建设多座水力发电厂和核电厂，风力发电多分布在内蒙古、新疆、甘肃、河北、山东等地，占全国装机容量的一半以上。中国太阳能行业有超过400个光伏(PV)企业。在2013年，中国安装了11.3 GW的太阳能光伏面板，总安装容量达到18.3 GW。这比2012年中国光伏面板安装的5.0 GW还高出2倍。[249]太阳能热水器也在中国非常广泛使用。在201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发电生产国，有43GW的装机容量。2014年核能发电电力超过130,580吉瓦·时[254]。境内共有30座核反应堆机组运转，总装机容量达2,831万千瓦，并有24座在建机组，机组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法国。

采矿业

中国矿产资源丰富，已知矿产有171种、探明储量者有158种；当中石油、天然气、煤、铀、地热等能源矿产10种，铁、锰、铜、铝、铅、锌等金属矿产54种，石墨、磷、硫、钾盐等非金属矿产91种。附近海域石油约250亿吨，天然气有8.4万亿立方米。中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及消费国，超过70%能源依靠煤炭供应。中国石油产量则位居世界第四，2014年每天产量达4,189,000桶。但因石油生产不能满足经济需求，有近半石油要从俄罗斯、中东、中亚和非洲进口，并在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2015年，中国天然气产量1350亿立方米，消费量达到1932亿立方

米。

经济数据

数据统计与质疑

国债余额包含内债和外债

外汇储备为可兑换外币

自2016年4月起，除按美元公布国际储备与外币流动性数据模版外，增加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公布相关数据，折算汇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其中2018年12月USD/SDR=0.719015。

中国经济数据以GDP为首多次遭到外界质疑是否造假，例如质疑中国GDP统计时通过物价指数的计算上调整从而拉高数据，又或者通过通胀报低调整GDP平减指数达到拉高GDP增速数据的目标。新华社曾发文反击称："（中国）GDP实际增速仅高估不到0.5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相关部门曾多次发现并处罚地方政府经济数据造假。同时，因为国家统计局有自己的直接收集数据的系统，国家统计局表示，中国的统计数据和制度不会因为少数地方少数企业少数单位的真实性问题而受到影响。

新华网2014年2月14日发文，称"湖南基层统计造假透视：数据虚涨百倍 造假触目惊心"，人民日报对此事评论是《基层统计造假实为得了GDP职业病》。又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家审计署发现东北经济数据造假严

重，吉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振起认为：“倘若依照各地汇报的产业成长性计算，东北一些县域经济规模都超过香港了。”习近平上任后的十三五规划中颁布《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框架意见》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文件，开始地方审计改革计划，作为全面从严治党计划的一环。

辽宁省省长陈求发2017年1月第12届人大8次会议中公开坦承，2011至2014年间该省的财政收入被虚报了至少20%，其中2014年虚报最高，达23%。2017年6月中纪委网站公布内蒙古和吉林省有地方经济资料造假，而中国铁路总公司有“黑中介”等问题，此次继辽宁省承认虚报经济数据及财政收入后，再有省份被揭造假。

2018年天津的滨海新区2016年的GDP造假虚报，总量下修1/3从1万亿元（人民币）大幅度调整为6654亿元（人民币）。但后经查证并非为虚报数据，实际为相关统计口径改变为所属地，天津全市总体GDP未受影响。

外汇储备

2011年各国债务情况（债务=外汇和黄金储备 - 外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元资产，其主要持有形式是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截止2020年6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局提供数据，外汇储备为31123.28亿美金。中国大陆外汇储备作为国家资产，由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实际业务操作由中国银行进

行。

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达2.85兆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7%，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但2014年6月达最高点后则不断下滑，2015年降幅超过5,000亿美元，在年底下滑至3.33兆美元，巴克莱银行更预测2016年降至2.75兆美元。中国也是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家，2012年获得2,530万美元投资。2014年，外汇汇款达640亿美元，是第二大的汇款接受国。中国亦大量投资海外市场，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投资海外达1,231.2亿美元，许多中国企业也并购外国公司。2009年，中国拥有价值1.6兆美元的证券；同时有超过1.16兆美元的美国国库证券，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China

中国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市场经济，并包含以产业政策和战略的五年计划为基础的规划经济。在国有企业（SOE）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主导下，经济还包括一个庞大的国内私营部门，并对外国企业开放；这种制度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从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经济已被描述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在2019年占中国市值的60％以上，并 在2020年创造了中国GDP（15.66万亿美元）的

40％，国内外私营企业和投资占剩余的60％。截至2019年底，中国所有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包括在金融部门运营的国有企业，总资产达到78.08 万亿美元。这些国有企业中的九十一个企业属于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公司。自2014年以来，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进行衡量，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据称这是对经济体真实规模的最准确衡量。自2010年以来，它的名义GDP一直是世界第二大；这依赖于波动的市场汇率。官方预测指出，到2028年，中国将成为名义GDP的全球最大经济体。从历史上看，从1世纪到19世纪，中国在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

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从此，中国拥有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其3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中国拥有世界十大最具竞争力的金融中心中的四个（上海，香港，北京和深圳），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根据市值和交易量，中国在全球十大证券交易所中占三席（上海，香港和深圳）。截至2020年10月12日，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内的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的总市值突破10 万亿美元，其中不包括香港证券交易所（约为5.9万亿美元）。截至2020年6月，外国投资者购买了总计4,400 亿美元的中国股票，约占总价值的2.9％。中国债券市场的总价值突破了15.4万亿美元，位居日本和英国之后，仅次于美国的40万亿美元。截至2020年9月，外资持有的中国债券达到3880 亿美元，占总价值的2.5％，尽管同比增长了44.66％。

截至2019年，中国公共部门占总就业人数的63％。根据IMF，以人均计算，中国GDP（名义）排名第59，GDP（PPP）第73。该国拥有自然资源，价值估计为23万亿美元，其中90％是煤炭和稀土金属。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业总资产，约为45.838万亿美元（309.41 万亿人民币），其中总存款和

其他负债为42.063万亿美元。截至2016年10月，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6万亿美元，直接或间接为中国的GDP贡献了三分之一，并为中国创造了四分之一的就业机会。截至2020年6月，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947万亿美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128万亿美元。中国拥有的外国金融资产总额达到7.860 万亿美元，其外国金融负债为5.716 万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它拥有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仅2019年就达到了1369.1 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同期的2266.5亿美元。截至2018年，中国在亿万富翁总数中位居世界第一，在百万富翁中排名第二-中国有658位亿万富翁和350万百万富翁。截至2020年，中国拥有《财富》世界500强中最大的公司，而129家总部位于中国。中国还是200多家私有科技初创公司（科技独角兽）的所在地，每个公司的估值都超过1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价值3.1 万亿美元，但如果包括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中国的储备价值将增至近4万亿美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和商品出口国。它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也是第二大商品进口国。中国是服务产品的净进口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参与贸易组织和条约。中国于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它还与多个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韩国和瑞士）。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欧盟，日本，香港，韩国，印度，台湾，澳大利亚，越南，马来西亚和巴西。截至2020年，中国劳动力为7.78亿，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它在《经商便利度指数》和《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排名第31位。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4位，并且是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唯一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唯一的前30名新兴国家。中国 在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创意方面排名全球第一；还拥有全球前五名的科技集群中的两个（分别是深圳-香港-

广州，北京，分别位于第二和第四位），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截至2020年7月，中国5G用户已超过8800万，占全球用户的80％以上，远远超过此前预计的整个2020年70％的份额。截至2020年6月，自动柜员机（ATM）的数量为105.21万，居全球之首。

历史

从历史上看，从1世纪到19世纪，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直到1700年代后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中国约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并在1820年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1820年，中国的GDP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英国的六倍，几乎是新生美国的20倍。

区域经济

中国不平等的交通运输系统，再加上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工业基础设施的重大差异，在中国区域经济中产生了巨大差异。

与其他地区相比，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通常要快得多，而且各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三个最富裕的地区是中国东部的长江三角洲；中国南方的珠三角；华北地区的京津冀地区。这些地区的快速发展预计将对整个亚洲区域经济产生最重大的影响；中国政府的政策旨在消除这些较富裕地区加速增长的障碍。

中国的财富

自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人口；到2018年，中产阶级的规模增长到4亿，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12亿，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截至2018年，中国在亿万富翁总数中位居世界第一，在百万富翁中排名第二；中国有658位亿万富翁和350万百万富翁。根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在201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富人的家园。2020年，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居世界之首，超过美国和印度的总和。截至2021年3月，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达到1,058，总财富达4.5 万亿美元。根据《胡润2021年全球富豪榜》，中国在世界十大城市中的六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杭州和广州）的所在地亿万富翁人数最多，分别位居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八和第九位，这比任何国家都多。

香港和澳门

根据“一国两制”政策，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和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的经济与中国其他地区分开。

发展

1978年实施的经济改革有助于推动中国跻身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行列。深圳的经济发展使这座城市被称为世界的下一个硅谷。中国沿海地区的省往往更工业化，而内陆地区则较不发达。

为了指导经济发展，中国中央政府实施“五年计划”，其中详述了其经济重点和基本政策。目前正在实施“第十四个五年计划（2021年至2025年）”，重点是消费驱动型增长和技术自给自足，而中国正从中等偏上的中等收入经济向高收入的经济过渡。中国经济的公共部门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与之前的日本和韩国一样，中国稳步发展，在生产全球消费商品的同时，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1978年至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从153美元增长到10,261美元。其经常账户盈余在1982年至2015年期间增长了53倍，从57亿美元增至3,040 亿美元。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也成为了工业强国，从服装和鞋类等低工资行业的最初成功，发展到了计算机，药品和汽车。中国的工厂创造了3.7万亿美元的实际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韩国，德国和英国的总和。中国制造业受益于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巨大的制造业规模以及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供应链。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经济能维持多长时间。根据“十一五”规划，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需要保持8％的年增长率。领导人争辩说，只有有了这样的增长水平，中国才能继续发展其工业实力，提高其公民的生活水平，并纠正全国范围内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然而，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保持中国所预测的那种增长。而且，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经历了发展中较为容易的部分。在1980年代，它改变了其庞大而低效的农业部门，使农民摆脱了中央计划的局限并使他们赢得改革事业。在1990年代，它同样开始重组停滞的工业部门，这是第一次吸引外国投资者。这些政策促进了该国的惊人增长。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必须采取许多人认为是迈向市场的最后一步，放开银行业，并启动实际资本市场的开启。根据格林威治大学商学院的Mete Feridun和中国武汉大学的Abdul Jalil在《亚太经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金融发展导致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减少。但是，此过程并不容易。

截至2004年，中国的国有企业仍只进行了部分重组，其银行处理的不良贷款负担超过2050亿美元（1.7 万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几乎不可能得到偿还。这个国家有浮动汇率，并且对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实行严格的控制。

2014年中，中国宣布将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当时的经济年增长率为7.4％，但目前仍在放缓。这些措施包括计划建立诸如铁路，公路和机场在内的多层运输网络，以在长江沿岸建立一条新的经济带。

过度的夸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中国的省市会增加自己的数字；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他们的官场晋升表现往往是根据各自经济表现的好坏来评估的。近年来，中国声称增长数字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审查；国内外观察家均指称政府一直在夸大其经济产出。例如：

天津2016年的万亿元GDP实际数字比上报数字减少了三分之一，为6,650亿欧元（1,030 亿美元）。

内蒙古政府还表示，2016年该地区报告的工业产值中约40％以及财政收入中26％不存在。

辽宁，通常被称为中国的锈带，于2017年承认，2011年至2014年当地的GDP数据被人为地夸大了20％。

《华尔街日报》对64位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有9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

GDP估算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状况”。但是，超过半数的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的年增长率在5％至7％的范围内；这仍代表了强劲的增长。维基解密（WikiLeaks）从2007年泄露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他对中国的GDP估计值没有信心，称其为“人为”且不可靠。他说，政府发布的数据，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应“仅供参考”。

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和唐纳德·斯特拉斯海姆（Donald Straszheim）等分析师认为，中国最近的经济增长被高估了，估计增长率在4％或以下。据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家、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助理谢昌泰，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郑松（Michael Zheng Song）所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小于中国政府2016年的数据。他们发现，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每年可能被夸大了1.7％，这意味着政府在2016年可能将中国经济的规模夸大了12-16％。

区域发展

西部大开发，旨在通过投资和开发自然资源来增加西部省份的经济状况。

振兴中国东北，振兴工业基地中国东北。它涵盖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以及内蒙古。

中部崛起计划，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它覆盖六个省：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

第三战线，集中在西南各省。

国家重点项目

“西电东输”，“西气东送”和“南水北调工程”是政府的三个主要战略项目。“南水北调”项目的建设于2002年12月27日正式启动，第一阶段于2010年完成。这将缓解北方地区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实现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水资源的合理分配。

投资周期

中国的投资一直是高度周期性的。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通常大约每五年达到峰值。最近的峰出现于1978年，1984年，1988年，1993年，2003年和2009年。

在中国，大部分投资是由至少部分为国有的实体进行的。其中大多数都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因此，繁荣主要是地方政府不当激励的结果。与自由企业经济中的企业家不同，中国地方官员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政治考虑。由于他们的绩效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辖区内的GDP增长，因此它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推动大型投资项目。他们也没有面临任何真正的破产风险。当地方陷入困境时，它们总是被国有银行纾困。在这种情况下，过度投资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典型的周期始于放松中央政府的信贷和产业政策。这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其直接控制的国有部门实体，或者通过向其管辖范围之外的私人投资者和企业提供投资促进激励措施，来积极推动投资。由此产生的繁荣给价格带来了上行压力，也可能导致诸如煤炭和电力等关键投入品短缺（如

2003年的情况）。一旦通货膨胀率上升到开始威胁社会稳定的水平，中央政府将通过加强对工业和信贷政策的执行进行干预。未经批准而进行的项目将被暂停。向特定类型的投资者提供的银行贷款将受到限制。信贷紧缩，投资增长开始下降。

最终，这种中央集权的萧条缓解了短缺问题，并使通货膨胀率降至可接受的水平。到那时，中央政府屈服于地方政府对宽松政策的要求，周期再次开始。

宏观经济问题

国债

2014年，许多分析师对中国政府债务的总体规模表示担忧。截至2014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中国广义政府总债务与GDP的比率为41.44％。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公共债务“相对较低”，并且在所有标准压力测试中均处于稳定水平，但有或有负债冲击的情况除外，例如“大规模的银行注资或金融系统纾困，以应对例如去杠杆化带来的不良贷款的潜在增长”。

中国当局消除了分析师的担忧，坚称“中国仍有增加政府债务的余地”。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16年初发表评论说：“ 鉴于大部分债务是以本币发行的，因此中国面临的...债务堆积是一个’内部’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影子银行”在中国已经兴起，给金融体系带来了风险。

监管环境和政府收入

尽管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其监管环境并未跟上步伐。自邓小平公开市场改革以来，新业务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的能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即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监督不力的企业，通常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来提高利润率，而这通常是以牺牲消费者安全为代价的。这个问题在2007年变得更加突出，美国对有问题的中国出口设置了许多限制。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央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被汇入国家。一些政府收入也来自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般工业和商业税。

然而，趋势是将国营企业的汇出利润改为对这些利润征税。最初，为了适应各种公司的市值和定价情况，对该税制进行了调整，但是在1990年代初期引入了更为统一的税制。此外，当时还实施了个人收入和增值税。

金融和银行系统

中国大多数的金融机构都是国有的，并且是受政府管辖的。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取代了中央银行，并逐步接管了私人银行。它履行了其他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许多功能。它发行货币，控制流通，并在支出预算中发挥

重要作用。此外，它还管理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的账目，付款和收据，从而使其能够根据政府的经济计划对其财务和总体绩效进行全面监督。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国际贸易和其他海外交易。海外华人的汇款由中国银行（BOC）管理，中国银行在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其他至关重要的金融机构包括国家开发银行（CDB），该银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并指导外国投资；中国农业银行（ABC），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工商银行（ICBC）。

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大提高了银行体系的经济作用。从理论上讲，任何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去银行获取国家计划以外的贷款，但实际上，国有银行贷款的75％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尽管以前几乎所有投资资金都是根据国家计划以赠款的形式提供的，但自改革开始以来，政策已通过各种由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转移到了贷款的基础上。据估计，截至2011年，地方政府的贷款余额为14万亿元。外部观察家认为，这一总额中的大部分都表现不佳。越来越多的资金可通过银行用于经济和商业目的。外国资本来源也有所增加。中国已从世界银行和几个联合国计划以及国家（尤其是日本）在较小程度上获得贷款。香港一直是这项投资的主要渠道，也是投资来源本身。2012年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十年时间表，表明了其开放资本市场的意愿。紧随此发展之后，深圳银行得以向个人发起跨境人民币汇款，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重大转变。由于先前禁止中国国民将人民币转移到海外帐户，因此资本管制严格。

中国是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中的四个（上海， 香港，北京和深圳）的所在地，比任何国家都多，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中仅次于纽约市和伦敦，位居第三。中国拥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截至2014年11月，中国大陆股市市值为4.48万亿美元，使其成为全球第二大股市。

2013年8月，中央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尚未命名的高层机构，以收集和分析财务信息和趋势。中央银行将参加，其他组织的人也将参与金融事务。它不是直接的监管机构，但是会尝试以最高的专业水平运作，以便为影子银行等可能导致不稳定的问题向监管机构提供适当的指导。格林威治大学商学院的Mete Feridun及其同事在2010年《国际经济与金融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供了金融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

货币系统

人民币采用浮动汇率制，主要针对美元进行管理。2005年7月21日，中国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重估了2.1％，此后便开始采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每天的波动幅度最大为0.5％。

中国的贸易平衡，通货膨胀（由消费物价指数衡量）与其货币价值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尽管允许人民币汇率“浮动”，但中国中央银行具有决定性的能力，可以通过与其他货币的关系来控制人民币汇率。2007年的通货膨胀反映了肉和燃料价格的急剧上涨，这可能与全世界用作动物饲料或燃料的商品价格上涨有关。因此，2007年12月允许的人民币价值快速上涨可能与通过允许人民币升值来减轻通货膨胀的努力有关。

2015年8月10日当周，在中国经济放缓和美元升值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

将人民币贬值了约5％。贬值是通过将官方汇率固定为收盘市场汇率来实现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人民币也在经历国际化所需的过程。

部门

农业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约有3亿中国农场工人从事该行业，其中大部分是在与美国农场大小相当的土地上劳作。几乎所有耕地都用于粮食作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并且是小麦，玉米（玉米），烟草，大豆，土豆，高粱，花生，茶，小米，大麦，油料，猪肉和鱼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的非粮食作物，包括棉花，其他纤维和油料种子，为中国提供了其对外贸易收入的一小部分。蔬菜，水果，鱼和贝类，谷物和肉类产品等农产品出口到香港。

畜牧业是农业生产中第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鸡和蛋生产国，而且还有大量的绵羊和牛。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更加重视增加牲畜产量。中国在海洋和淡水渔业以及水产养殖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池塘养育一直很重要，并日益受到重视，以补充遭受过度捕捞威胁的沿海和内陆渔业，并提供对虾等有价值的出口商品。中国的捕捞舰队的规模和覆盖范围也无与伦比，有200,000至800,000艘船，有些甚至远至阿根廷。主要受到政府补贴的推动，其增长和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

洪水，干旱和侵蚀等环境问题严重威胁到该国许多地方的农业。

中国西部，包括西藏，新疆和青海，除了花卉和养牛以外，对农业的重要性很小。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在南部省份占主导地位，这里的许多农场每年收成两次。在北部，小麦是最重要的，而在中国中部，小麦和大米相互竞争。小米和高粱的主要产地在东北和中部一些省份，其中，一些北方地区也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大麦。大部分大豆作物都来自北部和东北部。玉米生长在中部和北部，而茶主要来自南部温暖潮湿的丘陵地区。棉花在中部省份广泛种植。烟草来自南部的中心和部分地区。其他重要的农作物是土豆，甜菜和油料种子。

在过去的十年中，政府一直在鼓励农业机械化和土地整理，以提高单产，并补偿移民到城市的农民工的流失。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最新统计，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年增长率为6.38％。到2014年，综合机械化率已提高到近60％，其中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0％，玉米的综合机械化率接近80％。除了标准的农用设备（如拖拉机）外，中国的农业合作社还开始使用高科技设备，包括无人驾驶飞机，用于向农作物种农药。在增加水利保护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进行了经济改革。首先，这始于将农业工作转变为家庭责任制，并逐步取消集体农业。后来扩展到包括价格控制的逐步放开。财政分权；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从而使各种民营企业可以从事服务业和轻工制造业；多元化银行体系的基础（但具有大量的国家控制）；发展股票市场；经济的开放度增加了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

住房和建筑业

房地产业约占中国经济的20％。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该国内部的货币管制，在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上的投资更加困难。结果，许多中国公民拥有多种房产，因为这是相对容易增长和保存财富的少数几种方式之一。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推测中国经济中存在房地产泡沫。2020年7月1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经济中的房地产泡沫已增长至52万亿美元。

能源和矿产资源

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能源生产有了显着增长，分配给国内消费的比例也得到了极大提高。火力发电厂的化石燃料发电约占总发电量的80％，水力发电装置约占17％。仅有大约2％来自核能，主要来自广东和浙江的工厂。尽管中国拥有丰富的整体能源潜力，但大多数尚未开发。此外，能源的地理分布使这些资源中的大多数与主要工业用户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东北基本上富含煤炭和石油，中国北方中部煤炭资源丰富，西南部具有巨大的水电潜力。但是，广州周边的工业化地区和上海周边的长江下游地区的能源太少。

采矿

过时的采矿和矿石加工技术已被现代技术取代，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要求从国外进口矿物。特别是，由于钢铁产量迅速超过了国内铁矿石产量，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的铁矿石在2000年代初猛增。此外，中国在一些非洲国家越来越活跃地开采其经济增长所需的储备，特别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加蓬等国家。

2004年的主要生产是煤炭（近20亿吨），铁矿石（3.1亿吨），原油（1.75亿吨），天然气（4100万立方米），锑矿（11万吨），锡精矿（110,000吨），镍矿（64,000吨），钨精矿（67,000吨），未精制盐（3,700万吨），钒（40,000吨）和钼矿（29,000吨）。从数量上看，产生的矿物是铝土矿，石膏，重晶石，菱镁矿，滑石及相关矿物，锰矿，萤石和锌。此外，2004年，中国生产了2,450吨白银和215吨黄金。2002年，采矿业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不到0.9％，但却生产了工业总产值的5.3％。

在2019年，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世界第三大铜生产商；世界第三大白银生产商；世界上最大的硫磺生产国；世界上最大的磷酸盐生产商；世界上最大的钼生产商；世界上最大的铅生产商；世界最大的锌生产商；世界上最大的钒生产国；世界最大的锡生产商；世界上最大的钛生产商；世界上最大的锑生产国；全球第二大铝土矿生产商；世界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世界第六大锰生产国；世界第七大镍生产商；世界第十大钴生产国；世界上最大的食盐生产国。它是2018年世界第八大铀生产国。此外，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石生产国和黄玉，电气石，橄榄石和钻石的世界生产商之一。

直到2019年年底，共有173种矿物质已在中国发现，包括13种能源材料，59种金属，95种类型的非金属矿物和六种类型的水和气体。2019年，新发现的石油地质储量为11.2亿吨，其中1.6亿吨已被证明具有技术可采储量。新发现的页岩气地质储量为7644.2亿立方米，其中探明储量为1838.4亿立方米。在非石油和天然气矿产方面，评估指出，中国在包括煤炭，铁矿石，锰，铬铁矿，铜，铅，锌，铝土矿，钨，锡，钼，锑，镍，金，银，锂，黄铁矿，亚硫酸盐，磷酸盐岩，钾肥，菱镁矿，萤石，硼和重晶石在内的24种主要矿产中具有广阔的勘探潜力。

水力资源

三峡大坝

由于其庞大的河网和多山的地形，中国具有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水力发电总容量的大部分位于该国的西南部，那里的煤炭供应匮乏，但对能源的需求却在迅速增长。东北的潜力很小，但是日本人在占领满洲期间就在那里建造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

横跨长江的三峡大坝建设十三年，耗资240亿美元，于2006年基本完工，2018年发电量超过100TWh。

煤炭

中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最重要的是煤炭。中国的矿产资源包括大量的煤炭和铁矿石储备，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工业矿产的充足供应。尽管煤炭沉积物分布广泛（每个省都发现了一些煤炭），但总数量大部分位于该国北部。山西省被认为含有约占总数的一半；其他重要的含煤省份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和山东。除了这些北部省份外，四川还存在大量煤炭，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也有一些重要的矿床。该国大部分储量由优质烟煤组成，但也有大量褐煤矿床。无烟煤存在于多个地方（尤其是辽宁，贵州和河南），但总体而言并不十分重要。

为了确保煤炭供应的分配更加均匀，并减轻不足的运输网络带来的压力，

当局敦促在全国范围内开发大量小型的，由当地经营的煤矿。1960年代后大力开展了这项运动，结果建立了成千上万个小矿井，这些矿井生产了该国一半以上的煤炭。但是，这通常很昂贵，并用于本地消费。这还导致在这些不受管制的矿井中实施安全措施的程度不那么严格，每年造成数千人死亡。

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耗的大部分（2005年为70％），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预计中国的煤炭需求将大幅增长。尽管煤炭在中国总能源消耗中所占的份额将减少，但煤炭消耗绝对值仍将继续上升。中国对煤炭作为动力源的持续和日益增长的消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酸雨排放源，这导致了二氧化硫和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截至2015年，煤炭价格下跌导致东北煤矿的裁员。

石油和天然气

中国的陆上石油资源主要位于东北以及新疆，甘肃，青海，四川，山东和河南等省。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页岩油。在南海的珠江口，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发现了优质的轻质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黄海，东京湾和渤海勘探和开发了石油储藏。

201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国内的石油产能，而洪水在年中损害了该国的油田。因此，中国进口了石油以弥补供应量的减少，并于2013年9

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中国的天然气总储量尚不得而知，因为对天然气的勘探工作相对较少。四川占已知天然气储量和产量的近一半。中国其余大部分天然气是在东北主要油田特别是大庆油田生产的伴生气。在柴达木盆地，河北，江苏，上海和浙江以及海南岛西南近海发现了其他天然气矿床。

金属和非金属

在包括海南在内的大多数省份都有铁矿石储量。甘肃，贵州，四川南部和广东省都有丰富的矿床。最大的开采储量位于长江以北，并为邻近的钢铁企业提供资源。除了镍，铬和钴外，中国的铁合金和锰供应充足。钨的储量也相当大。铜资源中等，仅少数矿床中存在优质矿石。中国的锑储量是世界上最大的。锡资源丰富，并且有相当丰富的黄金矿藏。中国是世界第五大黄金生产国，并在21世纪初成为高科技产业所需的重要稀有金属生产国和出口国。

中国还生产相当广泛的非金属矿物。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是盐，它来自江苏，河北，山东和辽宁的沿海蒸发点，以及四川，宁夏和柴达木盆地的广阔盐田。在许多地区都有重要的磷矿床。截至2013年，中国每年生产9700万吨磷矿石。黄铁矿分布在几个地方。辽宁，河北，山东和山西拥有最重要的矿床。中国也有大量的萤石资源-氟石，石膏，石棉，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水泥，熟料和石灰石储量和产量。

工业和制造业

工业和建筑业占中国GDP的46.8％。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中国使用的水泥比整个20世纪美国消耗的水泥都要多。2009年，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约有8％来自中国本身，而当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在全球排名第三（第一是欧盟，第二是美国）。IHS Global Insight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担任这一职位约110年之后，中国在2010年贡献了世界制造业产量的19.8％，并成为当年世界最大的制造国。

主要产业包括采矿和矿石加工。铁和钢；铝；煤炭；机械；军备；纺织品和服装；石油；水泥；化学品；肥料；食品加工；汽车及其他运输设备，包括铁路车辆，机车，轮船和飞机；消费品，包括鞋类，玩具和电子产品；电信和信息技术。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工厂搬迁的首选目的地。它作为出口平台的实力为中国的收入和就业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工业发展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截至2011年，中国46％的国民生产总值继续用于投资。这个百分比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在各个工业部门中，机械制造和冶金工业受到最高重视。现在，仅这两个领域就约占工业总产值的20％至30％。在这些领域中，与大多数其他工业领域一样，创新总体而言不高；该系统所带来的回报是总产值的增长，而不是品种，复杂度和质量的提高。因此，中国仍进口大量特殊钢。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增长，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程度方面超过了所有其他部门。一些被认为具有国家战略重要性的重工业和产品仍然是国有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轻型和面向消费者的制造公司是私有的或私有的合资企业。

化学工业的主要发展重点是扩大化肥，塑料和合成纤维的产量。该行业的发展使中国跻身为世界领先的氮肥生产国。在消费品领域，主要重点是纺织品和服装，这也是中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纺织品制造业迅速增长，其中包括合成纤维，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并且仍然很重要，但比以前少了。该行业倾向于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是有许多重要的纺织中心，包括上海，广州和哈尔滨。

钢铁业

2018年，中国生产了世界钢铁的50％以上。2018年，中国生产了9.28亿吨钢材，比2008年增长了近100％。–世界十大生产商中有六家在那里。尽管由于高债务和由高债务融资的设备生产的高端产品过剩，需求仍然很高，但利润仍然很低。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当地的钢铁生产。同时，每个公司都在积极地提高产量。铁矿石1990年代初期，与钢铁生产保持同步，但在2000年代初期，进口铁矿石和其他金属很快增加。钢铁产量估计从2000年的1.4亿吨增加到2006年的4.19亿吨，到2018年增加到9.28亿吨。该国的钢铁产量大部分来自大量的小型生产中心，其中最大的一个是辽宁鞍山。

中国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钢铁出口国；2018年出口量为6690万吨，比上年下降9％。下降减缓了中国已有十年历史的钢铁出口增长。截至2012年，钢铁出口面临广泛的反倾销税，尚未恢复到2008年前的水平。然而，2015年，中国的钢铁出口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1亿吨。国内需求仍然强劲，特别是在发展中的西部，新疆的钢铁生产正在扩大。

2012年4月26日，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发布警告，对向钢铁公司借钱时要谨慎，这些钢铁公司由于钢铁生产和销售的利润下降而有时将借入的钱用于投机目的。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钢铁行业亏损10亿人民币，是2000年以来的首次亏损。2018年，中国钢铁行业报告的利润为4700亿元人民币（700 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39％。

汽车工业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2018年生产了2700万辆汽车。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数字分别为1,130万和970万。到2006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制造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并且是第二大消费国（仅次于美国）。然而，四年后的2010年，中国的汽车产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汽车改革期间制造业猛增。1975年，汽车年产量仅为139,800辆，但到1985年，汽车产量达到443,377辆，然后到1992年跃升至近110万辆，并在2001年达到230万辆之前每年平均增长。2002年的产量上升到近325万，然后在2003年跃升至444万，2004年为507万，2005年为571万，2006年为728万，2007年为888万，2008年为935万，2009年为1383万。截至2009年，它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制造者。国内销量与产量保持同步。在1990年代中期和后期出现了可观的年度增长之后，乘用车的销量在2000年代初猛增。2006年，共售出722万辆汽车，其中包括518万辆乘用车。

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最大的消费国，仅次于美国，估计售出了1800万辆新车。中国的汽车工业非常成功，于1999年开始出口汽车零部件。中国从2005年开始计划进军汽车和零部件出口业务。2004年，本田在广州新建了一家工厂，专门用于出口市场，预计2005年将向欧

洲运送30,000辆乘用车。到2004年，十二家主要的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建立了合资工厂。他们生产了各种汽车，小型货车，运动型多功能车，公共汽车和卡车。2003年，中国出口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车辆和零部件。

电动汽车行业

中国还是全球第一大电动汽车制造国，2018年生产了约130万辆新能源汽车。自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电动汽车生产第一大国。中国还购买了所有电动汽车的一半。中国现在有100多个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北京电动汽车公司，拜腾，北汽，长江电动汽车，长城汽车，康迪，力帆汽车，蔚来汽车，智斗，上海汽车和众泰是中国主要的电动汽车品牌和制造商。

其他行业

许多公司在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大量贷款支持下，在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的制造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到2012年，制造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和全球对这两种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太阳能电池板。全球供过于求已导致中国境内外破产和减产。2015年后的二十年内，中国将有十亿美元用于补贴太阳能发电，但即使由于供过于求而导致价格急剧下降，截至2012年，中国的太阳能电成本仍是传统燃煤电厂电成本的三倍。

自2011年起，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市场。自2019年以来，三星电子，现代汽车，起亚汽车和LG电子正将部分或全部产品生产移出中国，

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避免与当地竞争加剧，中国经济放缓以及中美贸易战有关的风险。

服务

2015年，中国的服务输出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高效电信密度确保该国长期保持高增长轨道。2015年，服务业创造了中国年度GDP的52.9%，仅次于制造业。但是，与较发达国家相比，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农业部门仍然雇用较大的劳动力。

在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之前，中国的服务业以国有商店，定量配给和受监管的价格为特征-改革带来了私人市场，个体企业家和商业部门。批发和零售贸易迅速扩大；产生了众多的商场，零售商店，餐饮连锁和酒店。公共行政仍然是服务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旅游业已成为就业的重要因素和外汇来源。

电信

中国拥有多元化的通讯系统，通过互联网，电话，电报，广播和电视将全国各地连接起来。到2006年底，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或网民数量突破了1.37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4%，到2007年6月则达到1.62亿，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互联网用户。2007年，中国的手机普及率为34%。2006年，手机用户发送了4,290亿条短信（每位用户平均967条短信）。2006年，固定电话的数量增长了79%，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旅游

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世界遗产地（55）。中国的旅游业是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也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之一。根据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数据，旅游业直接为 中国经济贡献了人民币13,620亿元（约合2,160亿美元）（约占GDP的2.6％）。2011年，国际游客总数为5800万，国际旅游收入为480 亿美元。

国内旅游市场占该国旅游量的90％以上，占旅游总收入的70％以上。2002年，国内游客达到8.78亿，旅游收入为469 亿美元。在中国，尤其是在大城市，正在形成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庞大的中产阶级。2003年，中国的出境游客达到2022万，首次超过日本。

奢侈品

中国的零售额仅占全球零售额的7％；但是，中国买家占奢侈品消费品全球零售额的25％。国际旅行目的地的许多奢饰品商店都有专门服务于中国客户的员工。

劳动与福利

在1979-1980年间，国家通过给工人加薪来对工厂进行了改革，但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了6％至7％，立即被抵消。改革还拆除了铁饭碗，这意味着它见证了经济中失业率的上升。在1979-80年间，有两千万失业者。

据估计，2005年中国的就业人口总数为7.91亿，约占总人口的60％。在2003年，有49％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采矿，制造业，能源和建筑业占22％；而29％的人在服务部门和其他类别。2004年，743,000个私营企业雇用了大约2500万人。从2004年到2007年，城市工资迅速增长，每年以13％到19％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平均工资接近200美元/月。到2016年，从事出口制造产品的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424美元。

2010年的人口普查发现，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现在正在迅速老龄化。预计这将导致对照顾老年人口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并且减少了从农村来的移民劳动力的供应。

由于恶化的污染，一党制国家的腐败和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在大型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中有限的经济自由，许多熟练的专业人员要么离开该国，要么在国外准备自己的安全网。在截至2014年的十年中，一千万中国人移居到其他国家，并拥有资产和他们的技术技能。在透明国际的国家腐败指数中，腐败现象从第75位下降到第80位，在中国，腐败现象继续恶化。

2013年2月批准的一项法律将规定，全国最低工资应为城市平均工资的40％，并将在2015年之前全面分阶段实施。

强迫劳动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强迫劳动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它使试图举报或宣传虐待行为的人和非政府组织保持沉默。强迫劳动在政府认可的机构和私人公司中均很普遍。

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砖瓦厂与奴隶制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有关。在工厂现场强迫或无偿实习也是一个问题。

该劳改制度是战俘营的网络，其中被定罪的犯人和持不同政见者被判处苦役。这些监狱营地都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囚犯被迫在其中从事工作。工作条件常常很残酷，囚犯面临系统的酷刑。这些监狱营地的产品经常进入世界市场。

到2020年3月，中国政府被发现利用维吾尔族人在血汗工厂内进行强迫劳动。根据当时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的一份报告，从新疆地区被强行遣返的维吾尔族人不少于80,000 ，他们至少在二十七家公司工厂中用作强迫劳动。根据一家位于英国的慈善机构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的说法，诸如Abercrombie＆Fitch，Adidas，Amazon，Apple，BMW，Fila，Gap，H＆M，Inditex，Marks＆Spencer，Nike，North Face，Puma，PVH，Samsung和UNIQLO均来自这些工厂。根据BuzzFeed的报告，新疆的监狱营地拥有超过210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空间。

对外贸易

国际贸易占中国整体经济的很大一部分。1976年以前，中国与第三世界贸

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赠款，信贷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提供资金。主要的努力是在亚洲，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但是在非洲（加纳，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和中东（埃及）也提供了大笔贷款。但是，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后，这些努力得到了缩减。在那之后，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变得微不足道，在那段时间，香港和台湾都开始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

自从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寻求分散其对外贸易体系以使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1991年11月，中国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该组织在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促进自由贸易与合作。中国于2001年担任APEC主席，上海于当年10月主办了APEC年度领导人会议。

在2000年夏季与欧盟和其他贸易伙伴达成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后，中国致力于制定多边世贸组织的一揽子计划。中国于2001年9月完成了加入世贸组织的多边谈判。经过16年的谈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谈判，其加入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的完成为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

中国的进口商品中绝大多数是工业用品和资本货物，尤其是机械和高科技设备，其中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主要是日本和美国。从地区上看，中国近一半的进口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约四分之一的中国出口到相同的目的地。中国约80％的出口产品为制成品，其中大部分为纺织品和电子设备，其余为农产品和化学产品。在在世界上五个最繁忙的港口中，三个在中国。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2330亿美元，进口增长18％。自1996年以来，中国在美国总进口商品中的份额已从7％增长到15％。

200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91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7.1%。2005年前11个月，中国对俄罗斯的机械和电子产品出口增长了70%，占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总额的24%。与此同时，中国对俄罗斯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了58%，占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总额的7%。也是在那个时期，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增长35%，占贸易总额的近20%。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大部分仍是服装和鞋类。俄罗斯是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中国现在是俄罗斯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在俄罗斯有750多个投资项目，涉及金额10.5 亿美元。 2005年1月至9月，中国在俄罗斯的合同投资总额为3.68亿美元，是2004年的两倍。

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主要是能源，例如原油（主要通过铁路运输）以及邻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电力出口。在不久的将来，这两种商品的出口都将增加，因为俄罗斯正在建设西伯利亚-太平洋东部的输油管道，并有一条通往中国边境的分支机构，而俄罗斯电网公司UES正在建设其一些水电站。以期将来向中国出口。

出口增长仍然是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了增加出口，中国采取了一些政策，例如促进外国投资工厂的快速发展，将进口零部件组装成消费品以进行出口和放开贸易权。在2005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更加重视发展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以维持经济增长并解决失衡问题。

中国是区域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该区域已于2020年11月签署协议，成为该

地区的成员。该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9％。RCEP旨在在20年内取消对多种产品的关税。2020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愿意考虑加入另一项大型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CPTPP）。

外国投资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将外国投资限制为出口导向型业务，并要求外国投资者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伙伴关系。《鼓励产业目录》规定了各个行业允许外国参与的程度。从使外国投资合法化的改革开始，资本流入每年都在增加，直到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的58-60％。

自1990年代初以来，政府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国内市场上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取消了设立合资企业的时间限制，提供了一些防止国有化的保证，允许外国合伙人成为合资企业的主席、董事会，并授权设立外商独资企业，这现在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形式。1991年，中国给予外商独资企业，合同制企业和外国公司更多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些外国公司投资于选定的经济区或国家鼓励的项目，例如能源，通讯和运输。

中国还批准了一些外资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和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特殊的“B”股股票。出售给外国人的这些“ B”股没有在公司中拥有所有权。1997

年，中国批准了21,046个外商投资项目，获得了超过450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在2000年和2001年大幅修订了《关于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法律》，放宽了出口绩效和国内含量要求。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宣布，将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国内金融服务公司中拥有高达51％的股份。以前，外国所有权仅限于这些公司的49％股权。

外国投资仍然是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快速扩张的重要因素，并且已经成为城市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1998年，外资企业生产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约40％，外汇储备总额约为1450 亿美元。如今，外商投资企业生产了中国约一半的出口产品（中国的大部分外国投资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而中国继续吸引大量投资流入。但是，中国政府对引导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制造业的重视已导致某些行业的市场饱和，同时使中国的服务业不发达。从1993年到2001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1999年获得了390亿 美元，2000年获得了410亿美元。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主要的FDI接受国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5年将近800亿美元。2006年，中国获得了694.7 亿美元。到2011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的外国投资减少，中国已取代它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当年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2800亿美元。

在经济形势放缓和2015年人民币贬值的背景下，同年12月，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下降了5.8％。尽管中国2014年以前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但2015年入境投资的放缓加上对美国的外国投资的大幅反弹，导致美国重新获得其作为最大投资目的地的地位。美国商会在2016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中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趋势，尽管它也表明中国仍然是最大的投资目的地。这项针对500多个成员的调查发现，“中国仍然是十分之六的成员公司的三大投资重点”，尽管这比2012年的十分之八的被访者认为中国为首

要任务的高点有所下降。

1999年的外汇储备总额为1,550亿 美元，2000年为1,650亿美元。2005年的外汇储备超过8,000 亿美元，是2003年的两倍多。 2005年底的外汇储备为8,190亿美元 ，2006年底为1.066万亿美元。 到2008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万亿美元。此外，到2008年9月，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

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一部分，中国承诺消除某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开放以前不接受外国投资的特定部门。外国投资的主要障碍包括不透明和不一致的法律法规，以及缺乏基于规则的法律基础设施。例如，华纳兄弟公司（Warner Bros.）由于一项法规的规定而退出了其在中国的电影业务，该法规要求中国投资者拥有至少51％的股份或在外国合资企业中发挥领导作用。

外国投资在中国历史上的另一项重大发展是2013年9月建立了上海自由贸易区。该区被认为是许多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试验场。至关重要的是，外国投资是通过“负面清单”方法进行控制的，在该领域中，所有行业都允许外国直接投资，除非明确禁止将特定部门纳入上海市政府发布的负面清单中。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全球化的一个新特征，中国本地公司寻求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据报道，2011年，资本富裕的中国公司对美国有前途的公司的投资正在增加。此类投资提供了获得营销和分销专业知识的

机会，这些专业知识可能对开拓中国发展中的国内市场有用。

自2005年以来，中国公司一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拓展。2013年，中国公司在全球非金融领域的投资达900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6％。

在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1610.3亿美元，创造了近30万个就业机会。西欧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区域接受国，德国是全球任何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最多的国家。

中国公司选择进入国外市场的方式有两种：有机增长和并购（M＆A）。许多中国公司更喜欢并购，原因如下：

快速。并购是公司通过获取品牌，经销，人才和技术来扩张到另一个国家的最快方法。中国的CEO已经习惯了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并且不想花费资本。

中国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许多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然后将他们的产品/服务带到中国，从高档汽车到时尚服装再到肉类再到好莱坞电影，一应俱全。

廉价的资本获取。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帮助许多中国公司积累了金融资本来进行并购。中国政府还为公司向海外扩张提供长期的低息资本。

低风险。并购帮助中国公司避免了有机增长失败的风险，因为它们成立了一家具备所有条件的成熟公司。

廉价劳动力。一些公司可能会将部分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国家的制造工厂转移到中国，以降低成本并提高产品的价格吸引力。

贸易和政策壁垒。许多行业的中国公司都面临配额限制和高额税收，这使其无法在国外市场上竞争。

不良资产。2008–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给许多西方公司带来了流动性问题，并降低了它们的市场价值。中国公司认为，这是他们以折扣价购买这些低迷资产的绝佳机会。中国在非金融领域的直接外国投资从2007年的250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900亿美元，增长了三倍以上。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不断增长，影响力不断增强，欧盟已经开始引起注意。

最初，国有企业主导着外国收购，大部分资金流向了石油和矿产。自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私营公司开始收购非原材料的外国公司。

并购

从1993年到2010年，中国公司以收购方或收购方的身份参与了25,284项并购交易，总价值已知为9,690 亿美元。2010年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创下新纪录。2010年发生的交易数量为3,640，与2009年相比增长了17％。2010年的交易金额为1,960 亿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25％。

人口统计

自1950年代的医疗服务以来，公共卫生和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流行病得到了控制。连续几代人的健康状况不断好转。随着死亡率的下降比出生率的下降更快，人口增长率急剧上升。庞大的人口一直是政府面临的主要困难。在1950年代，粮食供应不足，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这促使当局发起了重大的节育措施程序。1958–60年的“大跃进”工业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导致

了饥荒，致使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到1960年，总人口在下降。1962年开始进行第二次人口控制行动，着力于促进晚婚和使用避孕药具。到1963年，该国开始从饥荒中恢复，出生率飙升至194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人口年增长率为3％。1966年，文革中止了第二次计划生育计划，但四年后又恢复了第三次尝试，将限制结婚和限制家庭规模作为一项义务。自1970年以来，这些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个计划生育方案一直持续到1979年，当时实行了每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到1980年代初，中国人口已达到10亿左右，到2000年代初已超过13亿。在1980年代，平均总人口增长率约为1.5％。在199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到大约1％。今天大约是0.6％。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目前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但是，由于人口众多，每年的净人口增长仍然相当可观。一胎化政策的人口后果是，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老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流失着1亿至1.5亿的剩余农村工人，其中许多人靠兼职低薪工作维持生计。

根据《福布斯》中国富豪榜（2007年），中国有66位亿万富翁，仅次于美国（415位），位居第二。在2006年《福布斯富豪榜》中，中国有15位亿万富翁。在《 2007胡润百富报告》中，该榜单列出了中国106位亿万富翁。

劳动力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发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力规模首次缩水至9.937亿人口，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国家新闻社新华社援引中共的声明，报道了现行法律对两胎政策的修改，新法律于2016年1月1日生效。

运输和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主要目标是修复现有的运输基础设施，以满足军事运输和后勤需求以及加强领土完整。在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修建了新的公路和铁路连接，而同时又对旧的进行了改进。在1960年代，区域交通的大部分改善已成为地方政府的责任，并且修建了许多小型铁路。重点还放在发展偏远农村，山区和森林地区的运输上，以使该国较贫困的地区一体化，并帮助促进农业部门的规模经济。

在1970年代后期的改革时代开始之前，中国的交通运输线路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而通向内陆地区的交通普遍较差。此后，由于西北和西南的偏远和边境地区已经修建了铁路和公路，这种情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国际运输业也得到了发展，远洋运输的范围也大大扩大了。

货物运输主要是通过铁路。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推出自己开发的高速列车的国家之一。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中国与巴西，阿根廷和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中国早期对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关注：而中国将约GDP的9％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仅投资了其GDP的2％至5％。巨大的支出缺口使中国经济能

够以接近最佳的状态增长，而许多南美经济体则遭受着各种发展瓶颈的困扰，例如交通网络薄弱，电网老化和学校平庸。

科学技术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中国政府通过资金，改革和社会地位，把重点放在科学技术上，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威望的基础。中国在教育，基础设施，高科技制造，人工智能，学术出版，专利和商业应用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在某些领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已经成为世界领先者。中国现在越来越注重本土创新并旨在改革仍然存在的弱点。这些举措取决于吸引受过良好教育的海外华人返回中国从事创新经济工作，并教育下一代中国学生。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China_(1949%E2%80%93present)

中国经济历史

中国的经济史描述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发展。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根据政府统计，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0％。2005年，中国的GDP达到2.286万亿美元。自1978年毛主义时期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在从以国家为主导的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向混合经济过渡。这种转变需要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企业，治理和法律体系进行大量的改革，并要求政府有能力灵活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这种转变伴随着高水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过程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各个方面。

中国的幅员辽阔，意味着生活水平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从极度贫困到相对繁荣都可能有所不同。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以土地为生，而在上海和北京等主要城市，现代服务业经济正在形成。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令人惊讶且动荡的经济发展进程。它经历了革命，社会主义，毛主义，最后经历了后毛时代的特征，即逐步的经济改革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毛时期大跃进饥荒和混乱的文化大革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是，自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时期以来，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有了重大改善，并经历了相对的社会稳定。在这个时期，中国已经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

改革时期的高增长率是由于资源的大规模动员，以及对这些资源的控制从公共所有权转向私有制所致，从而提高了这些资源的管理效率。从大规模资源调动时代获得的收益现在已经结束，中国将来必须更多地依靠效率提高来进一步发展经济。

在1990年代后期之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具有对某些行业的所有权，并对计划和金融体系进行了中央控制，这使得政府能够动员任何可用的盈余，并大大增加了用于投资的国民经济产出的比例。

分析家估计，1979年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这一比率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超过。但是，由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相对较低，相对于国家和人

口的规模，即使是如此高的投资率也只能获得少量的资源。

可用于投资的资源有限，使中国无法快速生产或进口先进设备。技术发展逐步进行，过时的设备继续得到尽可能长时间的使用。因此，同时使用了许多不同级别的技术（请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大多数行业包括一些可与西方现代化设施相提并论的工厂，这些工厂通常基于进口设备和设计。中国工厂生产的设备通常落后于标准西方设计数年。农业在国家投资中所占的份额比工业所占的份额要小，并且其平均投资水平仍然低于技术和工业领域。尽管拖拉机，卡车，电动泵和机械脱粒机的数量大大增加，但大多数农业活动仍由人或动物进行。

尽管中央政府协调了经济并在必要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需要这些资源的地区，但大多数经济活动都非常分散，地区之间的商品和服务流动很少，使受灾地区不得不等待中央政府在没有其他任何救济的情况下介入。例如，中国种植的谷物中大约有75％被生产谷物的家庭消费，其余25％被分配到需要谷物的其他地区。

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来源之一是通过扩大运输能力来展示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运输和通信部门正在增长和改善，但由于投资资金短缺和缺乏支持这种增长所需的先进技术，其发展速度不足以应付快速增长的现代经济所需的交通量。

由于各地区之间的互动有限，因此创建了各种各样的地理区域，并使用了

各种不兼容的技术，从而在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和繁荣方面创造了截然不同的区域。

在任何给定的城市中，企业的范围从很小的集体所有的手工艺品单位（几乎不能为其成员赚取生活水平的收入），到现代化的国有工厂，其工人获得稳定的工资以及免费的医疗保健，奖金和各种其他福利。

尽管有巨大的限制和破坏，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停滞不前。产量在1800年至1949年之间大幅增长，并在1949年后迅速增长。然而，在1960年代之前，产量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增长相匹配，因此生产能力无法超越基本消费需求，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例如，1979年的谷物产量大约是1952年的两倍，但人口也增加了一倍，这主要是抵消了产量的增加，结果，即使在高产年份，也几乎没有盈余。此外，很少有资源可以用来投资于资本货物，例如机械，工厂，矿山，铁路和其他生产性资产。相对较小的资本存量导致每个工人的生产率保持较低水平。

1949–1969年经济政策

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后，其领导的根本长远目标是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功能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经济角度讲，这些目标意味着工业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和现代军事装备的生产。随着时间的流逝，领导层继续遵守这些目标。但是，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因经济，内部政治以及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而多次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认为社会主义的收入均等和增强政治意识的目标应优先于物质进步的领导人与认为工业化和一般经济现代化是获得成功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前提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在那些考虑政治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成员最为重要。经常强调实际经济考虑的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很大程度上，重要的政策转变反映了对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交替重视，并伴随着个人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地位的重大变化。经济政策和基本经济模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每个新的政策时期虽然与其前任有很大不同，但仍保留了大多数现有的经济组织。

从战争中恢复，1949–52年

1949年，中国的经济遭受了数十年战争的破坏性影响。许多矿场和工厂被破坏或摧毁。1945年与日本的战争结束时，苏联军队拆除了东北主要工业区的大约一半机械，并将其运往苏联。由于缺乏维护、运输，通讯和电力系统已被破坏或恶化。农业受到干扰，粮食产量比战前的最高水平低了约30%。此外，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一加剧了经济弊端。

1949-52年期间，政府的主要目标仅仅是恢复经济到正常的工作状态。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以修复运输和通讯联系，并恢复经济活动的畅通。银行体系已国有化，并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下进行集中管理。为了在1951年之前控制通货膨胀，政府统一了货币体系，收紧了信贷，限制了各级政府预算，将其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并保证了货币的价值。国有贸易公司（商业部门）的建立刺激和部分管制了商业，该公司与私营贸易商竞争，从生产商那里购买商品并将其出售给消费者或企业。工业所有制转型进展缓慢。国民党政府执政期间（1927-49年），该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企业以及许多现

代化的运输部门都处于国家控制之下。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后立即将这些单位定为国有企业。剩余的私营企业逐渐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1952年仍有17％的工业单位完全在国家体制之外。

在农业方面，土地所有权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一项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计划，约有45％的耕地所有权是从地主那里重新分配的。一旦某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完成，就会鼓励农民在生产的某些阶段进行合作，方法是组建一个由六到七户人家组成的小型“互助小组”。1952年，所有农户中有38％属于互助小组。到1952年，物价稳定，贸易恢复，工农业恢复了以前的最高生产水平。恢复期已实现其目标。

1953-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恢复了可行的经济基础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革命退伍军人的领导人准备着手开展密集的工业增长和社会化计划。为此，政府采用了苏联的经济模式，该模式基于现代部门的国家所有权，农业上的大型集体单位以及集中的经济计划。对经济发展的态度体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中。与苏联经济一样，主要目标是实现高经济增长率，重点放在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发展上，尤其集中在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上。苏联计划者帮助中国同行制定了计划。大量的苏联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协助开发和安装了新的重工业设施，包括从苏联购买的许多整厂和设备零件。在此期间，政府通过施加财务压力和诱因说服私营现代企业的所有者将其出售给国家或将其转变为国家控制下的公私合营企业，从而增强了对行业的控制。到1956年，所有现代工业企业中大约有67.5％为国有，而32.5％为公私合营。没有私有企业存在。在同一时期，手工业被组织成合作社，到1956年，手工业占所有手工业工人的91.7％。

农业也经历了广泛的组织变革。为了促进农业资源的动员，提高效率养殖，加大政府获得农产品，当局鼓励农民组织越来越大、社会化的集体单位。从结构松散，规模很小的互助团队中，村庄应首先发展到较低阶段的农业生产者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中，家庭仍会根据其贡献的土地数量获得一定的收入，并最终发展为先进的合作社，或集体。在先进的生产者合作社中，收入分成仅基于贡献的劳动量。此外，每个家庭被允许保留一个小的私人土地，在该土地上种植蔬菜，水果和牲畜以供自己使用。该集团化进程开始缓慢，但在1955年和1956年加速。在1957年，所有农户93.5％的人加入了先进的生产合作社。

在经济增长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非常成功，特别是在苏联式发展战略所强调的那些领域。为重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点行业，包括铁和钢制造，煤炭开采，水泥生产，电力发电，机械制造业被大大扩展。兴建了数千家工矿企业，包括156处主要设施。从1952年到1957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为19％，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为9％。

尽管国家缺乏对农业的投资，但农业产量却大幅度增长，年均增长约4％。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通过集体化进行的重组和合作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所致。然而，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领导人对农业表现相对疲软以及国有贸易公司无力大幅增加从农村单位购买的用于城市消费的谷物的数量日益感到担忧。

大跃进，1958–60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前，工农业增长之间日益严重的失衡，对效率低下的不满以及决策过程缺乏灵活性，这使该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深信，高度集权的工业——基于苏联的模式不适用于中国。1957年，政府采取了措施，将许多经济决策权移交给了省，县和地方行政机构。1958年，旨在继续第一个计划的政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62）被放弃。领导层取而代之的是依靠全体人民的自发英勇努力，立即为经济的所有部门带来戏剧性的“巨大飞跃”。农业的进一步重组被认为是努力突飞猛进达到更高生产率阶段的关键。一个根本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资本来同时在工业和农业上进行大量投资。

人民公社是由平均约20,000至30,000成员的大约20或30个先进的生产者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成员的数目从6,000个到40,000多个不等。最初成立时，设想的乡镇是将地方政府的最低层级和农业生产中的最高组织级的职能合并为一个机构。公社包括三个组织级别：中央公社；生产大队（大致相当于先进的生产者合作社或传统的农村村庄）和生产团队，通常由大约30个家庭组成。大跃进开始时，这些公社打算获得其下属单位生产资产的所有所有权，并接管大部分农场活动的计划和决策。理想情况下，公社应通过将农民家庭搬进宿舍，在公共食堂吃饭以及将整个劳动者团队从一个任务转移到另一个任务来提高效率。实际上，在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建立这种理想的，高度集中的公社形式。

在1958年4月至9月9日之间，有98％的农场人口被组织为公社。很快，很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下，公社太笨拙，无法成功地完成分配给他们的所有管理和行政职能。在1959年和1960年，最终，大多数政府职责被归还给县和

乡镇行政部门。尽管如此，公社制度得以保留，并一直是农业部门组织的基本形式，直到1960年代初。

在“大跃进”期间，人们还期望工业部门发现并利用闲散的劳动力和生产能力来增加产出，使其超出先前认为可行的水平。政治热情是原动力，进取的党支部接管了许多工厂的方向。此外，中央计划被减为次要角色，以支持各个单位自发的，受政治启发的生产决策。

大跃进的结果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实际上，1958年工业产值确实实现了“飞跃”，增长了55％，农业部门收成丰收。但是在1959年，1960年和1961年，不适当的水利控制工程以及其他资源分配不当，导致了农业产量的灾难性下降。1959年和1960年，农业总产值分别下降了14％和13％，1961年又下降了2％，达到了1952年以来的最低点。饥荒普遍蔓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人口普查数字，死亡率从1958年的1.2％上升到1959年的1.5％，1960年为2.5％，然后在1961年又下降到1.4％。从1958年到1961年，显然有超过1400万人死于饥饿，据报导的出生人数比正常情况下少2300万人。从1960年开始，政府取消了几乎所有外国技术进口订单，并利用该国的外汇储备每年进口了500万吨谷物，从而避免了更严重的灾难。

调整与恢复：“农业第一”，1961–65年

面对1960年代初的经济崩溃，政府急剧修改经济的近期目标，并制定了一套新的经济政策来取代大跃进的经济政策。恢复农业产量并以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的速度扩大农业产量是当务之急。计划和经济协调被恢复，尽管其方式要比大跃进之前的集中程度要低，以便恢复秩序并有效地

向经济分配资源。将降低投资率，并改变投资优先次序，首先考虑农业，轻工业第二，重工业第三。

在大跃进时期持续强调重工业发展的同时，政府承诺动员国家资源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的组织变革主要涉及公社结构内生产决策权的下放和收入分配。尽管中央公社的作用仍然是地方政府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纽带，并且在进行生产队规模过大的活动中很重要，但中央公社的作用大大减少了。生产团队被指定为基本会计单位，并负责做出几乎所有有关生产及其成员的收入分配的决策。

对农业的经济支持采取多种形式。减少了农业税，相对于农业的工业用品价格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化肥和各种农业机械的供应大量增加，特别是用于灌溉的小型电动泵。大多数现代供应都集中在已知可产生"高且稳定产量"的地区，以确保获得最佳结果。

在工业上，有几家重点企业恢复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但对大多数企业的控制权仍在省级和地方政府手中。这种权力下放发生在1957年和1958年，并在1961-65年期间得到了重申和加强。计划而不是政治再次指导了生产决策，物质奖励而不是革命性的热情成为了生产的主要动力。开始从日本和西欧国家购进大量先进的国外机械；这些机械从1960年苏联开始撤出便突然断供。

在1961-65年的调整和恢复时期，经济稳定得以恢复，到1966年，农业和工

业的生产都超过了大跃进时期的峰值。1961年至1966年，农业产量平均每年以9.6%的速度增长。同年，工业产值以年平均10.6%的速度增长，这主要是通过恢复1961年经济崩溃后产能不足的工厂而恢复的。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增长来源是——农村，小规模农业的蔓延；工业，特别是煤矿，水力发电厂，化肥厂和农业机械厂。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模式结合了高度集中，以工业为导向的苏联式的“五年计划”的要素；以及所有权的分散化和决策的特点，这是“大跃进”的特点，并且高度强调了这一点；对农业发展和均衡增长的“农业第一”政策。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发生在后来的几年；但是直到1960年代的改革时期，在1960年代初建立的所有权的基本制度、决策结构和发展战略才得到重大改变。

1966–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于1966年发起，并于1968年被叫停，但激进左派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和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此期间，有几个不同的阶段经济政策。

1966–69年文化大革命高潮

与大跃进不同，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政治动荡，并未对官方经济政策或基本经济模式产生重大变化。但是，它的影响力在整个城市社会中都可以感受到，并且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经济部门。

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但总的来说，农村地区的动荡不如城市。现代非农业部门的生产以多种方式减少了。

生产停顿的最直接原因是矿山和工厂中学生和工人的政治活动。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需要运输的火车和卡车在全国各地运送中国红卫兵而造成的运输中断。许多工厂的产量遭受原材料和其他供应短缺的困扰。

第三个破坏性影响是，工厂的方向交由革命委员会控制；该委员会由党，工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组成，他们的成员对管理或企业的知识往往不多。此外，几乎所有工程师，管理人员，科学家，技术人员，业主和其他专业人员都被“批评”，降职，“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甚至入狱，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他们的技能和知识被丢失。

结果是1967年工业生产下降了14％。军队在1967年末和1968年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工业部门在1969年恢复了相当高的增长率。

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方面对经济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仇外心理猖獗，限制了技术进步所需的外国设备的进口。

对大学经济的最严重和持久的影响可能是大学关闭导致高学历人才的严重短缺。高等教育的空白将限制中国发展新技术和吸收进口技术的能力。

恢复系统增长，1970-74年

随着政治稳定逐步恢复，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重新开始了协调，平衡发展的新动力。

为了恢复工业效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开展了一场运动，以使技术娴熟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重返文革期间流离失所之前的工作。

大学开始重新开放，并扩大了对外联系。经济再次遭受不同工业部门能力不平衡的困扰，迫切需要增加现代农业投入的供应。针对这些问题，投资显著增加，包括与外国公司签订了建设化学肥料生产，钢铁精加工以及石油开采和精炼的主要设施的合同。签署这些合同的外国公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世界上十三家最大、最现代化的化肥厂。在此期间，工业产值平均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

1972年，由于天气恶劣，农业产量有所下降，但整个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8％。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发展需求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估，周恩来在1975年1月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这些结论。在该报告中，他呼吁进行“四个现代化”。周强调了农业机械化和到本世纪末整个经济现代化的综合两阶段计划。

四人帮，1974–76年

在1970年代初期和中期，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激进组织企图通过其支持者网络，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媒体的控制，来统治权力中心。

然而，较为温和的领导人正在制定和颁布一项实用的计划，以实现经济的快速现代化，这与媒体上所表达的政策相矛盾。在新闻界和政治运动中，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倡议被强烈抨击为“有毒杂草”。

“四人帮”利用官方新闻机构提倡优先考虑非物质，政治激励措施，大幅减少收入差异，消除私人农场地块以及将基本核算单位转移到农业大队。他们反对加强中央计划，并谴责使用外国技术。

面对如此矛盾的政策声明和不确定的政治潮流，各级行政人员和经济决策者几乎瘫痪了。经济活动放缓，初期的现代化计划几乎停顿了。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以及随后的4月邓小平第二次被贬，加剧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

1976年7月唐山地震造成的破坏加剧了权力斗争和政策纠纷的影响。1975年的工业和农业年产量均未显示出增长。不确定性的状态最终在四人帮被捕时结束了。毛死后一个月，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

毛泽东时代插曲，1976–78

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华国锋领导的国家和已康复的邓小平于1977年7月重申了1975年周恩来所倡导的现代化计划。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以

期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目标。

新政策加强了管理者和经济决策者的权力，而牺牲了党的官员，强调了对工人的物质激励，并呼吁扩大研究和教育体系。对外贸易增加；学生和“外国专家”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将被鼓励。

这项新的政策倡议是在1978年2月和1978年3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当时华国锋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1976-85年十年计划草案。该计划要求工业和农业都实现高增长率，其中包括120个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大量和昂贵的外国技术进口。

在1976年至1978年之间，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停滞中迅速复苏。1977年，由于连续第三年恶劣的天气，农业生产低迷，但在1978年创纪录的收成反弹。工业产值在1977年增长了14％，在1978年增长了13％。

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还不太清楚。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视发展生产力。我们已经说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到了晚期，将实行从每个人的按需分配。这就要求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大量的物质财富。因此，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通过这些力量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快，更大

的发展来证明的。随着人民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不断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缺点之一是，我们对发展生产力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社会主义意味着消除贫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984年6月30日，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1978年12月22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里程碑上，党的领导人决定实施一项渐进但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毛主义版本未能产生有效的经济增长，不仅导致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工业化国家，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亚洲的新兴工业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

在1970年代末期，日本和香港在现代技术上可以与欧洲国家相提并论，而中国的公民则只能靠粮食供应，定量配给的服装，不足的住房以及服务不足和效率低下的服务业来生活。所有这些缺点使中国在国际上感到尴尬。

改革计划的目的不是放弃共产主义，而是通过大幅增加市场机制在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减少（而不是消除）政府计划和直接控制来使其更好地运转。

改革的过程是渐进的。新措施首先在一些地方通过实验引入，然后在证明成功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传播。

到1987年，该方案在增加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并创造了新的活力和经济机遇的气氛。但是，与此同时，改革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紧张局势，导致对该计划未来的激烈质疑和政治斗争。

调整期，1979-81年

改革方案的最初几年被称为“调整期”，在此期间，将纠正经济中的主要失衡状况，并为计划周全的现代化建设打下基础。华国锋十年计划的时间表被遗弃，尽管它的许多要素都保留了下来。

调整过程的主要目标是迅速扩大出口。克服运输，通讯，煤炭，铁，钢铁，建材和电力方面的主要缺陷；通过增加轻工业的增长率和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来解决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不平衡。1979年，农产品采购价格上涨了22％以上，从而刺激了农业生产。

改革方案的中央政策是在调整时期通过实验引入的。1979年政府提出了最成功的改革政策，即农业生产的合同责任制，作为山区或干旱地区贫困农村单位增加收入的一种方式。责任制允许单个农场家庭经营一块土地以牟利，以换取以给定价格向集体交付一定量的农产品。这种安排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率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引入责任制后不久，各个地区的许多农场单位都采用了责任制。

官方的鼓励政策也刺激了农业生产，以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建立免费的农民

市场，并允许一些家庭作为“专业家庭”开展工作，致力于在土地上生产稀缺的商品或服务。

在工业上，主要的政策创新增加了企业经理的自主权，减少了对计划配额的重视，允许企业在计划之外的市场上生产产品，并允许企业尝试使用奖金来奖励更高的生产率。政府还对数量有限的国有单位测试了财务程序的根本变化：这些企业没有像往常那样将所有利润都转交给国家，而是被允许对其利润缴税并保留利润。余额用于再投资并作为奖金分配给工人。

政府还积极鼓励建立集体所有和经营的工业和服务企业，以吸收年轻人的部分失业，同时帮助增加轻工业产品的供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消失后，个体企业也被允许，而独立的皮匠，裁缝，修补匠和摊贩再次成为城市的普遍景象。大大简化了对外贸易程序，使对外贸易部（1984年更名为对外经济关系和贸易部）以外的单个企业和行政部门与外国公司进行直接谈判与广泛的合作。

改革开放，始于1982年

调整期产生了可喜的结果，大大增加了收入；增加粮食，住房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除了有意限制的重工业以外，所有部门均实现了强劲的增长。在这些最初的成功的基础上，改革方案得到了扩大，邓小平领导层经常指出中国的基本政策是“改革开放”，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贸易开放。

在农业中，采用合同负责制作为整个国家的组织规范，公社结构在很大程

度上被拆除。到1984年底，大约98％的农户都实行了责任制，除少数公社外，大多数公社都已解散。将乡镇的行政职责移交给乡镇政府，并将其经济角色分配给乡镇和村庄。农产品自由市场的作用进一步扩大，随着销售可能性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农场收入迅速增加。

在工业中，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和相互关系阻止了一项单一而简单的政策带来农业责任制所实现的显着改善。尽管如此，基于更大灵活性，自治性和市场参与度的一系列政策显著改善了大多数企业可获得的机会，产生了高增长率，并提高了效率。企业管理者逐渐获得了对其单位的更大控制权，包括雇用和解雇权，尽管这一过程需要与官僚和党的干部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到1985年，对利润征收税收和保持平衡的做法开始普及，这增加了企业最大化利润的动力，并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自主权。潜在同等重要的变化是，投资资金的来源从政府预算拨款转移到了计息银行贷款；政府预算拨款不计利息，也不必偿还。截至1987年，此类贷款收取的利率仍然太低，无法作为对非生产性投资的检查；但该机制已经到位。

对外贸易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时期的重要性。与早期中国致力于实现自给自足不同，邓小平领导下的对外贸易被视为投资资金和现代技术的重要来源。结果，在1980年代中期进一步放宽了贸易限制，并使外国投资合法化。最常见的外国投资是外国公司与中国单位之间的合资企业。外国投资者的独资也已成为法律，但这种做法的可行性仍然值得怀疑。

对外贸易新地位的最明显标志是四个沿海特别经济区，它们于1979年作为飞地建立，在那里外国投资可以得到特殊待遇。四个区域中的三个–深圳，

珠海和汕头-位于广东省，靠近香港。第四个是福建省的厦门，它直接面对台湾海峡。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1984年4月在十四个最大的沿海城市（包括大连，天津，广州和上海）指定了经济开发区。所有这些都是主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这些区域旨在在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公司与中国主要经济网络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交流。

改革政策也刺激了国内商业；改革政策明确地通过将商品和服务分配的主要负担从政府计划转移到市场来振兴经济。在1980年代，私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活动被合法化并受到鼓励，尽管中央当局不断地与地方政府机构作斗争，以对独立商人征收过多的税款。到1987年，国有的商业机构和零售系统与迅速发展的私人和集体所有制并存，并与之激烈竞争，为中国公民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泛的消费选择。

尽管改革方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也引起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一个问题是自由市场活动和专业管理自治的原则对党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另一个困难是一波犯罪，腐败以及在许多老年人心目中的道德下跌，这是由宽松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引起的。最根本的紧张关系是那些由“致富”的人与不富裕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造成的，以及通货膨胀的普遍威胁。这些忧虑在导致党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作用；他1987年被迫辞职。在胡辞职之后，国家领导人就改革的未来进程以及如何平衡对效率和市场激励的需求与对政府的指导和控制的需求，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们确认了进一步改革的承诺，但其步伐仍然谨慎，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杠杆保持重视。

中国GDP

1985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建立国民账户体系（SNA），用GDP来衡量国民经济。中国开始研究建立国民经济核算新体系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核算模型等。1986年，第一位在海外经济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张风波博士担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的重点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并完成整理和发布了来自中国自己的研究的中国GDP数据。此内容的摘要已包含在由张风波主编，国务院研究中心合著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1988年6月）中。这是中国发布的第一批GDP数据。

该研究以世界银行的方法为参考，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许多适当的调整。GDP也已通过使用移动平均汇率转换为基于美元的数据。该研究系统地总结了1952年至1986年中国的GDP和人均GDP，并分析了增长率，各组成部分的变化和贡献率。该研究还包括国际比较。此外，该研究还比较了MPS（物料产品系统）和SNA（国民核算系统），从分析中国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系统的结果。这一成就为中国的GDP研究奠定了基础。

1992年8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国民核算体系的通知》，西方的国民账户体系正式引入中国，取代了苏联的MPS体系；西方经济指标GDP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根据张风波博士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家统计局与日本一桥大学合作，根据SNA原理估算了1952年至1995年的中国GDP数据。

行业

1985年，工业雇用了大约17％的劳动力，但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却超过46％。它是增长最快的行业。技术水平范围很广。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许多小型手工艺品单位，许多企业使用已安装或设计的机械。有许多大型的最新工厂，包括纺织厂，钢铁厂，化肥厂和石化厂，但也有一些新兴的轻工业生产消费品。中国生产了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生产的产品但高科技产品数量有限。技术转让是通过进口整个工厂，设备和设计进行的，这是一种重要的进步手段。主要工业中心是在辽宁省北京-天津-唐山地区，上海和武汉。矿产资源包括巨大的铁矿石储量；几乎所有其他工业矿产都有充足的充足供应。过时的采矿和矿石加工技术逐渐被现代工艺，技术和设备所取代。

农业

1985年，农业部门雇用了大约63％的劳动力，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33％。由于农业机械供应不足和其他现代投入物，生产率较低。大多数农业过程仍然是手工完成的。就国家面积和人口而言，耕地面积很小（仅占总面积的10％，而美国为22％）。土地大量使用；所有田地每年至少生产一种庄稼，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年（特别是在南部）种两到三种庄稼。谷物是最重要的产品，包括大米，小麦，玉米，高粱，大麦和小米。其他重要的农作物包括棉花，黄麻，油料种子，甘蔗和甜菜。鸡蛋也是主要产品。猪肉产量稳定增长，家禽饲养的家禽和猪也增加了。除绵羊和山羊外，其他牲畜的数量相对有限，它们在内蒙古自治区和西北草原上以大群放牧。中国还有大量的海洋和淡水渔业。木材资源主要位于东北和西南部，该国的大部分地区森林都在几个世纪以前被砍伐。种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

能源

中国在几乎所有能源形式上都是自给自足的。自1970年代初以来，煤炭和石油一直出口。它的煤炭储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而采煤技术发展不充分，但在1980年代后期稳步提高。当时的石油储量非常大，但质量不同且位置不同。西北和近海地区的可疑油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由于缺乏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勘探和开采受到限制。到1982年，日本和西方石油公司签署了27项联合海上勘探和生产合同，但到1980年代后期，只有少数几口井在生产石油。大量的天然气储量位于北部，西北部和近海。该国水电站的潜力是世界上最大的，容量是世界上第六大；大型水电项目正在建设中，其他项目处于计划阶段。1985年，火力发电（主要是燃煤）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的68％，到1990年已增长到72％。政策制定者将重点放在1980年代末期的火力发电上，这是解决能源需求的一种快速，短期的解决方案，而水电和核电被视为长期解决方案。石油产量持续增长，以满足全国机械化的需求，并提供了重要的外汇，但直到本世纪末，国内的使用一直受到限制。

对外贸易

按国际标准衡量，对外贸易很小，但规模和重要性却在迅速增长。贸易由对外经济贸易和贸易部及其下属单位以及中国银行控制。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发生了大规模的权力下放和，提高了外贸业务灵活性。纺织品是出口类别中的佼佼者。其他重要的出口产品包括石油和食品。领先的进口产品包括机械，运输设备，制成品和化学药品。日本是主要的贸易伙伴，1986年占进口的28.9％，占出口的15.2％。香港是出口的主要市场（31.6％），但仅占进口的13％。1979年，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进口来

源，1986年成为第三大总体贸易伙伴。西欧，特别是西德，也是主要的贸易伙伴。旅游业受到鼓励并在不断发展。

1990–2000

自199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GDP持续至少增长5%。在1992年初对中国南部的农历新年访问期间，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声明，旨在给与新的动力并振兴经济改革。在当年晚些时候、第14届全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层再次强调邓小平的市场改革努力，指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关键任务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和经济体制的大胆改革被宣布为1990年代十年发展计划的标志。

1996年，中国经济继续以9.5%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低通胀。在接下来的3年中，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影响而放缓，官方增长率分别为1997年，8.9%，1998年为7.8%和1999年为7.1%。从1995年到1999年，通货膨胀率急剧下降，反映出货币紧缩政策；并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食品价格。2000年显示出这种趋势的适度逆转。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当年正式增长8.0%，自1978年以来增长了三倍。1999年，中国拥有12.5亿人口，但人均GDP（PPP）仅为3,800美元。

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和其出口增长急剧下降，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其自身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其资本流入绝大部分由长期投资组成。由于这些原因，它

在很大程度上未受到亚洲区域危机的影响，并且其不贬值的承诺一直是该区域的主要稳定因素。但是，由于内部问题，中国面临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的问题，其中包括金融体系受到大量不良贷款的困扰，以及由于大力改革国有企业而产生的大规模裁员（国有企业）。

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改革国有部门和使银行体系现代化仍然是主要障碍。中国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并报告亏损。第15届全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1997年9月举行；总书记江泽民宣布计划出售、合并国有企业，或增加“非公有制”经济。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其1998年3月的会议上批准了该计划。2000年，中国宣称在三年努力中取得了成功，以使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获利。

从2000年起

在中国共产党于2003年10月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中国立法者公布了对宪法的若干拟议修正案。最重要的一项建议是为私有财产权提供保护。立法者还指出，新的重点将放在政府总体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包括努力减少失业（目前在城市地区为8-10％的范围），以重新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在保护环境和改善社会平等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04年3月举行会议时批准了这些修正案。

2005年10月的第五次全体会议批准了“十一五”经济计划（2006-2010年），旨在通过更加平衡的财富分配以及改善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来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十一五”规划。该计划要求到2010年将GDP相对保守地提高45％，并将能源强度（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降低20％。

在1990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平均速度增长，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尽管政府试图给经济降温，但中国的GDP在2003年增长了10.0％，在2004年增长了10.1％，在2005年甚至更快地增长了10.4％。2006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1.76万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如果中国要创造每年需要的1500万个就业岗位（大约相当于厄瓜多尔或柬埔寨的规模），以雇用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那么这样高的增长是必要的。

2009年1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修正后的数字为2007年财政年度中，增长发生在13％，而不是11.9％（临时数字）。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4万亿美元，而德国的GDP为3.3万亿美元。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根据这些数字，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1994年以来最快的，1994年GDP增长了13.1％。如果考虑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包括灰色市场和地下经济），那么中国可能早已超过德国大于德国。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Louis Kuijs）表示，截至2009年1月，中国的经济规模甚至可能比德国大15％。据美林（Merrill Lynch）中国经济学家丁挺（Ting Lu）说，预计中国将在三到四年内超过日本。

自从最近进行了各种改革以来，社会和经济指标已有所改善，但在高度发达的沿海省份与欠发达，较贫穷的内陆地区之间，不平等现象日益明显。根据联合国2007年的估计，中国约有1.3亿人（主要在落后的内陆省份的农村地区）仍生活在贫困中，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约35%的中国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

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在中期有潜在的充足量，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预计在201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在中国的城市化、技术进步、和追赶发达国家还有数十年的运行时间。但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和破坏环境的代价使未来的增长变得复杂。

中国启动了《经济刺激计划》，专门应对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它的主要重点是增加负担得起的住房，放宽对抵押贷款和中小型企业的信贷限制，降低房地产销售和商品税等税率，将更多的公共投资注入铁路，道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2008年的重大自然灾害，例如2008年的中国冬季风暴，2008年的四川地震和2008年的华南洪水，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温和的影响，但对当地和地区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却造成了重大破坏。四川的增长率在第二季度降至4.6%，但在2008年全年恢复至9.5%的年增长率。在5月12日地震后，主要的重建工作仍在继续，预计将持续至少三年。尽管由于2008年夏季奥运会而部分工厂关闭和搬迁，奥运会对北京的整体经济增长影响不大。由于经济的出口导向性质严重依赖国际贸易，因此中国经济受到2008-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然而，几乎所有方面的政府经济刺激措施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公司所得税（CIT）：公司的所得税设定为25％，尽管有一些例外情况。当公司投资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业时，税率仅为15％。在这些行业进行投资的公司还可以获得其他优势。

在互联网领域，开始的时候，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的增长速度比欧盟和美国的增长慢，但从2009年左右开始就出现了重要的发展时期。根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数据，中国的在线交易总金额从2008年的微不足道的规模增长至2012年的约4万亿人民币（约合6,600亿美元）。

根据全球透明国际联盟编制的《 2013年腐败感知指数》，中国在177个国家中排名第80位。该指数以0（高度腐败）至100（非常低腐败）的等级对国家进行评分；亚太地区超过半数的国家得分都低于40。透明国际在其最终评估中指出：

如果要作出真正的努力，中国政府目前的努力应超出遵守法治的范围。他们应该接受政治改革，以实现制衡，透明和独立审查，同时承认民间社会在反腐败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经济计划

直到1980年代以前，经济都是通过各级行政部门制定的经济计划来指导和协调的。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方案显著减少了这样的作用；中央计划通过鼓励计划外的国有单位生产，通过促进没有计划体制下的集体和个体企业的成长，来增加经济体系的灵活性。政府还努力通过税收和投资支持等经

济手段，以对经济的间接指导取代直接的计划控制。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中央经济计划仍对经济的总体方向作出了决定，钢铁和能源等关键商品的分配也是如此。

1950年代初期，中国首次建立起计划机构时，就仿照高度集中的苏联体制。该系统基本上依赖于中央计划官僚机构；该机构可以计算和平衡需求和供应的主要商品的数量。在大跃进时期（1958–60年），经济管理被广泛下放，这种方法得到了实质性的更改。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计划体系的集权程度随政治潮流而波动，在务实的增长时期趋于僵化，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影响下逐渐减弱。

在国家一级，计划从中央政府的最高机构开始。国家的经济目标和重点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然后将这些决定传达给国务院各部委和其他机构，以通过国家经济计划予以实施。

国家计委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建委，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制定时间长短不一的国家计划。在不同的时间也宣布了长达十年和十二年的长期计划。这些本质上是对未来目标和经济预期总体方向的陈述，对经济活动几乎没有直接影响。截至1987年底，最新的此类长期计划是1978年2月由华国锋提出的1976-85年计划草案。

中程计划的主要形式是五年计划，这是采用苏联体制的另一个特征。五年计划的目的是指导和整合年度计划，以实现国家目标的均衡增长和进步。

在实践中，只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才发挥了这种作用，该计划有效地充当了工业化的蓝图。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62年），以及第三个（1966-70年），第四个（1971-75年）和第五个（1976-80年）五年计划都被政治动荡打断了，几乎没有影响力。在1980年代，起草了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85年），它更多地反映了改革方案的结果，而不是改革的指南。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90）旨在指导改革过程，使之贯穿于1980年代下半期。

中期计划的第二种形式出现在1949–52、1963–65和1979–81的调整和恢复时期，每个时期之前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内战，大跃进和四人帮。在这些情况下，正常的中长期计划被暂停，而经济中的基本失衡得以针对和纠正。在每种情况下，目标都比五年计划中的目标更受限制和明确定义，并且相当成功地实现了。

经济部门的活动由年度计划控制。计划的制定始于秋天，因此可以考虑当年的农业产量。年度计划的基础是“物料平衡表”。在国家一级，准备物料平衡表的第一步是估计-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直接受中央控制的企业-每个中央所控制之产品的需求和供应。计划在省级单位之间进行货物转移，以使供求平衡。作为最后的手段，进口可能弥补商品的严重整体赤字。

最初的目标发送给省级主管部门和中央控制企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部委的省级对口单位细分至下级县，区，市和直属省级企业之间分配的目标。县进一步将其分配的数量分配到其下属镇，乡镇和县属企业；城市将其目标划分为其管辖范围内企业的目标。最后，城镇将目标分配给他们控制的

国有企业。农业目标是由乡镇在他们的村庄之间分配的，最终到村庄与个体农户签约的数量。

在每个级别，各个单位都收到了其目标输入分配和输出数量。经理，工程师和会计师将目标与自己的预测进行比较，如果他们得出计划的产出配额超出其能力的结论，则会与上级的行政机关代表进行磋商。每个行政级别在与下属单位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调整目标，并将修订后的数字发送回上一级计划单位。委员会和部委评估修订后的数额，重复物料平衡表程序，并将结果用作最终计划，然后由国务院正式批准。

省级制定的年度计划提供了中央控制商品的数量，并确定了国家计划中未包含、但对省，自治区或特殊市镇很重要的商品的既定目标。这些数据经历了相同的分解，审查，讨论和重新聚集的过程，并最终成为省级单位年度计划的一部分。同样，许多省级未包括的商品也被添加到县和市计划中。

计划过程的最后阶段发生在各个生产单位中。企业在收到产量配额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物资分配的数字之后，通常将生产计划安排为10天，1个月，3个月和6个月计划。

中国的计划体系也遇到了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体同样出现的僵化和反应不足的问题。基本的困难在于，计划者不可能预见经济的所有需求并充分说明计划的投入物和产品的特征。从1979年和1980年开始，在实验的基础上进

行了第一次改革。几乎所有这些政策都增加了各个经济部门的权力自主权和决策能力，并降低中央计划的直接作用。到1980年代中期，规划仍然是政府引导经济和纠正失衡的主要机制，但其预测和控制经济行为的能力已大大降低。

价格

价格确定

直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的改革时期，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机构确定的，并且很少变动。因为当生产成本或对商品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价格没有变化，所以它们常常无法反映出商品的真实价值，从而导致许多商品被错误分配，并产生了中国政府自己所称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

产生经济效率所需的准确价格的最佳方法是通过供需过程；并且在1980年代政府政策日益提倡使用“买卖双方共同商定”的价格，即通过市场。

农产品自由市场上产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1985年夏季，除粮食外，所有食品的国家存储价格也被允许根据市场情况而浮动。在城乡地区，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生产的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一般都可以自由浮动，国有企业在计划之外生产的许多商品的价格也可以自由浮动。但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大多数主要商品的价格，以及国家商业部门从农民那里购买的用于城市零售的谷物，价格仍由政府机构设定或限制，仍然不够准确反应真实价值和效率。

1987年，中国的价格结构混乱。一些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在市场上确定的，一些价格是由政府机构确定的，而其他价格则是由未明确定义的程序产生的。在许多情况下，同一商品的价格不止一个，具体取决于商品的交易方式，生产商品的单位或买方的身份。尽管政府对此情况感到不满意，但它致力于继续进行价格改革。但是，由于潜在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政府不愿释放剩余的固定价格。突然的不可预测的价格变化将使消费者无法继续购买某些商品。在旧的价格结构下，一些先前获利的企业将开始亏损。

价格的作用

经济改革方案的结果随着市场交换和盈利能力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1980年代，价格在决定经济大多数部门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方面起着核心作用。以前，在严格的中央计划系统中，已经为企业分配了实际的产出配额和投入。在改革方案下，显示正利润的动机甚至使国有企业也尽可能选择基于价格的投入和产品。国有企业无法改变计划所要求生产的商品的数量或价格，但可以尝试通过尽可能便宜地购买投入品来增加利润，而计划外生产的决定主要基于价格。

消费品是通过价格机制分配给家庭的，但配给的谷物除外。家庭根据与家庭收入有关的商品价格决定购买什么商品。

价格政策问题

谷物市场是政府无论是允许非理性的价格结构继续存在还是进行价格改革时都面临重大问题的典型例子。国家商业机构向农民支付的谷物价格要比

政府从向其出售谷物的城市居民那里获得的价格高。1985年，国家商业机构向农民支付的平均价格为每吨谷物416.4元，然后在城市以每吨383.3元的平均价格出售谷物，每吨谷物损失33.1元。在这种安排下售出了9000万吨，政府损失了近30亿元。如果国家降低采购价格，农民将减少其谷物产量。因为谷物是中国人的主要饮食，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国家将城市零售价格提高到等于购买价格的水平，那么中国家庭主要食品的价格将上涨9％，从而引起巨大的不满。但是，即使是这种选择，也可能无法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平均谷物的自由市场价格-1987年为510.5元/吨，表明其真实价值大大高于国家采购价。

没有明确的解决价格政策困境的方法。政府的做法是鼓励非计划经济活动的增长，从而扩大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比例。然后，这些市场价格可以作为对计划项目进行更准确定价的指南。接下来的几年，中国经济继续以双重价格体系运行。

通货膨胀

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中国经济不稳定的最明显表现之一是通货膨胀失控。通货膨胀在1940年代后期的中国内战期间达到顶峰，当时上海的批发价格在3年内增长了750万倍。在195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改革，银行的统一和国有化以及对价格和货币供应的严格控制实现了政府的主要目标——消除通货膨胀。这些措施一直持续到1979年，中国取得了骄人的价格稳定记录。在1952年至1978年之间，零售消费品价格平均每年仅增长0.6％。

在改革时期，当政府控制减少时，通货膨胀率上升。城镇居民生活成本的

首次大幅上涨发生在1980年，当时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7.5%。1985年增加了11.9%，而1986年增加了7.6%。在三十年稳定的价格之后，这种通货膨胀的爆发有几个基本原因。首先，在改革前的几年中，投资率普遍较高，并且集中在生产资料的制造上。由此造成的消费品短缺导致过度需求的逐渐积累：个人储蓄相对较大，并且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昂贵的耐用消费品市场蓬勃发展，例如手表和电视机。其次，随着某些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以及技术改变了制造工艺和产品，许多物品的实际价值发生了变化。农产品生产的实际成本随着现代投入物的使用增加而上升。出现了比以前市场上技术更先进，价格更高的制成品，例如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

在1980年代初期，消费者收入和流通货币数量都相当迅速地增长，有时甚至是出乎意料的增长。消费者收入的增长是由于改革计划强调物质激励措施，以及生产力和赚钱可能性的全面扩大。企业赚取和保留的较高利润在许多情况下以加薪，奖金和更高补贴的形式转嫁给了工人。同时，银行系统作用的扩大和多样化导致贷款和存款的金额有时会超过官方批准的水平，从而为经济注入了计划外的新货币数量。

国家目标

到1987年，在改革方案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在实现现代化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复兴教育体系，经济开放以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合作，扩大市场利用以促进商业和生产，以及灵活决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进一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潜力，也提高了单个经济单位的生产能力。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Leap_Forward

大跃进

从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改造国家的战役，目

的是通过人民公社的建立等，将农业经济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毛主席下令加大力度，增加粮食单产，将工业带到农村。地方官员担心反右运动，并根据毛泽东夸大其词的主张，竞争实现或超额完成配额，征收实际上不存在的农业"盈余"，致使农民挨饿。高级官员不敢报告由这些政策造成的经济灾难；各地官员将粮食产量的下降归咎于"恶劣"的天气；政府几乎没有针对饥荒采取任何行动。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死亡；估计死亡人数在1500万至5500万之间；这使此次大饥荒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中国农村人民生活的主要变化包括强制性农业集体化的逐步引入。禁止私人耕种；从事农业的人遭到迫害并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通过强迫劳动，公共斗争会议和社会压力对农村人群实行了限制。大跃进是1953年至1976年中国经济萎缩的两个时期之一。

1959年，毛泽东将日常领导权移交给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务实的温和派；中共在1960年和1962年的会议上，特别是在"七千干部会议"上研究了所造成的破坏。毛泽东没有退缩其政策，而是将问题归咎于执行不力和"右派"反对他。为了消除反对派并重新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于1963年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于1966年发起了文化大革命。

国民党在1949年10月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刻，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被迫将土地所有权重新分配给较贫穷的农民。在农业部门，被党认为是"充满邪恶"的农作物（例如鸦片）被破坏，并被稻谷等作物替代。

在党内，有关于再分配产生了重大辩论。党内温和派系、刘少奇认为，变革应该是渐进的，农民的任何集体化都应等到工业化之后才能进行，这可以为机械化农业提供农业机械。由毛泽东领导的一个更激进的派别认为，为工业化融资的最佳方法是政府控制农业，从而建立对谷物分配和供应的垄断。这将使国家能够以低价购买并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从而筹集了该国工业化所需的资本。

农业集体和其他社会变革

1949年以前，农民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并遵守传统习俗节日宴会和向祖先致敬。人们认识到，毛泽东利用国家对农业的垄断来资助工业化的政策在农民中间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建议通过建立农业集体来把农民置于党的控制之下，这也将促进工具和牲畜的共享。

这项政策在1949年至1958年间逐步推行，首先建立了5至15户家庭的“互助小组”，然后在1953年建立了20至40户家庭的“基本农业合作社”，然后从1956年开始建立“100-300个家庭的高级合作社”。从1954年起，鼓励农民成立并加入集体农业协会，据说这将提高农民的效率，而不会抢劫他们自己的土地或限制他们的生计。

到1958年，私有制被废除了，所有农业家庭都被迫加入国有的公社。毛泽东要求公社增加粮食产量，以养活城市并通过出口赚取外汇。这些改革在农民中普遍不受欢迎；通常是通过召集他们参加会议、并让他们在这里呆

上几天甚至是几周直到他们“自愿”同意加入集体而实施的。

除了对每个家庭的收成征收累进税之外，国家还实行了强制性的固定价格购买谷物的制度，以建立饥荒储备，并符合与苏联达成的贸易协定的条件。到1957年，税收和强制性购买加在一起占收成的30％，剩余很少。在城市中还实行了定量配给，以遏制“浪费性消费”并鼓励储蓄（这些储蓄被存入国有银行，因此可用于投资）。

除了这些经济变化外，该党还在农村实施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包括驱逐所有宗教和神秘机构和仪式，而以政治会议和宣传会议取代了它们。尝试加强农村教育和提高妇女地位（允许她们根据需要离婚），并结束缠足、童婚和鸦片。1956年引入了户口制度，防止未经适当授权的县际旅行。

集体化的第一阶段导致产出的适度提高。1956年，通过及时分配粮食援助，避免了长江中部的饥荒，但在1957年，该党的对策是增加国家收成的比例，以防止进一步的灾难。

百花齐放运动与反右运动

1957年，毛泽东在百花运动下，通过倡导言论自由和批评来回应党内的紧张局势。这导致了随后的波及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以惩罚那些对共产党提出批评的人士。

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完成时，毛泽东开始怀疑苏联采取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否适合中国。他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逆转持批评态度，并对东德，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起义感到震惊，也对苏联正在寻求与西方列强“和平共处”的看法感到震惊。毛泽东已经确信中国应该走自己的共产主义之路。专门研究中国事务的历史学家和记者乔纳森·米尔斯基（Jonathan Mirsky）表示，随着朝鲜战争的到来，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孤立，这加快了毛对他所认识的国内敌人的攻击。这使他加快了自己的设计，以发展一种经济，使该政权将从农村税收中获得最大收益。

初步目标

1957年11月，共产党国家的政党领袖聚集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古塔·赫鲁晓夫提议，在未来15年内，通过和平竞争，不仅要赶上美国，而且要超越美国。毛泽东受到口号的启发，以至于中国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在15年内赶上并超越英国。

组织和运作因素

大跃进运动在计划于1958年至1963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尽管该运动本身在1961年被终止。1958年1月在南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背后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农业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应同时进行。希望通过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来实现工业化，而不必进口重型机械。政府还试图避免社会分层和苏联发展模式所涉及的技术瓶颈，但为此寻求政治而非

技术解决方案。由于不信任技术专家们，毛泽东和党试图复制其在20世纪30年代在重组中使用的延安策略：“群众动员，社会平等，对官僚主义的攻击”。毛泽东主张，在农村中现有的集体将合并成庞大的人民公社；有必要以苏联的“第三阶段”为模式进行进一步的集体化。

人民公社

最初，公社成员可以在公社食堂免费用餐。当粮食生产停止增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1958年4月在河南茶山建立了一个实验公社。在这里，第一次完全废除了私人土地，并引入了公共厨房。在1958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这些人民公社将成为整个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新形式。到年底，已经建立了大约25,000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5,000个家庭。公社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合作社，其工资和金钱被“工分”所取代。

小拉尔夫·A·塔克斯顿（Ralph A. Thaxton）根据他的实地调查，将人民公社描述为中国农户的“种族隔离制度”。公社系统旨在最大化生产，以供应城市，并为城市居民，工人，干部和官员建造办公室，工厂，学校和社会保险系统。批评该制度的农村地区公民被标记为“危险分子”。逃离也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企图逃亡的人受到“由政党精心策划的公共斗争”，这进一步危害了他们的生存。除了农业，公社还纳入了一些轻工业和建筑项目。

工业化

毛泽东把粮食和钢铁生产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柱。他预测，在大跃进开始的15年内，中国的工业产值将超过英国。在1958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将钢铁产量在一年内增加一倍，大部分的增长来自“土法炼钢”。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主要投资是：分别于1958年，1959年和1960年启动了1,587个，1,361个和1,815个中型和大型国有项目，每年的投入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多。

由于这项工业投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成为了国营工人：1958年，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100万，1960年国家总就业人数达到了5044万的峰值，是1957年的两倍多。城市人口增加了3124万人。这些新来的工人对中国的粮食定量分配制度施加了很大压力，这导致对农村粮食生产的需求增加且难以为继。

在这种迅速的扩张中，协调受到损害，材料短缺频繁发生，导致“工资大幅上升，主要是建筑工人的工资，但制成品却没有相应增加”。面对巨额赤字，政府从1960年到1962年将工业投资从38.9亿元人民币减少到7.1亿元人民币（下降82％）。

土法炼钢

在没有冶金学方面的知识的情况下，毛泽东鼓励在每个公社和每个城市社区建立小型土法炼钢熔炉。

农民和其他工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用废金属生产钢铁。为了给炉子加燃料，当地政府从农民房屋的门和家具得到木材。锅，盆和其他金属制品被要求为炉子提供“废料”，从而可以实现极其乐观的生产目标。与许多工厂，学校甚至医院的工人一样，许多男性农业工人从农业劳作中被转移来帮助炼铁。产出的是低质量的生铁块，但其经济价值可忽略不计；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深有不信任（他们可以指出这一点），而是对农民群众动员的力量抱有信心。

此外，百花齐放大战之后知识分子阶级的经历，使那些意识到这种计划的愚蠢的人沉默了。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于1959年1月参观了东北的传统钢铁厂，在那里他发现高质量的钢铁只能在大型工厂中使用可靠的燃料（例如煤）生产。但是，毛决定不下令停止土法炼钢，以免削弱群众的革命热情。该工作仅在当年晚些时候被悄悄放弃。

灌溉

在“大跃进”期间，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劳动，但往往是以计划不周的基本建设项目的形式进行的，例如在没有经过培训的工程师投入的情况下进行的灌溉工程。

作物实验

在公社，应毛泽东的要求促进了许多激进而有争议的农业创新。许多这些都是基于现在名誉扫地的苏联农艺师特罗菲姆李森科及其追随者的想法。这些政策包括密种，即在错误假设同类种子不会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播种种子的密度要比正常情况高得多。鼓励深耕（深达2米）是因为错误地认为这会产生具有超大根系的植物。总而言之，这些未经测试的创新通常导致谷物产量减少而不是增加。

同时，当地领导人被迫向其政治上级虚假报告越来越高的谷物产量数据。参加政治会议的人们记得，随着争夺上级和赢得称赞的竞争（如与毛泽东本人会面的机会）的加剧，生产数字被夸大了高达实际产量的10倍。根据这些虚假的生产数据，国家后来得以迫使许多生产组织出售超出其剩余能力的谷物。

对待村民

根据米尔斯基（Mirsky）的说法，对私人财产的禁令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破坏了农民的生活。村民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来维持生活，因为他们被公社系统剥夺了能够出租，出售或使用土地作为抵押的传统方式。在一个村庄里，一旦公社开始运作，党的老板和他的同事就“狂奔起来，把村民放到田野里睡觉，在无法忍受的时间里劳作，并迫使他们走路，挨饿，以及匪夷所思的其他项目”。

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家爱德华·弗里德曼，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历史学家保罗·皮科维奇和宾汉姆顿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塞尔登写道，党与村民之间互动的动态：

毫无疑问，攻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性和结构化的动力，它使成千上万的爱国和忠诚的村民受到恐吓和贫穷。

作者在描绘共产党对中国村民传统的破坏时，与塔克斯顿（Thaxton）类似。根据米尔斯基（Mirsky）的说法，传统上受人尊敬的当地习俗被视为“封建主义”而被革除。“其中包括葬礼，婚礼，当地市场和节日。党因此摧毁了许多赋予中国生活意义的东西。”没有参加中共的政治运动-尽管这种运动的目的常常是矛盾的-“可能导致拘留，酷刑，死亡和整个家庭的苦难”。

公众批评会经常被用来恐吓农民、使之服从地方官员。据塔克斯顿（Thaxton）称，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了饥荒的死亡率。“在第一种情况下，对身体的打击会造成内部伤害，再加上身体消瘦和急性饥饿，可能导致死亡。”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农民从共同地偷走了两棵大白菜后，小偷被公开批评了半天。他崩溃之后病了，再也没有康复。其他人被送往劳教所。

弗兰克·迪科特（FrankDikötter）写道，用棍棒殴打是当地干部最常用的

方法。其他干部则设计了更严厉的手段来羞辱和折磨那些未能跟上的人。随着大规模饥荒的到来，必须施加越来越大的暴力，以迫使营养不良的人到田间劳作。被害者被活埋，被绑在池塘中，赤身裸体，并在冬季中旬被迫劳动，在沸腾的水中浸泡，被迫摄入粪便和尿液，并遭到肢解。在广东，一些干部用通常用于牲畜的针头向受害者注入盐水。在大跃进期间死亡的人中，大约有6％至8％被酷刑折磨或被立即杀害。

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指出，“共产党官员有时折磨并杀害那些被指控未能达到其粮食生产配额的人”。

庐山会议

1959年7月/8月的庐山会议讨论了“大跃进”的最初影响。尽管许多较温和的领导人对新政策持保留态度，但唯一公开发表意见的高级领导人是彭德怀元帅。毛对彭对大跃进的批评作出回应，解雇了彭的国防部长一职，谴责彭（来自贫困农民家庭）和他的支持者为“资产阶级”，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彭被林彪所取代，林彪开始有计划地从军队中清除彭的支持者。

后果

应对灾难对上级政府的影响是复杂的；1959年毛泽东清洗了国防部长彭德

怀；林彪，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临时晋升，使毛泽东失去了一定的权力和声望。大跃进之后，他于1966年发起了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造成全球死亡人数大幅上升（1950年至2017年）

饥荒

尽管进行了有害的农业创新，但1958年的天气仍然非常有利，收成有望保持良好。不幸的是，大量劳动力被转移到钢铁生产和建筑项目上，这意味着许多地区的大部分收成被烂掉。毁灭性的蝗虫蜂群加剧了这个问题，蝗虫蜂群是在“四害”运动中杀死其无数的天敌而造成的。

尽管实际收成有所减少，但在中央政府的巨大压力下，地方官员为了争宠报告了创纪录的收成，却相互竞争，宣布结果越来越夸张。这些数字被用作确定国家供应城镇和出口所需的谷物数量的基础。

在1958年至1960年间，尽管农村地区发生了广泛的饥荒，但中国仍然是粮食的主要净出口国，因为毛泽东努力保持面子并使外界信服他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外援被拒绝了。当日本外相告诉中国外长陈毅日本愿意提供十万吨小麦时，他被拒绝。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也意识到，在饥荒期间，中国人正在向非洲和古巴出口食品。

由于农产大大降低，甚至城市地区的口粮也大大减少。但是，大规模饥荒主要限于农村地区；由于浮夸数据的急剧膨胀以及强制征收，几乎没有谷物可供农民食用。全国粮食短缺严重。但是，安徽，甘肃和河南等最实行毛泽东改革的省份遭受的损失往往不成比例。四川省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因其肥沃而被称为“天府”。由于省领导李景全的措施，人们认为其死于饥饿的绝对人数最大。在大跃进期间，受饥荒严重影响的中国部分地区也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情况。

即使是那些在饥荒中幸存下来的人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大跃进的农业政策和相关的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1月；那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开始通过针对大跃进政策的逆转来恢复农业生产。谷物出口停止了，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进口有助于减少粮食短缺的影响，至少在沿海城市如此。

饥荒死亡

饥荒的确切死亡人数难以确定，估计范围从三千万至五千五百万。由于估算大跃进或任何饥荒造成的饥荒死亡人数不确定，因此很难比较不同饥荒的严重程度。但是，如果只接受低估的3000万死亡人数，那么大跃进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致命的饥荒。这部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

大跃进逆转了自1950年以来死亡率下降的趋势。饥荒的死亡和出生人数的减少导致中国人口在1960年和1961年下降。这仅是600年来中国人口的第三次下降。

饥荒的严重程度因地区而异。通过关联不同省份的死亡率上升，彭希哲发现甘肃，四川，贵州，湖南，广西和安徽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天津和上海的增幅最低（没有西藏数据）。彭还指出，城市地区死亡率的增长约为农村地区死亡率的一半。阜阳是安徽的一个地区，1958年有800万人口，其死亡率可与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相比；三年多来，有240万人丧生。

饥荒的原因和责任

大跃进的政策，政府未能对饥荒状况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以及在有明显证据表明农作物欠收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维持较高的粮食出口配额是造成饥荒的原因。对于造成饥荒的天气条件有多大（如果有的话）存在分歧。

暴力死亡

并非所有在大跃进期间的死亡都是饥饿造成的。弗兰克·迪克特（FrankDikötter）估计，至少有250万人被殴打或折磨致死，另有100万至300万人自杀。他提供了一些说明性的例子。在信阳，1960年有100万人死亡，其中6–7％（约67,000）被民兵殴打致死。在道县，有10％的死者“被党员及其民兵活埋，殴打致死或以其他方式杀害”。在石门县，1960年约有

13,500人死亡，其中12％被“殴打或致死”。在杨继绳的记录中，人们因反抗政府，报告真实的收成数字，发出警报，拒绝交出剩下的少量食物，试图逃离饥荒地区，乞讨食物或激怒官员，偷窃小东西而被殴打或杀害。

对经济的影响

大跃进期间，中国经济开始发展。铁产量在1958年增长了45％，在随后的两年中合计增长了30％，但在1961年暴跌，直到1964年才达到之前的1958年水平。

大跃进还导致人类历史上对房地产的最大破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任何轰炸行动。所有房屋中约有30％至40％变成了瓦砾。弗兰克·迪科特（FrankDikötter）指出：“房屋被拆毁以制造肥料，建造食堂，搬迁村民，整修道路，为美好的未来腾出地方或惩罚其主人。”

在农业政策中，大跃进时期粮食供应的失败通过1960年代的逐渐去集体化来解决，这预示着邓小平领导下的进一步去集体化。政治科学家Meredith Jung-En Woo指出：“毫无疑问，该政权未能及时做出反应以挽救数百万农民的生命，但当政权作出回应时，它最终改变了数亿农民的生计”。

尽管存在事业上的风险，但一些共产党员公开地将这场灾难归咎于党的领导层，并以此证明中国在发展经济中必须更多地依靠教育，获取技术专长和运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批评“经济灾难是自然的过失30％，人为的错误70％”。

北京大学两位经济学家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不切实际的单产目标导致了1959-61年间过高的死亡人数；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单产目标导致了谷物产量数字的上涨和过度的采购。我们还发现，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在毛泽东去世几十年后，在受政策影响的地区造成了人力资本积累的严重恶化，经济发展减缓。”

抵抗

对大跃进有各种形式的抵抗。有几个省发生了武装叛乱，尽管这些叛乱从未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叛乱发生在河南，山东，青海，甘肃，四川，福建和云南省以及西藏自治区。在河南，山东，青海，甘肃，四川，这些叛乱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偶尔还会发生针对干部成员的暴力事件。对粮仓的袭击，纵火及其他故意破坏，火车抢劫以及对邻近村庄和县的袭击是常见的。

根据布兰代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拉尔夫·萨克斯顿（Ralph Thaxton）20多年的研究，在大跃进期间和之后，村民们反对中共，认为中共是独裁，残暴，腐败和刻薄的。Thaxton认为，中共的政策包括掠夺，强迫劳动和饥饿，这导致村民“以与社会主义统治连续性不相称的方式思考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

对政府的影响

尽管处罚各不相同，但官员们因夸大产量数据而受到起诉。在一个案例中，省委书记被解雇，并被禁止担任更高的职务。许多县级官员受到公开审判和处决。

毛泽东于1959年4月27日卸任中国国家主席，但仍担任中共主席。刘少奇（新任中国主席）和改良主义者邓小平（中共中央总书记）被任命负责改变政策以带来经济复苏。庐山党组会议公开批评了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批评由国防部长彭德怀领导。彭德怀最初对大跃进对武装部队现代化的潜在不利影响感到困扰。庐山摊牌后，毛泽东用林彪代替了彭。

但是，到1962年，该党显然已经摆脱了导致大跃进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1962年，该党举行了多次会议，使大跃进之后批评毛泽东的大多数被罢免的同志恢复了生机。再次对该事件进行了讨论，引发了很多自我批评；政府称其为“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损失”，并谴责了对毛泽东的人格崇拜。

特别是在1962年1月至1962年2月的七千名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自我批评，并重申了对民主集中制的承诺。在随后的几年中，毛泽东基本上放弃了政府的职务，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权力范围。但是毛泽东思想在共产党中占了上风，直到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毛泽东的政治卷土重来。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Chinese_Famine

中国大饥荒

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是在1959年-196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期间所发生的普遍的饥荒。一些学者还包括1958或1962年。大饥荒被广泛认为是最致命的饥荒，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估计由于饥饿造成的

死亡人数达数千万（1500万至5500万）。

导致饥荒的主要因素是大跃进（1958年至1962年）和人民公社的政策，例如由于计划经济导致粮食分配效率低下，使用不良的农业技术，“四害运动”减少了鸟类种群（这破坏了生态系统），谷物产量的过高报告（实际上正在减少），并命令数百万农民从事钢铁生产而使得农业耕收工作停顿。此外，局部地区的干旱等自然灾害也加剧了饥荒。在1962年初的七千名干部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刘少奇正式将饥荒的30％归因于自然灾害，并将70％的归因于人为错误。

饥荒的程度

产量下降

政策变化影响农业的组织方式，并具有毁灭性影响，同时局部发生干旱和洪水。结果，中国的谷物产量同比大幅下降。与1958年相比，1959年的收成下降了15％，到1960年，已达到1958年水平的70％。具体而言，根据中国政府数据，作物生产从1958年2亿吨下降至1959年1.7亿吨，以及1960年1.4亿吨。

死亡人数

中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由于当时缺乏食物和结婚的动机，根据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国的人口在

1961年约为658,590,000，比1959年减少了1,458万。出生率从2.922%（1958）下降至2.086 %（1960）和死亡率从1.198%（1958）增至2.543%（1960），而1962-1965年的平均数分别约为4%和1%。死亡率在1961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迅速恢复。人们普遍认为，政府严重低估了死亡人数：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卢保国向杨继绳解释了为什么他从未报道过自己的经历：

1959年下半年，我乘坐了从信阳到洛山和固始的长途巴士。从窗外，我看到沟渠中一具一具尸体。在公共汽车上，没人敢提到死者。在光山一县，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尽管到处都有死人，但当地领导人享受美食和美酒。...我见过那些告诉真相的人被摧毁了。我敢写吗?

1959年和1960年信阳市委书记俞德宏说：

我去了一个村庄，看到了100具尸体，然后又去了另一个村庄，又看到了100具尸体。没有人关注他们。人们说狗在吃尸体。我说不对。狗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吃掉了。

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于1989年得出结论，至少有1500万人死于营养不良。

中国国家统计局前部长李成瑞（1998）估计有2200万人死亡。他的估算基于Ansley J. Coale估算的（2700万人死亡）和前副总理（1千7百万例死亡）的估计。

全球人口统计会议委员会总监Judith Banister估计，从1958年至1961年，死亡人数增加了3000万。

英国学者贾斯珀•贝克尔（Jasper Becker）在他的《饥饿的鬼魂：毛泽东的秘密饥荒》一书中指出，大饥荒死亡人数估计在3000-6000万之间。

上海交通大学杰出教授曹树基（Cao Shuji），估计有3250万。

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杨继绳总结说，由于饥饿，有三千六百万人死亡，另外四千万人没有出生，因此"大饥荒期间中国的总人口损失达到了七千六百万。"

中国经济学家，2012年"弥尔顿•弗里德曼进步自由奖"获得者毛玉石估计死亡人数为3600万人。

中共历史研究室前副主任廖盖隆（Liao Gailong）报告说，由于饥荒造成4000万"非自然"死亡。

前中国高级官员，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最高顾问陈一谘（Chen Yizi）得出结论，饥荒造成4300万人死亡。

香港大学人文讲座教授，《大饥荒》的作者弗兰克·迪克特（FrankDikötter）估计，大跃进期间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饥饿，劳累和国家暴力，并声称他的发现是基于接触最近打开的地方和省党的档案。他的研究还强调，国家暴力加剧了死亡人数。迪科特声称，至少有250万受害者被殴打或折磨致死。Dikötter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一个家庭成员被偷窃食物后发生了什么事：

刘德胜犯有偷红薯罪，被尿液覆盖着。他，他的妻子和儿子也被迫排泄粪便。然后，在他拒绝吞下粪便后，被用钳子来张开嘴巴。他三周后去世了。

余习广是一名独立的中国历史学家，曾在中共中央党校任教，他估计有5500万人死于饥荒。他的结论基于二十年的档案研究。

食人

关于饥荒，人们以各种形式对人类的自相残杀行为进行了广泛的口头报告和一些官方文件记述。由于饥荒的规模，由此导致的自相残杀被描述为“在20世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

饥荒的原因

“大饥荒”是由激进的农业政策，社会压力，经济管理不善和局部自然灾害（如某些农业地区的干旱和洪水）共同造成的。

大跃进

中共主席毛泽东发起了农场所有制的农业政策的重大变化。不遵守政策将导致惩罚。

人民公社

在大跃进时期，农业被组织成人民公社，禁止种植私有土地。农业经济是

中央计划的，区域党的领导人得到了他们所控制的公社的生产配额。他们的产出然后由国家拨款并由其酌情分配。

在2008年，杨继绳将生产目标的影响概括为无法将供应重定向到最需要的地方：

在信阳，人们挨着粮食仓库的门忍受饥饿。他们死前大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我们"。如果河南和河北的粮仓已经开张，没有人会饿死。尽管周围有大量人死亡，官员们没有想到要拯救他们。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完成谷物的运送。

农业技术

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在农业技术实施一些变化，这基于俄罗斯农艺师特罗菲姆李森科的一些被后来验证为荒谬的想法。这些想法之一是密植，将幼苗的密度首先增加了两倍，然后又增加了一倍。从理论上讲，相同物种的植物不会相互竞争。但是在自然周期中，它们确实完全竞争，这实际上阻碍了生长并导致了较低的单产。

另一项被称为"深耕"的政策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特伦蒂·马尔采夫的想法，他鼓励中国各地的农民避开正常的15–20厘米的耕作深度，而是深深地耕作土壤。深耕理论指出，最肥沃的土壤深埋在地球深处，而异常深耕将

使根系生长特别旺盛。但是，在浅层土壤中，无用的岩石，土壤和沙子被抬起，掩埋了肥沃的表土并严重阻碍了幼苗的生长。

四害运动

在“四害”运动中，要求公民消灭麻雀和其他食用农作物种子的野鸟，以保护农田。害虫鸟被击落或惊吓着陆，直到精疲力尽。大规模消灭鸟类导致了害虫种群的爆炸，特别是以农作物为食的昆虫，没有鸟类就没有这些昆虫的捕食者。

多余的幻象

从1957年开始，由于上级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开始报告粮食生产过剩。但是，从1957年到1961年，中国全国的粮食实际产量正在下降。例如：

在四川省，尽管从1958年到1961年收成的谷物数量有所减少，但向中央政府报告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在甘肃，从1957年到1961年，谷物产量下降了4,273,000吨。

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浮夸风”幻想，而该党则认为他们的粮食过多了。相反，农作物的产量低于平均水平。例如，北京认为“到1960年，国家粮仓将有500亿斤粮食”，而实际上却只有127亿斤。富裕错觉的影响是巨大的，一

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造成整个中国大部分饥饿的主要原因。杨大立认为，超富幻象有三个主要后果：

首先，这导致计划者将土地从谷物转向棉花，甘蔗和甜菜等经济作物，并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从而刺激了国家对从农村采购谷物的需求。其次，它促使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等领导人加快了谷物出口，以确保有更多的外汇来购买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货物。最终，过剩的幻想使公社食堂的采用在当时显得很合理。当然，所有这些变化导致了谷物供应的迅速枯竭。

钢铁生产

钢铁生产被确定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求，数百万农民被命令从农业工作中撤离，加入钢铁生产劳动力队伍。农民生产的大部分铁最终都质量太低了，无法用于实际用途。

中央政府的更多政策

经济学家孟鑫，钱南茜和皮埃尔·亚雷德（Pierre Yared）表明，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早些时候所声称的那样，总产量足以避免饥荒，而饥荒是由于该国过度采购和分配不当造成的。他们表明，与大多数其他饥荒不同，在人均生产更多粮食的地方，死亡人数惊人地多，这说明中央计划粮食采购系统的僵化导致至少一半的饥荒死亡率。经济历史学家龚国和陈硕表明，在政客面临更多竞争的地方，存在更多的过度采购。

此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证明在思想上不利于日益严重的饥荒。中共的三面红旗“激起了1958年的狂热”。引用“群众路线”的实施是三个标志之一，告诉人们“全力以赴，着眼于目标，并以更大，更好，更经济的结果建立社会主义”，这与官员们感到压力的报告有关。开始于1957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通过各种方式导致了饥荒的严重性，包括引起“浮夸风”。一旦报道了作物产量的夸大现象，在进一步的报道中“没人敢泼冷水”。反对的言辞还导致了阴谋论的建立，在这些阴谋论中，农民被认为假装饿了以破坏国家购买粮食。

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

地方政府对饥荒的影响，甚至更高，甚至更多。随着“大跃进”的发展，许多省级领导人开始与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保持一致。地方领导人被迫在做出对自己社区最有利的事情和政治上维护自己的声誉之间做出选择。官员们开始“谴责任何反对派为右派”，广义上将其定义为任何反共主义者。农民们无法公开谈论集体化和国家粮食采购。在地方和官方层面上都存在一种恐惧和指责的文化，对饥荒进行报告和采取行动似乎已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从安徽省与江西省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饥荒中的影响。安徽有一个激进的亲毛政府，由曾经与毛有联系的“独裁者”曾希圣领导。曾坚定地相信“大跃进”，并试图与高级官员建立关系，而不是维持当地利益。他在没有咨询同事的情况下提出农业项目目标，这导致安徽省的农业严重失

败。省委书记，副省长张开凡听到有关安徽发生饥荒的传闻，不同意曾的许多政策。曾向毛泽东报告了张的此类猜测。结果，毛泽东将张清除。当饥荒成为一个危机情况，曾无法在饥荒中报告，因为这将证明他的虚伪。为此，他被形容为"公然的政治激进者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使安徽受损"。

江西遇到的情况几乎与安徽相反。江西领导人公开反对一些大跃进计划，默默地尽量不参与，甚至对毛主义经济采取被动态度。在领导人之间相互合作时，他们还与当地居民一起工作。通过创造一个环境，使大跃进没有得到充分实施，江西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损失最小化"。从这些发现中，学者曼宁和温默尔得出结论，饥荒的严重程度主要归因于省级领导人及其对所在地区的责任。

自然灾害

1958年，黄河发生了明显的区域性洪灾，影响了河南省和山东省的部分地区。据报道，这是自1933年以来黄河最严重的洪水。1958年7月，黄河洪水在1708个村庄中影响了741,000人，淹没了超过304万亩的耕地。7月27日洪水的最大洪流被顺利引导到了渤海；政府派出了超过200万人的救援队，宣布了"水灾胜利"。中国政府防洪中心的发言人于1958年7月27日表示：

今年，我们战胜了大洪水，没有洪流的漫延或大坝的破裂，这确保了庄稼的丰收。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但是政府鼓励报告成功和隐藏失败。因为来自两个省的200万农业工人被命

令离开田野充当救援队，修理河岸而不是照看他们的田地，所以“作物被忽略了，大部分收成是留在田里烂掉”。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弗兰克·迪科特（FrankDikötter）认为，饥荒期间的大多数洪水不是由于异常天气，而是由于大跃进的大规模计划不善和执行不力的灌溉工程。此时，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中国人民正在建设大量的水坝和数千公里的新灌溉渠，以试图将水从潮湿地区转移到遭受干旱的地区。一些工程，例如红旗运河，对灌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研究人员指出，大规模的水力建设工程导致了许多由于饥饿，流行病和溺水而引致的死亡，这导致了饥荒。

但是，关于干旱和洪水在引起大饥荒中的重要性存在分歧。根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发布的数据，1960年的干旱并不少见，与其他年份相比，其严重程度仅被视为“轻度”；它的严重性不如1955年，1963年，1965-1967年等。此外，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上层想要的任何数字”，以夸大自然灾害并减轻官员对饥饿造成的死亡的责任。杨继绳调查了其他来源，包括来自中国350个气象站的非政府气象数据档案，显示——1958-1961年期间的干旱，洪水和温度都属于中国的典型模式。西方学者也指出：

许多外国观察员认为，这些与天气有关的农作物欠收的报道旨在掩盖导致农业表现不佳的政治因素。他们还怀疑，地方官员倾向于夸大此类报道，以获得更多的国家援助或税收减免。

后果

初步掩盖

就地方党领导人而言，他们密谋掩盖不足并重新指责，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职位。

没有人能够挑战毛泽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就像苏联在乌克兰造成的大规模饥荒一样，医生被禁止在死亡证明上将“饥饿”列为死亡原因。这种欺骗绝非罕见。饥荒中的一幅著名宣传相片显示，山东省的中国儿童表面上看似站在一块麦田上，麦丛茂密，显然可以支撑他们的体重。实际上，他们站在隐藏在植物下方的长凳上，“田地”完全由单独移植的茎组成。

文革

1962年1月和1962年2月，“7000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7000多名共产党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刘正式宣布了关于大饥荒起因的结论，而大跃进被中国共产党宣布为“结束”。毛泽东的政策遭到批评。

大跃进和饥荒的失败迫使毛泽东退出了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决策，并将未来的各种责任移交给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和邓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包括诸如“三自一包”之类的政策，该政策允许自由市场和家庭对农业生产的责任。

但是，毛与刘（和邓）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在1963年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6年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刘被指控为叛徒和敌方特工，仅将30％的自然灾害归咎于自然灾害。刘被殴打并拒绝接受糖尿病和肺炎药物治疗；他于1969年去世。另一方面，邓小平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被指控为“资本主义走资派”，并被二次清洗。

改革与思考

1978年12月，邓小平成为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发起了历史性的改革开放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农业和工业体系。直到19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的立场反映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名称，即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自然灾害的结果。在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将名称更改为“三年困难”，并指出饥荒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派运动”的错误，此外还有一些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一些高级中国官员对饥荒发表了看法：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曾经说过：“我们党从不承认错误。如果情况真的很糟，我们只是找到了一些替罪羊，并指责他们，例如林彪和四人帮。如果替罪羊很难发现，我们就归咎于自然灾害，例如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当时有数千万人死亡，这完全是由于党的政治失误造成的。”

薄一波之一，有八位长老和前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副总理曾经说过，“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的人们由于缺乏食物而营养不良，水肿十分普遍，导致在许多农村地区，由于饥饿而大量死亡的人数。据估计，仅在1960年，就有超过1000万人死亡。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一沉重的教训！”

中国以外的研究人员认为，伴随大跃进而进行的大规模机构和政策变化是饥荒的关键因素。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将这场饥荒置于全球背景下，认为缺乏民主是罪魁祸首：“的确，无论多么贫穷，民主国家都从未发生过大饥荒。”他补充说：“很难想象在一个定期进行民意调查并拥有独立新闻报道的国家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那场可怕的灾难中，政府没有受到报纸的压力，报纸受到了控制，没来自缺席的

反对党的任何压力。”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ngry_Ghosts:_Mao%27s_Secret_Famine

饥饿的鬼

《饿鬼：毛的秘密饥荒》是南华早报北京分社社长贝克尔所写的一本书。贝克尔认为，美国媒体准确报道了《大饥荒》，但是当毛泽东的大跃进演变成大饥荒时，左派和共产主义者如埃德加·斯诺，路易·艾利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都对这场可怕的悲剧保持沉默或轻描淡写。贝克尔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毛泽东的高级顾问敢于与他对峙，则悲剧本可以在第一年后避免。

人民公社

毛泽东于1958年宣布，中国将在15年后取代英国（后来将其改为2至3年），而这样做的方法是在乡村和城市建立数千个人民公社，当“家庭作为一个机构”将被抛弃时，中国人将生活在半军事状态。最初，政府许诺其人民将免费提供食物，并在公共食堂中永久地提供大量食物，人民开始吃掉包括种子在内的所有谷物。当粮食产量开始下降时，“在该国许多地区，1959年春节前后，饥饿都来了，弱者和老人开始死亡。”

“《饥饿的鬼魂》是第一本英文书，详细描述了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的大规模饥荒。” 时代文学增刊-理查德·埃德蒙兹（10/25/1996）

“贝克尔先生的那本非凡的书牢固地确立了大跃进和由此带来的饥荒的事实，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暴行之一。”

纽约时报-理查德·伯恩斯坦（02/05/1997）

“在这本有力而重要的书中……贝克尔先生已经很好地开始了填补现代中国历史空白页的工作，这样做既向死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向我们的良心提出了挑战。”纽约时报书评-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

“任何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因为作为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他[贝克尔]进行了数百次采访并研究了许多未出版的文件....。该书...是对中国影响的综合研究。”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he_People%27s_Republic_of_China_(1949%E2%80%9319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1949-1976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经常被历史学家清楚地分为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延续到1978年12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巩固权力和扭转政策的局面。毛泽东时代集中于1950年代初以来的毛泽东社会运动，包括土地改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

1949年10月1日下午3:00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立仪式上的宣告中正式宣布成立新的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期间举行一个阅兵奠基仪式。

1950年代初：社会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一个被一个世纪的外国入侵和内战摧残的土地上。

在1949年至1959年之间，城市和农村社区以及农业和工业都经历了显着增长。毛泽东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建立了集体化组织，并实行了劳改集中营制度。

从经济上讲，该国遵循了苏联的“五年计划”模式，并于1953年至1957年制定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该国经历了转型，生产资料从私人转移到公共实体，并于1955年通过工业国有化，国家以与苏联经济类似的方式控制着经济。

朝鲜战争

成立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陷入了第一次国际冲突。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的北朝鲜部队越过第38平行线，入侵了韩国，并最终向东南部的釜山周界进发。联合国部队在南方一侧发动了战争，而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迫使共产党撤退，提议在1950年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苏联、中国将联合国（以及因此的美国）胜利视为对美国的重大政治胜利；在冷战初期，这种前景被认为是危险的。但是，斯大林不想与美国交战，而让中国承担了在平壤拯救该政权的责任。直到此时，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感到十分反感，并认为仅仅是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6月27日，美国第7舰队被派往台湾海峡，以防止共产党入侵该岛并防止蒋介石企图重新征服大陆。同时，中国警告说，它不会在边界接受美国支持的朝鲜半岛。9月，联合国部队解放汉城后，北京威胁说，韩国军队可以进入朝鲜，但美国不能进入。麦克阿瑟（MacArthur）认为韩国军队太虚弱以致无法自行进攻，对此置之不理。平壤在10月沦陷后，联合国部队进入了战略敏感的鸭绿江地区。作为回应，中国派出了一支名为“人民志愿

军”的部队。中国军队装备不足，但内战经验丰富。此外，它拥有巨大的人力储备。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攻势于10月被推迟，但到1950年圣诞节，彭德怀将军领导的“人民志愿军”迫使联合国撤退至北纬38度平行线。但是，这场战争对中方而言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动员的不仅仅是“志愿人员”，而且由于缺乏现代战争经验和现代军事技术，中国的伤亡人数大大超过了联合国。1951年4月11日，美国第7舰队驱逐舰在中国西南海岸接近汕头港口，这激怒了中国派遣一支由40多艘武装笨拙的舰只组成的舰队，在驱逐舰离开该地区前近五个小时对峙并包围着该驱逐舰，而双方均未通过发起敌对性火力扩大冲突。双方在北纬38度平行线之间断断续续地战斗，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签署为止。接下来的多年中，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任何可能性。同时，中国军队于1950年10月入侵并吞并了西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西藏在名义上都受到皇帝的统治，但在1912年宣布独立。

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于1964年在其核计划596计划中制造了第一枚原子弹。它是第五个成功进行核试验的国家。

1953–1957

朝鲜战争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在内战之后；这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并延缓了战后的重建。结果，毛泽东宣布该国将“向东方倾斜”，这意味着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将成为其主要盟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个月后，毛泽东及其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他们没有受到斯大林的热烈欢迎；他们被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仅仅是一群中国民族主义者。当时，斯大林仍然承认蒋介石的政府，而且不

信任任何不受他直接控制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与毛会晤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说：“毛是什么样的人？他似乎对革命有某种观念，涉及农民，但没有工人。” 最终，沮丧的毛泽东准备回家，但周恩来拒绝未经正式协议就离开。因此，签署了《中苏互助条约》，中国人最终于1950年2月离开。

根据李华宇在《毛泽东与中国经济的斯大林化》一书中的说法，毛泽东被《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短期课程》中光辉的报道所误导（该书由斯大林（Stalin ）授权，讲述或吹嘘了苏联的社会和经济进步），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纲领，建立了“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该纲领是建立在苏联模式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纲领。据报道，毛泽东因与斯大林和苏联在个人和国家层面的对抗、较劲而受到部分驱动。

在1950年代，苏联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援助和培训。许多中国学生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工厂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均基于苏联的设计，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落后的国家，产业很少。1953年，毛泽东告诉印尼大使，除了农产品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出口的。成立了几家共同拥有的中苏公司，但毛泽东认为这些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于1954年悄然解散。

到1956年，毛泽东对国家的日常运转感到无聊，也担心繁文缛节和官僚主义的增长。当年的第八届党代会宣布，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已经建立起来，因此未来几年将致力于休息和巩固。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他最著名的讲话之一，他说：“让一百朵花盛

开，让一百种思想流派抗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百花运动被中共希望通过公开辩论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推广，但许多人把它作为邀请来表达对共产党不屑。许多人开始反对党国统治。毛泽东彻底震惊于这一点，然后发起了反右运动。无数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被清洗，入狱或失踪。直到1970年代，许多人才“平反”。

大跃进

毛泽东的社会和文化计划，包括集体化，在1950年代初期最为流行。然而，中国与新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关系紧张；中苏共产主义学校之间又发现了新矛盾。这种分裂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发展的，当时苏联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谴责斯大林。1956年的“秘密讲话”震惊了共产主义世界。中国拒绝实行去斯大林化，实际上在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中展示了斯大林的大型肖像。毛泽东宣称，尽管有一些过失，但斯大林基本上是一位善良，好心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苏联没有将中国视为平等伙伴。文化差异也加剧了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摩擦。赫鲁晓夫与美国进行和平竞争而不是公开敌对的想法在北京并未引起很好的共鸣。

赫鲁晓夫1958年提出成立中苏联合舰队以对抗美国第7舰队的建议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泽东告诉苏联大使：“如果你想谈论合作，那可以。我们可以在政府，军事，文化和经济事务等领域开展合作。但您可以留下游击队。”次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亲自访华时，毛再次要求他解释联合舰队是什么。毛说，不欢迎苏联人在和平时期向中国派兵，并说：“要认真听。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努力，驱逐了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和其他人。我们

再也不会允许外国人将我们的领土用于其目的。”苏联则认为中国对达赖喇嘛（西藏的精神领袖）太软，未能在与印度的边界争端中支持他们，称有关领土“只是没有人居住的冻土”。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打破了苏联模式，并于1958年宣布了一项旨在迅速提高工农业生产水平的新经济计划“大跃进”。具体到工业生产中，毛泽东宣布要超过英国钢产量，并在农业上建立人民公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中国村庄都被改造成几千人组成的劳动公社；按照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人们可以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中国没有建造很多钢厂，而是大量使用“土法炼钢”。

然而，结果是灾难性的。正常的市场机制被破坏，农业生产落后，人们精疲力竭地生产劣质的，不可出售的商品。由于依赖政府提供和分配粮食和资源，并且由于规划不当而使粮食和资源迅速枯竭，即使在肥沃的农业地区，饥饿也出现了。从1960年到1961年，大跃进期间的拙劣计划，政府煽动的政治运动共同导致饥荒和许多死亡。大量死亡不是由于饥荒造成的，而是被当局杀害或过度劳累致死。根据各种消息来源，死亡人数可能在2000万到4000万人之间。事实证明，“土法炼钢”中在低温下生产的钢是无用的。最后，农民讨厌缺乏隐私和生活的军事化。

大跃进的最大反对者之一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几年前，他在试图将解放军发展成为装备精良的专业战斗部队方面发挥了作用，而毛泽东认为，具有足够革命性的士兵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内战和朝鲜战争期间，军队没有军衔。这种制度在这些冲突中表现不佳，因此在1954年实行了等级制度（模仿苏联）。

在农村旅行时，彭对大跃进的残骸感到震惊。到处都是荒野，到处都是废弃的公社，破烂的农作物和无用的生铁块。此后，他指责毛泽东应对这场灾难负责，并因此被谴责为右派，并被罢免。彭随后在退休生活中遭到羞辱，直到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逮捕并殴打。他在酷刑中幸存下来，但受到永久性伤害，并于1974年去世。在毛死后，彭以极高的荣誉被“平反”。

1959年，当苏联开始限制科技信息向中国的流动时，已经紧张的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争端升级，苏联于1960年8月从中国撤走了所有人员，使许多建筑项目处于休眠状态。同年，苏中两国在国际论坛上开始公开争执。1969年，随着中苏边境冲突，两国元首的关系达到了最低点，当时苏中两国军队在东北边境交战。

文革

大跃进的灾难降低了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甚至削弱了其作为经济计划者的地位。毛泽东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很少有人像彭德怀那样有话语权，但是普遍的共识是，主席的宏伟实验完全失败了。1960年代初，刘少奇主席，党总支书记邓小平，周恩来总理接任党的领导，采取了务实的经济政策，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愿景背道而驰，并解散了公社，试图将经济体系重塑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允许私人手工艺品和街头小贩；农民可以在达到国家生产配额后出售多余的农作物以牟利。毛泽东生活在半退休状态，继续偶尔在公众场合露面，并就各种问题发表意见，但在1961

年至1964年期间，在该国的日常管理中几乎没有发挥积极作用。报纸对主席发表了讽刺的评论，并在过去时经常使用他的名字。邓，周和刘似乎都得出结论说，毛泽东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们会做些实际事情，同时将他用作人民集会的空虚象征。毛泽东对中国的新方向和自己的下放权力不满意，对此越来越恼火。他抱怨说："他们像死祖一样在呼唤我的名字。" 地主和资本家正在重新获得权力。苏联赫鲁晓夫的倒台也使毛泽东担心这最终将成为他的命运。

就外交政策而言，与美国的关系仍然是敌对的。美国仍然坚持认为，国民党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尽管他们夺回大陆的可能性每年都在降低。台湾也占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62年，毛泽东突然变得害怕国民党的入侵。美国大使馆和中国大使馆在波兰华沙举行了会议（因为美国在中国没有大使馆），并向后者保证没有计划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攻大陆。

肯尼迪总统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荒谬的，他计划在第二任期恢复关系。但是他的被暗杀，随后是越南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结束了一切机会。

在1960年代初，与苏联的愤怒辩论一直在持续。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对物质发展的重视会使人民软化，并使他们丧失革命精神。这位苏联领导人反驳说："如果我们向人民承诺的，除了革命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那么，他们只会挠头并说'难道拥有炖牛肉不是更好吗？'"但是，毛的这种敌对情绪大部分是针对赫鲁晓夫本人和之后的人。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黜后，中国试图改善关系。几周后，周恩来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了苏共1917年革命47周年纪念仪式。他们对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阿列克谢·科西金（Alexei Kosygin）感到失望，回来汇报说，他们会否决赫鲁晓夫的一些古怪的政策，但他们无意将时间倒转到斯大林时代。尽管如此，与苏联的关系仍然融洽，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继续派代表参加以后每年的苏共1917年革命周年纪念活动，直至1966年为止。当时（1966年），毛泽东和中共发起和主持了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个11月，一位苏联政治家评论说："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文化的，也不是革命的。"

毛泽东在1963年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开始努力夺回政权，并在1965年盯上了一位剧作家，后者通过舞台剧间接攻击了他。该剧以一位聪明的官员（据称是影射彭德怀）为主人公；他被一个愚蠢的皇帝（据称是影射毛泽东）免职。毛泽东任命了妻子江青（一位文艺界的前演员）为文化大臣，并让她致力于清理封建和资产阶级主题的艺术和文学。林彪协助主席的活动；他在1960年继彭德怀之后担任国防部长。林在1930、1940年代曾是重要的陆军指挥官，但由于身体状况不佳而挣扎，没有参加1950年代朝鲜战争。陆军军衔再次被废除。新的运动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讲是对上一次革命以来未完成的阶级斗争的扩展。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自由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继续统治着社会，其中一些所谓的危险因素存在于政府内部，甚至是共产党的最高层。这一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个部门试图集结民众对另一个领导群体的反对，导致了困扰该国十年的大规模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混乱。1966年8月在北京，穿着军服的学生被称为"红卫兵"，他们穿越全国，消灭资本家和修正主义者。为协助他们，印刷了数百万份《毛主席的精选语录》。这本即将成为世界著名的书，摘录了1930年代至1957年期间毛泽东的所有主要讲话的摘录，但未按时间顺序排列。

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目标之一。邓被剥夺了党员身份，被贴上了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的标签。他写了一篇自我批评，被放逐到乡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再次崛起。刘则远没有那么幸运。毛泽东似乎对他怀有极大的仇恨，他被谴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叛徒，工贼，汉奸”。不幸的刘被关押，慢慢地在肺炎和糖尿病中煎熬。他最终于1969年11月去世，但是直到1974年香港一家报纸报道了他的去世，外界才意识到这一点。

同时，随着教师，党的官员和任何当权者的遭到袭击，红卫兵开始颠覆中国的主要人口中心。1966年底，军队开始进行干预以恢复秩序。进行了战斗，破坏了城市，造成无数人丧生或受伤。毛泽东然后试图克制军队，而红卫兵又回到了狂暴中。事实证明，他的妻子是最恶劣的煽动者之一，她用激烈的演讲刺激了红卫兵。运往越南的运载武器的火车以及军营被洗劫一空，在某些地方，红卫兵分裂成各派，并在街上用机关枪和大炮相互作战。到1967年8月，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在公共场合携带两三本《毛泽东语录》，以免遭到攻击。革命委员会接管了被摧毁的城市政府部门，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治理，并很快与更多的极端青年发生冲突。1949年以前印刷的书籍被摧毁，外国人受到攻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被烧毁。许多寺庙和历史瑰宝被摧毁。周恩来（在毛的允许下）命令部队在一些庙宇和其他古老建筑周围驻扎以保护它们。甚至军队本身也变得分裂，地方军事首长获得了对某些省的控制权；这些省像过去的封建军阀一样统治。年轻人徒步穿越整个广阔的乡村，有时持续数月之久。1967年末，随着中国处于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失败。至此，正规军开始恢复秩序。直到1968年后期，暴力才被完全遏制，但是到那时，许多红卫兵被放逐到乡下，并被贴上“无政府主义者”和“阶级敌人”的标签。他们的一些领导人被审判并被处决。到那时，这些城市还没有运转的政府，也没有公共服务。患病或受伤的人无法接受治疗，因为所有医生都被清洗

了，如果有人死了，尸体也无法掩埋。街道上到处都是无处可去的年轻人。

在这一切之中，毛泽东的人格崇拜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尽管他一直都被崇拜，但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在文革中，各种奇迹都归功于人们阅读他的著作。

1960年代后期，中国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只保留了与几个国家的外交关系。美国因帝国主义而受到谴责，英国因殖民主义而受到谴责，日本因军国主义而受到谴责，而苏联因修正主义而受到谴责。文化大革命震惊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这导致中国将共产主义国家分为三类。古巴，罗马尼亚，朝鲜和北越被归类为"多数是社会主义者，但有一些错误"。苏联，蒙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被列为修正主义者，他们奉行假的社会主义。中国本身和阿尔巴尼亚被视为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失控，超越了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控制局势的能力也随之减弱，他的权威也随之减少。他的主要副手林彪和毛的第三任妻子江青操纵了这些地区的动乱，以在不理会他的某些指示的情况下将毛化为光荣的神坛。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小红书》出版了超过3.5亿册。自从溥仪退位以后，这是第一次有人被称呼为"万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词汇本来是来自于一个老旧的中国传统，专门用于称呼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林彪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他的名字被编入国家和党的宪法，作为毛泽东的指定继任者。

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在北京举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参加1956年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已退职。九大的代表们穿着绿色的军服，还带着各种各样的毛肖像，小红书和其他用具。经济问题大多被忽略，所有重点都放在美化毛泽东身上。林彪被正式任命为继任者，刘少奇被开除党籍。红卫兵也被批判得声名狼藉。但是，毛泽东指出，在几年之内可能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并补充说："我们不要认为，经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文化大革命之后，情况就会好起来；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将要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林彪和四人帮

激进活动在1969年消退，但中国的政治局势开始沿着复杂的派系路线对立。林彪健康状况欠佳，实际上对军队拥有控制权，在权力共享的观念上与毛泽东越来越矛盾。私下里，他对文化大革命并不热心，称其为"无文化革命"，并且反对恢复与美国的关系，而毛泽东和周正准备这样做。1971年9月，他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目的是在乘火车旅行时暗杀毛泽东。在毛泽东明显改道之后，林被告知在上海的活动失败。林随后与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乘坐军用喷气飞机逃跑，并在去往苏联的途中坠毁于蒙古。林的政变和死亡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历史学家仍然无法正确地确定发生了什么事。例如，有理论认为，毛泽东或周恩来总理下令将飞机击落。林的支持者走出国门，大部分去了香港。林的逃亡对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再次面临重新确立继承人的困境。由于过去的失误，毛泽东不愿再任命任何继任者，这只会进一步笼罩政治局势。林彪去世后，他和已故的刘少奇被国家宣传机器变成了两头怪兽，中国的所有弊病都被归咎于他们。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一切思想独立性都被淘汰了。大城市变成了严峻的地方，每个人都穿着蓝色，绿色，白色，黑色或灰色的衣服。禁止装饰，甚至所有自行车都必须漆成黑色。艺术和文化沦落为江青的革命戏剧，电影和歌剧。毛泽东的人格崇拜仍然很突出，尽管在林彪死后被淡化了。1965年，中国拥有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官僚机构，其中大多数在1966-1968年的混乱中被摧毁。北京仅剩下一小部分中央政府。尽管如此，在1972年尼克松访问期间，毛泽东对他说："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国务卿基辛格率领一个秘密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他们没有受到热烈欢迎，他们所住的酒店房间都配备了反美小册子。但是，他们遇到了周恩来，后者谈到了肯尼迪总统想如何与中国建立关系，并说："我们愿意等待。如果这些谈判失败，最终将有另一个肯尼迪或尼克松来。"他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一直冷落和孤立中国；建立关系的任何主动行动都必须来自美国方面。

毛泽东显然已经决定，苏联比美国更具危险性。如上所述，文化大革命导致与莫斯科的关系彻底崩溃。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被称为"新希特勒"，并且在60年代后期，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忽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倾向于国防开支，这是美帝国主义的一种手段，追求一种错误的社会主义形式，并试图使世界在核战争中炸毁。美国也与中国相隔了数千英里的海洋，而苏联的边境线很长，在那里他们部署了部队和核导弹。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现在宣称有权对任何偏离正确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进行干预，这使中国深感忧虑。但是1969年3月，中国东北边境发生冲突，才真正促使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建立联系。

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进行了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并会见了周和毛。这次旅行在共产主义世界引起了一些混乱。苏联不能完全谴责这一点，但他们显然认为美国和中国都在密谋反对他们。朝鲜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原因是美国未能孤立中国并被迫和解），而北越，阿尔巴尼亚和古巴则认为中国通过与敌人谈判而犯了投降性错误。它也对台湾造成挫败感，台湾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不可避免的情况，但由于没有先征询他们的意见而感到沮丧。随着尼克松的访问，大多数反美宣传在中国消失了。美国仍然因帝国主义而受到批评，但没有达到1972年以前的程度。

林标事件发生后，在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批评和解雇的许多官员得到了恢复。毛泽东在1973年8月突然召集了一个党代会。第十届代表大会正式使邓小平恢复了生机。此举是周恩来提出的，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认为邓是"70％正确，30％错误"。林彪也被开除出党。毛泽东曾想利用这段时间来重新思考他的继任者。同时，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与上海革命组织的王洪文、以及上海革委会主席张春桥和宣传作家姚文元，形成了非正式的激进政治联盟；王似乎已经获得了毛泽东的青睐、成为一个可能的继任者；所有这些人都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升到政治局。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

然后，"四人帮"试图瞄准周恩来；他当时患有膀胱癌，无法履行其许多职责。他们于1974年发起了"批判林彪，批判孔子"运动，企图打倒总理。但是，中国人民厌倦了无用的打倒性运动，并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它。1974年底在广州竖起的一面大墙贴显示了越来越不满的迹象，该墙贴抱怨中国没有法治，官员也不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四位作者中的三位随后发表了自我批评。一个人拒绝了自我批评，被放逐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到1973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他的视力一直很迟钝，视力逐渐丧失，并经历了各种心脏，肺部和神经系统问题。江青一直就渴望接管这个国家，但毛泽东并不希望那样做。他曾经说过：“我的妻子不代表我，她的观点也不是我的观点。”

1975年后期，更加务实的党的老官员们与激进分子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以报仇的方式重新出现。“四人帮”试图攻击他们的政治对手，并将他们一网打尽。自从他们企图诽谤受欢迎的周恩来总理失败后，该帮派发起了一场针对新兴邓小平的媒体运动，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严峻的政治挑战。1976年1月，周总理因癌症去世，引发了广泛的哀悼。4月5日，北京市民上演了一个自发的天安门广场示威；这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以纪念死者。这次聚会的真正目的是抗议“四人帮”的镇压政策。警方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将人群驱逐出广场（15年后那里发生规模更大的事件）。四人帮成功说服了身患重病的毛泽东，邓小平应对此事负责。结果，尽管邓小平保留了党员身份，但他却被谴责为走资派，并被剥夺了副总理的职位。他躲藏在广州市，在那里他被当地的军事指挥官庇护，他既不在乎四人帮，也不在乎毛泽东新任命的继任者华国锋。邓知道毛很快就会走了，他只需要等一会儿。

在经历政治风暴的同时，中国也遭受了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正式记录为里氏7.8级；当局拒绝了大量的外国援助。在北京的政治动荡中，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真实意义的地震震撼了超过24万人。一颗陨石也降落在中国西北部，当局告诉人们不要像从前那样相信这些事件是来自天上的征兆。

毛泽东的遗产

1949年至197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被称为“毛时代”。对这一时期的评价，实质上就是对毛泽东的遗产的评价。自毛泽东去世以来，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中都引起了关于他的大量争议。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亡。但是，由于他的管理，似乎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例如，在1949年之前，中国大陆的文盲率为80％，预期寿命仅为35岁。在他去世后，文盲率下降到了7％以下，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30年。此外，从鸦片战争到国共战争结束之前，中国的人口一直稳定在4亿；毛泽东去世后，这个数字猛增了7亿多。支持者认为，在毛泽东政权统治下，中国结束了“屈辱的世纪”，并在国际舞台上恢复了作为大国的地位。毛泽东还对中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工业化，并在其统治期间确保了中国的主权。此外，毛泽东试图废除儒家和封建制度。

毛泽东在思想上比实际更重要。197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是1949年的三倍（但1949年的中国经济规模是1936年的经济规模的十分之一），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获得了一些超级大国的特征，例如：核武器和空间计划；与苏联相比，这个国家还是相当贫穷和落后的国家，更不用说美国，日本或西欧了。文化大革命消灭了1962-1966年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其他批评毛泽东的人指责他不鼓励节育，并通过鼓励群众“不必要的人口增长”来制造不必要的人口膨胀；后来中国领导人以有争议的独生子女政策强行回应。围绕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的意识形态，也被称为毛主义，已被编入中国宪法作为指导思想。在国际上，它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共产主义者，包括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例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秘鲁的光辉道路和尼泊

尔的革命运动。在实践中，除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中国革命起源的传闻外，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内部是无效的。在剩下的那些人中，毛泽东的追随者们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对毛泽东传统的背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Land_Reform

土地改革

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也是中国著名的缩写词汇“土改”，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国共内战后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所开展的运动。活动涉及土地租户大规模杀害地主，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该运动造成的人员伤亡估计数为数百万。就共产党的评价而言，周恩来估计有83万人被杀，毛泽东估计有200万到300万人被杀。

被杀害的人是根据他们的社会阶层来确定的。在毛主义的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30年几乎一直是由阶级引起的大屠杀，并且到改革结束时，地主阶级已基本从中国大陆被淘汰或逃到台湾。到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和四川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已完成。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通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实行被征收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这种

合作将财产权从原地主阶级转移到了中国国家。

起源

在19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有一个短暂的没收土地和再分配的程序；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均等分配的计划；这是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部分实施的。

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认为农村将成为革命的基础。土地改革是中共执行社会平等方案并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农村的关键。与革命前的俄罗斯不同，中国的农民没有与大庄园建立封建奴役关系。他们要么拥有土地，要么租用土地。他们在乡村市场上以现金出售农作物，但当地精英利用与官僚的联系来统治当地社会。当中央政府在19世纪末开始失去控制权，然后在1911年之后解体时，当地的士绅和宗族组织变得更加强大。毛的1927年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张动员贫苦农民开展"斗争"。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拒绝了和平土地改革的主张，认为农民除非参与暴力推翻地主，否则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

大规模屠杀地主

打倒中国地主阶级（1949–1953）

地点　中国

日期　1946-1953年

攻击类型　　大屠杀，阶层屠杀

死亡人数　　830,000 人 – 3,000,000 人

最多7,500,000 （中国共产党数据）

200,000 – 5,000,000（学术估计）

受害人　　　地主，富裕农民

犯罪者　　　中国共产党与激进农民

动机　毛主义，不平等

初期战役（1946-1948）

在1927年随后的几十年中，该党在战略上来回移动。领导人就诸如将要使用的暴力程度等问题进行了斗争；是要吸引还是要攻击大多数耕种土地的中农；或将所有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农民。在中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强调了孙中山的温和的“土地分田”计划；该计划将土地租金限制为农作物的37.5％，而不是重新分配土地。然而，在中国内战爆发时，1946年，毛泽东开始敦促采取激进的政策，动员村民打倒地主阶级，但保护中农的权利，并明确规定富农不是地主。 1946年7月7日指令引发了长达18个月的激烈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所有富农和所有类型的地主财产都将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贫困农民。党的工作队迅速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将人口分为地主，富人，中农，穷人和失地农民。但是，由于工作团队没有让村民参与进来，因此，富农和中农迅速上台。

1947年10月的《土地大纲法》增加了压力。党中央派遣工作队回村，由贫困和失地农民负责，要求取消被称为“封建剥削”的地租，并取消地主地位。工作队动员贫困和失地农民对邻近村庄的主要氏族和家庭采取直接和暴力的行动，以确保家庭忠诚度不会干扰这一运动。在河北南部的一个村庄，一位外国观察员记录说有四人被打死。威廉·欣顿报道说，在他称为长弓的村庄，至少有十多人被打死。

扫荡地主（1949–1953）

根据毛泽东传记作者菲利普·肖特（Philip Short）的说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土地改革“猛烈向左倾斜”，而毛泽东则制定了“不过早纠左”的新指导方针。殴打虽然不是党的正式倡导，但也不被禁止。尽管地主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但那些被冠以“富农”烙印的人受到了中等程度的保护，免受暴力侵害，而处于低端的人则受到了充分保护。因此，毛泽东坚持人民应自己而不是安全机构参与制定《土地改革法》，并杀死压迫他们的地主，这与苏联人民政府的做法大不相同。毛泽东认为，杀死地主的农民将与革命进程永久地联系在一起，而被动的旁观者是不会的。

尚·路易·马戈林（Jean-Louis Margolin）认为，谋杀不是进行土地改革的先决条件，因为在台湾和日本发起的土地改革很少发生暴力。相反，暴力是由于以下事实造成的：土地改革与其说是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因为在改革的几年之内，大多数土地必须归还集体农场），不如说是消灭“农村阶级的敌人”，并因而使得共产党掌握地方的权力。玛格琳（Margolin）观察

到，即使在非常贫穷的村庄（占中国北方的一半）中，没有人有资格成为地主，有些“地主”也被“制造”出来受到迫害。例如，在武功村，有70户（总共387户）从中农转变为富农，使其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些政策并不一定要遵守，这要求选择“几乎每个村庄至少要有一个地主，通常是几个地主，以供公共处决”。一位官员报告说，仅在广西省就有18万至19万名地主被处决；此外，一名天主教学校的老师报告说，其村庄的2.5％被处决。一些被谴责为地主的人被活埋，肢解，勒死或枪杀。在许多村庄，地主的妇女被“重新分配”为农民的小老婆，或被迫嫁给丈夫的迫害者。

估计死亡人数

1949–1953年间处决的死亡人数的估计范围从较低的200,000至800,000，较高的估计值为200万至500万；还有150万至600万被送往“劳改”营地，许多人在那里丧生。菲利普·肖特指出，在这样的估计中，不包括成千上万在“批斗会”中被迫自杀的人；三反/五反运动也发生在同一时间。国外估计死亡人数高达2800万。根据共产党的评估，周恩来估计有830,000人被杀，毛泽东估计有200万至300万人被杀。中南军事和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辉报告说，在中国5000万名地主和富农中，有15％被处决，而25％已被送往劳改营。

地主的报复

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帮助建立了“还乡团”；归国军团进行了针对中共军队的游击战，直到1949年内战结束。

土地再分配

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归集体所有，从而创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0年代中期，大跃进时期的第二次土地改革迫使个体农民加入了集体，而集体又被归为具有中央控制的财产权和平等分配原则的人民公社。就生产而言，该政策通常是失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62年颁布了《六十条》，撤销了这项政策。结果，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划分为三个级别，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归生产团队所有。

经济影响

到1958年，私有制被完全废除，整个中国的家庭被组织成国有的公社。中国领导人要求公社必须为城市生产更多的谷物，并从出口中赚取外汇。这些改革在农民中普遍不受欢迎，通常是通过召集他们参加会议并让他们在这里呆上几天甚至是几周直到他们“自愿”同意加入集体而实施的。

大跃进

在大跃进期间，国家实行了强制性的国家以固定价格购买谷物的体系，以建立饥荒储备并符合与苏联达成的贸易协定的条件。到1957年，税收和强制性购买加在一起占收成的30％，剩余很少。在城市中也实行了定量配给，以遏制“浪费性消费”并鼓励储蓄（这些储蓄被存入国有银行，因此可

用于投资）；尽管可以从国有零售商那里购买食品，但市场价格高于配给的价格。这样做也是以阻止过度消费为名。

在1958年至1960年间，尽管农村地区发生了广泛的饥荒，但中国仍然是粮食的主要净出口国，因为毛泽东努力保持面子并使外界信服他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外援被拒绝了。当日本外相告诉中国外长陈毅愿意提供十万吨小麦时，他被拒绝。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也意识到，在饥荒期间，中国人正在向非洲和古巴出口食品。由于单产大大降低，甚至城市地区的口粮也大大减少。但是，大规模饥荒主要限于农村地区；由于生产统计数据的急剧膨胀，几乎没有谷物可供农民食用。

台湾的土地改革

撤退到台湾后，国民党政府在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的领导下实施了和平的土地改革计划。土地改革法通过资产购买而去除地主阶级，并创造了更多数量的农民；这些农民在国家的帮助下，大幅提升台湾的农业产出。土地改革也取得了成功，因为国民党的成员大多来自中国大陆，因此与其余台湾原住民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联系很少。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_killings_under_communist_regimes

共产主义大屠杀

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权下，发生了许多大规模屠杀事件。死亡估计数差异很大，具体取决于其中包含的死亡定义。大规模杀戮的估计数较高，这是政府对平民犯下的罪行，包括处决，因人为饥饿造成的人口破坏和在强迫驱逐和监禁期间发生的死亡以及强迫劳动造成的死亡。

除了“大规模屠杀”，即用于定义这种杀害的术语还包括“人口大屠杀”，

“ 政治大屠杀”，“ 阶级大屠杀”和“种族大屠杀”。

试图提出一个通用术语

几个不同的术语用于描述故意杀害大量非战斗人员。

一些作者使用以下术语来描述共产党政府单独或整体杀害未武装之平民的大规模杀戮：

大规模杀戮–埃文·史陶布教授将大规模杀戮定义为“杀害某个团体的成员而无意消灭整个团体，或杀害大量没有明确界定团体成员身份的人。” 参考先前的定义，琼·埃斯特万，马西莫·莫雷利和多米尼克·罗纳教授将大规模杀戮定义为“在不对军事力量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包括在受害者基本无力和无助的情况下，杀害了大量人。”

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教授将该术语定义为“故意杀害大量非战斗人员”，其中“大量”被定义为在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至少有50,000例故意死亡。这是该术语最公认的定量最低阈值。他将此定义适用于斯大林的苏联，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和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同时也承认“较小规模的大规模杀戮”似乎也是朝鲜，越南政权，东欧和非洲各个国家实施的。

杰伊·乌尔费尔德（Jay Ulfelder）使用了杀死1,000人的门槛。根据Attiat F. Ott和Sang Hoo Bae的普遍共识，“大规模杀害”是故意杀害许多非战斗人员的行为，但这一数字范围从少至四人到50,000多人不等。Yang Su使用“集体杀戮”一词来分析小于整个国家（可能未达到Valentino阈值）的较小地区的大规模杀戮。

大屠杀-鲁道夫·拉梅尔教授定义的大屠杀是“政府人员根据政府政策或命令行事的故意杀人。”他的定义涵盖了广泛的死亡，包括强迫劳动和集中营受害者；“非官方”私人团体的杀戮；法外简易杀人；以及由于政府的刑事疏忽和其他疏忽而造成的大规模死亡，例如蓄意的饥荒，以及事实上的政府（例如内战中的军阀或叛乱分子）的杀戮。该定义涵盖了任何政府对任何数量的人的谋杀，并且已被用于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谋杀。

共产主义大屠杀–一些国家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使用了共产主义大屠杀一词。史蒂芬Rosefielde教授定义了共产党员“平时状态杀戮”，同时指出，它“可能定义为包括所有谋杀（经过司法制裁的恐怖执行），过失杀人罪（致命的强迫劳动和大清洗），重罪过失杀人（恐怖饥饿），以及所有后续重罪状态发生的屠杀。”

镇压–斯蒂芬·惠特克罗夫特教授（Stephen Wheatcroft）指出，在苏联的情况下，“恐怖”，“清洗”和“镇压”等术语是指同一事件。他认为，最中立的用语是“镇压”和“大规模杀戮”，尽管在俄语中，广泛的镇压概念通常被认为包括大规模杀戮，有时被认为是大规模杀戮的代名词，在其他语言中则不是这种情况。

危害人类罪–克拉斯·葛兰·卡尔森（Klas-GöranKarlsson）教授使用危害人类罪一词，其中包括“直接大规模杀害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分子以及强迫驱逐和强迫劳动”。卡尔斯（Karlsson）承认，从政权针对其本国公民的意义上来说，该词可能会误导他人，但他认为，该词可作为广泛的法律用语，强调对平民的袭击，因为这些罪行贬低了整个人类。历史学家雅克·塞梅林（JacquesSémelin）和迈克尔·曼（ Michael Mann）教授相信当谈到共产主义政权的暴力时，“危害人类罪”比“种族灭绝”或“杀人罪”更合适。

估计

根据克拉斯·戈兰·卡尔森（Klas-GöranKarlsson）的说法，对共产主义政权受害者人数的讨论“极为广泛，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偏见”。鲁道夫·拉默尔（Rudolph Rummel）和马克·布拉德利（Mark Bradley）写道，尽管确切的数字有争议，但数量级却没有。尽管任何估计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杀戮总数的尝试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义，但尝试已进行：

1978年，记者托德·库尔伯森（Todd Culbertson）在《里士满新闻领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重新发表在《人事》上，他在文章中说：“ 有效证据表明，也许有1亿人被共产主义者摧毁；铁的不透明帘子阻止了更明确的真相。”

1985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和苏联事务主任John Lenczowski在《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被共产主义政权谋杀的人数估计在6000万至1亿5千万人之间；根据最近的学术研究，较高的数字可能更准确。"

1993年，布热津斯基，卡特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写道，"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所摧毁的生命差不多有60,000,000。"

1994年，鲁道夫·拉梅尔的书估计，共产党从1900年到1987年杀了1亿1千万人，这个总数不包括中国1958至1961年大饥荒的死亡。

1997年，史蒂芬·考特瓦（StéphaneCourtois）《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 Book of Communism）所作的介绍给出了"粗略的估算，基于非官方的估计"，接近1亿人被杀。Courtois列出的数字总计有9,436万丧生。

2005年，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表示，仅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被共产主义政权杀害的非战斗人员人数就有2100万至7000万人。瓦伦蒂诺（Valentino ）援引Rummel等人的话说，"归因于共产主义政权的死亡人数高达1.1亿。"

2005年，已退休的鲁道夫·鲁梅尔（Rudolph Rummel），由于从Jung Chang和乔恩·哈利代（Jon Halliday）的工作中获得了关于毛泽东在大饥荒中之罪恶的信息，他将共产主义大屠杀的总数从1900年至1999年从1.1亿

增加到了约1.48亿，包括估计有3800万人饥荒死亡。

2010年，史蒂文·罗斯菲尔德（Steven Rosefielde）在《红色大屠杀》中写道，共产主义的内部矛盾“致死了”大约6000万人，也许还有数千万。

2011年，马修·怀特（Matthew White）发表了大约7000万人“在共产主义政权下死于死刑，劳教所，饥荒，种族清洗和绝望的逃亡”，其中不包括在战争中丧生的人。

2014年，朱莉娅·史特劳斯（Julia Strauss）写道，虽然就学术上的共识开始，即苏联约有2千万人丧生，柬埔寨有2-3百万人丧生，但中国的数字尚无共识。

2016年，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持不同政见者博客，努力使用1976年至2010年的数据来源来编制估算范围，并得出结论，整个范围“从42,870,000到161,990,000”被杀死，其中1亿是最常被引用的数字。

2017年，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教授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写道，共产主义在1917年至2017年期间至少杀害了6500万人：“共产主义故意杀害了大批人；还有更多受害者因饥饿而死于残酷的社会工程项目。”

对某些估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i）当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大错误时，估计是基于稀疏和不完整的数据；（ii）一些批评家说，这些数字偏向更高的可能价值；和（iii）一些批评家认为，不应计算共产主义政府造成的大饥荒和其他人为饥荒的受害者。

意识形态

克拉斯·葛兰·卡尔森（Klas-GöranKarlsson）写道："意识形态是思想体系，不能独立地犯罪。但是，将自己定义为共产主义者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名义犯罪" 鲁道夫·鲁梅尔（Rudolph Rummel），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理查德·派派斯（ Richard Pipes）和约翰·格雷（ John Gray）[50]等学者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大屠杀的重要诱因。《共产主义黑皮书》指出："共产党政权将大规模犯罪变成了成熟的政府体系" ，同时补充说，这种犯罪在于意识形态层面，而不仅仅是国家实践层面。

马克·布拉德利教授写道，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经常与人权处于紧张状态，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跟随卡尔·马克思的领导，拒绝了"启蒙时代不可剥夺的个人政治和公民权利"，而主张"集体经济和社会权利"。Christopher J.芬利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使得没有任何明确的限制原则的暴力行为被公然合法化，因为它拒绝道德和伦理规范作为统治阶级的结构和状态；这使得革命者在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犯下残暴罪行，并相信无产阶级所建立的新的道德制度将可追溯地免除他们的罪行。鲁斯塔姆·辛格指出，卡尔·马克思曾提到和平革命的可能性，但1848年革命失败后，强调暴力革命和"需要革命性的恐怖"。

文学史学家乔治·沃森（George Watson）引用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于1849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匈牙利斗争》的文章（该文章发表在马克思的《新莱茵河杂志》上），并指出恩格斯等人的著作表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出于隐性的原因而要求人群灭绝；在它的主张中，封建制度既然已经在发达国家中被资本主义所取代了，所以，封建制度就更应当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工人革命、社会主义时代的封建残余，使得整个国家都被拖了后腿，因此，那些封建残余势力必须被杀死；正如恩格斯所说，它们是人群中的垃圾，只适合历史的粪堆。”

鲁梅尔认为，共产主义政权的杀戮最好地被解释为绝对权力与马克思主义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的结果。鲁梅尔指出：“共产主义就像狂热的邪教。它有教义和阐释者。它有‘天堂’，并且有达到它的适当举止。它对信仰具有吸引力，并且对非信徒进行讨伐；使这种世俗宗教如此致命的原因是，它夺取了国家的所有武力和胁迫手段，并立即将其用于摧毁或控制一切独立的权力来源，例如教会，专业人士，私营企业，学校和家庭。”

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将乌托邦的建设视为“一场针对贫困，剥削，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战争”。为了更大的利益，就像在一场真正的战争中一样，人们被杀害了。因此，这场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战争有其必要的敌人伤亡，包括被卷入“战斗”的宗教神职人员，资产阶级，资本家，渣滓，坏蛋，反革命分子，右派，暴君，富人，地主和非战斗人员。对于许多共产党员来说，共产主义的事业足以证明所有杀戮都是正当的。”

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写道，共产党人选择了大规模杀戮战略，以经济方式处置大量人口，——“这种速度和规模的社会变革与

大规模杀戮有关，这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种变化造成的大规模社会错位往往导致经济崩溃，流行病，最重要的是广泛的饥荒。[...]共产主义政权致力于社会的根本变革的第二个原因已与大规模杀戮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革命性变革与他们大部分人口的根本利益无休止地发生了冲突。若没有极其强烈的恐吓与逼迫，很少有人愿意接受如此激烈程度的社会生活变革。”根据杰克斯·塞米林，“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制度最终摧毁本国人民，不是因为他们计划要消灭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从上到下重组社会团体”。

丹尼尔·奇罗特（Daniel Chirot）和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写道，尤其是在斯大林的苏联，毛泽东的中国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共产党人狂热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残酷暴力运动可以鼓舞共产主义领导人，使他们的敌人“不被视为人，而是被视为在历史意义上、客观意义上的谬误反动者”。此外，如果事件未能按预期进行，那是因为阶级敌人，外国间谍和破坏分子，或者最糟糕的是，内部叛徒破坏了该计划。共产党人不会承认愿景本身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反革命力量的屈服。

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写道，共产党员“是以意识形态为驱动力的；他们相信，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必须鼓动起社会主义热心。杀人行为通常很普遍，基层官员热衷于超过配额地进行杀戮。”据弗拉基米尔·蒂斯曼努，“在苏联，中国，古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某些社会群体是不可挽回的敌人，因此要理所应当地被谋杀。”

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Bellamy）写道，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首先开发和应用了针对目标群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府下的选择性人群灭绝"，但"在冷战期间屠杀大量平民的每个共产主义政权都建立了自己的特色"。马丁·肖（Martin Shaw）写道："民族主义思想是共产主义国家多次大规模杀戮的核心"，首先是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学说"，然后是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杀戮，以民族解放的名义。

政治制度

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断言："列宁主义对一党制国家的信仰无一例外是每个共产主义政权的特征"，并且"布尔什维克在每次共产主义革命中都反复使用暴力。" 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和Cheka创始人Felix Dzerzhinsky所说的短语已遍布世界各地。她指出，直到1976年，Mengistu Haile Mariam才在埃塞俄比亚发动了红色恐怖活动。列宁对他在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同事说："如果我们不准备射杀破坏分子和白俄卫队，那算是什么革命？"

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强调，斯大林的清洗与列宁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但却是列宁建立的制度的自然结果；列宁亲自下令杀死当地的阶级敌人。佩雷斯特里卡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后来担任政治压迫受害者委员会主席，对此做了详尽的阐述，他说："事实是，在惩罚性行动中，斯大林没有使用过任何列宁所未曾使用过的手段：处决，劫持人质，集中营以及其他所有活动。" 历史学家罗伯特·盖拉特利对此同意，并说："换句话说，斯大林很少提出列宁还没有介绍或思考过的东西。"

罗克福德学院的斯蒂芬·希克斯（Stephen Hicks）将这些20世纪社会主义统治的暴力特征归因于这些集体主义政权放弃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公民社会价值观的捍卫。希克斯写道："在实践中，每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着良好的人道记录，因为它们大体上尊重权利和自由，使人们有可能实现富有成果和有意义的生活"，而在社会主义中，"实践与时间一再地证明了，共产主义比二十世纪之前最糟糕的独裁政权更加残酷。每个社会主义政权都沦为独裁政权，开始大规模杀害人民。"

埃里克·D·韦茨（Eric D. Weitz）表示，共产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杀戮是法治失败的自然结果，这在20世纪的社会动荡时期很常见。对于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大屠杀，"人群灭绝发生在极端的社会危机时刻，通常是由政权的政策所引起的。" 它们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政治决定的结果。史蒂芬·罗斯菲尔德（Steven Rosefielde）写道，共产主义统治者必须在改变路线和"恐怖命令"之间做出选择，而且往往选择后者。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缺乏制度化的权威法治结构意味着集中控制和党派之间的混乱是造成杀戮的因素。

领导人

马修·克兰（Matthew Krain）教授指出，许多学者指出，革命和内战为激进的领导人和意识形态提供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也为国家大规模屠杀提供了前提。Nam Kyu Kim教授写道，排他性意识形态对于解释大规模杀戮至关重要，但革命领导人的组织能力和个人特征，包括他们对风险和暴力的态

度，也很重要。革命除了为新领导人开辟政治机会以消灭其政治对手外，革命还带来了更倾向于对平民实施大规模暴力行为的权力领袖，以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并得到加强。种族灭绝学者亚当·琼斯（ Adam Jones）指出，俄罗斯内战对斯大林等领导人的出现非常有影响力，并且也使人们习惯了“严厉，残酷，恐怖”。马丁·马利亚（ Martin Malia）称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条件”对理解共产主义暴力很重要，尽管不是其来源。

历史学家海伦·拉帕波特（Helen Rappaport）将尼古拉·叶佐夫（Nikolay Yezhov）（在大清洗期间负责NKVD的官员）形容为身体虚弱的“情报头子”和“心胸狭隘的政客”；他通过病态虐待和残酷恐怖来弥补自己身体矮小的不足。 俄罗斯和世界历史学者约翰·汤普森（John M. Thompson）将个人责任直接放在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身上。根据他的说法，“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只有部分归因于斯大林本人的心态不佳、病态残酷、极端的偏执狂、不安全心理，才有道理。尽管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上建立了专政，但他面对一切人都深深充满怀疑和戒心；面对敌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斯大林成了一个饱受困扰、而又凶残暴虐的人。”

帕勃罗·蒙塔涅斯（Pablo Montagnes）和史蒂芬·沃尔顿（Stephane Wolton）教授认为，苏联和中国的清洗活动可归因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主义者”领导；他们残暴行动的主要动机是，清洗那些他们所认为的敌人，并时刻准备清洗那些被清洗者们的替代者。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Žižek）认为：“毛泽东认为人的生命是可以随意被牺牲的；这源自于毛的‘世界观’中对于人生命的看法”。

发生大屠杀的国家

苏联

亚当·琼斯（Adam Jones）声称：“在人类经历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记录可以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至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去世，苏联采取的暴力行为相提并论。”琼斯指出，这方面的例外是红色高棉（相对而言）和毛泽东在中国的统治（绝对而言）。

罗伯特·康奎特（Robert Conquest）在2007年修订的《大恐怖》 一书中估计，尽管确切数字永远无法确定，但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造成了至少1500万人死亡。

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对苏联历史的不同时期做出单独的估计，其死亡估计值从600万（斯大林时期）到810万（1937年结束）到2000万不等。若考虑1917年至1987年的整体时间，则增至6100万。

红色恐怖

红色恐怖是1918年俄国内战开始后布尔什维克实行政治镇压和处决的一个

时期。在此期间，政治警察（Cheka）处决了数以万计的“人民敌人”。”许多受害者被围捕为“资产阶级人质”，随时处决，以报复任何所谓的反革命挑衅。唐纳德·雷菲尔德教授说：“仅在克朗施塔特和坦波夫的叛乱之后的镇压行动就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处决。”许多东正教神职人员也被杀害。

根据尼古拉斯·沃斯（Nicolas Werth）的说法，去哥萨克化政策等于苏联领导人试图“消灭，灭绝和驱逐整个领土的人口”。在1919年前几个月，大约10,000至12,000名哥萨克人被处决，在他们的村庄被夷为平地之后，更多人被驱逐出境。根据历史学家迈克尔·科特（Michael Kort ）的说法：“在1919年和1920年之间，在大约150万唐·哥萨克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估计杀死或驱逐了30万至50万。”

约瑟夫·斯大林

苏联和共产主义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激烈争论了斯大林统治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在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档案启示之前，一些历史学家估计，被斯大林政权杀害的人数为2000万或以上。

苏联解体后，苏联档案面世；包含在斯大林领导下大约80万名囚犯执行的官方记录，在古拉格大约170万人死亡，39万人死于一些富农强制搬迁；这些类别中总共约有300万正式记录的受害者。然而，古拉格死亡的苏联官方文件被广泛认为是不够的。Golfo Alexopoulos，Anne Applebaum，Oleg Khlevniuk和Michael Ellman写道，政府经常在囚犯快死前释放他们，以避

免正式计数。J. Arch Getty等人于1993年对档案数据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从1934年到1953年，古拉格（Gulag）共有1,053,829人死亡。随后，史蒂文·罗斯菲尔德（Steven Rosefielde）断言，鉴于更完整的档案证据，这一数字必须增加19.4%，达到1,258,537，这是对古拉格的最佳估计。考虑到过高的死亡率，从1929年到1953年的死亡人数为160万人。Alexopolous估计在古拉格（Gulag）被释放后不久死亡的人的总数更高，至少为600万。

根据历史学家史蒂芬·G·惠特克罗夫特（Stephen G. Wheatcroft）的说法，斯大林的政权可被指控造成约100万人的“故意死亡”。Wheatcroft将所有饥荒死亡排除为“有目的的死亡”。其他人则认为，斯大林政权的某些行动，不仅是大屠杀期间的行动，而且还有针对特定种族群体的去库拉克化和有针对性的运动，至少在其宽松的定义中，可以将其视为种族灭绝。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主义造成600万人直接死亡；直接与间接死亡人数总计900万人，其中包括因驱逐出境，饥饿和古拉格（Gulag）死亡。迈克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将斯大林主义政权造成的约300万人死亡归咎于饥荒，疾病和战争造成的过高死亡率。目前的几位学者，其中包括斯大林传记作家西蒙·塞巴格·蒙特菲奥雷，苏联/俄罗斯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和耶鲁大学“共产主义年鉴”系列的主编乔纳森·布伦特，仍然估计斯大林的死亡人数约为2000万。

少数民族的大规模驱逐

在约瑟夫·斯大林统治期间，苏联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驱逐，这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种族地图。驱逐出境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通常

是在牛车上；成千上万的被驱逐者在途中丧生。一些专家估计，在某些情况下，被驱逐出境的死亡比例可能高达三分之一。

1932-1933年的苏联饥荒

在苏联内部，强制性的农业政策变化（集体化），没收谷物和干旱导致了1932–1933年的苏联饥荒；这发生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地区和哈萨克斯坦。饥荒在乌克兰的SSR中最为严重，经常被称为大饥荒。饥荒受害者的很大一部分（330万至750万人）是乌克兰人。在哈萨克灾难中，有130万哈萨克人（约占总人口的38％）死亡。许多学者说，造成饥荒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可能是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崛起的一种攻击，因此可能属于种族灭绝的法律定义。

饥荒被乌克兰和其他国家政府正式确认为种族灭绝。欧洲委员会议会在一项决议草案中宣布，饥荒是由“苏联政权的残酷而蓄意的行动和政策”引起的，并造成了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和俄罗斯“数百万无辜人民的死亡”。相对于其人口，哈萨克斯坦受到的影响最大。

大清洗

斯大林试图巩固自己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地位的尝试导致了拘留和处决的升级，在1937年至1938年达到高潮（有时被称为“叶热夫舍纳时代”或“叶热夫

时代”），并一直持续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约有70万人被枪杀。其他人在“调查拘留”中和古拉格，挨饿，疾病，暴晒，劳累过度，遭受殴打和酷刑。

逮捕通常是根据反革命法律作出的，其中包括未举报叛国行为以及1937年增加的一项关于为履行职责者的修正案。在1936年10月至1938年11月，NKVD国家安全局调查的案件中，至少有171万人被捕，有72.4万人被处决。现代历史研究估计，在1937年至1938年期间，镇压死亡的总数为950,000-1,200,000。这些数字考虑到官方档案数据的不完整，包括该期间的死刑和古拉格死亡。“kulaks”受害者及其家人占受害者的大多数，有669,929人被捕，有376,202人被处决。

NKVD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家行动”，总共逮捕了350,000人，并处决了247,157人。这些行动中，针对Polska Organizacja Wojskowa成员的波兰行动似乎是最大的行动，有14万人被捕和111,000处死。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Nikolaevich Yakovlev）引用教会的文件，估计这段时间有10万多名神父，僧侣和尼姑被处决。

在1937年夏季和秋季，斯大林派遣NKVD特工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并设计了蒙古大恐怖，其中约有22,000 或35,000 人被处决。大约有18,000名受害者是佛教喇嘛。

在白俄罗斯，1988年在Kurapaty发现了1937年至1941年被NKVD杀害的数千名平民的万人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谋杀案

苏联在1939年9月入侵波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队开始去除被征服的领土中的“苏联敌对分子”。NKVD系统地实施酷刑，经常导致死亡。根据波兰国家纪念学会的说法，由于苏联在战争期间的镇压，有15万波兰公民丧生。最臭名昭著的屠杀发生在1940年春天，当时NKVD在被称为“卡廷大屠杀”的事件中处决了约21,857名波兰战俘和知识分子领袖。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之后，还执行了处决。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始阶段，NKVD和红军 附属单位从成千上万的人中杀害了囚犯和政治对手，然后逃离了不断逼近的轴心国德国部队。相关地区已经建设了纪念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学家之间普遍达成共识，即毛泽东掌权后，他的政策和政治清洗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数千万人的死亡。根据苏维埃的经验，毛泽东认为，为了建立一个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暴力是必要的，因此，他计划并大规模实施了暴力。

镇压反革命运动

毛泽东领导下的第一次大规模杀戮是在他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发生的。在1948年发表的官方研究材料中，毛泽东设想“必须消灭十分之一的农民”（约5000万），以促进土地改革。据信，在毛的土地改革中被杀的确切人数较低，但至少有一百万人被杀。镇压反革命分子主要是针对前国民党官员和涉嫌不忠的知识分子，至少有712,000人被处决，1,290,000人被监禁劳教所。

大跃进与中国大饥荒

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声称，大跃进是造成中国大饥荒的原因。在较早的运动中被标记为“黑分子”的人（宗教领袖，右派和富农）死亡人数最多，因为他们在分配食物方面的优先次序最低。历史学家弗兰克·迪科特写道：“强迫，恐怖和有计划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基础”，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Dikötter估计，在此期间，至少有250万人被立即杀害或折磨致死。他对地方和省级中国档案馆的研究表明，死亡人数至少为4500万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该政党非常清楚自己正在饿死自己的人民。”1959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毛泽东下令从农村采购所有谷物的三分之一，他说：“当吃不饱的时候，人会饿死；最好让一半人直接饿死；人们死了，以便另一半可以吃饱。”鉴于毛的罪魁祸首的其他证据，鲁梅尔将被大饥荒杀死的人加到毛所杀死之人的总人数当中；毛共造成7700万人死亡。

西藏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中的让·路易斯·马戈林（Jean-Louis Margolin）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人对藏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行动。玛格琳指出，西藏的屠杀比中国的屠杀比例更高；“由于涉及的人数众多，因此可以合理地说是灭绝种族性质的屠杀。” 按照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藏人不仅被射杀，而且被殴打致死，钉死，被活活烧死，淹死，肢解，饿死，勒死，绞死，煮死，活埋死，斩首死。”专门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亚当·琼斯（Adam Jones）指出，在1959年藏人起义之后，中国批准了反对反动派的斗争，其间“共产党干部谴责，折磨并经常处决人民的敌人”。这些行动政策导致约600万总人口中的92,000人死亡。琼斯强调说，这些死亡不仅被视为种族灭绝，而且还可以被视为“精英灭绝”，意思是“针对藏族人口中受过良好教育和领导才能的人群”。帕特里克·法兰西伦敦，自由西藏运动的前任负责人写道，自由西藏运动和其他团体声称，自1950年以来，共有120万西藏人被中国人杀害，但他在达兰萨拉检查档案后，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支持那个数字。” Patrick French说，不太可能知道一个可靠的替代数字，但他估计，使用历史学家沃伦·史密斯（Warren Smith）的方法，至少有多达五十万的西藏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直接结果”而死亡。

文革

汉学家Roderick MacFarquhar和Michael Schoenhals估计，文化大革命

中，仅在中国农村，就发生了75万至150万人的被杀害事件。在北京，毛的红卫兵虐待和杀死被视为革命敌人的人们。1966年8月，学生们在北京西部谋杀了100多名老师。

Yang Su写道，毛泽东政府使用人为和任意的标准指定了阶级敌人。芬克尔和施特劳斯估计高达300万人“由他们的邻居集体杀戮或在斗争集会中被杀害。”

天安门事件

尚·路易·马戈林（Jean-Louis Margolin）说，在邓小平领导下，1989年他的政府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游行过程中，至少有1000人在北京被杀害，另外还有数百人被处决。据路易莎·林（Louisa Lim）2014年说，在中国，一个名为“天安门母亲”的遇难者亲属组织已经确认了200多名遇难者的身份。

柬埔寨

柬埔寨内战结束后，1975年至1979年，在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期间，许多人被杀害。

社会学家马丁·肖（Martin Shaw）将柬埔寨的种族灭绝描述为“冷战时代最纯正的种族灭绝”。柬埔寨种族灭绝的人口统计研究结果得出结论，从1975年至1979年，全国死亡人数为1,671,000至1,871,000，占柬埔寨总人口的21％至24％。根据本·基尔南（Ben Kiernan ）的说法，具体死于死刑的人数仍然未知，因为许多受害者死于饥饿，疾病和劳累过度。柬埔寨文献中心研究员Craig Etcheson表明死亡人数在200万到250万人之间，“最有可能”的数字是220万人。在花费了五年时间研究了大约20,000个墓地之后，他得出结论说：“这些万人坑包含1,112,829名被处决的受害者的遗体。” 法国人口学家Marek Sliwinski进行的一项研究计算出，在1975年的柬埔寨780万人中，红色高棉统治下的非自然死亡人数略少于200万，其中33.5％的柬埔寨男性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死亡，而柬埔寨女性的死亡比例为15.7％ 。根据2009年的学术消息，在23,745个万人坑中发现的可疑死刑受害者人数估计为130万。种族灭绝期间，死刑执行占死亡总数的大约60％，其他受害者则死于饥饿或疾病。

种族灭绝学者海伦·费因（Helen Fein）指出，红色高棉政权的仇外意识形态与“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民族社会主义现象”或法西斯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更相似。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解释说，红色高棉是仇外的，因为他们认为红色高棉是“能够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一个真实的共产主义者”。史蒂芬·罗斯菲尔德（Steven Rosefielde）声称，按人口比例计算，波尔布特民主柬埔寨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中最致命的，主要是因为它“缺乏可行的生产核心”，并且“未能为大规模谋杀设定界限”。

其他国家

芭芭拉·哈夫（Barbara Harff）和泰德·古尔（Ted Gurr）写道：“战后时期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上台的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虽然规模迥异，但都犯下了一个或多个政治屠杀罪行。”根据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 ）的说法，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东德等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也有可能曾经发生大规模屠杀，其规模小于其在5年内杀死50,000人的标准。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根据瓦伦蒂诺（Valentino）的说法，现有证据表明，自1944年起，保加利亚有50,000至100,000人被杀，这是农业集体化和政治镇压运动的一部分，尽管没有足够的文件做出明确的判断。

东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去纳粹化立即在被占领的德国和纳粹吞并的地区开始。在苏联占领区，NKVD在通常被废弃的集中营中建立了监狱营地，他们用它们来关押据称的纳粹分子和纳粹德国官员以及一些地主和普鲁士的容克斯人。根据苏联内政部1990年发布的文件和数据，总共拘留了123,000名德国人和35,000名其他国家的公民。在这些囚犯中，共有786人被枪杀，有43,035人死于各种原因。大多数死亡不是直接杀人，而是由痢疾和结核病暴发引起的。饥饿造成的死亡也大量发生，特别是从1946年末到1947年初，但这些死亡似乎不是故意杀人，因为苏联占领区普遍存在粮食短缺。

1961年，东德竖立起柏林墙。尽管有动机和被批准的旅客可以穿越东德和西德，但成千上万的东德人还是试图通过非法越过隔离墙而叛逃。在柏林墙的存在期间（1961年至1989年），有136至227人被柏林墙的警卫杀死。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据瓦伦蒂诺说，从1945年开始，由于农业集体化和政治镇压，罗马尼亚有60,000至300,000人被杀。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托血腥镇压反对者。多米尼克·麦克高德里克（Dominic McGoldrick）写道，铁托是“高度集中和压迫性”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在南斯拉夫发挥了巨大的权力；他的独裁统治是通过精心制作的官僚机构来执行的；这种官僚机构经常压制人权。埃利奥特·比哈尔（Eliott Behar）说：“铁托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警察国家”。根据大卫·梅茨（David Mates ）的说法，在苏联以外，南斯拉夫的政治犯比东欧其他所有国家的政治犯还要多。铁托的秘密警察仿照苏联克格勃。他们经常法外行事，受害者包括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

朝鲜

根据Rummel的说法，从1948年到1987年，强迫劳动，处决和集中营导致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100万人死亡。其他人估计，仅在朝鲜集中营，就有40万人死亡。营地发生了广泛的暴行，包括强迫堕胎，杀婴和酷刑。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Thomas Buergenthal告诉《华盛顿邮报》（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作者之一，也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名儿童幸存者）：“［朝鲜]难民营中的条件比我年轻时在纳粹难民营中、以及我在人权领域长期职业生涯中所看到和经历的情况，更加糟糕，甚至更糟得多。”皮埃尔·里古洛特（Pierre Rigoulot）估计有100,000人被处决，集中营和奴隶劳动造成150万人死亡，饥荒造成500,000人死亡。

饥荒，夺去多达一百万人的生命。2010年，史蒂芬·罗斯菲尔德（Steven Rosefielde）表示，“金大屠杀”在朝鲜仍然存在，因为金（Kim Jong Il）“拒绝放弃大规模杀戮”。亚当·琼斯（Adam Jones）引用了记者贾斯珀·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说法，即饥荒是由于对食品的政治操纵而造成的大规模杀戮或种族灭绝。根据北朝鲜2008年的人口普查估算，由于1990年代北朝鲜的饥荒，造成240,000至420,000例额外死亡；饥荒过后，由于生活条件恶劣，2008年朝鲜人口减少了600,000至850,000。

越南民主共和国

瓦伦蒂诺（Valentino）将8万至20万人的死亡归因于越南北部和南部的“共产主义大屠杀”。

根据基于越南和匈牙利档案证据的学术研究，在1953年至1956年的北越土地改革期间，多达15,000名可疑的地主被处决。北越领导人事先计划杀戮0.1％越南北部的人口，把他们当作“反动分子或邪恶地主”，尽管这一比例在实践中可能会有所不同。Vu Tuong指出，北越土地改革期间的处决比例与1949年至1952年中国土地改革期间的处决比例大致相同。

古巴

根据Jay Ulfelder和Benjamin Valentino的研究，在1959年和1970年之间的政治镇压活动中，5000至8335名非战斗人员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政府杀害。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1979年入侵后，苏维埃建立了傀儡的巴巴拉克·卡马尔（Babrak Karmal）政府。到1987年，该国约80％的领土都没有受到亲共政府和支持苏军的永久控制，也没有受到武装反对派的永久控制。为了达到平衡，苏联采用了“焦土”政策和“移民种族灭绝”相结合的策略。苏联人有计划地烧毁了农作物并摧毁了叛乱省的村庄，并通过报复轰炸涉嫌藏匿或支持抵抗力量的整

个村庄，试图迫使当地居民迁往苏联控制的领土，从而剥夺了武装反对派的支持力量。瓦伦蒂诺（Valentino）将1978年至1989年之间的950,000到1，280,000平民死亡归因于苏联入侵和占领该国，主要是因为反游击大规模杀戮。到1990年代初，阿富汗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逃离了阿富汗。M.哈桑Kakar说，“阿富汗人是由一个超级大国种族灭绝的最新受害者之一。”

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大赦国际估计，在1977年和1978年的埃塞俄比亚红色恐怖期间有50万人丧生。在恐怖期间，成群的人被放进教堂，然后被焚毁，妇女遭受士兵蓄意强奸。拯救儿童基金报道的红色恐怖，受害者不仅包括成年人，还有1000个或更多的孩子，大多是11岁和十三岁，其尸体被留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大街小巷之间。埃塞俄比亚独裁者Mengistu Haile Mariam本人据称赤手杀死了政治对手。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iticism_of_communist_party_rule

共产党统治所受的批评

（选摘）

共产主义国家政府的行动受到了整个政治领域的批评。评论家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导致极权主义，政治压迫，人权限制，不良的经济表现以及文化和艺术审查制度。西方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批评也基于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他们认为国家所有权和计划经济特征、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导致经济停滞和短缺经济。执政

的共产党也受到国内异议的挑战。

几位作者指出，平等与经济正义的官方政策宣传目标，与共产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以牺牲人口为代价而兴旺的新阶级的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在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Havel）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作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而幻灭的前共产主义者如米洛万·西拉斯（MilovanĐilas）的作品也获得了国际知名度；他们谴责了在共产党统治下出现的新阶级或nomenklatura体系。人们对其社会经济性质进行了广泛的辩论，被不同地称为官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或一种完全独特的生产方式。

反共主义者和右翼评论家特别批评了共产党的统治。由于压制和杀害政治持不同政见者和社会阶级（所谓的“人民的敌人”），宗教迫害，种族清洗，政治清洗，强迫集体化，和在集中营中使用强迫劳动，共产党的统治被批评为专制或被指控为极权。在柬埔寨，中国，苏联，波兰和乌克兰，共产党的统治也被指控犯有种族（人群）灭绝行为。一些学者提出了对共产党统治的更为细致入微的分析。

背景和概述

经过俄国革命，共产党的统治建立起来。在美国，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被许多人视为对自由市场，宗教自由和自由民主的威胁。同时，在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下，苏联宪法只允许唯一政党；国家机构与党的机构密不可分。

到1920年代后期，约瑟夫·斯大林通过一套经济计划和五年计划，巩固了该政权对该国经济和社会的控制。

在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只蔓延到一个后来未纳入苏联的国家。1924年，在邻国蒙古建立了共产主义统治，蒙古是俄罗斯影响西伯利亚地区的传统前哨基地。但是，在整个欧洲和美洲，反共主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批评一直没有减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控制了红军到达的领土，建立了后来被称为东方集团的地区。在中国革命之后，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中国革命胜利到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之间，共产主义统治遍及整个东亚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而新的共产主义政权成为当地和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的主题。共产主义政党采取政治镇压，秘密警察，控制大众媒体，镇压自由讨论和批评，大众监督、告密和国家恐怖。针对这些极权主义的学术研究影响了西方史学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历史的影响，特别是罗伯特·孔奎特和理查德·派皮斯在斯大林主义，大清洗，古拉格和苏联饥荒（1932-1933年）方面的研究工作。

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批评集中在许多主题上，包括它们对它们所统治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权，外交政策，科学进步和环境退化的影响。

对于共产主义统治的政治镇压的记述，包括关键的许多有影响的话题的书

作：——罗伯特《斯大林的征服》《大清洗中的大恐怖》和《1932年苏联大饥荒》；理查德•派佩斯（Richard Pipes）对俄罗斯内战中的“红色恐怖”的叙述；鲁道夫・鲁梅尔（Rudolph Rummel）关于“灭绝”的工作；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对斯大林在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的强迫劳教所的叙述；和斯特凡・考图瓦（StéphaneCourtois）对共产主义政权中的处决，强迫劳动营地和大规模饥饿的描述；尤其要注意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

苏维埃式的中央计划和国家所有权已成为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批评的另一个话题。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经济学家的著作认为，与共产主义统治有关的经济结构导致了经济停滞。批评共产主义统治的其他主题包括外交政策的扩张主义，环境恶化和对自由文化表达的压制。

艺术，科学和技术政策

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批评也集中在对艺术的审查上。就苏联而言，这些批评常常涉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予的优惠待遇。其他批评则集中在某些共产主义政权的大规模文化实验上。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历史中心被拆除，整个城市在1977年至1989年之间进行了重新设计。在苏联，数百个教堂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被拆除或转变为世俗用途。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试图使所有艺术表现形式都具有“无产阶级”的内容，并摧毁了许多缺乏这种表现形式的较旧材料。这些政策的拥护者承诺会创造出一种优于旧文化的新文化，而批评家则认为，这些政策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无理破坏。

有关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伪造图像的作用的著名文献。在《消失的政委：在斯大林的俄国的照片伪造》一书中，大卫·金写道："如此多造假发生在斯大林时代；——共产党通过润饰和修改照片来告诉苏联时代的故事"。在斯大林统治下，历史文献常常是修正和伪造的主题，目的是改变公众对某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认识。在托洛茨基成为反对斯大林统治的共产党派别的领导人之后，他在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几乎从官方历史记录中被完全抹去。

很少有来自共产党国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苏联对某些科学的研究有时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科学考虑。尽管没有科学依据，但在生物学和语言学领域，苏联都分别在短期内推广了列森科主义和雅斐特主义理论。遗传学的研究被限制；因为纳粹优生学的用途促使苏联把遗传学标签为"法西斯主义的科学"。苏联受抑制的研究还包括控制论，心理学，精神病学和有机化学。

苏联技术在许多领域都落后于西方技术。例外情况包括苏联太空计划和军事技术；由于大量的研究资源，共产技术有时会更先进。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资料，共产主义国家的许多技术仅由合法购买或通过大规模间谍手段获得的西方产品的复制品组成。甚至有人说，通过"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西方国家更加严格地控制了技术出口，并在秘密行动中将有缺陷的技术提供给共产党特工，助长了共产主义的垮台。

经济政策

冷战前很早，西欧比东欧更加发达和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一些国家

的经济造成的损害要大于对其他国家的损害。东德的大部分工业被拆除，并转移到苏联进行战争赔偿。

苏联式经济计划的拥护者声称，该系统在某些情况下取得了巨大进步，包括苏联的迅速工业化，特别是在1930年代。作为回应，对苏联经济计划的批评者断言，新的研究表明，苏联的数字是部分捏造的，尤其是那些在斯大林时代表现出极高增长的数字。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有些估计比1930年代的要高得多，但后来下降了，据一些估计，在1980年代后期变成了负数。在集体化之前，俄罗斯曾是“欧洲的大粮仓”。此后，苏联成为谷物的净进口国，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的人口。

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末开始实行市场改革（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中国和越南实现了更高的增长率，而更高的增长率伴随着贫困率的下降。在看被冷战分裂的国家时，共产主义国家的表现不佳。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东德生产力相对于西德的生产率在1936年约为90％，在1954年约为60-65％。与西欧相比，东德的生产率从1950年的67％下降到1990年统一前的50％。所有东欧国家经济体生产率远低于西欧平均水平。

同样，尽管与任何经济结构相关的经济增长形式都会产生一些赢家和输家，但反共主义者指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高增长率与特别严重的苦难甚至农民的大规模饥饿有关。

与共产党统治持续的中国和越南缓慢的市场改革不同，中央计划的突然结

束之后是许多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萧条，它们选择了所谓的经济冲击疗法。例如，俄罗斯联邦在1989年至1996年期间人均GDP下降了三分之一。截至2003年，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均实现了正增长，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均GDP都比转型前更高。总的来说，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批评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大部分存在的时间里，就经济发展而言落后于工业化的西方。

环境政策

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批评包括对环境灾难的关注。一个例子是咸海的逐渐消失和里海的消亡，这是因为通向它们的河流被改道了。另一个是黑海，波罗的海的污染以及贝加尔湖独特的淡水环境。许多河流被污染，还有一些河流，例如波兰的维斯杜拉河和奥德河，实际上已在生态上死亡。苏联70％以上的地表水受到污染。1988年，苏联只有30％的污水得到了适当处理。1988年建立了空气污染卫生标准；在苏联的103个城市中，空气污染被超过了十倍甚至更多。东欧的空气污染问题更加严重。它导致了肺癌的迅速增长，森林的枯竭以及对建筑物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根据官方消息，前苏联的农业用地中有58％受盐碱化，侵蚀，酸度或涝灾的影响。核废料被倾倒在日本海，北冰洋以及远东地区。据透露，1992年，莫斯科市有636个放射性有毒废物处置场，圣彼得堡有1500个。

强迫劳动和驱逐出境

许多共产主义国家还在一定时期内将强迫劳动作为一种合法的惩罚形式；许多被判处遣送古拉格等强迫劳动营地的人是出于政治而不是犯罪原因被送往那里的。古拉格（Gulag）的一些营地位于非常恶劣的环境中，例如西

伯利亚（Siberia），这导致许多囚犯在完成监禁刑期之前死亡。古拉格岛在1960年被正式关闭，尽管它们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实际上仍在运作。朝鲜继续维持监狱和劳教所网络，其中囚禁着大约200,000人。

作为苏联人口迁移的一部分，整个少数民族的非自愿搬迁也造成了许多死亡。由于战争结束后被关押在古拉格（Gulags）而死亡，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俘的战俘并未获释。许多德国平民死于苏联军队在东普鲁士撤离期间的暴行，以及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所进行的种族清洗政策。

行动自由

柏林墙于1961年建造，以阻止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移民。在关于共产主义统治的文献中，许多反共主义者断言，共产主义政权往往对行动自由施加严格的限制。他们认为，这些限制是为了阻止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因为这有可能提供证据表明民众普遍对他们的统治不满。

在1950年至1961年之间，有275万东德人移居西德。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匈牙利-奥地利边界暂时开放，约有20万人移居奥地利。从1948年到1953年，成千上万的朝鲜人迁移到南方，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移民被制止，才停下来。

在古巴，1959年至1961年，古巴革命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破裂后，有50,000名中产阶级古巴人离开。古巴政府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采取了一段时间的镇压措施之后，古巴允许不满的公民大规模移民，这一政策导致1980年的Mariel Boatlift航行，导致随后几个月的移民率下降。在1990年代，被称为“特殊时期”的经济危机，加上美国对禁运的紧缩，导致人们拼命尝试从巴拉萨岛（用筏，轮胎和临时船只）离开该国。许多古巴人目前仍在继续尝试移民到美国。据一些估计，总共有超过100万人离开古巴，约占该国人口的10％。在1971年至1998年之间，有547,000古巴人与700,000邻国多米尼加人，335,000海地人和485,000牙买加人一起移民到美国。自1966年以来，向美国的移民受1966年《古巴调整法》的管辖，这是一部仅适用于古巴人的美国法律。该裁决允许任何古巴国民，无论进入美国的途径如何，都可以在进入美国一年后领取绿卡。哈瓦那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辩说，该政策助长了非法外逃，故意无视和低估了难民所承受的危及生命的艰辛。

在越南战争中，北共取得胜利之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原南越南领土上有超过200万人离开了该国。另一批难民离开柬埔寨和老挝。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对移民的限制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在西方，柏林墙成为这种限制的象征。在柏林墙的存在期间，有六万人未能成功地从东德非法移民，并因此类行为被判入狱；大约有五千人成功逃入西柏林；有239人在试图穿越时被打死。阿尔巴尼亚和朝鲜也许对移民施加了最极端的限制。从大多数其他共产主义政权中，合法移民始终是可能的，尽管通常如此困难，以至于申请未遂者会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移民。一些共产国家从1960年代起大大放宽了移民法。1970年代，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合法移民。

意识形态

根据克拉斯·葛兰·卡尔森（Klas- GöranKarlsson）的说法，“[意识形态]是无法独立犯罪的思想体系。但是，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名义犯下了罪行。”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约翰·格雷（John Gray），理查德·派珀斯（ Richard Pipes ）和鲁道夫·拉姆梅尔（ Rudolph Rummel）等作者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影响或至少部分诱因的重要因素。《共产主义黑皮书》声称共产主义与犯罪之间存在联系，认为“共产主义政权将大规模犯罪变成了成熟的政府体系”，同时补充说，这种犯罪行为在意识形态（而不仅是国家实践）这一层面上是存在的。

克里斯托弗·J·芬利（Christopher J. Finlay）辩称，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明确的限制原则，因而可以使暴力合法化，因为它拒绝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作为统治阶级的建构规范，并指出，“可以想到的是，革命者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犯下残暴的罪行，相信无产阶级实行的新的道德制度将追溯性地免除他们的罪行。”

国际政治与关系

帝国主义

作为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对帝国主义的激进反对。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在1917年宣布了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无条件自决和分裂权利。在冷战期间，共产主义国家因提供军事援助而被指责或被批评为帝国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直接代表为争取控制而战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进行干预。

西方批评家指责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实行帝国主义。苏联以侵略、威胁、或通过傀儡政权间接控制等手段，把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等收入囊中。西方评论家还谴责1956年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和阿富汗战争期间的苏军干预，因为这是对民意的侵略和镇压。毛派主义者认为，苏联在维持社会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大国。

支持恐怖主义

一些受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被批评为直接支持恐怖组织，如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红军阵营和日本红军。朝鲜卷入了摧毁大韩航空858航班等恐怖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

理查德·派派斯（Richard Pipes）认为，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部分责任。派普斯认为，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都以苏联为自己政权的榜样，希特勒私下将斯大林视为“天才”。根据派派斯的说法，斯大林私下希望，另一场世界大战将削弱他的外国敌人，并使得他在国际上维护苏联的权力。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斯大林允许在苏联领土上试验和生产凡尔赛条约禁止的德国武器。斯大林还被指控在1933年希特勒统治之前削弱德国对纳粹的反对力量。例如，在1932年德国大选期间，他禁止德国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这些政党获得的票数超过了希特勒；如果这些政党合作，希特勒就不会当选总理。

领导

马修·克兰（Matthew Krain）教授指出，许多学者指出，革命和内战为激进的领导人和意识形态提供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也为国家大规模屠杀提供了前提。Nam Kyu Kim教授写道，排他性意识形态对于解释大规模杀戮至关重要，但革命领导人的组织能力和个人特征，包括他们对风险和暴力的态度，也很重要。革命不仅为新领导人提供了消除其政治对手的政治机会，革命还带来了更倾向于对平民实施大规模暴力以使自己的合法性和力量得到增强的权力领袖。种族灭绝学者亚当·琼斯（Adam Jones）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前的俄罗斯内战对斯大林等领导人和习惯于“严酷，残酷，恐怖”的人们的崛起具有很大影响。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称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条件”对理解共产主义暴力很重要，尽管不是其来源。

大屠杀

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权下发生了许多大屠杀。死亡估计数差异很大，具体取决于所包括的死亡定义。政府对平民大规模杀戮的犯罪行为，包括处决，因人为饥饿造成的人口破坏以及在强迫驱逐，监禁和强迫劳动中的死亡。

诸如史蒂芬·考图瓦（StéphaneCourtois），史蒂芬·罗斯菲尔德（Steven Rosefielde），鲁道夫·鲁梅尔（Rudolph Rummel）和本杰明·瓦伦蒂诺（ Benjamin Valentino）之类的学者认为，共产主义政权造成了数千万甚至数亿人的死亡。这些死亡大多数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统治

下发生的，因此在《共产主义黑皮书》中，苏联和中国在共产党统治的这些特殊时期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尽管其他共产主义政权也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尤其是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通常被称为杀死了比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的公民比例。死亡人数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各种罪名被判处死刑的人，二是在监狱中死亡，以及不是由政权直接造成，但被认为是国家或共产党政策的间接结果而死亡。这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统治的大多数受害者都属于这一类。

评论家还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下被当局处决的许多被定罪的囚犯其实不是罪犯，而是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在1930年代后期（大约从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被认为是最突出例子。关于不是由国家或政党当局直接造成的死亡，《共产主义黑皮书》指出饥荒和战争是共产党造成死亡的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1932–33年的苏联饥荒和"大跃进"通常被称为人为饥荒。据估算，仅这两项事件就杀死了大多数被视为共产主义国家受害者的人。库图瓦还谴责孟吉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政权通过给民众造成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负担，加剧了埃塞俄比亚1983-1985年的饥荒。

估计

到1939年，在斯大林统治下被苏联杀害的人数由杰弗里·蓬顿（Geoffrey Ponton）估计为350万–800万，沙普林则认为660万，亚历山大·诺夫（Alexander Nove）认为1000万–1100万。关于中国，王维治估计在毛泽东统治下被杀的人数为1950万，约翰·海登里希估计为2700万，Kurt Glaser和Stephan Possony认为介于3800万到6700万之间，Robert L. Walker认为介于3200万到5900万之间，Rosefielde认为超过5000万，Cortois和Malia认为6500万，乔恩·哈里代（Jon Halliday）和Jung Chang《毛泽东：未

知的故事》和鲁梅尔（Rummel）认为是7700万。

《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还估计，在其他国家，共产党统治下有930万人被杀：朝鲜200万人，柬埔寨200万人，非洲170万人，阿富汗150万人，越南100万人，东欧为100万，拉丁美洲为150,000。Rummel估计越南政府杀害了170万人，北朝鲜杀害了160万人（不算1990年代的饥荒），柬埔寨杀害了200万人，波兰和南斯拉夫杀害了250万人。瓦伦蒂诺估计，柬埔寨有1-2百万人丧生，保加利亚有50,000至100,000人丧生，东德有80,000至100,000人丧生，罗马尼亚有60,000至300,000人丧生，北朝鲜有40万至1,500,000人丧生，而越南北部和南部则有80,000至200,000人丧生。

在作者Wiezhi，Heidenrich，Glaser，Possony，Ponton，Tsaplin和Nove之间，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估计总死亡数在2300万至1.09亿之间。《共产主义黑皮书》断言，在所有共产主义政权下大约有9400万人死亡，而拉梅尔认为在六个共产主义政权下大约有1.447亿人死亡。瓦伦蒂诺声称，仅在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共产主义政权就造成了2千1百万至7,000万人死亡。贾斯珀·贝克尔（Jasper Becker），《饥饿的鬼魂》的作者，声称，如果将中国，苏联，柬埔寨，朝鲜，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的共产主义政权造成的饥荒导致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这个数字可能接近9000万。包括维芝，海登里希，格拉瑟，波斯尼，庞东，沙普林和诺夫的研究在内的总数并未包括斯大林或毛泽东统治之外的其他时期，因此，包括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在内，有可能达到更高的总数。在2006年1月25日的一项谴责共产主义政权罪行的决议中，欧洲委员会援引了《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共计9400万的罪行。

根据历史学家J. Arch Getty的说法，归因于共产党统治的1亿人死亡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饥荒造成的。 斯特凡·考图瓦（StéphaneCourtois）认为，许多共产主义政权在试图强行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努力中引起饥荒，并通过控制粮食供应和在政治基础上分配粮食系统地将其用作武器。在《共产主义黑皮书》中，科托斯说："在1918年以后，只有共产主义国家经历过这种饥荒，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有时甚至数百万、数千万人丧生。在1980年代，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是当时仅有的遭受这些致命饥荒的非洲国家。"

人格崇拜

反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批评了许多共产主义统治者的人格崇拜，特别是斯大林，毛泽东，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金日成的崇拜。

政治压迫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中，政治压迫的程度在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之间差异很大。最严格的审查制度是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1922-1953年），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以及北朝鲜（1948年至今）的共产主义政权实行的。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的政治镇压包括处决了被国家当局视为"富农"的大清洗受害者和农民；在古拉格强迫劳动营地制度；驱逐少数族裔；1932年至1933年的苏联饥荒期间，由于政府故意管理不善或某些原因造成的大规模饥荒。共产主义黑皮书还详细描述了中国大跃进和柬埔寨杀戮场。尽管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的政治镇压方式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广泛和严厉，但诸如理查德·派珀斯，奥兰多·菲

格斯和《共产主义黑皮书》等著作的作者认为，恐怖统治始于列宁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全国各地的持续内战期间。其中包括Cheka处决的数十万“阶级敌人”，劳改营制度的发展，内战期间的粮食征用政策。

雅科夫列夫指出，有些孩子跟随他们的父母到古拉格斯去，他们的死亡率特别高。根据雅科夫列夫的说法，在1954年，有884,057名16岁以下的“特别安置”儿童。其他人则被安置在由秘密警察管理的特殊孤儿院中，以便接受再教育，甚至常常失去其名字，并被视为社会危险。

另外还有由志愿人员或被迫招募的人员组成的广泛的平民线人网络。这些网络用于收集情报并报告异议案件。异议人士被归类为精神病患者，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苏联工人被禁止组织独立的非国家工会。军事力量被用于对内部起义的镇压上，例如俄罗斯内战期间的坦波夫叛乱和克朗施塔特叛乱以及1989年在中国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侧重于政治压迫和强大裙带关系的党官僚，被称为权贵阶层；在共产党统治下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剥削人口。

政治制度

历史学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断言：“列宁主义对一党制国家的信仰毫无例外地是每个共产主义政权的特征”，并且“布尔什维克在每次共产主义革命中都反复使用暴力。”

历史学家罗伯特·孔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强调，诸如斯大林的清洗之类的事件并不违反列宁主义的原则，而是列宁建立的制度的自然结果。

罗克福德学院的哲学家斯蒂芬·希克斯（Stephen Hicks）将20世纪共产党统治的暴力特征归因于这些集体主义政权放弃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公民社会价值观的拒绝。希克斯写道："在实践中，每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良好的人道纪录，因为他们大体上尊重权利和自由，并有可能使人们拥有富有成果和有意义的生活"，而在共产党统治中，"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共产主义比二十世纪之前最糟糕的独裁统治更加残酷。每个社会主义政权都沦为独裁统治，开始大规模杀害人民。"

作者埃里克·D·威茨（Eric D. Weitz）说，诸如共产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杀戮等事件是法治失败的自然结果，这在20世纪的社会动荡时期很常见。对于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大屠杀，"种族灭绝发生在极端的社会危机时刻，通常是由政权的政策所引起的。" 根据这种观点，大屠杀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政治决定。

社会发展

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领导人奉行一项经济发展战略，将国家的经济资源集中在重工业和国防而不是消费品上。后来，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一策略。对于许多对共产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西方批评家来说，苏联共产党在西方普遍缺乏消费品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共产主义统治是如何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

共产主义统治导致生活水平降低的指控与夸口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文化计划成就的共产主义论点形成鲜明对比。例如，苏联领导人吹嘘保证就业，补贴衣食，免费医疗保健，免费托儿服务和免费教育。苏联领导人还吹捧了妇女平等的早期进展，特别是在中亚伊斯兰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相比，东欧共产党人经常吹捧高水平的识字率。

共产主义统治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受到严厉批评。一些研究得出结论，可能是由于营养和医疗服务等因素的差异，东德人比西德人矮一些。据一些研究人员称，统一后，东德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苏联统治的批评者指责苏联的教育体系充斥着宣传且质量低下。美国政府的研究人员指出，苏联在医疗保健上的花费远少于西方国家，并指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苏联的医疗保健质量正在恶化。此外，西方国家指出，苏联的养老金和福利计划未能提供足够的保护。

1965年后，苏联和东欧的预期寿命开始趋于平稳甚至下降，尤其是男性；而西欧的预期寿命则继续增长。在欧洲的两个部分之间的这种差异从1960年代后的三十年中一直持续，导致1990年代中期的巨大差距。在几个东欧国家中，共产主义垮台后，人们的预期寿命立即开始增加。在某些东欧国家（如罗马尼亚），男性先前的跌势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开始增加。

在1980年代，对肉和糖的定量配给在苏联很普遍。霍洛维茨（Horowitz）引用的研究表明，苏联公民的平均红肉摄入量是1913年沙皇统治时期的一半；相比于苏联，南非种族隔离下的黑人人均拥有更多的汽车；美国在一个月内获得的收入超过了苏联普通工人一年的平均收入。根据霍洛维茨的说法，苏联人擅长的唯一消费领域是烈性酒。霍洛维茨还指出，三分之二

的家庭根本没有热水，三分之一的家庭根本没有自来水。霍洛维茨引用了政府报纸伊兹维西亚，他指出，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四口之家被迫在一个八乘八英尺的房间里住了八年，然后才获得稍微更好的住宿。在对苏联住房短缺的讨论中，霍洛维茨指出，住房短缺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任何时候，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必须将17％的苏联家庭分开。三分之一的医院没有自来水；人们常常需要行贿医生和护士，以得到体面的医疗护理、甚至苏维埃医院的毯子这样的便利设施。在对苏联教育的讨论中，霍洛维茨指出，只有15％的苏联年轻人能够上高等教育，而美国这一比例为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ft-wing_terrorism

左翼恐怖主义

左翼恐怖主义或极左翼恐怖主义，有时也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恐怖主义或革命性左翼恐怖主义，是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恐怖主义。左翼恐怖主义也已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作为针对现任执政政府的激进主义而发生。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活动的大多数左翼恐怖组织在1990年代中期消失

了。一个例外是希腊革命组织11月17日（17N），该组织一直持续到2002年。自那时以来，与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相比，西方世界的左翼恐怖主义很少发生，主要是由发展中世界的叛乱组织实施的。

意识形态

左翼恐怖分子受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的影响。Narodnaya Volya是一个19世纪的恐怖组织，在1881年杀死了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发展了思想宣传，这是一个重大影响。

莎拉·布罗克霍夫（Sarah Brockhoff），蒂姆·克里格（Tim Krieger）和丹尼尔·梅耶里克斯（Daniel Meierrieks）表示，左翼恐怖主义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而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则是出于种族动机。他们认为，左翼恐怖主义的革命目标是不可谈判的，而民族主义恐怖分子则愿意做出让步。他们认为，左翼恐怖分子要求的刚性可能可以解释他们相对于民族主义团体缺乏支持。不过，许多革命左派人士对使用恐怖主义的民族解放团体表示了声援，例如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南美的图帕玛罗斯（Tupamaros），认为他们参与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斗争。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刺激，一些分离主义运动，包括巴斯克ETA，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民族解放军，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纳入其政策。

大卫·布兰南（David Brannan）写道，左翼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往往不会

对公众进行滥杀滥伤，因为这不仅违背了他们所主张的作为工人阶级保护者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且他们也不想疏远大片如此的组织和个人，以寻求获得支持。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左翼恐怖主义与右翼恐怖分子一样，可能不分青红皂白。

历史

左翼恐怖主义的根源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并在冷战期间变得明显。现代左翼恐怖主义是在1968年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西欧，著名的团体包括西德红军，意大利红军，法国行动指挥（AD）和比利时共产主义战斗团（CCC）。亚洲团体包括日本红军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尽管后者后来采纳了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在拉丁美洲，1970年代和1980年代积极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团体包括尼加拉瓜桑迪尼斯塔斯，秘鲁的光辉之路和哥伦比亚4月19日运动。

Kis-Katos等人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左翼恐怖主义是过去最普遍的恐怖主义，但如今已大大减少。

加拿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魁北克解放阵线，活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加拿大；他们推进社会主义起义和独立的魁北克。他们以160多次爆炸和其他暴

力事件，以及1970年魁北克政治家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的绑架谋杀案而闻名。

美国

美国的现代左翼恐怖组织是从“地下天气”的残余分子和“民主社会学生”的极端分子发展而来的。1973年到1975年之间，共生解放军活跃，犯抢劫银行，谋杀和其他暴力行为。诸如小规模的新世界解放阵线等其他恐怖组织在1970年代后期诉诸死亡威胁，驾车射击和放置炸弹的行为。在1980年代，共产主义组织（M19CO）和规模较小的联合自由阵线很活跃。在冷战结束时（1989年左右），左翼恐怖主义事件有所减少，部分原因是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支持。

5月19日共产主义组织

5月19日共产主义组织，也被称为5月19日共产党联盟，M19CO名称来自胡志明和马尔科姆X的生日。5月19日的共产党组织从1978年到1985年活跃。该组织还包括黑豹和新非洲共和国（RNA）的成员。根据2001年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黑人解放军与Weather Underground成员之间的联盟具有三个目标：从美国监狱中释放囚犯；适当的资本财富（通过武装抢劫）来资助其运作；并发起针对美国的一系列轰炸和恐怖袭击。

拉丁美洲

斯特凡·奥布里（Stefan M. Aubrey）将桑迪尼斯达人，《光明之路》，4月19日运动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描述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参与拉丁美洲左翼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组织。这些组织反对美国政府，得到了当地的支持，并获得了苏联和古巴的支持。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先后从事汽车爆炸事件，气瓶炸弹，杀戮，地雷，绑架，勒索和抢劫，以及游击和常规军事行动。美国国务院与欧洲联盟一样，将FARC-EP列入其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它主要通过勒索，绑架和参与非法毒品交易来筹集资金。他们的许多阵线都以武力招募新兵和未成年兵，散布宣传和抢劫银行。在农村地区经营的企业，包括农业，石油和采矿业，必须支付“疫苗”（每月付款），以“保护”他们免遭随后的袭击和绑架。另一个收入来源（尽管利润较低）是高速公路封锁，游击队在此封锁了驾车者和公共汽车，以没收珠宝和金钱。据估计，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人员中有20％至30％在18岁以下，许多人只有12岁，总共约有5000名儿童。试图逃脱游击队成员的儿童将受到酷刑和死刑。

光辉之路

秘鲁共产党，通常被称为“光辉道路”，是一个毛派游击组织，于1980年在秘鲁发动了内部冲突。该组织的野蛮行为遭到广泛谴责，包括对农民，工会组织者，民选官员和平民的暴力。光辉之路在美国国务院的“指定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秘鲁，欧盟，和加拿大同样将“光辉之路”视为恐怖组织，并禁止为其提供资金或其他财务支持。

根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道，“光辉道路”的行动夺走了31,331至37,840人的生命。

亚洲

Stefan M. Audrey将日本红军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描述为亚洲主要的左翼恐怖组织，尽管他指出LTTE随后转变为民族主义恐怖组织。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和纳萨尔主义者

武装的纳萨尔集团在印度中部和东部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开展业务。在毛主义的人民战争战略的指导下，最重要的团体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它是由之前的两个纳萨尔派组织，人民战争小组和印度毛主义共产党中心（MCC）合并而成。纳萨尔武装运动被认为是印度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纳萨尔激进分子在印度的红色走廊参与了多次恐怖袭击和侵犯人权行为。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对百个政府和平民目标进行了袭击。在尼泊尔联合人民阵线（UPF）的毛主义派别CPN-M在选举中表现不佳，并被排除在1994年选举之外之后，毛派主义者转向了叛乱。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尼泊尔的君主制和议会民主制，并改变尼泊尔的社会，包括清除该国的精英阶层，国家接管私营工业以及农业集体化。在尼泊尔，对平民的攻击是毛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导致大赦国际声明：

CPN（毛主义）一贯以其思想上反对的私立学校为目标。2005年4月14日，尼泊尔共产党（毛派）要求关闭所有私立学校，尽管这一要求已于4月28日撤回。根据这一要求，它于4月15日炸毁了尼泊尔西部的两所学校，于4月17日炸毁了Banke区Nepalganj的一所学校，并于4月21日炸毁了奇旺的Kalyanpur的一所学校。据报道，尼共（毛派）的干部还向鲁库姆区喀拉一所学校上课的学生投掷炸弹。

日本红军

日本红军（JRA）始建于1969年的“红军派”学生。1970年，他们劫持了飞机、飞往朝鲜，在那里有9名成员被拘捕。内部清洗期间有14名成员被杀。1971年，更名的JRA与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建立了联系，并在黎巴嫩建立了基地。他们的主要恐怖行为包括对特拉维夫机场的武装攻击，劫持飞往利比亚和孟加拉国的飞机，绑架法国驻海牙大使以及轰炸联合服务组织

（USO）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夜总会。到1990年代中期，他们的活动水平有所下降，美国国务院不再将其视为恐怖主义威胁。在2001年，他们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解散，尽管该组织的某些成员已入狱，其他人仍被警方通缉。

巴基斯坦

左翼团体如扎克迈（Pakhtoon Zalmay），Al-Zulfiqar组织（AZO）和MQM（包括其前身Muhajir Qaumi运动）实施了许多暴力行为，包括炸弹，有针对性的杀戮，虚假信息和暗杀。

欧洲

通常，欧洲的小型、城市左翼恐怖组织致力于推翻其国家的政府，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权取代它们。尽管没有人在实现目标方面取得任何成功，但它们在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希腊，法国，土耳其，葡萄牙和西班牙引起了严重的安全问题。

行动指挥（AD）

行动指挥（AD）在1979年至1987年期间活跃于法国。在1979年至1985年期间，尽管他们暗杀了法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但他们集中精力于非致命轰炸和对政府建筑物的袭击。在一些成员被捕后，该组织后退了，变得不活

跃。法国政府已禁止该组织。

共产主义战斗细胞（CCC）

共产主义战斗细胞（CCC）是由皮尔·卡特于1982年在比利时成立。CCC有大约十名成员，通过一系列银行抢劫案为其活动提供了资金。在14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对一些物业进行了20次袭击，其中大多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设施。尽管试图避免导致死人，但这些袭击仍造成人员伤亡。1985年，卡莱特（Carette）和其他成员被捕后，该组织停止运作。Carette被判处17年无期徒刑，尽管与他一起被定罪的同事较早被释放。

十月一日的反法西斯抵抗团体

十月一日的反法西斯抵抗团体（GRAPO）是毛派的恐怖组织，于1975年在西班牙成立。自成立以来，直到2007年，它通过轰炸或射击暗杀84人，包括警察，军人，法官和平民。该组织最初出于政治原因进行了多次绑架，后来主要是勒索。它的最后一次进攻是在2006年。

爱尔兰民族解放军

爱尔兰民族解放军（INLA）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共产主义准军事组织，形成

于1974年12月10日。它试图从英国分离北爱尔兰，建立一个覆盖整个爱尔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是爱尔兰共和党社会党（IRSP）的准军事队伍。

INLA由反对该团体停火的爱尔兰共和军前成员创立。它最初被称为“人民解放军”或“人民共和军”。INLA对北爱尔兰的英军和皇家阿尔斯特警察（RUC）进行了准军事行动。它在爱尔兰共和国和大不列颠的活跃程度较小。INLA进行的引人注目的攻击包括Droppin Well炸弹袭击，1994年的Shankill Road杀害以及1979年的Airey Neave和1997年的Billy Wright遇刺。但是，它比共和军的主要准军事组织IRA规模小，活跃度也低。仇恨和内部紧张也削弱了它。该小组的成员使用的名称包括人民解放军（PLA），人民共和军（PRA）[50]和天主教反动部队（CRF）。

根据2000年“恐怖主义法案”，INLA是英国的被禁止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国的非法组织。

人民军4月25日

人民军4月25日（FP-25）成立于葡萄牙，在奥特洛萨莱瓦德卡瓦略中校的领导下。FP-25的目的是推翻葡萄牙政府并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它对葡萄牙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暗杀和炸弹袭击。他们在1980年代中期停止活动。

红军派系

从德国Baader-Meinhof集团发展而来的红军派系（RAF）在197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并活跃了20多年。并与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和Jack狼人卡洛斯有联系。尽管该组织的领导人，包括古德伦·恩斯林（Gudrun Ensslin），安德烈亚斯·巴德（Andreas Baader）和乌尔里克·梅因霍夫（Ulrike Meinhof）于1972年被捕，但它进行了重大袭击，包括绑架和谋杀汉斯·马丁·施莱尔，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和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以及在1977年所谓的“德国秋季”中劫持了汉莎航空181号班机。

红旅

红色旅成立于1970年8月，主要由极端主义观点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成员组成。是意大利最大的恐怖组织，其目的是推翻政府，并以共产主义体系取代。

革命组织11月17日

革命组织11月17日，也被称为17N或N17。自2001年以来，该组织杀害了23人，其中包括美国官员，北约官员以及希腊政治人物，地方官员和商人。希腊警察，中央情报局（CIA）和苏格兰尝试对该组织进行调查均未成功。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在被自己携带的炸弹炸伤后，于2002年被抓获。该组织

已被希腊，美国和国际执法机构确认为恐怖组织。

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

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在土耳其是一种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美国，英国和欧盟将其归类为恐怖组织。截至2007年，土耳其安全总局反恐怖主义与行动部将其列为土耳其的12个活跃恐怖组织之一。它是2008年美国国务院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列出的44个名称之一；它也被欧盟和英国列为主要恐怖组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st_terrorism

共产主义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恐怖主义是指，为了推进或坚持与共产主义相关的意识形态，如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毛主义，而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历史上，共产主义恐怖主义有时采取由国家资助的恐怖主义形式，并得到苏联，中国，朝鲜和柬埔寨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支持。此外，非国家行为者，例如红旅，前线和红军也参与了共产主义恐怖主义活动。这些团体希望激发群众起来，并发起一场革命，以推翻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有时可以称为红色恐怖主义或左翼恐怖主义。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导致了这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显着下降。

历史

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在德国的部分宣传活动中使用术语“共产恐怖主义”，传播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情绪。纳粹指责共产党恐怖主义的国会纵火案，他们以此为借口通过立法在德国删除个人自由。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目睹了从事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团体的崛起。

在1960年代，中苏分裂（两个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导致该地区的恐怖活动显着增加。在那十年中，各种恐怖组织也开始在欧洲，日本和美洲开展行动。约纳·亚历山大（Yonah Alexander）认为这些团体是暴力共产主义组织（FCO），并说他们从抗议越南战争的学生运动中崛起。在西欧，这些团体的行动被称为欧洲恐怖主义。FCO的创始人辩称，暴力是实现其目标所必需的，和平抗议既无效又不足以实现目标。在1970年代，估计有50个在土耳其运作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团体，估计有225个在意大利运作的团体。集团还开始在爱尔兰和英国开展业务。这些团体被北约以及意大利，德国和英国政府视为主要威胁。

背景

虽然列宁系统地谴责实行恐怖主义社会革命，反对弑君，但是，他还支持恐怖作为工具，并认为公众恐怖是推进革命目标的战略和有效的方法。根据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的说法，列宁强调了恐怖的绝对必要，而列宁早在1904年就说：“若无雅各宾派的强制，无产阶级的专政绝对是毫无意义的表达。”1905年，列宁指示圣彼得堡“战斗委员会”成员实施抢劫行为，纵火等恐怖行为。

例子

保加利亚

1925年4月16日，St Nedelya教堂遭到保加利亚共产党（BCP）的袭击。他们炸毁了圣Nedelya教堂。150人被杀，约500人受伤。

柬埔寨

约瑟夫·图曼（Thomas S. Tuman）估计，红色高棉（Khmer Rouge）所犯的柬埔寨种族灭绝行为造成170万至250万人死亡，这是恐怖主义行为。

中国

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A. Valentino）估计，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在1927年至1949年中国内战期间犯下的暴行导致180万人至350万人死亡。在1940年代后期，美国国务院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国，共产主义恐怖主义，包括抢劫，屠杀，等等的行动超越日本占领中国时期。[31]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在1948年共产主义叛乱，以及在1965年未遂政变的过程中，进行了许多恐怖主义行动；后者最终导致了虐待狂一般的反共政治杀人，随后的政权在动乱后变成了右翼军事独裁政权。

菲律宾

成立于1969年的新人民军（NPA）被描述为在菲律宾活动的第三大恐怖集

团。该组织在1987年至1992年间进行了袭击，之后中断了。在2000年至2006年之间，他们又进行了42次袭击。

罗得西亚

罗得西亚（1980年更名为津巴布韦）在1970年代战争期间，在该国活动的游击队被政府视为共产恐怖分子。有关组织从许多共产主义国家获得了战争物资和财政支持，它们还在包括苏联，中国和古巴在内的几个国家中接受了培训。参与战争的有两支游击军队-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的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PRA ），以及隶属于该组织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ZANLA）。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最初位于赞比亚的卢萨卡地区。ZANU和ZANLA的基地在1972年左右移至莫桑比克的太特省，直到1979年战争结束，他们的基地一直在那里。根据其上级组织ZANU所宣称的毛主义思想，赞拉利用中国的毛主义策略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农村人口政治化，并在罢工期间躲藏在当地人中间。大部分ZIPRA人员在赞比亚组成一支常规型军队，接受了古巴和苏联军官的训练；其计划目的是最终侵略罗得西亚并与罗得西亚安全部队战斗。但这最终并未发生。

苏联

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特点是使用恐怖主义制服人。历史学家安娜·盖夫曼（Anna Geifman）表示，“这在该政权的起源中是显而易见的”。最初的红色恐怖运动估计导致17,000人死亡。列宁说，他的“雅各布派政党永远不会拒绝恐怖手段”；1793-1794年的雅各布恐怖统治，被作为布尔什维克红色恐怖的典范。Felix Dzerzhinsky，Cheka（苏联秘

密警察）的创始人，广泛采用恐怖手段，尤其是针对拒绝将粮食交给政府的农民。列宁在启动新经济政策时表示：“认为新经济政策已经结束了恐怖主义，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将重返恐怖主义，这将是一种经济恐怖主义。”

越南

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A. Valentino）估计，在1954年至1975年间，越南共产党恐怖主义造成的平民死亡总数为45,000至80,000人。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ctatorship_of_the_proletariat

无产阶级专政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无产阶级拥有政治权力的形态。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之间的中间阶段，在这一阶段，革命后的国家抓住了生产资料，代表工人委员会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国有化，从私有到集体所有。在这一阶段，该党的行政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党的执政需要和行使国家权力的需要，以防止反革命和促进向持久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通常用来描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术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国家，民主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

社会主义革命家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其用于其哲学和经济学。专制一词表示国家机构对生产资料的完全控制。物质生产的计划将服务于人口的社会和经济需求，例如受教育权，健康和福利服务以及公共住房权。巴黎公社（1871年）控制了首都两个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例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资产阶级专政一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反义词。这种政治思想有多种流行趋势；所有这些趋势都认为国家在革命后将因其执行能力而得以保留无产阶级专政。

它试图组织一个先锋党，——马克思在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字及其本身的著作基础上倡导的先锋党，从而领导无产阶级起义，以承担国家、经济的力量；媒体和社会服务（学术界，卫生界等）代表无产阶级，并建设一个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单一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要通过民主集中制来统治；列宁将其描述为"讨论中的多样性，行动中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古巴，老挝和越南执政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是苏联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后来也是组成东欧集团的其他执政党的官方意识形态。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通向农奴制之路》（1944年）中写道，无产阶级专政会像专制制度一样彻底破坏人身自由。

理论方法

卡尔·马克思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写得太多，但《共产党宣言》（1848年）却说：“只有通过强行推翻所有现有的社会条件，才能达到其目的。”

1852年1月1日，共产主义记者约瑟夫·韦德迈尔（Joseph Weydemeyer）在德语报纸Turn-Zeitung上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他写道：“很明显，这里不可能有任何逐步和平过渡的问题”。那年，马克思给他写信说：“很久以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解剖学一样描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我自己的贡献是（1）表明存在阶级的束缚仅与生产发展中的某些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专政；［和］（3）这种专政本身仅构成了过渡。废除所有阶级，实现无阶级社会。”

马克思在1875年的短篇著作“对哥达计划的批判”中扩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严厉批评和抨击了德国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的前身）计划提出的原则。该计划提出了一种温和的渐进式，改良式和进化式的社会主义方式，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暴力方式。结果，马克思指责哥达方案是“修正主义者”且无效。不过，他允许在一些民主体制结构健全的国家（例如英国，荷兰和美国）实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他建议在其他国家，工人无法“实现自己的事业”、不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目标”，“我们的革命的杠杆必须是力量”，其原则是，如果劳动人民被剥夺政治表达

权，他们有权反抗。

马克思指出，在无产阶级管理的社会中，国家应控制“劳动所得”（即生产的所有粮食和产品）。此外，他认为国家应随后承担足够的行政费用，用于运营公共服务的资金，以及为那些身体上无能为力的人提供的资金。一旦从“劳动收益”中拿走了足以应付所有这些东西的费用之后，马克思认为剩下的应该在工人之间分摊，每个人得到的商品的价值等于他们拥有多少劳动力的同等价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武力和暴力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革命和无产阶级统治的愿景中起着重要作用。1877年，恩格斯与EugenDühring争论，嘲笑他对使用武力的保留，并指出：“然而，这种武力在历史上又起着革命性的作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是埋葬旧社会、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士；通过它粉碎死去的僵化的政治形式。”

弗拉基米尔·列宁

在20世纪，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发展了列宁主义（Leninism），即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帝国（1721-1917）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适应。这种理论体系后来成为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

《国家与革命》（1917年）明确讨论了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措施。列宁否认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改良主义者解释，例如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卡尔·考茨基的解释。列宁特别关注恩格斯的“枯萎国家”一词，否认它可以适用于“资产阶级国家”，并强调恩格斯的工作主要是“暴力革命的泛神论”。基于这些论点，他谴责改良主义者是“机会主义的”，反动的，并指出红色恐怖是唯一的道路。列宁所引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在俄罗斯帝国，1905年俄国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工人和士兵的议会）实现了巴黎公社的样板政府形式，其革命任务是废除资本主义（君主制）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即专制统治、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之前的阶段。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称其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苏维埃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上台。在整个1917年，列宁争辩说俄罗斯临时政府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着对于资产阶级的专政。他认为，苏维埃人需要为自己夺权。

无产阶级政府

列宁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在俄罗斯这样的欠发达国家，资本主义阶级仍将构成威胁。因此，他主张镇压那些反对新苏联政府的资本主义阶级分子，并写道，只要阶级存在，一个国家就必须存在，以行使一个阶级的统治；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比其他阶级（资本主义阶级）强。列宁写道：“独裁并不一定意味着废除行使对其他阶级的专政的民主；但它

的确意味着废除民主（或非常实质性的限制，这也是废除民主的一种形式）。”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卡尔·考茨基开始批评布尔什维克革命；列宁谴责他为“叛徒”。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米哈伊尔·巴库宁（Mikhail Bakunin）批评使用暴力，恐怖和单一共产党统治。

在俄国苏联模式中，资本家被剥夺了选举权。1917年至1924年的布尔什维克并未声称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相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1977年宪法（基本法）的序言（《勃列日涅夫宪法》）指出，1917年革命将无产阶级专政确立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苏维埃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公开，共产主义自治。”

禁止反对党和派系

在俄罗斯内战期间（1918–1922年），所有主要的反对党都武装起来反对新的苏维埃政府，参加了破坏活动，与被废除的沙皇主义者合作或暗杀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当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等反对派在某些地区被民主选举为苏维埃人时，他们便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来欢迎沙皇和外国资本主义军事力量。结果，布尔什维克在镇压反对苏维埃政府时禁止了每个反对党。

在内部，列宁的批评家认为，这种政治镇压永远是他的计划。1919年后，由于强迫粮食征用引发的饥荒导致苏联人流离失所，苏维埃已不再发挥民主统治的作用。在这一阶段，莫斯科的一半人口和彼得格勒的三分之一人口逃往农村，以寻找食物和政治生活基础。

布尔什维克开始感到关切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群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禁止反对党的力量——反革命势力会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表达自己。尽管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内部派系和其他党派被禁止。该禁令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散为止。1921年，俄罗斯内部仍然存在激烈的内部辩论和见解自由，审查制度和大规模政治镇压的开始尚未出现。尽管名义上已经解散，工人反对派仍然继续活动。苏联共产党的辩论一直持续到1923年。

约瑟夫・斯大林

斯大林主义和专政

列宁生病期间和去世后，以后的审查制度和对政治表达的攻击都会出现；当时未来的斯大林派系成员压制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政党民主，并开始审查材料。普拉达（Pavda）在1924年以后停止发布政治反对派的意见，同时，统治集团（格里高利・季诺维耶夫（Grigory Zinoviev），列夫・卡梅涅夫（Lev Kamenev）和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接纳大量新成员加入党内，以便在党的会议上压过反对派的声音，从而严重

限制了内部辩论。他们的政策部分是由新官僚机构的利益所决定的，而新官僚机构在大多数人没有积极参与政治的情况下积累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到1927年，左翼反对派的许多支持者开始面临政治镇压，列昂·托洛茨基被流放。

从1936年起，受斯大林主义启发的国家宪法通过赋予各共产党在社会上“领导作用”来体现一党独裁这一概念，这一规定被解释为完全禁止其他政党或强迫他们接受斯大林主义者的有保障的统治权，作为那些其他党派被允许存在的条件。此论据为后来基于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共产党所采用，例如中国，朝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rrorism_and_the_Soviet_Union

恐怖主义与苏联

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直被指责多次赞助国际的恐怖主义，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北约以及意大利，德国和英国政府将“共产主义战斗组织”形式的暴力视为严重威胁。

对恐怖组织的支持

根据苏联叛逃者格里戈里·别塞多夫斯基（Grigori Besedovsky）的说法，NKVD最早在1920年代就直接协调了波兰的多次爆炸。1923年10月13日对华沙城堡的最大一次爆炸行动中，炸弹摧毁了一个大型军事弹药储存设施，炸死28人，炸伤89名波兰士兵。1923年5月23日在华沙大学发生的另一起炸弹爆炸，造成许多人丧生，其中包括罗曼·奥尔曾基（RomanOrzęcki）教授。进一步的炸弹袭击发生在琴斯托霍瓦，克拉科夫和比亚韦斯托克。

GRU叛逃者 维克多·苏沃洛夫（Viktor Suvorov）和斯坦尼斯拉夫·卢涅夫（Stanislav Lunev）将苏联特勤部门描述为“全球恐怖分子的主要讲师”。苏联领导人认为恐怖主义是减轻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之间不平衡的唯一途径。据恩·米哈伊·帕切帕，克格勃将军亚历山大·萨克哈罗维斯基曾经说过：“在当今世界，当核武器作为武力过时，恐怖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他还声称“劫机是我自己的发明”，仅在1969年，由克格勃资助的巴解组织就在世界范围内劫持了82架飞机。

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击败了苏联控制的阿拉伯国家之后，苏联开始了针对以色列的广泛秘密行动，其中包括对宣告以色列为敌人的恐怖组织进行宣传以及直接军事支持（资金，武器，训练）。此外，苏联决定传播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甚至参考西方文化中先前的反犹太主义比喻，例如犹太共济会阴谋论，以增加反以色列的情绪。该运动的总体目标

是传播这样一种观念，即以色列国是建立在不公正压迫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感觉在苏维埃推动制定的联合国大会第3379号决议中有所体现。同时，苏联促进了在以色列国建立后、以及随后该地区战争后而遭受大规模流离失所和驱逐出境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苏联积极支持了以恐怖主义为主要斗争方法特征的某些巴勒斯坦反叛团体，例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1970年代初与罗马尼亚和苏联克格勃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克格勃提供了对巴解组织游击队的秘密训练。主要的克格勃活动和武器运输是通过沃迪·哈达的民阵组织进行的。在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的带领下，1975年一群PFLP战士对维也纳石油输出国组织（ Office of Petroleum Exporting Nations）办事处进行了一次突袭。

克格勃采取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行动，以苏联共产党的命令为国际恐怖分子提供武器，例如：

1972年，苏联情报船Reduktor（行动SPLASH）将机枪，自动步枪，瓦尔特手枪和子弹盒移交给爱尔兰共和军，以履行迈克尔·奥赖丹的武器要求。

通过瓦迪·哈达德（Wadi Haddad）将反坦克手榴弹RPG-7发射器，无线电控制的SNOP地雷，带有消音器的手枪，机关枪和其他武器转移到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员（Wadi Haddad），后者于1970年被招募为克格勃特工。

冷战与恐怖主义

情报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Mistokhin Archive），苏联可能已经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以对抗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arison_of_Nazism_and_Stalinism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

许多作者进行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比较，在其中考虑了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异同，两种政权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以及为什么两者同时突出。在20世纪，人们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

人格崇拜的主题上进行了比较。两种政权都与自由主义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着重显明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以及历史学家罗伯特•孔奎（Robert Conquest）是运用极权主义概念比较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著名倡导者。

其他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也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作了比较，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比较长期以来引起了政治争议，并导致了历史学家在1980年代在德国内部发生的名为Historikerstreit的争议。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最早发表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的苏联比较研究的学者之一。阿伦特在1951年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了极权主义的思想，认为它是一种独特的政治运动和政府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有所不同，例如专制和独裁”。此外，阿伦特区分了极权运动（例如具有极权目标的政党）和极权政府。并非所有的极权主义运动

一旦获得权力就可以成功建立极权主义政府。在阿伦特看来，尽管1920年代和1930年代欧洲存在许多极权主义运动，但只有斯大林和希特勒政府才成功地完全实现了极权主义的目标。

阿伦特追溯了极权主义运动的19世纪起源，特别关注反犹太主义和帝国主义。她强调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与反犹太主义的增长之间的联系。阴谋论比比皆是，犹太人被指控为破坏欧洲国家的各种国际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应对这种犹太人的威胁，成立了小型反犹太政党，据阿伦特说，这些是欧洲最早的政治组织，声称其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是阶级或其他社会团体的利益。后来的极权主义运动会复制或继承这一主张，为整个国家说话，这意味着对他们的任何反对都构成叛国罪。

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也被称为新帝国主义，通过使无休止扩张的概念合法化，也为极权主义铺平了道路。欧洲人在其他大陆上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之后，便出现了旨在在欧洲大陆本身复制帝国主义的方法的政治运动。阿伦特特别提到泛德国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泛运动”，它们向没有海外扩张希望的国家人民许诺了大陆帝国。阿伦特认为，“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分别归因于泛德国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而不是任何其他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

敌人的非人道化是双方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反过来导致了相互仇恨，反俄罗斯和反德国的歇斯底里。

阿伦特认为，纳粹运动和布尔什维克运动都“从许多其他各方都放弃了的人群中招募了成员，” 他们“有理由对所有政党同样怀有敌意”。因此，极权

主义运动不需要辩论或说服力，也不需要反驳其他政党的论点。不必说服他们的目标受众鄙视其他政党或民主制度，因为它的对象是已经鄙视主流政治的人们。结果，极权主义运动可以对对手发动暴力和恐怖活动，而不必担心这会疏远他们自己的支持者。特别是纳粹上台之前，他们“杀害小型社会主义工作人员或反对党的有影响力的成员”既是威吓对手的一种手段，也是向其支持者表明自己是反对者行动党的一种手段，“不同于其他政党的’闲聊者’”。

极权政府广泛使用宣传。阿伦特将这分为“灌输”和“宣传”。灌输包括以下对象：极权政府内部执政党成员和支持政府的那部分人群。宣传包括极权政府寻求在外部世界以及其自身社会中可能不支持政府的那些部分中进行宣传的信息。因此，“宣传的必要性总是由外界决定”，而灌输的机会则取决于“极权政府排除外界干扰的能力。”

苏联和纳粹使用的灌输类型以“科学的”真理主张为特征，并诉诸“客观的自然法则”。两种运动都对人类社会具有确定性的看法，并声称它们的意识形态是基于有关种族（对于纳粹而言）或支配人类历史的力量（对于苏维埃而言）的科学发现。阿伦特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现代广告，公司声称科学研究表明他们的产品是卓越的，但是更普遍地说，她认为这是“对科学的痴迷”的极端版本。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通过使用伪科学作为其行动的主要理由，与早期的历史专制政权区分开来。根据阿伦特的说法，像希特勒和斯大林这样的极权主义领导人真正相信他们是在按照不变的自然法则行事。纳粹极度残酷地对待被占领土上的居民，并计划将东欧人口减少，以使日耳曼“优等民族”可以到这里来移民，尽管这实际上损害了他们的战争努力。斯大林一再清洗共产党队伍，因为在斯大林看来，那些被清洗者偏离党路线，代表着“垂死阶级”的利益，而历史的消亡是不可避免

的。

领袖

阿伦特还指出了无所不能的领导者在极权主义运动中的核心重要性。与其他领域一样，她区分极权主义领导人（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和非极权主义独裁者或专制领导人。极权主义者的领导不是通过亲自使用暴力或通过任何特殊的组织技能来上台，而是通过控制党内人员的任命，从而使所有其他杰出的党员都臣服于他。随着对领导者的忠诚成为晋升的主要标准，雄心勃勃的党员相互竞争，试图表达自己的忠诚和对人格的崇拜。即使当领导者不是特别有能力并且他的内心圈子的成员意识到他的不足时，他们仍然对他执着，因为担心如果没有他，整个权力结构就会崩溃。

“敌人”

据阿伦特说，极权主义运动一旦执政，将面临一个主要的困境：它们是在对现状的愤怒和不可能、或不诚实的承诺的基础上建立支持的。他们通过与现实和想象中的外部和内部敌人进行不断的斗争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使他们能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尚未获得履行诺言所需的权力。阿伦特认为，极权政府必须不断与敌人作战才能生存。这就解释了他们明显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即使希特勒得到满足他在慕尼黑协议中所要求的一切后，他仍然继续提出领土要求。或斯大林尽管已经消灭了党内所有主要反对者、已经没有重大内部反对的时候，仍然要发动大恐怖、大饥荒行

动。

集中营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政府广泛使用集中营，认为集中营是寻找敌人与之作战的最重要体现，因此集中营“比任何其他设施对维护政权都更为重要。”尽管强迫劳动通常被施加于集中营的囚犯，但阿伦特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该政权带来任何实质性经济收益。 纳粹尤其通过在战争期间花费大量金钱，资源和人力以建立灭绝营地并为其配备人员，并将人员运送到那里。这将极权政权的集中营与与之有某些相似之处的较旧的人类机构（例如奴隶制）区分开来。为了牟利，奴隶被虐待和杀害。集中营的囚犯被虐待和杀害，却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政治统治。最后，阿伦特指出，希特勒和斯大林领导下的集中营中有许多囚犯，他们不仅从一般意义上讲，甚至从政权本身的标准上都无罪。也就是说，大多数囚犯实际上并未对该政权采取任何行动。

极权主义制度的未来

在她的整个分析中，阿伦特强调了斯大林和希特勒建立的政府结构的现代性和新颖性，认为它们代表了“全新的政府形式”，将来很可能会以其他各种形式再次体现出来。她还告诫人们不要相信未来的极权主义运动必然会共享纳粹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并写道“所有意识形态都包含极权主义要素”。

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极权制度和专制

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比较研究中的极权主义范式由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进一步发展，他们在这个话题上单独或合作进行了广泛的写作。他们类似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极权专政是一种新现象；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现象。”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将极权专政划分为一种专制政体，但认为这在重要方面与大多数其他历史独裁政体不同。特别是，它的特点是对现代技术和大众合法性的依赖。

不同于阿伦特，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所研究涉及的极权专政不仅包括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权，也包括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政权。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还确定了所有专制国家共有的其他特征，例如“严格控制与宽松控制之间的波动”。政权在强烈压制时期和相对自由时期之间交替，通常由不同的领导人代表。这在某

种程度上取决于不同领导人的个人性格，但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认为，还有一个潜在的政治周期，在这种政治周期中，不满情绪的加剧导致压制的加剧，直至消除反对派，然后放松控制，直至下次人们的不满情绪开始加剧。

因此，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置于更广泛的专制政府的历史传统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极权主义的专政是使专制制度适应了二十世纪的工业社会。”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坚持认为极权专政是一种“新型的专制政体”，并认为20世纪的极权政权，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权，彼此之间有更多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包括过去的历史独裁政权，都要多。极权主义只能在现代技术产生之后才存在，因为这种技术对于宣传来说至关重要，以及监视人口，还有秘密警察的行动。此外，在谈到法西斯政权和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时，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坚持认为，两种极权政府“基本相同”但“并非完全相同”。在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指出的主要区别中，特别指出了共产党人寻求“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事实，而法西斯主义者则希望“确立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帝国统治地位”。

极权制度的五个支柱

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相似性方面，弗里德里希列出了它们共有的五个主要方面：首先，社会上所有成员应该遵循的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一个完美的导引，引向一个终极的美好状态目标。第二，一个由最积极的官方意识形态支持者组成的政党，代表社会上的精英团体（不超过总人口的10％），并按照严格的路线组织。第三，在党或

其代表手中“对所有有效武装战斗手段进行控制的技术条件几乎完全垄断”。第四，该党在大众传播媒介和所有技术传播形式上享有类似的垄断权。第五，“恐怖警察控制系统”不仅用于捍卫政权对抗真正的敌人，而且还逼迫各种只被怀疑是敌人或将来有可能成为敌人的人。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表示，任何极权政府的两个关键是独裁者和党。独裁者，无论是斯大林，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明确拒绝有关党或任何其他机构可以极大地抵消纳粹主义或斯大林主义中独裁者力量的说法。独裁者需要政党才能统治，因此他可能会谨慎行事，不要做出直接违背党内其他主要党员意愿的决定，但最终的权力在于他，而不是他们。像阿伦特一样，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也将领导者周围的人格崇拜确定为极权专政的基本要素，并特别提及了斯大林的人格崇拜。他们还提请注意以下事实：希特勒和斯大林被期望为其政府提供意识形态指导，而不仅仅是实际领导。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写道：“与过去的军事独裁者不同，但与某些原始酋长一样，极权独裁者既是统治者又是大祭司。” 也就是说，他不仅执政，而且提供了他的政府所依据的原则；他不仅是政治领袖，也是精神领袖。这部分是由于极权政府的产生方式。他们是在好战的意识形态运动夺取政权时出现的，因此，极权政府的第一位领导人通常是建立了夺取权力运动的思想家，后来的领导人试图效仿他。

独裁者和他的帮手

极权独裁者需要忠诚的副官忠实地，合理地执行其命令。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随从中确定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认为两位独裁者使用相似的人来执行相似的任务。因此，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和乔治·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都是干练的行政官和官僚，而海因里希·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和拉夫蒂尼·贝里亚（Lavrentiy Beria）是残酷的秘密警察局长，负责压制对独裁者权力的任何潜在挑战。希特勒和斯大林都促进了副将之间的竞争和不信任，以确保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变得强大到足以挑战独裁者本人。这是极权主义政权一个重要弱点的原因：继承问题。弗里德里希指出，纳粹政府和斯大林政府都没有建立任何正式的继承路线，也没有任何机制来决定谁将在独裁者死后接替他。独裁者是被尊敬的"人民之父"，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永远不会有任何继承人，因为这样的继承人会在独裁者活着的时候对他的力量构成威胁。因此，独裁者不可避免的死亡将总是留下主要的权力真空，并引起政治危机。就纳粹政权而言，由于希特勒在战争中德国最终败北前几天就去世了，所以这从来就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的死导致了严重权力真空和政治危机。

极权主义政党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还确定了纳粹政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之间的主要相似之处，这使它们与其他类型的政党区分开来。它们以类似于独家俱乐部的方式对潜在成员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并经常进行会员制的政治清洗，将大量人员逐出他们的行列（有时逮捕并处决那些被驱逐的人，例如在大清洗之夜）。因此，极权党的会员拥有非党员所没有的特权，而为了维持这种特权，党员必须完全服从领导者。尽管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要求党员在实践中表现出这种完全的忠诚，但他

们在理论上对待这种忠诚的方式却有所不同。纳粹主义公开宣称绝对服从是其主要思想原则。同时，斯大林主义是声称坚持民主原则，而党代会（由民选代表组成）据称是最高权力机构。但是，斯大林主义的选举通常只有一名候选人，而党代会很少开会，只是走过场地批准斯大林既有的决定。因此，无论其潜在的意识形态主张有何不同，纳粹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在实践中都是按照类似的路线组织的，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集中的领导权。

每个极权主义政党和独裁者都有特定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支持。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与阿伦特（Arendt）达成一致，认为纳粹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真正相信各自的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将其用作获取权力的工具。意识形态不同，目标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乌托邦式的重塑世界的决心，以及决心以任何必要的手段与真实或想象中的敌人作战。

根据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的观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所涉及的普遍性程度。斯大林主义和一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吸引力方面具有普遍性，并面向所有“世界工人”。另一方面，纳粹主义和一般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只能针对一个特定的种族或民族，即注定要统治所有其他民族的“优等种族”。

宣传与恐怖

极权独裁政权通过使用宣传和恐怖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认为这是密切相关的。恐怖可以通过逮捕和处决持不同政见者来实施，但也可以采取更微妙的形式，例如面临失业，社会污名和诽谤的威胁。“恐怖”可以指在日常生活中用来恐吓他人屈服的任何广泛使用的方法。根据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的说法，最有效的恐怖是它所影响的人们所看不见的。他们只是养成以顺从方式行事的习惯，而不是质疑。因此，恐怖活动创造了一个以明显共识为主导的社会，其中绝大多数人口似乎都在支持政府。然后使用宣传来维持这种公众同意的外观。

极权主义的宣传是将极权主义政权区别为现代政府形式并将其与较早的专制政体区分开来的特征之一，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对所有传播手段（不仅是大众传媒等公共传播手段，还包括私人传播手段例如信件和电话）拥有完全控制权，实行严格监控。宣传方法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非常相似。他们妖魔化敌人，并展示一幅团结的人民站在其领导人身后以对抗外国威胁的画面。纳粹政权和斯大林主义政权都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宣传方式—一种用于内部灌输，另一种用于欺骗其他国家的潜在同情者。在与前敌人和解或与前盟友交战时，这两个政权有时有时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宣传路线。

矛盾的是，极权政府对通讯的完全控制使政府自己被极度误导。独裁者没有办法让任何人发表批评，也没有办法知道他在普通民众中实际上得到了多少支持。他们总是宣布所有政府政策都是成功的；官员们无法确定什么政策有效，什么政策无效。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遭受这个问题的困扰，特别是在他们之间的战争期间。随着战争转向德国本土，人们越来越反对希特勒的统治，包括在军方内部；但希特勒直到7月20日叛乱阴谋爆发

时才意识到这一点，但为时已晚。1948年，在柏林封锁的初期，苏联领导层显然认为，西柏林的居民同情苏联共产主义，因此他们会要求加入苏联地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真正的民意与极权主义政府对民意的看法之间的鸿沟可能会扩大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甚至无法进行有效的宣传，因为它不知道人民的实际想法和看法。所以它不知道该告诉他们什么。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将此称为"宣传的仪式化"：极权政权继续将宣传作为一种政治仪式进行，对公众舆论影响不大。

逮捕，处决和集中营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详细分析了对大规模逮捕，处决和集中营的极权主义使用。他们认为，"极权主义恐怖活动以制度化的形式维持了最初产生极权主义的内战，而内战使该政权得以继续存在。"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认为自己是在与顽固的敌人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但是，宣布斗争已经胜利就意味着宣布不再需要政府的大多数极权主义特征。例如，如果没有需要寻找的危险叛徒，那就没有必要存在秘密警察部队。因此，必须将与内部敌人的斗争或"内战"制度化，并且必须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在斯大林的苏联，镇压机器最终转而针对那些昔日镇压他人的官员们。

纳粹集中营达到了极权恐怖的顶峰。从劳改营到灭绝营，范围广泛，Friedrich和Brzezinski将其描述为旨在"消灭该政权的所有实际，潜在和想象中的敌人"。由于大屠杀研究领域在撰写本文时仍处于早期阶段，因此并未详细描述条件，但确实将难民营称为"极端恶毒"。他们还将这些营地与苏联古拉格进行了比较，并强调使用集中营作为纳粹和斯大林政权一样

的惩罚和处决手段。但是，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古拉格（Gulag）营地没有任何经济目的不同，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辩称，它们为斯大林主义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廉价劳动力来源。

莫西·莱文（Moshe Lewin）和伊恩·克肖 Ian Kershaw）

德国和俄罗斯

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比较研究由摩西·莱文（Moshe Lewin）和伊恩·克肖（Ian Kershaw）等其他学者及其合作者进一步进行。列文和克肖在苏联解体后的写作中拥有更长的历史视野，并认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不像阿伦特，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新型社会的例子，而更多地被视为历史上的“反常现象”或不寻常的事物，偏离大多数工业社会应遵循的典型发展道路。

他们认为，比较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任务是解释为什么德国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背离历史规范。首先，Lewin和Kershaw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那次战争期间德国和俄罗斯的历史情况之间的相似之处。两国都是由专制君主制统治的，这些君主制在压力下不得不让步以迎合大众的要求。两国都有“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强大的军事传统”。两者都具有“强大的地主阶级”，同时还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两国都有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对中欧和东欧特别感兴趣。

系统的异同

伊恩·克肖（Ian Kershaw）承认，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在“其不人道的性质和程度”方面具有可比性，但指出，这两个政权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

人格崇拜

莱温和克肖把人格崇拜放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比较的中心，他们写道，两个政权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流派，其核心是领导力崇拜的人为建构-“伟大”的“英雄神话”。领袖，不再是国王或皇帝，而是“人民的人”。关于斯大林主义，他们强调了它的官僚主义特征，并通过将现代技术和最新的行政管理和宣传方法与古老的任意统治实践相结合，强调了它的官僚主义特征和“最现代与最古老的特征的融合”。他们将此与普鲁士人进行了比较；德国的军事传统在18世纪被称为“官僚专制主义”，并在20世纪的纳粹国家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克肖同意莫姆森（Mommsen）的观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领导人的重要性方面存在根本差异。斯大林主义有绝对的领导者，但他不是必不可少的。他可以被另一个代替。另一方面，纳粹主义是完全由其领导者定义的“经典魅力型领袖的运动”。斯大林主义有一个独立于斯大林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但对纳粹主义来说，“希特勒是意识形态的正统思想”，纳粹的理想就是希特勒的思想。在斯大林主义中，官僚机构是制度的基础，而在纳粹

主义中，领导人是基础。

莱温还着重比较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性格崇拜，以及他们在纳粹德国和苏联中的角色。他称他们为“希特勒神话”和“斯大林神话”，并认为它们在两个政权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希特勒神话”的作用是使纳粹统治合法化，而“斯大林神话”的作用不是使苏联统治本身合法化，而是使斯大林在共产党内部的领导合法化。斯大林的个性崇拜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斯大林知道他是可以替代的，并且担心自己会被替代，因此需要尽可能地增强他的权威。虽然“希特勒神话”对纳粹德国至关重要，但“斯大林神话”仅对斯大林而言至关重要，而不是苏联本身。

极权制度的内在不稳定

莱文与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一起认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政权的特征是“内在结构矛盾”，导致“固有的自我毁灭性”：他们依靠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官僚机构，试图对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复杂的规则和程序；这个官僚机构都完全由一个专制的个人控制，他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做出政策决定，经常在重大问题上改变主意，而无视他自己的官僚机构制定的规则和制度。官僚机构和领导者相互需要，但彼此之间的优先次序却相互削弱。相对于斯大林的苏联，莫姆森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纳粹继承了德国传统官僚机构的大部分，而苏联则很大程度上是从头开始建立自己的官僚机构。他认为，纳粹政权的许多非理性特征，例如浪费资源消灭不受欢迎的人口，而不是在战争努力中使用这些资源，都是由于纳粹国家功能失调而造成的。

按照领袖原则，在纳粹状态的所有决定权最终属于希特勒，但往往希特勒发出含糊笼统的指令，迫使其他纳粹头目胡乱猜测元首的意思。这种混乱在纳粹官员之间产生了竞争，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通过采取更加极端的政策来证明自己比他的竞争对手更加敬业。根据蒙姆森的说法，这场取悦希特勒的竞赛是纳粹非理性的真正原因。希特勒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念"而故意鼓励它。莫姆森认为，这代表了希特勒政权和斯大林政权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尽管进行了清洗，但斯大林的政权在建立稳定的官僚机构方面更为有效，因此即使没有斯大林，该制度也有可能维持自身并继续下去。另一方面，纳粹政权更加个性化，其政府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希特勒，无法建立任何持久的机构。

斯大林和希特勒

克肖还看到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的重大个人差异以及各自的统治风格。他将斯大林形容为"一个委员长，首席寡头，政党机器的首领"和"他的政党的产物"，他的上台只是因为他的政党的意志，以及他在该政党内部操纵权力杠杆的能力。相比之下，希特勒是基于他的魅力和大众吸引力而上台的，在纳粹政权中，是由领导者创建了这个政党，而不是相反。克肖说："斯大林是一个高度干预主义的独裁者，发出了一系列决定或干预政策的指令"，而希特勒"就政府行政而言是一个不干预主义的独裁者"，他更倾向于参与军事活动。希特勒的注意力集中于军事事务和征服计划，而不是政府工作的日常工作，并且只向下属提供有关民政事务的广泛口头指示，希望他们将其转化为政策。

尽管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两种制度都具有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但这些崇拜之间存在质的差异。斯大林的人格崇拜被“叠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共产党之上”，并且可以在不对政权进行重大改变的情况下被抛弃，或者被围绕其他领导人的人格崇拜所取代。另一方面，“希特勒神话”在结构上实际上是纳粹运动的基础。相信希特勒是德国民族的唯一救世主，这是纳粹主义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纳粹主义甚至无法想象希特勒的继任者。在克肖的分析中，斯大林主义是一个根本上的官僚体系，而纳粹主义则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描述的“超凡权威”的体现。斯大林主义没有领导者就可以存在，而纳粹主义则不能。

亨利·鲁索 Henry Rousso），尼古拉斯·沃斯（Nicholas Werth）和菲利普·伯林 Philippe Burrin）

历史学家亨利·鲁索（Henry Rousso），尼古拉斯·沃思（Nicolas Werth）和菲利普·伯林（Philippe Burrin ）也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研究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比较话题。

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差异

鲁索为卡尔·弗里德里希的工作辩护，指出弗里德里希本人只是说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可比的，而不是相同的。卢梭同时指出，极权主义的概念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被描述为极权主义的政权没有共同的起源，也没有以类似的方式出现。纳粹主义在极权主义政权中是独一无二

的，因为它在“一个拥有发达的工业经济和政治民主制度（甚至是更古老的政治多元主义）的国家”掌权。

鲁索认为，极权主义的所有其他例子，包括斯大林主义政权，“在农业经济中，在没有政治多元主义（更不用说民主）传统的贫穷社会中，在传统上盛行多种形式的暴政的文化中夺取了政权”。他认为这是极权主义概念的弱点，因为它仅描述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而没有考虑他们上台的方式截然不同的情况。

独裁者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冲突

尼古拉斯·沃斯（Nicolas Werth）和菲利普·伯林（Philippe Burrin）共同致力于对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比较评估，其中沃斯涉及斯大林主义政权，伯林涉及纳粹德国。他们研究的主题之一是独裁者在两种政权中究竟拥有多少权力的问题。沃斯（Werth）在研究斯大林政权时确定了两种主要的史学方法：那些强调约瑟夫·斯大林本人所行使的权力和控制权，将苏维埃政府的大部分行动归因于他的计划和决定的人，以及那些主张斯大林主义的人。斯大林没有预先确定的行动方针，他对事态发展做出反应，而且苏联官僚有自己的议程，这常常不同于斯大林的意愿。沃思（Werth）认为有两个错误的极端，一个是以为斯大林无所不能，另一个是以为他像一个软弱的独裁者。但是，他认为，相互竞争的观点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斯大林苏联的两种不同形式的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关注，即（1）“行政指挥系统”，官僚主义，抗拒变革但有效地管理着苏维埃；（2）“斯大林和他的少部分董事干部以粗暴专政的方式经营国家”的战略。因此，沃思同意莱温的观点，认为苏联官僚机构的优先事项与斯大林自己手中的绝

对权力积累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沃思认为，正是这场悬而未决的冲突导致了斯大林政权对自己的政党和国家干部进行大清洗和使用恐怖。

像克肖和勒温一样，伯林说纳粹主义中的领导人与其政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斯大林主义不同。不同于斯大林继承了现有制度和意识形态、并以自己为列宁主义政治传统的继承人，希特勒自己创造了自己的运动和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是“由德国人民派来的弥赛亚”。就像海因里希·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喜欢说的那样，人们为此一直期待着几个世纪甚至2000年。因此，由于纳粹党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支持和跟随希特勒，因此该党与希特勒之间不会存在真正的冲突。但是，由于纳粹主义是与传统保守的精英，工业家和军队结盟的一部分，因此领导人与国家官僚机构之间可能存在分裂的可能。

与苏联不同，纳粹德国不是建立自己的国家新政府，而是继承了上届政府的国家机制。这为纳粹立即提供了有能力，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和军事指挥官，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纳粹政权必须依靠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不是纳粹的政府之人的合作，并且他们的忠诚度值得怀疑。只是在战争期间，纳粹德国征服了大片领土并不得不为它们建立纳粹政府，才创建了全新的纳粹官僚机构，而没有德国传统精英的任何投入或参与。这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区别：当斯大林主义苏联征服领土时，它创造了自己的较小副本，并将其设置为占领国政府。另一方面，当纳粹德国征服领土时，它并没有试图在当地复制德国政府的副本。取而代之的是，它尝试了不同的权力结构和政策，常常反映出“当地社会的纳粹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德国本身的纳粹化程度”。

恐怖和暴力的作用

沃思（Werth）和伯林（Burrin）研究的另一个主要话题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政权所使用的暴力和恐怖。沃思报道说，斯大林主义苏联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而“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端的残酷对待”，以“在十年内获得一百年的历史，并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强国”。这种转变是以大规模暴力和社会政治蜕变为代价的，这种转变被沃思称为“军事封建剥削”。斯大林政权使用的暴力类型包括剥夺公民权利，大规模逮捕，将整个民族从苏联的一部分驱逐到另一部分，古拉格（Gulag），大规模处决（尤其是在1937–1938年的大恐怖期间），以及最重要的1932–1933年的大饥荒。从上到下，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受到斯大林主义镇压的影响。在最高层，共产党的高级成员被逮捕并被处决，理由是他们策划了对斯大林的阴谋（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迫在演出的审判中承认虚构的罪行）。在最底层，农民遭受了大饥荒（特别是在乌克兰），甚至在饥荒时期之外，他们都面临着非常高的粮食征收配额。

沃斯（Werth）确定了四类人，这些人成为了苏联斯大林主义暴力的目标。他从最小到最大列出了它们。第一组也是最小的一组，由斯大林的许多前战友组成，他们参加了革命并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对斯大林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在斯大林上台之前就已经认识他，并且可能揭露他的个性崇拜所提出的许多错误主张。第二组由中层共产党官员组成，他们在193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大清洗期间遭到大规模逮捕和处决。消除他们有双重目的，因为这会使得斯大林将权力集中在克里姆林宫而不是区域中心，而且还为他提供了“腐败官员”，他可以将过去的政治经济政策失败归咎于他们。沃思将这一点与沙皇的传统相提并论，后者将不受欢迎的政府行动归咎于“坏官僚”而非沙皇自己。第三组由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组成，他们为

了应付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状况而从事小额犯罪，例如从田地里拿些小麦或从工厂里偷来工具。这种小规模犯罪非常普遍，并经常受到惩罚，就好像它是出于政治反对苏联的动机蓄意破坏一样。第四类也是最大的类别，是由于集体不忠于斯大林或苏联国家而遭到驱逐、饥荒或任意逮捕的族裔群体。其中包括针对乌克兰人的大饥荒，驱逐涉嫌亲德国的种族群体，例如伏尔加日耳曼人，克里米亚人，车臣人和其他人，并最终还迫害犹太民族，尤其是当斯大林在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变得越来越反犹太人。

伯林对纳粹政权进行的暴力研究始于以下观察："暴力是纳粹主义的核心"，纳粹暴力"被确立为一种学说，并在言语中得到崇高地位"。据布林说，这标志着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斯大林主义中，关于暴力，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苏维埃政权不断否认它是压制性的，宣称自己是和平的捍卫者，并力图掩盖所有相反的证据。另一方面，在纳粹主义中，"理论与现实从一开始就融合在一起"。纳粹主义不仅实行暴力镇压和战争，而且在口头原则上也主张这样做，认为战争是人类文明的积极力量，并公开寻求"德国人对欧洲大陆的统治"。

伯林确定了纳粹暴力的三种动机，即政治压迫，排斥和社会压制，以及种族政治。首先，政治压迫在许多独裁政权中很普遍。纳粹的目的是消灭他们真正或想象中的政治对手，首先是在德国内部，然后是在战争期间的被占领土地。这些反对者中有一些被处决，另一些则被关押在集中营中。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政治镇压的第一个目标是一般的左翼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在1930年代中期之后，镇压扩大到神职人员，后来又扩大到保守派反对派，尤其是在1944年暗杀希特勒的失败尝试之后。甚至在战争之前，广泛使用了死刑。在战争期间，政治压制在德国内部，以及新占领的领土上大大扩展了。战争开始时，集中营中的政治犯只有约25,000人。到

1945年1月，他们已经膨胀到714,211，其中大多数是非德国人，他们被指控密谋反对德国帝国。

纳粹暴力的第二种类型是由排斥和社会压制引起的，这种暴力旨在驱赶德国社会中的、其生活方式被视为与纳粹政权的社会规范不符的人，即使其中涉及的人种族纯洁、且身体健全。这些人分为两类：同性恋者和“团体”。“团体”只是模糊地定义，包括“吉普赛人，流浪汉，乞丐，妓女，酗酒者，拒绝任何工作的失业者以及经常或无缘无故地离开工作的人”。

纳粹暴力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是迄今为止最广泛的，是由纳粹种族政策引发的暴力。这既是向内的，是为了清除“劣等”元素的“雅利安人”和不值得一命的人，也旨在向外，以消灭“劣等的人”。被认为身体或精神上不合适的德国人是第一批受害者。纳粹政权的第一部法律规定，必须对患有肢体残疾或精神疾病的人进行绝育。后来，作为“安乐死”计划（称为Aktion T4）的一部分，绝育被谋杀精神病患者和重度残疾人所取代。伯林指出，这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目的，因为被谋杀的人不可能是该政权的政治反对者，因此动机纯粹是种族意识形态问题。然而，纳粹暴力行动中最系统，最大规模的是针对“种族劣等”的非德国人口。如《总纲计划》中的规定，纳粹希望消灭东欧的大部分斯拉夫人口，部分通过驱逐和部分谋杀来消除，以确保德国人聚居和殖民地的土地。然而，更紧迫的是，纳粹希望消灭欧洲犹太人，他们认为这是德国人的顽固种族仇敌。这最终导致了大屠杀，纳粹屠杀犹太人。与所有其他目标人群不同，犹太人将被彻底消灭，没有任何个人例外。

迈克尔·盖尔（Michael Geyer）和希拉·菲茨帕特里克 Sheila

Fitzpatrick）

在《超越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一书中，对极权主义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该词首先是作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自我描述的术语进入政治讨论，后来才用作纳粹德国与苏联比较的框架。他们争辩说，极权主义国家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单一或由意识形态驱动。盖尔和菲茨帕特里克将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苏联描述为"在他们的对立中动摇了世界"的"强大，具有威胁性和传染性的独裁政权"。他们没有称他们为"极权主义者"，而是确定了他们的共同特征，包括种族灭绝，无所不能的政党，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以及普遍侵犯自由的行为。但是，他们认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并不代表一种新型的独特政府，而是可以将它们置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转向独裁统治的更广泛背景下。他们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是20世纪欧洲独裁统治中"最杰出，最顽强，最暴力的"。它们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是因为它们具有"震惊与敬畏"和纯粹的残酷性，但是在表面的相似之处之下，它们却根本不同，并且"当进行一对一比较时，两个社会和政权也可能来自不同的世界。"

盖尔和菲茨帕特里克认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因为它们都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并试图使生活的各个方面服从其各自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分歧，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相互对立，并视对方为敌人。另一个主要区别是，斯大林创建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政权，而纳粹德国则具有"短暂的，爆炸性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主义创造的稳定状态是基于一个全新的精英阶层，而纳粹主义尽管得到了传统精英的支持，却未能实现稳定。盖尔和菲茨帕特里克认为，两个政权相互借鉴，特别是在宣传技术上，尤其是在建筑和电影院，以及在国家监督和反犹太主义方面。同时，他们俩都坚决拒绝互相借用任何东西。尽管他们的宣传方法相似，但内容却不同。例如，苏联战时的宣传是围绕抵抗帝国侵略的思

想，而纳粹的宣传则是关于种族征服的战争。盖尔和菲茨帕特里克还注意到，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试图创造一个“新人（类）”，即“一个完全现代，自由和自以为是的人（类）”，尽管他们对“新人”的看法不同。

生物政治学，优生学和社会工程学

在盖尔和菲茨帕特里克编辑的其他著作中，戴维·霍夫曼和安妮特·蒂姆都在讨论生物政治学与纳粹和斯大林政权的关系。两国政府都高度关注各自人口中的低生育率，并运用了广泛而侵入性的社会工程技术来增加出生人数。苏联和纳粹德国的生殖政策是通过其医疗保健系统实施的，这两个政权都将医疗保健视为其发展新社会的主要支柱。苏联不得不从头开始设计公共卫生保健系统时，纳粹德国建立在1883年德国已存在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上，当时奥托·冯·俾斯麦的立法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共卫生保健体系。纳粹将德国的医疗体系集中起来，以在其上实施纳粹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并用专门用种族卫生和纳粹意识形态其他组成部分的新机构取代既有的自愿性政府福利机构。

两种政权的方法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斯大林的苏联从未像纳粹那样正式支持优生学，苏联政府称优生学为“法西斯主义科学”。两种制度在家庭与有偿劳动之间的关系上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纳粹主义促进了男性单工的家庭（丈夫工作，妻子担任家庭主妇），而斯大林主义则促进了双工收入的家庭（夫妻都在外从事工作）。

大规模暴力，仇外心理和对少数民族的迫害

克里斯蒂安·盖拉赫（Christian Gerlach）和尼古拉斯·沃思（Nicolas Werth）在同一卷书中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大规模暴力的话题，以及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使用它的方式。无论斯大林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比如在大恐怖的苏联1937年至1938年，和纳粹大屠杀的纳粹德国和二战被占领土。

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利用了由国家特工，苏联的NKVD和纳粹德国的党卫军领导的拘留营。他们都基于仇外心理对少数群体进行暴力，纳粹的仇外暴力被直言不讳，但被合理化为针对那些“反对社会分子”，而斯大林主义者的仇外暴力被伪装为反对“反苏维埃”、“反革命”和“对社会有害”元素。斯大林主义苏联建立了“特殊定居点”，驱逐了包括前罪犯，罪犯，流浪者，被剥夺公民权和被贬低身份的“社会有害分子”或“社会危险分子”。这些“特殊定居点”主要在西伯利亚最北部，乌拉尔或其他不适宜居住的地区。1933年7月，苏联有效地根据种族将5000名罗曼人大规模逮捕，并将他们当月驱逐到西西伯利亚的“特殊定居点”。

纳粹政权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政治观之上的，它设想将东欧的大多数人口驱逐或消灭，以便为德国人定居者开放“生活空间”。这主要是在德国最终在占领战争中获胜之后进行的，但是在战争仍在进行的同时，已经开始采取步骤。例如，到1942年底，纳粹已将365,000名波兰人和犹太人从他们在波兰西部的原有房屋驱逐出境。另有194,000名波兰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没有被驱逐到另一个领土，而是被驱逐出了家）。纳粹还驱逐了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的10万人，以及54,000斯洛文尼亚人。

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期，苏联实行斯大林主义种族驱逐政策，共有300万苏维埃公民被迫迁移。第一次重大种族驱逐事件是在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在此期间，大约有60,000名库班哥萨克人被集体刑事指控与抵抗社会主义和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有联系。从1935年到1936年，苏联驱逐了居住在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波兰和德国血统的苏维埃公民，并将芬兰和苏维埃边界的芬兰血统苏维埃公民驱逐。从1935年到1936年的这些驱逐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家庭。从1937年9月至10月10日，苏联当局将朝鲜少数民族从其与日本控制的朝鲜接壤的远东地区驱逐。从1937年9月至1937年10月，有170,000多名韩国人被驱逐到苏维埃中亚的偏远地区。这些基于种族的驱逐反映了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新趋势，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理由的“苏联仇外心理”；这也是基于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纳粹德国于1941年对苏联宣战后，苏联发起了又一轮大规模的民族驱逐。第一批目标是苏维埃日耳曼人。在1941年9月至1942年2月之间，有90万人被大规模驱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占整个苏维埃日耳曼社区的70％。第二波大规模驱逐是在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之间，苏联当局驱逐了六个民族，例如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克里米亚人，英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和卡尔梅克人，总数达9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还进行了一些规模较小的行动，涉及对侨民少数群体的种族清洗，其中成千上万的克里米亚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伊朗人，Khemshils，Kurds和Meskhetian土耳其人被驱逐出黑海和跨高加索边界地区。

车臣族和印古什族是斯大林苏联专门迫害的两个民族。与可能被怀疑与具有相同种族背景的外国有联系的其他民族不同，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完全是

苏联的土著人民。这两个族裔并没有被指控与外国敌人合作，而是被认为具有与苏联文化不符的文化，而当局声称苏联工会必须介入以"改造"这些文化。其中涉及将500,000车臣人和印古什从高加索地区逮捕并驱逐到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驱逐还涉及数千人的彻底屠杀，被驱逐者面临严峻条件；他们被放到没有密封的火车上，在为期四周的旅途中几乎没有食物，许多人因饥饿和疲惫而死亡。

纳粹和斯大林驱逐的主要区别在于目的。纳粹德国寻求种族清洗，以允许德国人定居到清洗后的领土，而斯大林的苏联则进行种族清洗，以从战略上重要的地区驱逐少数群体。

其他学者

斯坦利·佩恩（Stanley Payne）在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中说，尽管纳粹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经常表示认识到，只有苏维埃俄罗斯才与他们的革命和意识形态对口。双方都着重强调建立一支由该党控制的常规武装力量的"党军"。以苏联为例，这是通过政治委员会来完成的，而纳粹德国在1943年为"国家社会主义指导官"引入了大致等效的领导角色。弗朗索瓦·弗雷特（FrançoisFuret ）在他的关于共产主义著作《幻觉的消逝》中评论说，希特勒很钦佩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并多次公开赞扬斯大林寻求净化苏联共产党中的犹太影响力，特别是通过清洗列昂·托洛茨基，格里高利·齐诺维耶夫，列夫·卡梅涅夫和卡尔·拉德克等犹太共产主义者。

理查德•派派斯（Richard Pipes）针对纳粹（Nazi）反犹主义与斯大林的反犹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1917年10月革命之后不久，苏联就采取了破坏犹太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做法。1918年秋天，苏联共产党成立了犹太人区Yevsektsiya，其明确使命是“破坏传统的犹太人生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希伯来文化”。到1919年，布尔什维克根据新颁布的反宗教法开始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希伯来语学校，图书馆，书籍和犹太教堂，并将其建筑物变成“共产党中心，俱乐部或餐馆”。斯大林上台后，反犹太主义在整个俄罗斯仍然很普遍，尽管苏联官方政策对此予以谴责。1952年8月12日，斯大林的个人反犹太主义变得更加明显，因为他下令处决苏联最杰出的犹太人作者，这被称为“被谋杀的诗人之夜”。死前不久，斯大林还组织了一次反犹太运动，即所谓的医生阴谋。许多研究机构都在关注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比较方法的分析，包括德国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极权主义研究学院，捷克共和国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和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

劳尔•纽马耶（Laure Neumayer）认为，“共产主义黑皮书”通过“使犯罪成为共产主义的本质”，为“使纳粹和共产主义罪行的对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政治话语中

在1920年代，在总理赫尔曼•穆勒（HermannMüller）的领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认为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对自由民主构成了同等危险。1930年，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说，这两个运动相互促进。他认为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德国共产党是“涂成红色的纳粹分子”。1939年

《莫洛托夫-里本特洛普特条约》宣布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希特勒主义是棕色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是红色法西斯主义”。

由捷克政府发起并由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Havel）等人签署的2008年《欧洲良心和共产主义布拉格宣言》，呼吁“对极权主义政权，尤其是共产主义政权的犯罪采取共同的做法”。它还呼吁“［全欧洲”理解，纳粹和共产主义极权政权各自在其有计划地实行极端恐怖形式，压制一切公民和人类的政策中具有破坏性；它们压制自由，发动侵略性战争，并且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消灭和驱逐整个国家和人口群体；因此，应将它们视为破坏了20世纪的主要灾难。”

由欧洲国家联盟组织在欧洲议会委托拍摄的2008年纪录片《苏联故事》，公布了档案记录，其中列出了成千上万在苏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逮捕的德裔犹太人。1937年至1941年，他们被移交给德国的Gestapo或党卫军官员。这些德国犹太人最初是在苏联寻求庇护的。纪录片指责斯大林政权通过逮捕这些寻求庇护者并将他们送回德国，成为希特勒大屠杀的帮凶。欧洲议会前主席兼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汉斯-格特·珀特林（Hans-GertPöttering）辩称，“极权主义制度（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类似且可怕的”。

在某些东欧国家，否认纳粹和共产主义罪行已被明确宣布为非法，捷克外交大臣卡雷尔·施瓦岑贝格（Karel Schwarzenberg）辩称，“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即以相同的标准来衡量极权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成员国之间缺乏共识，欧洲委员会拒绝了类似的欧盟范围内立法的呼吁。俄罗斯立法机关通过的声明说，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比较“亵渎了所有反

法西斯运动的退伍军人，大屠杀的受害者，集中营的囚犯以及成千上万为之牺牲生命的人。”英国新闻工作者和工党助手苏马·米尔恩（Seumas Milne）认为“冷战后的关于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叙述显明了，共产主义像纳粹主义一样可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Purge

大清洗

大清洗或大恐怖（俄语：**Большойтеррор**），也被称为的1937年Yezhovschina，是斯大林1936年至1938年在苏联进行的政治镇压。它涉及对农民的大规模镇压，种族清洗；共产党，政府官员和红军的清洗；广泛的警察监视；对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怀疑，监禁和任意处决。历史学家估计，1937-38年斯大林镇压导致的死亡总数在950,000至120万人之间。

“库拉克行动”和针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是大恐怖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两项行动加在一起占死刑的十分之一，占古拉格监狱营地刑期的四分之三。

在西方世界，Robert Conquest于1968年出版的《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使“大恐怖”这个词流行。其标题本身是一个历史典故，来自于法国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

斯大林（斯大林），莫洛托夫（Molotov），卡加诺维奇（Kaganovich），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米高扬（Mikoyan）和丘巴尔（Chubar）签署的“大清洗”清单。

镇压一词被正式用来针对当时被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起诉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和人民敌人的人。历史学家辩论了清除的原因，例如斯大林的妄想症，或者他希望从共产党中驱散持不同政见者

或巩固他的权威。清除工作始于红军，那里的行动很快被扩展到其他领域的清除工作。大多数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清除上层共产党领导群体的某些部分以及政府官僚和武装部队领导人，其中大多数是党员。这些运动还影响了社会的许多其他类别：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那些借钱或富裕的人）和专业人士。

NKVD的一系列行动影响了许多少数民族。许多清洗行动的受害者是波兰裔普通的苏联公民。

很多指控，尤其是在莫斯科表演审判中提出的指控，都是基于强迫逼供，通常是通过折磨，和宽泛解释的苏俄刑法第58条，其中涉及反革命罪。当时有效的苏联法律所定义的正当法律程序在很大程度上被NKVD三驾马车简易程序取代了。

数以十万计的受害者被指控犯有各种政治罪行（间谍，破坏，破坏，反苏煽动，准备起义和政变的阴谋）；他们被枪击迅速处决，或被送到古拉格劳教所。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暴晒和劳累过度的劳动大本营。在实验的基础上使用了其他处决受害者的方法。在莫斯科，有记录在案的汽油车被用来杀害受害者，或将其运送到Butovo射击场。

大清洗始于NKVD负责人Genrikh Yagoda的领导下，但在1936年9月至1938年8月达到顶峰的时期是在Nikolai Yezhov的领导下，故名Yezhovshchina。清洗活动是按照党的总路线进行的，通常是由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局直接下

达的。

背景

从1930年开始，党和警察官员担心，由于强迫农民集体化的动荡、和由此导致的1932–1933饥荒、以及数百万农民无节制地大规模迁移到城市而引起的“社会混乱”。战争的威胁加剧了斯大林对政治可疑人口的担心。他开始计划预防性地消灭那些人。

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929年，不久被赶出苏联。

在1933年，该党开除了大约40万人。但是从1936年到1953年，“政治清洗”这个词改变了它的含义，因为被开除出党意味着几乎可以肯定的逮捕，监禁和处决。

政治清洗主要是斯大林为消除过去和潜在反对派团体（包括分别由莱昂·托洛茨基和尼古拉·布哈林领导的左翼和右翼）的挑战所做的努力。继内战，并在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经济的重建，老布尔什维克不再认为有必要采取“临时”战时专政（它已经从列宁传递给斯大林）。斯大林在政治方面的反对者都指责他是不民主的，并且对官僚主义的腐败持松懈态度。对当前领导层的这种反对，可能通过攻击国家向其高薪精英提供的特权和豪华，在工人阶级中积累了实质性支持。作为回应，斯大林对党派实行了禁令，并禁止了那些反对他的党员，从而有效地结束了民主集中制。

在新的党组织形式中，政治局，特别是斯大林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决定者。这就要求消灭所有持不同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那些享有盛誉的革命家“老兵”。随着清洗工作的开始，政府（通过NKVD）对布尔什维克英雄（包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和贝拉·昆，以及列宁的多数政治局成员）进行了枪决，以寻求政策上的统一。NKVD袭击了这些“异端”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者，朋友和家人，无论他们是否住在俄罗斯。

1934年，斯大林以谢尔盖·基洛夫（Sergey Kirov）的谋杀为由发起了“大清洗”运动，其中约有100万人丧生。（后来一些历史学家开始相信斯大林故意安排了谋杀案，或者至少有足够的证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基洛夫是斯大林的坚定拥护者，但由于基洛夫在温和派中日益流行，斯大林可能将他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基洛夫被暗杀后，NKVD指控前反对派们杀害了基洛夫，以及他们越来越多的其他罪行，包括叛国，恐怖主义，蓄意破坏和间谍活动。

进行清洗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消灭任何可能的“第五纵队”。作为政治局成员的镇压参与者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拉扎尔·卡加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在整个清洗过程中都保持了这种辩解。他们每个人都签署了许多死亡名单。斯大林认为战争即将来临，受到明显敌对的德国和扩张主义日本的威胁。苏联媒体将这个国家描述为受到法西斯间谍内部威胁的国家。

从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一直使用针对布尔什维克敌人的镇压来作为灌输恐

惧和促进社会控制的系统方法，特别是在通常被称为“红色恐怖”的运动中。在斯大林统治下，这一政策得以继续并得到加强，在镇压加剧的时期，包括反对集体化的富农被驱逐出境，以及乌克兰的严重饥荒。大清洗的一个显着特征是，第一次将执政党的成员作为大规模镇压的对象。由于恐怖活动的规模，清洗的主要受害者是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党的清洗伴随着全社会的清洗。

莫斯科审判

莫斯科第一次和第二次审判

在1936年至1938年之间，举行了三场非常大型的针对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莫斯科审判；他们被指控与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强权合谋暗杀斯大林和其他苏维埃领导人，解散苏联并恢复资本主义。这些审判受到了广泛的宣传，并被外界广泛报道；审判中，昔日列宁最亲密的同伙们坦白承认最残酷的罪行，并请求判处自己死刑。

第一次审判是由1936年8月举行的所谓的“托洛茨基-卡梅涅维特-齐诺维耶维特-左派-反叛者革命集团”的16名成员组成的，其中主要被告是格里高利・齐诺维耶夫和列夫・卡梅涅夫；他们曾是布尔什维克两个最杰出的前政党领导人。在认罪之后，所有人都被判处死刑并立即处决。

1937年1月的第二次审判涉及17个较小的被称为“反苏联托洛茨基派中心”的人物，其中包括卡尔・拉德克，尤里・皮亚塔科夫和格里戈里・索科尼科

夫；他们被指控与托洛茨基密谋，后者据说与德国密谋。最终有13名被告被枪杀。其余的人在劳改所被判刑，在那里他们很快死亡。

1937年6月，包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一组红军指挥官的军事法庭也进行了秘密审判。

一些当时参加审判的西方观察员说，这是公平的，被告有罪。他们根据被告的供词进行了评估，这些供词是在公开法庭上免费提供的；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的供词是通过酷刑或精神药物而被提取的。例如，英国律师兼国会议员DN Pritt写道："再一次，胆怯的社会主义者再度充满疑虑和忧虑"，但"一旦烟雾从战场上散去，我们再一次充满信心。有争议的人将意识到，指控是正确的，供词真实，检控公正。"

现在知道，只有在对被告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酷刑之后才使之作出罪行供认。从前OGPU官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Alexander Orlov）和其他人的叙述中得知，用于提取供词的方法是：诸般酷刑，如反复殴打，模拟溺水，使囚犯连续数日不睡觉或站立，以及威胁要逮捕、处死囚犯的家属；例如，卡梅涅夫的十几岁的儿子被捕并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经过几个月的审问，被告绝望和精疲力尽。

Zinoviev和Kamenev要求政治局直接保证，作为其"认罪"的条件，挽救他们及其家人和追随者的生命。这个提议被接受了，但是当他们被带到所谓的政治局会议时，只有斯大林，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和叶佐夫出席了会议。斯大林声称他们是政治局授权的"委员会"，并保证不会执行死刑。审判后，斯大林不仅违背了免除被告死刑的诺言，还逮捕了大多数被告亲戚

并开枪射杀。

NKVD的主要执行者Vasili Blokhin在清洗期间执行了一些备受瞩目的处决。

杜威委员会

1937年5月，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在美国成立了莫斯科对莱昂·托洛茨基的指控调查委员会（通常称为杜威委员会），以确立莫斯科审判的真相。该委员会由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领导。尽管听证会显然是为了证明托洛茨基的清白进行的，但他们提出了证据，证明在审判中提出的某些具体指控可能是不正确的。

例如，乔治·比亚塔科夫（Georgy Pyatakov）作证说，他于1935年12月飞往奥斯陆，以“接受托洛茨基的恐怖分子的指示”。杜威委员会确定没有发生此类逃跑事件。另一被告伊凡·斯米尔诺夫（Ivan Smirnov）承认，在他已经入狱一年的时候，他于1934年12月参加了暗杀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的行动。

杜威委员会随后在422页的《无罪》一书中发表了调查结果。它断言所有在莫斯科审判中受到谴责的人都是无罪的。该委员会在总结中写道：

“独立于外部证据，委员会认为：

莫斯科审判的举动，让任何没有偏见的人意识到，莫斯科未作任何查明真相的尝试。

尽管供词必须得到最认真的考虑，但供词本身包含着固有的不可能性，因此委员会认为它们不代表真相，而不管获取这些供词的手段如何。

托洛茨基从未指示莫斯科审判中的任何被告或证人与外国势力就苏联达成协议，而托洛茨基则从未建议，策划或试图恢复苏联的资本主义。

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因此，我们认为莫斯科审判是有组织的造假和诬陷。"

右派分子的含义

在第二次审判中，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作证自己有罪时说："在托洛斯基派之外，还有一个第三组织"，还有"半托洛茨基派，四分之一托洛茨基派，八分之一托洛茨基派，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帮助。"所谓"第三组织"，是指布哈林领导的最后一个剩余的前反对派团体，称为右派。拉德克说："我对另一件事感到内疚：——即使在承认自己的有罪并揭露了右派组织之后，我仍然顽固地拒绝提供有关布哈林的证据。我知道布哈林的处境与我的情况一样绝望，因为我们的内疚即使不是从法律上讲，也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亲密的朋友，理智上的友谊比其他友谊更强。我知道布哈林和我一样处于动荡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让他束手无策地被交给人民内政委员会。正如我们其他干部一样，我希望布哈林自己放下武器。"

莫斯科第三次审判

负责进行大规模镇压的NKVD领导：Yakov Agranov；Genrikh Yagoda；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Stanislav Redens）。三人本人最终被逮捕并处决。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即1938年3月，被称为“二十一审判”，这是苏联最著名的审判节目，因为涉案人员和指控的范围将早期审判中所有松散的线索绑在一起。意思是过去的研究之大成，它包括了21名被告涉嫌属于所谓的“右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阵营”，由布哈林的前主席领导的共产国际，前总理阿列克谢李可夫，克里斯蒂安·拉科弗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和根里克·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果达。

Yagoda是被告中的一员这一事实表明，清洗剂正在迅速地自毁。现在据称，布哈林和其他人试图从1918年起暗杀列宁和斯大林，以毒药谋杀马克西姆·高尔基，分割苏联，并将其领土移交给德国，日本和英国，以及其他荒谬的指控。

甚至以前接受早期审判定论的同情观察者也发现，随着这些新指控变得越来越荒谬，他们难以接受这些新指控，而且清除行动扩大到除斯大林和加里宁之外几乎所有在世的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斯大林时代的所有其他犯罪审判活动，没有哪一个像针对布哈林的审判活动那样引起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关注；布哈林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地位的理论家。对于一些著名的西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例如Bertram Wolfe，Jay Lovestone，Arthur

Koestler和Heinrich Brandler，莫斯科对布哈林的审判标志着他们以苏联共产主义的彻底分道扬镳；甚至，前三个人最终变成了热情的反共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布哈林的认罪象征着共产主义统治的卑劣无耻，这不仅摧毁了那些心向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而且使他们陷入自省和自责。

布哈林的认罪

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于1938年被处决。

庭审的第一天，克雷斯汀斯基（Krestinsky）拒绝了书面供词，并对所有指控均表示无罪，引起了轰动。然而，第二天他在被采取“特殊措施”后改变了无罪诉求，这使他的左肩脱臼。

在审讯中，布哈林最初坚持了三个月，但对他的年轻妻子和婴儿儿子的威胁加上“身体上的影响方法”使他不堪重负；随后，他交出认罪供词。但是，当他看到斯大林亲自修改并更正后的、他的供词时，他撤回了全部供词。审讯由数量加倍的审问员们重新开始。

布哈林的认罪自白尤其引起西方观察家的讨论，激发了科斯特勒广受赞誉的小说《中午的黑暗》和莫里斯·梅洛-庞蒂的《人道主义与恐怖》的哲学论文。他的供词与其他供词有些不同，虽然他承认“犯罪总数”，但他否认有关具体犯罪的知识。

结果是各种自白的供词（作为为“恢复资本主义”工作的“堕落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对审判的微妙批评的奇怪混合。布哈林用以下文字结束了最后的认罪自白：“我的罪行的可怕性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在苏联斗争的新阶段。也许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严峻教训，也许苏联的强大力量已为所有人所认识。”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等人写信给斯大林（Stalin）寻求宽大处理布哈林，但除拉科夫斯基（Rakovsky）和其他两名被告（他们在1941年NKVD囚犯屠杀中丧生）之外，所有主要被告均被处决。尽管斯大林承诺布哈林饶了他的家人，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里纳，被送到劳改营。但她活了下来，看到她的丈夫死后半世纪以后被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平反。

“前富农”和其他“反苏联分子”

1937年7月2日，在一项最高机密命令中，斯大林指示各个区域党和内务人民党首领在他们所在的地区整理“富农”和“罪犯”的数量清单。这些人将被逮捕并处决，或被送往古拉格营地。党的负责人在几天之内就编制并列出了这些清单，其中的数字大致相当于已经受到秘密警察监视的人群数量。

1937年7月30日，第00447号NKVD命令颁布，针对“前富农”和其他“反苏维埃分子”（例如沙皇政权的前任官员，除共产党以外的前政党成员等）。根据NKVD三驾马车的决定，他们将被法外处决或送往古拉格监狱。

这些人包括：以前被驱逐到该国荒凉地区的“特殊定居点”（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远北地区）的“前kulaks”，前沙皇公务员，前任高级人员白军，农民起义者，神职人员，被剥夺投票权、非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前成员，普通罪犯，贼，和其他各种“对社会有害的分子”。另外，大批人是出于谴责政府，或因为与被捕者有亲戚关系、或认识已经被捕的人，而被随机逮捕。工程师，农民，铁路工人和其他类型的工人在“库拉克行动”中被捕，原因是他们在重要战略地点和工厂附近工作；这些地方由于“疯狂的节奏和计划”而发生了工作事故；在此期间，NKVD重新审理了这些案件，并将其标记为“蓄意破坏”事件。

白俄运动的剩余领导人之一叶夫根尼·卢德维格·卡洛维奇·米勒（Yevgeny-Ludvig Karlovich Miller）在1937年被内务人民党绑架，并在19个月后被处决。东正教神职人员，其中包括活跃基督徒，差点全军覆没：神职人员的35,000成员的85％被逮捕。尤其容易受到镇压的还有所谓的“特别定居者”（spetzpereselentsy），他们受到警察的永久监视，构成了巨大“敌人”。在大恐怖袭击中，至少有100,000人被捕。

盗贼，“违反证照制度的人”等普通罪犯也得到了简易处理。例如，在莫斯科，在布托沃射击场被处决的20,765人中，近三分之一被指控犯有非政治犯罪。

大清洗开始以后不久，地区NKVD和党的老板要求斯大林增加逮捕人数，以此来表达对他的仰赖并表明他们的忠诚奉献精神。同时，斯大林和叶佐夫

也主动提高了清洗配额。根据尼古拉斯·沃斯（Nicolas Werth）的说法，“例如，1937年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将被镇压的人数增加了12万（第一类为63,000人，第二类为57,000人）； 1938年1月31日，斯大林下令进一步增加57,200人，其中48,000人将被处决。”

为了进行大规模逮捕，NKVD的25,000名国家安全人员配备了普通警察，Komsomol（青年共产主义同盟）和平民共产党员。警方试图填补配额，将人们聚集在市场和火车站，目的是逮捕“社会流浪者”。NKVD的地方单位为了达到他们的“最低限度的工作量”，并迫使被捕者认罪，他们长时间不间断地轮班工作，在此期间他们审问，折磨并殴打囚犯。在许多情况下，被捕者被迫在空白页上签名，随后审讯人以虚假的供词将其填写。

经审问后，这些档案提交给NKVD三驾马车，后者在没有被告人的情况下宣布了判决。在为期半天的会议中，三驾马车审理了数百起案件，判处死刑或对古拉格劳教所判刑。死刑可立即执行。死刑在夜间进行，无论是在监狱中还是在NKVD所管理的僻静区域中，这些地方通常位于主要城市的郊区。

“库拉克行动”是1937–38年间最大的一次镇压运动，共逮捕669,929人，处决376,202人，占已知处决总数的一半以上。

针对特定国籍和种族的行动

NKVD的波兰行动是此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根据记录，波兰行动中的NKVD受害者人数最多：143,810人被捕，111,091人被处决。斯奈德（Snyder）估计其中至少有八万五千是波兰人。其余人被"怀疑可能"是波兰人，没有进一步询问。总体而言，这些运动中的少数民族在大清洗的受害者中占36%，尽管在苏联人口中仅占1.6%；74%大清洗期间被捕的少数族裔被处决，而在库拉克行动期间被判刑的少数民族被处决的几率有50%。

NKVD第00486号命令处理了被捕者和处决者的妻子和子女。这些妇女被判处强迫劳动5至10年。他们的未成年子女被安置在孤儿院。没收所有财产。根据家庭的规模，这影响了多达20万至25万波兰背景的人。NKVD国家行动中，官员被授权逮捕并处决一定数量的所谓的"反革命者"；这些反叛者是由政府使用各种统计数据汇编而成的，还包括电话簿上的名字听起来像非俄国人的那些人。

NKVD的波兰行动是一系列类似的NKVD秘密法令的典范，这些法令针对的是苏联境内侨民，包括芬兰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中国人。对少数民族的行动中，这是最大的一个，仅次于"富农行动"受害者的数量。根据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说法，波兰裔是大恐怖中最大的受害者群体，占该国总人口的不到0.5%，但占被处决者的12.5%。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将大清洗期间30万人的死亡归因于"民族恐怖活动"，其中包括少数族裔和在1930年代初幸存的乌克兰库拉克人。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称斯大林在1930年代对波兰人的政策是"种族灭绝"；但是他并不认为"大清洗"是完全种族灭绝的，因为它也针对斯大林政治对手。

清洗军队

起初，人们认为有25％至50％的红军官员已经被清除。现在已知真实数字在3.7–7.7％的范围内。这种差异是系统地低估了红军官兵的真实人数的结果，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仅仅是被驱逐出党而被忽略了。1937年至1939年被清洗的军官中有30％获准恢复服役。

据称，这支军队的清洗是由德国伪造的文件支持的（据说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与德国高级司令部之间的往来书信）。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因为据称在创建文件时，图哈切夫斯基小组中八个人中的两个人已经被监禁，并且据称文件到达斯大林之时，清除工作已经在进行中。在莫斯科审判中引入的实际证据是从强迫供认中获得的。

更大范围的清洗

最终，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国革命或列宁苏维埃政府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布尔什维克都被清洗。大清洗以后，斯大林本人几乎是唯一一个还活着的。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1929年被迫流亡到苏联之外，但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拉蒙·默卡德（RamónMercader）暗杀。在10月革命和列宁1924年逝世之间的七名政治局委员中，四个被处决，一个（汤姆斯基）自杀，两人（莫洛托夫和Kalinin）活了下来。

但是，前布尔什维克前领导人的审判和处决虽然是最明显的部分，但只是清洗工作的一小部分。

NKVD的所有大规模行动的特征就是灵活性：首先，可以很容易地增加数字（即所谓的限制）。第二，将特定的囚犯枪杀还是送往监狱营地，完全由NKVD官员负责；第三，没有截止时间。

受害者在夜间被处决，无论是在监狱中，在NKVD总部地窖中，还是在僻静的地区，通常是森林。内务人民警察使用手枪射击了囚犯的头部。

知识分子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有2,000名作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监禁，另有1,500人在监狱和集中营中死亡。太阳黑子发展研究被评为非马克思主义之后，27名天文学家在1936年和1938年之间消失了。1933年，气象局未能准确预测危害农作物的天气，导致很多气象学家被清洗。但是，作家的损失特别大。在大清洗期间丧生的人包括：

钢琴家Khadija Gayibova，于1938年被处决。

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Dmitrii Mushketov于1938年被处死。

1938年8月2日，诗人曼德尔斯坦在教养所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于1938年12月27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集中营去世。

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几乎要被清洗，但据说斯大林把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说："不要碰这个乌云密布的人。"

作家艾萨克·巴贝尔（Isaac Babel）于1939年5月被捕，根据他的供词（其中有血迹），他"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派组织的成员，并被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Malraux）招募为法国做间谍。在最后的审讯中，他撤回了供认，并写信给检察官办公室，说他牵扯到无辜的人，但无济于事。Babel在NKVD三驾马车前受审，1940年1月27日，他在Butyrka监狱被枪杀。

作家鲍里斯·皮尔尼亚克（Boris Pilnyak）于1937年10月28日因从事反革命活动，从事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罪名而被捕。一份报告声称"他与安德烈·基德举行了秘密会议，并向他提供了有关苏联局势的信息。毫无疑问，基德在攻击苏联的书中使用了这些信息。" 皮尔尼亚克（Pilnyak）于1938年4月21日受到审判。在历时15分钟的诉讼中，他被判处死刑，不久后被处决。

剧院导演Vsevolod Meyerhold于1939年被捕，并于1940年2月因作日本和英国情报"间谍"而被枪杀。他的妻子女演员Zinaida Raikh在她的公寓中被谋杀。梅耶德（Meyerhold）在1940年1月13日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

"调查人员开始对我这样一个生病的65岁男人使用武力。我被迫面朝下躺着，他们用皮带殴打我的脚底和脊椎。接下来的几天，当我的那些部位被广泛的内部出血所覆盖时，他们再次殴打那些伤处，疼痛如此剧烈，以至于感觉像在这些敏感部位上倒了沸腾的水。我从痛苦中哭了起来。我恳求自己，希望通过告诉他们谎言可以结束这场磨难。在经过18个小时的审问后，当我躺下入睡时，我被自己的吟声惊醒，因为我像伤寒病人一样在抽搐。"

格鲁吉亚诗人Tiansian Tabidze因叛国罪于1937年10月10日被捕，并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在一个痛苦的幽默中，他只指认了18世纪的格鲁吉亚诗人贝西奇（Besiki）作为他在反苏联活动中的帮凶。他于1937年12月16日被处决。

Tabidze的终身朋友和诗人Paolo Iashvili早些时候被迫谴责他的一些同伙为人民的敌人，他用猎枪在作家联盟的大楼里开枪自杀。在死之前，他甚至被迫参加针对其他人的公开审判，该审判将他的许多同伙从作家联盟中赶下，从而有效地将他们判处死刑。当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斯大林在苏联的安全和秘密警察头子，进一步逼迫、威胁亚什维利检举Tabidze、否则他自己就要被NKVD逮捕和施以酷刑的时候，亚什维利自杀。

1937年初，诗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瓦西里耶夫（Pavel Nikolayevich Vasiliev）为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辩护、称之为“俄罗斯的良心”。他迅速于1937年7月16日被枪杀。

斯大林在努力学习黑格尔的辩证法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哲学家兼副校长扬・斯滕是斯大林的私人导师。（从1925年到1928年，斯大林每周两次上课，但他发现很难掌握一些基本思想。斯大林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产生了持久的敌意，他称之为“贵族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娇气反应”）。斯滕最终成为地下反对派团体的成员，后来该团体加入了由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领导的苏维埃反对派集团。1937年，斯滕是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被逮捕的。1937年6月19日，斯登被处死在Lefortovo监狱。

诗人尼古拉・克里尤夫（Nikolai Klyuev）因与苏联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于1933年被捕。他于1937年10月被枪杀。

出生于杜尔诺沃贵族家庭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尼古拉・杜尔诺沃（Nikolai Durnovo）于1937年10月27日被处决。他创建了俄罗斯方言分类，为现代科

学语言命名奠定了基础。

1937年11月3日，乌克兰剧院和电影导演莱斯·库尔巴斯（Les Kurbas）被杀。他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乌克兰最重要的剧院导演。

俄罗斯作家兼探险家马克西米利安·克拉夫科夫（Maximilian Kravkov）被捕，罪名是涉嫌参与“日本SR恐怖主义颠覆性间谍组织”。他于1937年10月12日被处决。

俄罗斯世界语作家和翻译尼古拉·涅克拉索夫（Nikolai Nekrasov）于1938年被捕，并被指控为“世界法西斯，间谍，恐怖主义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于1938年10月4日被处决。另一位世界语作家弗拉基米尔·瓦兰金（Vladimir Varankin）于1938年10月3日被处决。

剧作家和先锋派诗人尼古拉·奥利尼科夫（Nikolay Oleynikov）于1937年11月24日因“颠覆性写作”而被捕并被处决。

雅库特作家普拉顿·奥云斯基（Platon Oyunsky）被视为现代雅库特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于1939年在监狱中去世。

俄国戏剧家阿德里安·皮奥特罗夫斯基（Adrian Piotrovsky）负责为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制作梗概。于1937年11月21日被处决。

鲍里斯·舒米亚茨基，是1930年至1937年期间的、事实上对于苏联电影垄断的执行制片人。在苏联电影业的大清洗中，他被作为“叛徒”于1938年被处决。

汉学家朱利安·舒茨基（Julian Shchutsky）被判“日本间谍”罪，并于1938年2月2日被处决。

俄罗斯语言学家尼古拉·涅夫斯基（Nikolai Nevsky）是许多东亚语言的

专家，因被指控为“日本间谍”而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1937年11月27日，他与日本妻子Isoko Mantani-Nevsky一起被处决。

乌克兰戏剧作家Mykola Kulish于1937年11月3日被处决。

西方移民受害者

恐怖的受害者包括在大萧条时期移民到苏联找工作的西方移民。在恐怖高峰期，美国移民包围了美国大使馆，乞求护照以便离开苏联。他们被使馆官员拒之门外，之后被潜伏的NKVD特工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逮捕。许多人随后在Butovo射击场被枪杀。此外，有141名来自芬兰的美国共产党被处决并埋葬在Sandarmokh。127名芬兰加拿大人也被枪杀并葬在那里。

古拉格囚犯的处决

已经在古拉格营地服刑的政治犯也被大量处决。NKVD的00447号命令还针对“营地中最恶毒，最顽固的反苏联分子”，它们全都“被列为第一类”，即开枪射杀。NKVD特遣队处决了10,000人，但在秘密大规模行动中被枪杀的人数至少多出三倍；多数发生在1938年4月至4月。

蒙古大清洗

在1930年代后期，斯大林向蒙古派遣了NKVD特工，建立了蒙古版的NKVD三驾马车，并处决了成千上万被指控与“亲日间谍圈”有联系的人。佛教喇嘛占受害者的大多数，有18,000人在恐怖活动中丧生。其他受害者是蒙古贵族，政治和学术人物，以及一些普通的工人和牧民。到2003年，人们发现了包含成百上千名被处决的佛教僧侣和平民的万人冢。

新疆大清洗

亲苏联的新疆领导人盛世才在中国新疆推出了自己的清洗行动，该行动与1937年的斯大林大清洗一致。盛获得了NKVD的帮助。盛和苏联共同宣称破获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大规模阴谋和摧毁了苏联的“法西斯托洛茨基派别”。苏联的总领事加雷金・阿普雷索夫（Garegin Apresoff），马虎山将军，马绍武将军，马哈茂德・西扬（Mahmud Sijan），新疆省官方领导人黄汉昌和霍贾・尼雅兹（Hoja -Niyaz）都是该阴谋中的435名涉嫌阴谋者。新疆实际上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斯大林反对中国共产党。

时间线

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1936年10月– 1937年2月

改革安全组织，通过正式计划清除精英。

1937年3月– 1937年6月

净化精英；采取计划，对潜在侵略者的“社会基础”进行大规模镇压，从反对派中清除“精英”。

1937年7月– 1938年10月

大规模镇压“富农”，“危险”少数民族，反对派家庭成员，军官，农业和工业界的破坏分子。

1938年11月– 1939年

停止大规模行动，废除了许多法外处决机构，对某些大规模镇压组织者的镇压。

结尾

1938年夏天，叶佐夫被解职，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并最终受到审判和处决。斯大林的知己与格鲁吉亚同胞Lavrentiy Beria接任叶佐夫为NKVD的负责人。

然而，大规模逮捕和流放的做法一直持续到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政治处决还在继续。

在某些情况下，在叶佐夫（Yezhov）时代被捕的高级军事指挥部后来在贝里亚（Beria）时代被处决。例如，苏联元帅亚历山大·叶戈罗夫（Alexander Yegorov）于1938年4月被捕，1939年2月被枪杀（或死于酷刑）（他的妻子GA Yegorova于1938年8月被枪杀）；陆军司令伊万·费德科（Ivan Fedko），1938年7月被捕，1939年2月枪决；康斯坦丁·杜谢诺夫，1938年5月被捕，1940年2月被枪杀。Komkor GI Bondar，1938年8月逮捕，1939年3月处决。

波兰出生的苏联政治家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尔（Stanislav Kosior）对于1932年至33年乌克兰饥荒有一定责任；他于1939年被处决。

当1937–38年被处决者的亲属询问其命运时，NKVD告诉他们，被捕亲属被判处“十年无通信权”。当这十年期在1947-48年过去，但仍没有音信时，亲戚再次向MGB询问了他们的命运，这次被告知被捕者死于监禁。

西方反应

尽管前苏联领导人的审判被广泛宣传，但数十万其他人的逮捕和处决却没有。这些只有在少数前古拉格囚犯带着他们的故事来到西方时才在西方广为人知。西方的媒体不仅没有报道清除行动，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都试图使这些古拉格证人保持沉默或声名狼藉。根据罗伯特·孔奎特（Robert Conquest）的说法，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应当忽略古拉格的证据，以免法国无产阶级灰心。西方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法律行动，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些证据确定了以前劳改营囚犯作证的有效性。

根据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1968年出版的《大恐怖：斯大林三十年代的清洗》，就莫斯科对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审判而言，一些西方观察家无意或故意地忽视了那些指控和证据的欺诈性质；尤其是例如——（1）《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他通晓俄语；（2）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Joseph E. Davies）报告说：“针对叛国罪的裁决是合理的”；（3）和《苏联共产主义：新文明》的作者Beatrice and Sidney Webb。

虽然“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是在传播苏联路线”，但一些最关键的批评报道也是来自左派媒体，尤其是曼彻斯特卫报。美国记者HR尼克尔博克（HR Knickerbocker）也报道了死刑情况。他在1941年称他们为“大清洗”，并描述了四年来大清洗如何影响到“党，军方，海军，空军和空军领导人的四分之一，以保守的方式估计；以及，新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主管，科学家，等等”。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还写了关于去库拉化的文章：“保守的估计是，大约500万[库拉克]……一次或几年内死亡。”

斯大林死后，证据和研究结果开始出现。这显示了清洗的大规模程度。这些消息的第一个来源是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报告，该报告尤其影响了美国共产党报纸《每日工人》的美国编辑们；后者跟随《纽约时报》，全面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讲》。

平反

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谴责了大清洗运动。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秘密讲话（一个月后公开）；赫鲁晓夫称这次清洗是斯大林的“滥用权力”，对国家造成了巨大伤害。在同一讲话中，他认识到许多受害者是无辜的，并且是基于酷刑提取的虚假供认而定罪的。关于批评“大清洗”的新路线削弱了赫鲁晓夫政治对手的权力，并帮助赫鲁晓夫晋升为部长会议主席。从1954年开始，大清洗中的一些判决结果被推翻。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

切夫斯基和红军许多其他将军被宣布无罪（“平反”）。20世纪50年代，前政治局委员Rudzutak和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以及许多低级别的受害者被宣布无辜。直到1988年，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其他在莫斯科审判中被判有罪的人才得以平反。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被认为是俄国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但从未得到苏联的平反。

被处决的人数

官方数字显示，除古拉格（Gulag）死亡136,520人外，1937年和1938年可记录处决的总数为681,692人；而在大清洗期间，苏联镇压造成的死亡总数估计在950,000至120万之间，其中包括处决，拘留中的死亡以及因接受治疗而从古拉格释放后不久死亡的人。该估计值总结了各种档案文件的比较分析结果。

斯大林的角色

具有档案访问权限的历史学家已经证实，斯大林与恐怖活动密切相关。斯大林亲自指示叶佐夫折磨那些没有作出适当认罪的人。除了批准酷刑外，斯大林还在1937年和1938年亲自签署了357份清单，亲自授权处决约40,000人，其中约90％确认被枪杀。在审查一份这样名单的时候，据说斯大林一边在看名单一边小声说：“十年、二十年以后，谁还会记得这些名单上的人是怎么死的？当年伊凡雷帝沙皇杀过的人，谁还会记得他们？没有人记

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he_Soviet_Union_(1927%E2%80%931953)

苏联历史（1927–1953）

苏联的1927年和1953年之间的历史涵盖了斯大林主义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及斯大林的逝世。他试图摧毁他的政治敌人，同时用中央规划、特别是通过农业的集体化和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改造苏联社会。斯大林在党和国家内巩固了他的权力，并推行了广泛的人格崇拜、苏联秘密警察制度和大规模政治动员活动。共产党是斯大林塑造苏联社会的主要工具。斯大林实现其目标的方法，包括党派清洗，对一般民众的政治镇压和强迫集体化；这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在古拉格、劳教所和饥荒期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苏联历史学家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摧毁了苏联大部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分之二的死亡人数是苏联公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军队占领了东欧，在那里建立或支持共产党傀儡政府。到1949年，西方集团与东方（苏联）集团之间开始了冷战。苏联阵营的华沙条约组织（创建于1955年）与北约（创建于1949年）在欧洲发起了冷战。1945年后，斯大林并未直接从事任何战争，继续他的极权统治，直到他于1953年去世。

苏联国家的发展

实践中的工业化

国家计划动员资源，扩大了该国的工业基础。从1928年到1932年，工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生铁产量，从每年330万吨增加到每年620万吨。煤炭产量是现代经济和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基本燃料，从3,540万吨增加到6,400万吨，铁矿石的产量从570万吨增加到1900万吨。许多工业园区，例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莫斯科和高尔基汽车厂，乌拉尔山脉和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械厂以及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工厂已经建造或正在建造中。

实际上，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人的生活水平趋于下降而不是上升。斯大林关于“加强工作纪律”的法律使情况变得更糟：例如，1932年对RSFSR劳动法法规的更改，使无故旷工一天的工人就会被解雇。被解雇意味着失去“口粮和商品卡的使用权”，以及“丧失使用公寓的权利”，甚至被列入新工作的黑名单，这完全意味着挨饿的危险。但是，这些措施并未得到充分执行，因为经理们很难替代这些工人。相比之下，1938年的立法引入了劳工手册，随后对劳工法进行了重大修订。例如，缺席甚至迟到20分钟就是被解雇的理由。未能执行这些法律的管理人员将面临刑事起诉。后来，至1940年6月26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工人每天必须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七天，以及禁止未经许可的劳工和上班族从工厂和办公室离职”；以强制性的刑事处罚取代了1938年的修订版；无故辞职将面临2-4月监禁，迟到20分钟面临6个月缓刑和25％的罚款，等等。

根据这些数据，苏联政府宣布仅在四年内完成了五年工业生产计划，而致力于重工业的部门则完成了108％。1932年12月，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宣布

了该计划的成功，因为增加煤炭和铁的产量将推动未来的发展。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37年）中，在第一个计划的巨大投资的基础上，工业发展迅速，很快达到了计划的目标。到1937年，煤炭产量为1.27亿吨，生铁为1,450万吨，军械工业得到了飞速发展。

在实现工业能力的飞跃的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工业工人极为苛刻。任务配额很难实现；矿工被要求每日工作16到18个小时。未达到任务配额可能会导致叛国罪。工作条件差，甚至是危险的。由于集体化以来工业资源的分配以及生产率的下降，发生了饥荒。在工业园区的建设中，古拉格的囚犯营地被用作奴役资源。但是在第二个计划期间，情况迅速改善。在整个1930年代，工业化与技术和工程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对弹药生产的日益重视相结合。

从1921年到1954年，警察局高强度运作，寻找被指控破坏该政权系统的任何人。大约有370万人因涉嫌反革命罪而被判刑，其中包括60万被判处死刑，240万被判处劳教所和70万被判遣返。斯大林主义的镇压在1937-38年的大清洗期间达到了顶峰，这使许多熟练的管理人员和专家被免职，并在1937年大大减缓了工业生产。

经济

农业集体化

根据新经济政策（NEP），列宁不得不容忍私有农业的持续存在。他决定等待至少20年，然后再将其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同时专注于工业发展。但是，在斯大林上台之后，集体化的时间表被缩短到仅仅五年。随着新的强制措施的实施，对食品的征收激增，尤其是在苏联的主要谷物产区。加入kolkhozes（集体农场），农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私人土地和财产。每次收获时，集体农庄的产品都以国家设定的低价卖给国家。但是，集体化的自然进展缓慢，中央委员会1929年11月的全体会议决定通过武力加速集体化。无论如何，俄罗斯的农民文化形成了传统主义的堡垒，阻碍了苏维埃国家的目标。

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国家寻求加强对农业的政治控制，以养活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并通过增加谷物出口获得外汇来源。由于起步较晚，苏联需要进口大量重工业化所需的昂贵技术。

到1936年，大约90％的苏联农业已经集体化。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经常宰杀牲畜而不是将牲畜交给集体农场、让国家用这些牲畜去收获和运送征收的谷物。“富农”被强行安置到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北部。但是，几乎任何反对集体化的人都被视为“富农”。1929年底，斯大林制定了清算小农阶级的政策，这意味着要处决一些农民，或将其驱逐到特别定居点，有时还驱逐到强迫劳动营地。

尽管抱有期望，集体化还是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灾难性下降，直到1940年才恢复到NEP之前的水平。集体化带来的动荡在乌克兰和乌克兰伏尔加河地区尤为严重。农民大批屠杀了他们的牲畜。仅在1930年，该国25％的牛，绵羊和山羊就被杀死，三分之一的猪被杀死。直到1980年代，苏联的牲畜数量才恢复到1928年的水平。政府官僚们接受了农业技术的基本教育，他们被派到农村去“教”农民社会主义农业的新方式，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理论基础，而这些理论基础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即使在国家不可避免地获胜并成功实行集体化之后，农民们还是竭尽全力以破坏的方式作对。他们耕种的土地少得多，工作少得多。乌克兰饥荒的规模使许多乌克兰学者争论说，有针对乌克兰人民的蓄意种族灭绝政策。

到1937年底，几乎所有耕地中的99％都被拉进了集体农庄。农民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尚未确定，但在这些年中，可能有多达500万人死于迫害或饥饿。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遭受的苦难比大多数国家都要严重。— 罗伯特《服务，同志们！——世界共产主义史》（2007年）第6页。

仅在乌克兰，在饥荒中死亡的人数现在估计为350万人。

苏联于1940年接管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并于1941年将其输给了德国，然后于1944年恢复。农场的集体化始于1948年。由于恐怖，大规模杀害和强迫搬迁，到1952年大多数农民被苏联集体化。在其他所有苏维埃共和国中，农业生产都急剧下降。

快速工业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快速工业化和大规模集体化时期，苏联的就业人数呈指数增长。到1923年，预计每年将提供390万个工作岗位，但实际上这一数字攀升至惊人的640万个。到1937年，这一数字再次上升，达到790万。最终，在1940年达到830万。从1926年到1930年，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在沙俄帝国末期甚至在新经济政策下，失业一直是一个问题，但在实施斯大林的大规模工业化计划之后，失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因素。为了使原来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进行工业现代化而动用的大量资源，造成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失业率几乎降为零。苏联计划者设定的工资水平也导致失业率急剧下降；从1928年到1940年，工资实际下降了50％。人为压低工资，使得国家雇用的工人远远多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雇佣能力。国家开始了几个雄心勃勃的开采项目，这些项目旨在为军事硬件和消费品提供原材料。

莫斯科和高尔基的汽车制造厂为公众生产了汽车-尽管极少有苏联公民买得起汽车-并且钢铁生产和其他工业材料的扩展使制造更多数量的汽车成为可能。例如，轿车和卡车的产量在1931年达到20万。

社会

宣传

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大多数最高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是1917年之前的宣传员或文学编辑；他们都敏锐地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他们在1917年掌权后，立即占领了所有传播媒体、垄断它们，并在报纸，杂志和小册子方面大大扩展了其宣传手段。无线电在1930年代成为一种强大的工具。 例如，斯大林一直是《真理报》的编辑。除了国家报纸"真理报"和伊兹维西亚，还有许多地区性出版物、报纸和杂志。舆论的钳制和统一是苏联时代的常态。打字机和印刷机在1980年代以前受到严格控制，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出版物。残酷地镇压了萨米兹达特的颠覆性小说和非小说类非法发行。官方媒体中100％统一性的罕见例外是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1936年的苏联宪法草案就是一个实例。Pravda（真理报）和Trud（体力劳动者论文）对宪法草案表示赞赏。但是伊兹维斯蒂亚由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控制并且发布了负面的信息和报告。布哈林赢了，党的风向改变了；苏共开始攻击"托洛斯基派"、反对派和叛徒。布哈林的成功是短暂的。他于1937年被捕，并受到了表演审判，并被处决。

教育

为了使宣传有效，它必须覆盖整个人口，但是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共产主义的成功取决于他们的识字能力。需要对工业工人进行教育以提高竞争力，因此着手进行与工业化同时进行的计划，以大大增加学校的数量和总体教育质量。1927年，有790万名学生就读于118,558所学校。到193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66,275所学校的970万学生。此外，到1933年，已经建立了900个专业部门和566个机构，并全面运作。结果，识字率大大提高，尤其是在中亚共和国地区。

妇女

苏联人民还受益于一种社会自由化。应当使妇女接受与男子相同的教育，并且至少在法律上讲，在工作场所获得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尽管实际上没有实现这些目标，但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的努力和对理论平等的陈述使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了普遍改善。

尤其是，女性被招募为扩张中的百货商店的职员，导致百货商店的“女性化”，女性销售人员的数量从1935年占销售人员总数的45％上升到1938年占销售人员总数的62％。这部分是由于1931年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该运动将女性气质与“文化”联系起来，并断言新苏联妇女也是一名职业妇女。此外，百货商店的工作人员在苏联的地位低下，许多男人不想担任销售人员，导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级女性和从乡下到达城市的女性去从事销售工作。

健康

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也促进了医疗保健的进步，这标志着苏联帝国时代的巨大进步。斯大林的政策使苏联人民获得了免费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广泛的免疫计划使人们第一次摆脱了对斑疹伤寒和霍乱的恐惧。这些疾病的发生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到1950年代中后期，男女的预期寿命都增加了20多年。

青年

共青团是一个全新的青年组织，由列宁（Lenin）设计、创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以前，它成为一支热情的罢工部队，该组织组织了俄罗斯各地经常被要求攻击传统敌人的共产主义群众运动。共青团在向年轻一代传授党的价值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还充当了劳动力和政治行动主义者的流动仓库，能够在短时间内搬迁到高度优先的地区。在1920年代，克里姆林宫指派共青团负责工厂一级的工业化。1929年，有7,000名共青团学员在斯大林格勒建立了拖拉机工厂，另外5.6万在乌拉尔建立了工厂，还有36,000被分配到煤矿工作。共青团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充满活力的布尔什维克激进主义者核心力量，以影响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工厂和矿山的同事们。

共青团在1935年采取了精英制的，据说是不论阶级的成员制政策，但结果是工人阶级青年成员的人数减少，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年轻的专业人士和学生加入苏维埃精英组织，无产阶级的人士失势，出现了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共青团在1930年代的会员政策反映了斯大林主义的更广泛性质，将列宁主义关于无阶级进步的言论与斯大林实用主义相结合，后者致力于获得最热情和最熟练的共青团员。

现代性

斯大林领导下的城市妇女，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并驾齐驱，也是能够在医

院获得产前保健的第一代妇女。在经济发展之后，教育是另一个可以改善的领域，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斯大林统治期间出生的这一代人是第一批普遍识字的一代。一些工程师被派往国外学习工业技术，而数百名外国工程师则按合同被引入俄罗斯。运输线路也得到了改善，因为修建了许多新的铁路，尽管劳动很辛苦、并造成了数千人的生命损失。超额完成任务的工人、劳动模范们，Stakhanovites（尽管许多这样的工人模范实际上是被“安排”通过在工作中获得极大帮助而获得成功的），——他们的成就被用来进行广泛政治鼓动宣传。

宗教

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上台以来，对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系统性攻击就开始了。1930年代，斯大林加剧了他对有组织宗教的战争。几乎所有教堂和修道院都被关闭，成千上万的牧师被监禁或处决。历史学家Dimitry Pospielovski估计，在1918年至1929年之间有5,000至10,000名东正教神职人员因处决或入狱而丧生，在1930年至1939年又有45,000人丧生。修士、修女和相关人员又增加了40,000人死亡。

国家宣传机器大力提倡无神论，并谴责宗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1937年，教皇庇护十一世谴责苏联对宗教的袭击。到1940年，只有少数教堂保持开放。列宁领导下的早期反宗教运动主要针对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因为它是沙皇政府的象征。然而，在1930年代，所有信仰都受到攻击：少数基督教派，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从长远来看，无神论未能赢得许多灵魂。宗教在地下得到加强，并复兴以帮助抗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90年代共产主义垮台之后，它蓬勃发展。正如Paul Froese解释的那样：

无神论者对苏联的宗教信仰发动了长达70年的战争。共产党摧毁了教堂，清真寺和庙宇；它处决了宗教领袖；它以反宗教的宣传充斥了学校和媒体；它引入了一个名为“科学无神论”的信仰体系，其中包括无神论者的仪式，无神论的传教士，以及对世俗救赎的承诺。但最后，大多数老年苏维埃公民保留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还有一批年纪太小以至于无法经历以前苏维埃时代的公民都获得了宗教信仰。

根据2012年的官方统计，将近15％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而将近27％的人则认为自己是无具体宗教的人士。

大清洗

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斯大林通过消灭潜在的反对派来巩固近乎绝对的权力。在1936–38年间，将近八十万名苏联人被处决；有超过一百万名苏联人被判处长期刑期、送往非常严酷的劳改营中。斯大林的“大恐怖”席卷了工厂厂长和工程师，并除去了陆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军官。借口是1934年对谢尔盖·基洛夫（Sergey Kirov）的暗杀（许多人怀疑斯大林自己设计了暗杀阴谋，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样）。几乎清除了1918年以前的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于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1929年被苏联驱逐出境，并于1940年被暗杀。斯大林利用这些清洗手段从政治上和实际上摧毁了他的其他正式对手（和前盟友），指责格里高里·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卡梅涅夫把基洛夫暗杀，并计划推翻斯大林。最终，被捕者遭到酷刑，被迫承认是间谍和破坏分子，并迅速被定罪并处决。

在莫斯科举行了几场演出审判，以作为地方法院预计将在该国其他地方进行的审判的示例。从1936年到1938年共进行了四次主要审判，其中“十六人审判”是第一次审判（1936年12月）。然后是“十七人审判”（1937年1月）；然后对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红军将领进行审判（1937年6月）；最后是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包括布哈林）。在此期间，被告通常承认其破坏，暗中侦察，反革命以及密谋与德国和日本一起入侵和分割苏联等等罪行。在1935年至1936年的最初审判实践是由Genrikh Yagoda领导下的OGPU进行；但反过来，检察官受到审判并被处决。秘密警察改名为NKVD，并把控制权交给了尼古拉·叶佐夫（Nikolai Yezhov），称为“血腥矮人”。

1937年，“大清洗”席卷了苏联。它被广泛称为“叶佐夫统治”。逮捕率惊人。仅在武装部队中，就有34,000名官兵被清除，其中包括许多高级军官。整个政治局和大部分中央委员会，以及生活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以及许多知识分子，官僚和工厂管理者，都被清除了。在此（Yehzhovschina）期间被监禁或处决的总人数约为200万人。到1938年，大规模的清洗活动开始破坏该国的基础设施；斯大林开始将其停止。叶佐夫逐渐失去了权力。叶佐夫于1939年被解除了所有权力，然后于1940年被审判并处决。他的继任者是NKVD的负责人（从1938年至1945年），他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朋友Lavrentiy Beria（贝利亚）。逮捕和处决一直持续到1952年，尽管再也没有发生像大清洗这样规模的大事了。

在此期间，秘密警察的大规模逮捕，酷刑，监禁或处决的做法变得司空见惯。根据NKVD的统计，仅1937-38年间，就有681692人被枪杀，数十万名政

治犯被运送到古拉格（Gulag）的劳改营。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和清洗活动在外界鲜为人知，一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同志们继续相信，苏联人已经成功地替代了资本主义世界。1936年，苏联通过了第一部正式宪法，仅在书面上赋予了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

1939年3月，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934年第17届代表大会上的大多数代表都不见了；斯大林受到利特维诺夫的高度赞扬；西方民主国家因未能采取针对纳粹德国的“集体安全防卫”原则而受到批评。

对外关系1927-1939年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建立苏联期间，苏联政府没收了外资拥有的私人公司。外国投资者未获得任何金钱或物质补偿。苏联还拒绝向外国债务人支付沙皇时代的债务。年轻的苏联政体被西方国家排斥，因为它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支持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在西方各个国家，它发起了工人的反抗，试图推翻许多资本主义的欧洲国家，但都失败了。从1921年起，列宁开始寻求贸易，贷款和认可。共产国际被命令停止组织起义。外国一一重新开放了贸易路线，并承认了苏联政府。美国是1933年承认苏联的最后一个主要政体。1934年，法国政府提议结盟，并带领30个政府邀请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苏联已获得合法性，但由于对芬兰的侵略而在1939年12月被开除。

1928年，斯大林基于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的信念，推行了左翼政

策。各种欧洲共产党被命令不要与本国温和力量组建联盟，而要谴责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为法西斯主义者。激进分子被派往工会，以从社会主义者手中夺走控制权。到1930年，斯大林转变了想法；斯大林主义者开始暗示与其他政党结盟的价值，到1934年，形成人民阵线的想法浮出水面。共产国际特工威利·门森伯格（WilliMünzenberg）在组织知识分子，反战和和平主义者加入反纳粹联盟方面尤其有效。共产党人将与任何政党组成联盟，以对抗法西斯主义。对于斯大林主义者来说，人民阵线只是权宜之计，但对右派人士来说，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想形式。

法苏关系最初是敌对的，因为苏联正式反对法国大力支持的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解决方案。苏联对征服东欧领土感兴趣时，法国决心保护那里的新兴国家。然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外交政策集中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大规模夺取中欧、东欧和俄罗斯土地，而当希特勒（Hitler）退出193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时，威胁就袭来。苏联外交大臣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导致了法苏和解。1935年5月，苏联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互助条约。斯大林命令共产国际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左派和中间派政党组成一个受欢迎的联合阵线。但是，由于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法国的新战线强烈的意识形态敌视，波兰拒绝让红军在其领土驻扎，法国的防御性军事战略，以及苏联对与纳粹建立关系的持续兴趣，该联合阵线并没有什么效果。

纳粹德国与帝国主义日本和法西斯意大利以及中欧和东欧多个国家（例如匈牙利）颁布了《反共产国际条约》，表面上是为了压制共产主义活动，但实际上是为了结盟对抗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

斯大林于8月23日与德国纳粹签署了《莫洛托夫—里本特罗普条约》，这是与纳粹德国达成的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并建立了德苏商业协定以开放经济关系。该协议的秘密附录将波兰东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比萨拉比亚和芬兰交给了苏联，并将波兰西部和立陶宛交给了纳粹德国。这反映了苏联渴望获得领土的愿望。

根据与希特勒的协定，斯大林于1939-40年吞并了波兰的一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罗马尼亚的北部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路易斯·菲舍尔（Louis Fischer）认为，它们不再是将苏联与德国地区分开的缓冲区。相反，它们促成了希特勒迅速进入莫斯科的大门。

宣传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对外关系工具。国际展览，电影等媒体的发行，例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i），以及邀请杰出的外国人访问苏联，都被用作赢得国际影响力并鼓励旅行者和和平主义者建立流行阵线的一种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德国于9月1日入侵波兰；在苏联，9月17日镇压反对派。苏联在1939年至1941年的四次热潮中将可疑的种族群体迁至西伯利亚。估计数字超过150

万。

波兰与德国分裂后，斯大林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以保卫列宁格勒。受到世界舆论支持的赫尔辛基拒绝了，因此斯大林入侵了芬兰。尽管红军的人数与芬兰军队的比例是2.5：1，但战争对红军来说却是令人尴尬的艰巨，因为冬天的天气，红军装备不足，而且自从苏维埃最高统帅部被清除以来，缺乏能干的指挥官。芬兰人坚决抵抗，并得到盟国的支持和同情。1940年3月，新的威胁导致芬兰要求停战。它放弃了卡累利阿地峡和一些较小的领土。伦敦，华盛顿-尤其是柏林-计算得出，苏联军队的糟糕表现表明它无力捍卫苏联免于德国的入侵。

1940年，苏联占领并非法吞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1941年6月14日，苏联对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强迫搬迁。

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驻莫斯科大臣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罗马尼亚立即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意大利和德国需要稳定的罗马尼亚，并需要进入其油田，因此敦促卡罗尔二世国王这样做。在胁迫下，没有法国或英国的援助希望，卡罗尔遵行了。6月28日，苏联军队越过德涅斯特河，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北部和赫尔察地区。

伟大的卫国战争

1941年6月22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突然打破了不侵略条约，并入侵了苏联。斯大林没有做任何准备。苏联情报部门被德国的虚假信息蒙骗，入侵使苏联军队措手不及。从更大的意义上说，斯大林预计会入侵，但不会很快。军队被之前的大清洗所毁灭了；恢复能力需要时间。这样，战争动员就没有发生；从入侵开始，苏联军队在战术上还没有做好准备。战争的最初几周是一场灾难，成千上万的苏联人被杀，受伤或被俘。整个师团因德国的猛攻而瓦解。与普遍的看法相反，苏联的高伤亡人数不是红军表现不佳的结果，而是由于德国军队对红军战俘的待遇不佳。在这些德国难民营中，数以百万计的此类人大多死于饥饿和疾病。1/3的德国战俘在苏维埃营地中幸存下来，而仅有1/10的红军战俘在德国营地中幸存下来。1941年12月，德军到达莫斯科市郊，但由于苏联的坚决防御和反攻而未能将其占领。在1942-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红军使德军遭到了惨败。由于日本人不愿在满洲开设第二条战线，苏联人得以从俄罗斯东部召集数十个红军师。这些部队有助于扭转局势，因为他们的大多数官兵都逃过了斯大林的清洗。苏联军队很快在整个德军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到1944年，德国人已被从苏联赶出普鲁士以东的维斯杜拉河两岸。苏联元帅乔治·朱可夫（Georgy Zhukov）从普鲁士进攻，伊万·科涅夫（Ivan Konev）元帅从南面将德国割成两半，纳粹德国的命运被封杀。1945年5月2日，最后一支德军向柏林大喜过望的苏军投降。

战时发展

从1944年底到1949年，德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苏联的占领。1945年5月2日，首都柏林被占领，而超过一千五百万的德国人被从德国东部强迫搬迁，并被推入德国中部（后来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国西部（后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随后，俄国人，乌克兰人，波兰人，捷克人

等被转移到德国土地上。

在战争期间，爱国的紧急气氛在苏联充斥；对东正教的迫害被终止。现在，只要不参与政治活动，教会就可以在相当自由的程度上开展活动。1944年，写了一部新的苏联国歌，代替了自1918年以来一直用作国歌的国际歌。之所以做出这些更改，是因为人们认为人民为了国家的战斗比对政治思想的回应更好。

苏维埃之所以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是因为西方直到入侵意大利和诺曼底之战才在欧洲开辟第二个地面战线。战争中大约有2660万苏联人丧生，其中包括1800万平民。在纳粹占领的许多城市，平民被围捕，焚烧或枪杀。面对德军起初的势如破竹的侵略进攻，撤退的苏联军队奉命在临行前摧毁当地民用基础设施和粮食供应，使纳粹德国军队不能使用它们。

斯大林最初于1946年3月宣布有700万战死者的声明，于1956年由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修订，总数约为2000万。在1980年代后期，国家统计委员会（Goskomstat）的人口统计学家使用人口统计学方法进行了另一番研究，得出的估计数字为2627万至2700万。在最详细的估计中，估计死亡人数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平民损失。

战后，苏联根据苏联的意识形态占领并控制了东欧。

斯大林决心对那些在战争期间与德国合作的人民进行惩罚，并解决各种民族主义问题，因为它将使苏联分裂。数百万波兰人，拉脱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古拉格。（以前，在1939年吞并波兰东部之后，包括后备役人员在内的数千名波兰陆军军官在1940年春天被处决，后来被称为卡廷大屠杀）。此外，在1941年，1943年和1944年，几个民族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中包括伏尔加河域的日耳曼人，车臣人，Ingush，Balkars，克里米亚人和Meskhetian土耳其人。尽管这些团体后来在政治上“被平反”，但其中一些从未回到以前的自治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整个欧亚大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基础设施和人口遭到巨大破坏，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幸免于难。由于1930年代建立的工业基地遭到大规模破坏，苏联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苏联在1946-48年也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饥荒，这是由于战争破坏造成的，据估计损失了100万至150万人的生命，以及由于生育力下降造成的第二人口减少。然而，苏联恢复了生产能力并超过了战前能力，到战争结束时拥有历史上最强大的陆军，并且成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生产能力的国家。

战争和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军事发展

尽管根据租借计划，苏联从美国获得了援助和武器，但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苏联生产的战争物资比纳粹德国还要多（租赁约占苏联自身工业产值的10–12％）。“第二个五年计划”将钢铁产量提高到1800万吨，将煤炭产量提高到1.28亿吨。在中断之前，“第三个五年计划”生产了不少于1900万吨的钢铁和1.5亿吨的煤炭。

苏联的工业产出提供了支持其军队的军备工业，帮助其抵抗了纳粹的军事进攻。根据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L. Hutchings）的说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工业发展速度变慢，德国对苏联的攻击将成功；世界历史将发生很大变化。” 但是，对于从事工业的劳动者来说，生活是困难的。

然而，一些历史学家将苏联缺乏自卫意识的准备解释为斯大林经济计划的缺陷。例如，大卫·希勒（David Shearer）辩称，这里存在着“命令管理型经济”，但它并不是“计划中的经济”。他认为，苏联仍在遭受大清洗之苦，并且完全没有为德国入侵做好准备。

冷战

苏联对东欧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扩大了对东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此举被某些人视为俄罗斯帝国较早政策的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吞并了苏联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1918年）中失去的领土：波罗的海国家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俄罗斯SFSR也获得了东普鲁士（北半部加里宁格勒州来自德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获得Transcarpathia（如外喀尔巴阡州）；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乌克兰人居住在罗马尼亚北部的布科维纳（切尔诺夫策州）。最终，到1940年代后期，亲苏联共产党赢得了中欧和东欧五个国家（特别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

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选举"，随后成为"人民民主"国家。这些选举通常被认为是操纵的，西方国家认为它们是表演性质的选举。在冷战期间，东欧国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家—它们是"独立"国家，是一党制 共产主义国家，总书记必须由克里姆林宫批准，因此，尽管民族主义势力和内部压力很大，但它们的政府通常仍使其政策符合苏联的意愿。然而，卫星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力量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那些国家对严格的苏联统治的偏离。

苏美关系

战争中，苏联迫切需要美国和英国提供的弹药，食品和燃料；这主要是通过借租获得的。这三个大国保持着定期接触；斯大林试图维持对内政的保密面纱。丘吉尔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罗斯福的最高助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也访问了莫斯科。斯大林一再要求美国和英国在欧洲大陆开设第二条战线。但是直到两年后的1944年6月，盟军才开始完成战争准备，进行诺曼底登陆。同时，俄罗斯人伤亡惨重。但盟军指出，他们对德国的密集轰炸是斯大林常常忽略的一个主要因素。

国内事件

艺术和科学受到严格的审查。以前，全俄作家联盟（AUW）曾试图发表非政治性著作，而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则坚持政治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并出版了主要体现工人阶级主权的内容，表现了小说中的阶级

价值。在1925年，RAPP发起了一场反对AUW主席Evgeny Zamyatin的运动。它导致了全俄作家联盟的失败，并被全俄苏维埃作家联盟所取代；后者严格采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

苏联生物学研究受到现已声名狼藉的生物学家Trofim Lysenko的重大影响。他拒绝了孟德尔生物遗传学的概念，而是倾向于拉马克主义。在物理学中，相对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理想主义"。大部分这种审查制度是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工作；他被称为斯大林的"思想打手"。斯大林的人格崇拜在战后时期达到顶峰；他的相片出现在每所学校，工厂和政府办公室，但他本人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战后重建工作进展迅速，但由于重点都放在重工业和能源上，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外。

战争期间在苏联进行的温和的政治自由化很快在1945年结束。东正教教会在战争结束后通常不被骚扰，甚至被允许印刷少量宗教文献；但其他少数宗教遭到了迫害。

随着冷战的开始，反西方的宣传得到了加强，资本主义世界被描绘成犯罪，失业和贫穷猖獗的颓废之地。

战后时期，秘密警察的恐怖活动仍在继续。尽管没有发生与1937年类似的事情，但仍进行了许多较小的清洗，包括在1951–52年间大规模清洗了格鲁吉亚的政党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的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他在1945年秋天中风，病了几个月。随后在1947年又发生了一次中风。斯大

林在国家的日常运转中变得不那么活跃；他不是参加党的会议，而是更喜欢邀请政治局成员参加通宵的晚宴，在那儿他会看电影，并强迫政治局成员们喝醉。

1952年10月，战后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不愿发表主要报告，而大多数时间都在默默地坐着；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乔治·马林科夫发表了主要讲话。但他建议将该党从"布尔什维克联盟"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理由是"曾经有一次需要将我们自己与孟什维克区分开来，但是没有孟什维克了。我们现在是整个党。" 斯大林还提到了他的高龄（还差两个月满73岁），并建议说自己该退休了。可以预见，大会上没有人会敢于同意这个建议，而代表们则恳求他留下。

朝鲜战争

1950年，苏联抗议中国国民党政府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席位的事实，并抵制了会议。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国通过了一项谴责朝鲜行动的决议，并最终向韩国提供了军事支持。在此事件之后，苏联从未在安理会会议上缺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o:_The_Unknown_Story

《毛泽东：未知的故事》

（选摘）

《毛泽东：未知的故事》是2005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1893–1976年）的传记，由作家Jung Chang和历史学家Jon Halliday完成；他们描绘了毛泽东在和平时期造成的死亡超过了希特勒（Adolf Hitler）或斯大林（Joseph Stalin）致死的人数。

在十年的研究过程中，作者采访了数百名与毛泽东接近的人，使用了中国政界人士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并探索了中国与俄罗斯的档案。Chang自己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她在较早的书《野天鹅》（Wild Swans，1991）中对此进行了描述。

这本书很快成为欧洲和北美的畅销书。报纸评论对此书广泛赞誉；学术界也有一些赞誉；但更受到了一些相关学术界的主要批评。

Chang和Halliday把毛描绘成一个暴君，他为了追求个人力量而操纵着所有人和一切。他们说，从他最初的几年起，他就受到对权力的渴望的驱使，

并且毛泽东有许多政治反对派被捕和被谋杀，无论他们与他的关系如何。他们认为，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毛不可能获得对党的控制，在长征期间，毛的决定也没有埃德加·斯诺的《中国红星》所宣称的那样英勇而巧妙、从而进入了革命神话。

第二次统一战线和中国内战期间受共产主义统治的地区，如江西和延安，被恐怖统治并由鸦片经济支撑。他们说，毛泽东牺牲了数千名军队，只是为了摆脱张国焘等党的对手，他也没有主动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尽管是出生于一个富裕农民（富农）的家庭，但毛泽东在1949年上台后，他很少关注中国农民福利。毛泽东利用农业剩余来补贴工业的决心以及对异议者的恐吓导致了大跃进带来的致命饥荒；即使很明显中国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人口，但中共仍然允许谷物继续出口，而加剧了饥荒。

长征

Chang和Halliday说长征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努力，而毛泽东的领导作用被夸大了。Chang认为长征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调整和夸大的神话。他们认为，长征的有效性令人怀疑，因为它一开始就与现实相去甚远。毛被正式刻画为鼓舞人心的指挥官，但实际上，毛在长征中被甩在后面，只指挥了一支相当小的部队。显然，长征中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他，他的战术和策略也有缺陷。作者还写道，蒋介石允许共产党人前进，所以他们没有任何重大障碍。

毛泽东与共产主义精英一起被描绘成特权人物，通常被抬在担架上，免受下属的痛苦，而不是分担他们的苦难。尽管普通士兵中有大量人员伤亡，但无论旅途中有多少疾病或重伤，据说高级官员都不会在旅途中丧生。

该书说，与革命神话相反，泸定桥没有战斗，而“英雄式”穿越险境的故事仅仅是宣传。张找到证人李秀珍，她告诉她没有战事，桥没有着火。此外，她说，尽管共产党人宣称战斗是激烈的，但所有先锋队都在战斗中幸存了下来。张还引用了国民党的战斗计划和公报，这些战斗计划和公报表明守卫这座桥的部队在共产党到达之前已经撤出。

即使在中国以外，许多历史著作也描绘了这场战斗，尽管没有那么英勇。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的《长征：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夏洛特·索尔兹伯里（Charlotte Salisbury）的《长征日记》中提到了在泸定桥的一场战斗，但他们依靠的是二手信息。但是，其他消息来源对此事件表明，中共官方造假与夸大。中国记者孙淑云同意官方说法被夸大了。她采访了见证这一事件的当地铁匠，并说：“当（反对红军的部队）看到士兵来时，他们惊慌失措，逃离了-他们的军官早就抛弃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战斗。 ”成都档案馆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说法。

2005年10月，《时代报》报道说，它找不到张的当地证人。此外，《悉尼先驱晨报》还发现了一名85岁的目击者李桂秀，他在渡口时年仅15岁，其说法对张的主张提出了异议。李说，这场战斗的确是一场战斗：“战斗是从傍晚开始的。红军一侧有许多人丧生。国民党向另一侧的桥楼放火，试图将铁链融化，链被切断后，红军花了7天7夜来穿越。”

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到他曾经与邓小平进行的一次对话。他回忆道，邓小平笑着说：“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宣传方式。我们需要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部队的战斗精神。实际上，这是一次非常容易的军事行动。”

鸦片生产

这本书中针对毛泽东的指控之一是，他不仅容忍了中共内战期间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鸦片生产，而且还参与了鸦片贸易，以为其士兵提供资金。据俄罗斯消息人士称，他们说，他们发现，当时的交易每年为共产党创造了约6000万美元。

反对毛泽东对手的运动

据称，毛泽东在他的指挥下使人们遭受不必要的苦难，只是为了消灭对手。政治局的对手张国涛于1936年与他的军队一起被派往绝望的戈壁沙漠执行任务。不可避免地失败时，毛泽东下令处决幸存者。

Chang和Halliday说，毛泽东用其他卑鄙的手段消灭对手。除了像“百花齐放”这样的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其他行动外，他还让王明（政治局的另一名对手）中毒了两次。王不得不在俄罗斯寻求治疗。

抗日战争

Chang和Halliday写道，与中国当局提供的官方历史相比（中共自己声称，共产党军队对日本帝国军发动了激烈的游击战），实际上，他们很少与日本人作战。毛泽东对拯救自己的军队以对抗中国国民党更感兴趣。在共产党与日本人抗争的几次场合，毛泽东非常生气（毛认为部下不应当与日本军队冲突）。

共产主义者的“间谍”

据称，国民党著名成员一直在秘密地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国家革命军高级将领胡宗南就是这样的“间谍”。胡的儿子反对这一描述，他的法律诉讼威胁导致此书的台湾出版商放弃了该书的发行。

朝鲜战争

事实证明，毛泽东并没有像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勉强地参加冲突，而是故意在冲突开始前向金日成（当时的朝鲜领导人）许诺，中国军队将会参加朝鲜战争。此外，这本书详细描述了毛迫切需要苏联人承诺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是支持金日成入侵韩国的主要动力（当毛在朝鲜对抗美国以后，斯大林开始更加支持对毛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Halliday此前曾对这一

冲突进行过研究，并出版了《朝鲜：无名战争》。

毛泽东时代的死亡人数

这本书的开头是“毛泽东，几十年来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在和平时期造成了7000万人死亡，比二十世纪任何一位领导人都要多。” 他称农民为“两个肩膀和一个屁股”，因为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被杀死，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Chang和Halliday声称他愿意中国一半的人死亡以实现军事核超级大国。尽管Chang和Halliday的估计是最高的数字之一，但对这一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有所不同。汉学家Stuart Schram在对该书的评论中指出，“确切的数字...被估计为4000万指7000万人之间”。

中国学者认为，大跃进期间的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Chang和Halliday争辩说，这一时期约占7000万总数的一半。根据胡耀邦在1980年的官方估计，死亡人数为2000万，而菲利普·肖特（Philip Short）在其2000年的著作《毛：一生》中发现2000万到3000万是最可信的数字。Chang和Halliday的数字是3767万，历史学家Stuart Schram表示，他相信“很可能是最准确的”。共产党员、新华社前记者杨继绳估计，饥荒死亡人数为3600万人。香港历史学家弗兰克·迪克特（FrankDikötter）在2010年的《毛泽东大饥荒》一书中查阅了新近公开的本地档案，将大跃进的死亡人数定为4500万，并将其描述为“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杀害之一”。

RJ Rummel教授于2005年发布了有关全球杀戮事件的最新数据，称他相信

Chang和Halliday的估计大部分是正确的，并且他相应地修改了毛泽东时期在中国的数据。

对书的回应

《毛：未知的故事》成为畅销书，仅在英国的销售就在六个月内达到了60,000。学者和评论员发表了评论，从好评到严重批评。评论汇总者Metacritic报告基于主要英语媒体的24条评论，平均获得100分中的64分。

赞美

这本书得到了许多评论家和学术专家的好评。西蒙·塞巴格·蒙特菲奥雷（Simon Sebag Montefiore）在《泰晤士报》（Times）上赞扬这本书，称张和哈利代（Halliday）的作品是“胜利”，“从人物，事迹和数量上，其主题暴露了20世纪暴君救世主最血腥的三重体。受害者数字...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怪物-中国红帝的第一份亲密政治传记。”

在《纽约时报》中，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将这本书称为“权威著作”。克里斯托夫说，这证明毛泽东是一个“灾难性的统治者”，比迄今为止任何其他著作都做得更好。用他的话说，毛泽东的“残酷”是“被这本非凡的书巧妙地抓住了”。

格温妮·戴尔（Gwynne Dyer）赞扬这本书记录了“毛泽东的罪行和无情的，史无前例的细节上的失败”，并表示他相信这最终将对中国产生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在苏联产生的相似影响。

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表示，这本书是“对野蛮的起诉书，借鉴了包括重要的苏联在内的许多资料，以消除欺骗和无知。” 但是，它的弱点是“它将毛泽东的崛起和长期统治完全归功于镇压，而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本国人民如此长期地致力于他的疯狂愿景。”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迈克尔·雅胡达（Michael Yahuda）也对《卫报》表示支持。他称这是一本“宏伟的书”和一部“惊人的著作”，它们为“毛泽东动荡的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事件都注入了新的和启示性的光辉”。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理查德·鲍姆教授说：“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因为在毛泽东和中共的崛起中，这是研究最深入，文献最多的综合学术作品。” 尽管鲍姆说：“这不是一个足够丰富或细微的解释性架构，不能支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验的全部分量”，但鲍姆仍然相信，“这本书很可能会永远改变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理解和教学方式。”

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在批评《毛泽东：未知的故事》的某些方面的同时，在《中国季刊》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张和哈里代的书“对我们对毛泽东及其历史地位的理解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佩里·林克（Perry Link）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中赞扬了这本书，并强调了这本书可能在西方产生的影响：

——

“Chang和Halliday揭露‘未知的’毛泽东的热情显然是针对易受骗的西方人的。。。几十年来，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一直认为，毛泽东及其继承人象征着中国人民及其文化。任何阅读Jung Chang和Jon Halliday的书的人都应放弃这种特殊的幻想。”

一些好坏参半的评论

哥伦比亚大学的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教授在《伦敦书评》上对该书进行了广泛的评价。虽然他在某些方面对这本书感到满意，例如，该书“对毛泽东的妻子和孩子的苦难表现出特别的洞察力”，并承认这可能对这一领域做出真正的贡献，但内森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他指出，“他们的许多发现来自无法查证的来源，其他发现是公开推测的，或者是基于间接证据，还有一些是不真实的。”同样，耶鲁大学的乔纳森·斯彭斯（Jonathan Spence）教授在《纽约书评》中认为，作者对毛泽东恶行的过于专注破坏了“他们的故事可能拥有的许多可信力量”。

批评

Chang和Halliday的书受到了许多学术专家的强烈批评。2005年12月，《观察家报》指出，该领域的许多知识渊博的学者都对Chang和Halliday的某些说法的事实准确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他们选择性地使用了证据，质疑了他们的立场以及其他批评。他说，张和哈里代的批评者并不否认毛泽东是“一个怪物”。

悉尼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戴维・SG・古德曼（David SG Goodman）在《太平洋评论》上写道，《毛泽东：未知的故事》与其他修正历史的例子一样，暗示着“学者有一种阴谋，——他们选择不揭露真相。”古德曼认为，作为通俗历史，这本书的风格“极具争议性”，他对张和哈里代的方法论，资料来源和具体结论持高度批判态度。

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教授将这本书称为“……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重大灾难……”，因为“学术被用来彻底摧毁毛的声誉。语境中的引述，事实的歪曲以及许多遗漏，忽视了毛泽东作为复杂，矛盾和多方面的领导人的事实。”

英国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在为《新左派评论》撰稿时，批评该书着眼于“毛泽东的明显缺陷（政治和性方面的缺陷），将其夸大到了惊人的高度，并提高了政治领导人的道德标准，而这些标准永远都不会适用于罗斯福或肯尼迪”。阿里（Ali）指责这本书包括未经证实的主张；来自台湾和苏联的毛政治对手的档案材料，它们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以及对毛泽东和中国的了解有限的名人受访者，例如莱希・瓦文萨（LechWałęsa）。阿里将这本书的耸人听闻的段落和对毛的谴责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毛的自己的政治口号进行了比较。

英文出版物

出版商：兰登书屋

发布日期：2005年6月2日

书号 0-224-07126-2

发布者：Knopf

发布日期：2005年10月18日

书号 0-679-42271-4

《毛：未知的故事》在2005年7月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榜上排名第二。

中文出版物

出版商：Open Magazine Publishing（香港）

发布日期：2006年9月6日

书号 962-7934-19-4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ague_Declaration

布拉格宣言

《关于欧洲良知和共产主义的布拉格宣言》是由捷克政府发起，并于2008年6月3日签署。签署人包括前任捷克总统哈维尔和未来的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该宣言旨在欧洲范围内进行对共产主义罪行的谴责和教育。该声明的大部分内容都再现了欧洲人民党在2004年提出的要求，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理论。

迄今为止，宣言中提出的最明显的建议是欧洲联盟和安全组织通过的"欧洲纪念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者日"（在某些国家称为"国际黑丝带日"）。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ádGroup）的政府于2011年10月14日建立了"欧洲记忆与良心平台"，这是一个欧盟教育项目，旨在提高人们对极权主义犯罪的认识并打击不容忍，极端主义和反民主运动。在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犯罪化"和加强欧洲政治空间中对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认识中，该宣言被视为重要文件。

会议

该宣言结束了欧洲良心与共产主义会议，这是由参议院教育，科学，文化，人权和请愿委员会在亚历山大·冯德拉主持下于2008年6月2日至3日在捷克参议院举行的国际会议。

欧洲良心和共产主义会议收到了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法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英国），国务卿杰森·肯尼（加拿大）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支持。

劳尔·纽马耶（Laure Neumayer）指出：“这次会议得益于即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政府的支持以及前异见人士的道德权威。”

声明

在宣布宣言之前，举行了欧洲极权政权犯罪公开听证会。宣言是欧洲和国际层面上更广泛进程的一部分，旨在达到与宣言中所述目标相似的目标。

宣言的核心是呼吁“全欧洲的理解，即纳粹和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政权都应被视为20世纪的主要灾难”。声明得到了来自欧洲议会的支持；2009年欧洲议会特别通过了关于欧洲良知和极权主义的决议。宣言也得到了欧盟其他机构的支持，得到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支持，得到了曾经遭受苏联占领和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多个欧洲国家政府的支持。

该声明要求：

“达成全欧洲的理解，纳粹和共产主义极权政权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特征来被

判断；它们系统地应用极端恐怖形式，压制一切公民和人类自由，发动侵略战争，和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消灭和驱逐整个国家和人口群体；因此，应将它们视为破坏了20世纪的主要灾难”；

“认识到以共产主义名义犯下的许多罪行应被视为危害人类罪，应作为对子孙后代的警告，就像纽伦堡法庭对纳粹罪行的评价一样”；

“制定关于极权主义政权，尤其是共产主义政权的犯罪的共同方法，并提高全欧洲对共产主义罪行的认识，以明确界定对共产主义政权罪行的共同态度”；

“制定法律，使法院能够审判和判处共产主义罪行的肇事者，并赔偿共产主义的受害者”；

“确保所有极权主义政权的受害者享有平等待遇和不歧视的原则”；

“欧洲和国际压力要求有效谴责过去的共产主义罪行并有效打击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罪行”；

“承认共产主义是欧洲共同历史的组成部分和恐怖的一部分”；

“接受泛欧对共产主义犯罪的责任”；

“8月23日为缅怀日，即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签署日，即莫洛托夫-里本特罗普条约纪念日，以纪念纳粹和共产主义极权政权的受害者，欧洲以同样的方式缅怀1月27日的大屠杀受害者”；

“国民议会对承认共产主义罪行为危害人类罪的负责任态度，制定适当的立法，并由议会监督这种立法”；

“关于共产主义符号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滥用的有效公开辩论”；

“继续欧洲委员会关于极权主义政权受害者的听证会”；

“由极权共产主义政权统治的欧洲国家中，由独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设立，其任务是在国家一级收集和评估关于极权共产主义政权下侵犯人权行为的信息，以期欧洲专家委员会与理事会密切合作”；

“确保有一个明确的国际法律框架，以自由和不受限制地访问载有共产主义罪行信息的档案”；

“建立欧洲记忆与良心研究所”；

“在政府，议员，学者，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下，组织一次关于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政权所犯罪行的国际会议，其结果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

“对欧洲历史教科书进行调整和大修，以便儿童可以像被教导评估纳粹罪行一样学习和警告共产主义及其罪行”；

“整个欧洲对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和遗产的广泛而彻底的辩论”；

“联合纪念明年柏林墙倒塌2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罗马尼亚的杀戮”；

该宣言引用了欧洲委员会第1481号决议以及“一些国家议会通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罪行的决议”。在发表《宣言》之前，举行了关于极权主义政权所犯罪行的欧洲公开听证会。

签署人

创始签署人包括：

创建签署人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Havel），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前总统，也是《宪章》第77项的发起人之一

创立签字人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

创立签署人维陶塔斯·兰德斯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这是苏联共产主义解放后立陶宛的第一任国家元首

瓦茨拉夫·哈维尔，前持不同政见者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和总统捷克共和国，签署的77宪章

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前斯塔西记录联邦专员，德国总统（2012-17年），德国

欧洲委员会议会副主席葛兰·林布拉德（GöranLindblad），瑞典国会议员

Vytautas Landsbergis，欧洲议会议员，前异议人士和立陶宛国家元首

JanaHybášková，捷克共和国欧洲议会议员（自2011年起担任欧洲联盟驻伊拉克大使）

克里斯托弗·比兹利（Christopher Beazley），英国欧洲议会议员

Tunne Kelam，欧洲议会议员，前异议人士，爱沙尼亚

JiříLiška（政治家），参议员，参议院副主席，捷克共和国议会

捷克参议员MartinMejstřík

捷克参议员JaromírŠtětina

以马内利·辛格尼斯（Emanuelis Zingeris），立陶宛国会议员，立陶宛纳粹和苏联占领制度犯罪国际评估委员会主席，立陶宛犹太社区前名誉主席

西滕·桑杜普·查霍克亚帕中，代表达赖喇嘛对中欧和东欧的日内瓦西藏局

加拿大白俄罗斯流亡政府领袖Ivonka Survilla

Zyanon Paznyak，白俄罗斯人民阵线前主席，美国白俄罗斯人民阵线基督教保守党主席，美国

RůženaKrásná，捷克共和国前政治犯，政治家

JiříStránský，前政治犯，作家，前PEN俱乐部主席，捷克共和国

瓦茨拉夫·瓦什科（VáclavVaško），前政治犯，外交官，天主教活动家，捷克共和国

亚历山大·波德拉比内克（Alexandr Podrabinek），前异见人士和政治犯，俄罗斯联邦记者

帕维尔·萨斯克，捷克共和国

极权政权研究所副所长MiroslavLehký，捷克共和国《宪章》第77条签署人

卢卡斯·卡明斯基，副主任，国家纪念研究所（IPN），波兰（从2011年的IPN主席）

迈克尔·基森纳（MichaelKißener），约翰·古腾堡大学历史教授，德国美因茨

历史学家爱德华·斯蒂列克（EduardStehlík），捷克共和国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捷克共和国军事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家Karel Straka

捷克共和国记者Jan Urban

雅罗斯拉夫·赫特卡（Jaroslav Hutka），前异见人士，词曲作者，《捷克宪章》第77章的签字人

捷克共和国政治学家兼作家LukášPachta

欧洲议会议员和其他政客，包括埃尔斯·代·格龙，围梁瓦尔迪斯·克里斯托夫斯基斯，吉乔治·施普夫林，吉斯拉·卡伦巴奇，欧根尼胡斯·金特维勒斯，迈克尔·加勒，祖扎纳·罗伊特霍瓦，Inese Vaidere，汉斯-约瑟夫·费尔，Nickolay姆拉德诺夫，乔塞夫·斯萨赫尔，彼得·斯斯特尼，阿里·瓦塔宁，沃杰西奇·罗斯科斯基，拉兹罗·托克斯，夏洛特·塞德舍尔德，拉斯洛·瑟贾恩，和米兰·兹韦尔。

宣言还由李·爱德华兹（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席），阿斯帕鲁克·帕诺夫（自由国际副总统），诗人和民权运动家纳塔莉亚·戈尔班涅夫斯卡娅，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以及前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西尔夫·西尔克签署。

后果

宣布之后，与《布拉格宣言》中提出的问题有关的一些政治事态发展。这些进展被欧洲历史和解小组称为“布拉格进程”，该小组是由桑德拉·卡尔涅特（Sandra Kalniete）和历史学家劳尔·诺伊玛耶（Laure Neumayer）主持的欧洲议会中的跨党派组织。

2008

在欧洲议会于2008年9月23日宣布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并在2009年通过关于欧洲良知和极权主义的决议（以533赞成-44反对、33弃权获得通过），要求建立欧洲记忆与良心平台。由联合主办的欧洲人民党，欧洲自由民主同盟，绿党-欧洲自由联盟，与欧洲国家联盟，决议呼吁承认“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共同的危害”和“关于上个世纪所有极权主义罪行的诚实而彻底的辩论”，重申“无论从意识形态背景如何，都统一反对一切极权主义统治”，并“坚决，明确地谴责所有一切危害人类罪和所有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犯下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

2008年9月18日，绿色环保组织-欧洲自由联盟在欧洲议会的主持下举行了公开听证会，该会议基于《布拉格宣言》，由欧洲议会议员MilanHoráček组织，主题是“极权主义政权和中欧和东欧秘密档案档案的开放”。官方计划指出：“《欧洲良心和共产主义布拉格宣言》应该成为东欧所有国家研究和评估共产主义政权的共同基础。”

2008年9月18日，保加利亚议会正式批准了《布拉格宣言》。

2009

2009年3月18日，欧盟理事会捷克共和国总统与支持《布拉格宣言》的欧洲议会议员合作，主办了“欧洲良心和极权共产主义罪行欧洲听证会：20年后”，作为“朝着实现世界和平的第三步迈进。建立欧洲记忆和良心平台，以支持从事与欧洲极权政权和解的机构的活动。” 结论要求“建立欧洲记忆

和良心平台”，并支持宣布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者欧洲纪念日。

与“布拉格宣言”相似的提案在欧洲议会中得到了支持，该议会通过了2009年关于欧洲良心和极权主义的决议。

2009年4月25日，欧洲民主党学生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我们，欧洲民主学生，将全力支持《布拉格宣言》，并将其内容纳入我们的总体政策。”

2009年4月28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政府受到欧洲议会主席汉斯·格特·珀特灵的感谢，他们为使西欧更好地了解苏联的极权主义而做出了努力。珀特林提出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极权主义的经典研究，该研究发展了“描述极权主义的科学基础标准”，认为“极权主义体系（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类似且可怕的”。

2009年6月16日，欧盟总务理事会通过了结论，其中说：“为了增强欧洲对极权政权所犯下的罪行的认识，必须保留对欧洲陷入困境的过去的记忆。”

2009年7月3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发布了《维尔纽斯宣言》，其中包括关于若干问题的其他决议，包括“关于分裂的欧洲重新统一的决议：促进欧安组织地区的人权与公民自由” ”，并支持将8月23日指定为欧洲纪念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者的纪念日。

欧洲人民党主席约瑟夫·道尔说：

自从我们庆祝北约成立60周年和冷战开始以及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2009年是具有深远象征意义的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议在欧洲范围内举行纪念日，这将有助于欧洲调和纳粹和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历史记忆。

2009年，在以马内利·辛格尼斯（Emanuelis Zingeris）的倡议下，立陶宛的议会也批准了《布拉格宣言》。

2010

在欧洲议会中，建立了一个由欧洲议会组成的全党小组，名为欧洲历史和解小组。其目的是“调和欧洲不同的历史叙述，并将它们整合成欧洲对过去的记忆。”它由前欧盟委员桑德拉·卡尔涅特（Sandra Kalniete）主持。其成员还包括汉斯-格特·珀特林，拉兹罗·托克斯，海迪·豪托拉和贡纳尔·奥克马克。

2010年2月25日，《共产主义罪行宣言》获得通过，结束了共产主义罪行国际会议，该会议由极权主义制度研究所和捷克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合作组织。2010年宣言重申了《布拉格宣言》的许多建议，指出“过去20年来对共产主义罪行肇事者的司法制度令人非常不满意”，并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法院。”

欧洲联盟的斯德哥尔摩计划指出：

联盟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领域，这些价值观与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和战争罪，包括极权政权所犯下的罪行不相容。每个会员国对这个问题都有其自己的作法，但是为了和解的利益，对这些罪行的记忆必须是我们大家共同共享和促进的集体记忆。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Gulag_Archipelago

《古拉格群岛》

《古拉格群岛：文学调查实验》（俄语：**АрхипелагГУЛАГ**，Arkhipelag GULAG）是一部三卷非虚构文字书籍，由俄罗斯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于1958年至1968年间撰写。它于1973年首次出版，并于次年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它通过从各种来源（包括报告，访谈，陈述，日记，法律文件以及索尔仁尼琴自己作为古拉格囚犯的经历）构建的叙述涵盖了通常被称为古拉格（Gulag）的生活，这是苏联的强迫劳动营地系统。

出版之后，该书最初在苏联的萨米达特地下出版物中发行，直到1989年出现在文学杂志Novy Mir上；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品分三期出版。自苏联解体以来，该书已在俄罗斯正式出版。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于2018年11月1日发行了删节的五十周年纪念版，并为其增添了新的前言。

结构

从结构上讲，该文本包括七个部分（在大多数印刷版本中），分为三卷：第1-2部分，第3-4部分和第5-7部分。

尽管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和其他人为古拉格（Gulag）的记忆做出了努力，但直到1980年代，难民营的现实仍然是禁忌话题。索尔仁尼琴也意识到，尽管许多实践已经停止，但该系统的基本结构仍然存在，并且可以由未来的领导人加以恢复和扩展。尽管赫鲁晓夫，共产党和苏联的西方支持者认为古拉格仅仅是斯大林的个人行为结果，但索尔仁尼琴和许多反对派人士倾向于将古拉格视为苏联政治文化的系统性缺陷，这是布尔什维克政治政治的必然结果项目。

与这种历史和法律叙述平行的是，索尔仁尼琴遵循zek（囚犯）的典型过程，从逮捕开始，监禁，运输到“古拉格”；囚犯的待遇及其一般生活条件；奴隶劳工和监狱营地系统；营地叛乱和罢工；原判刑期结束后进行内部流放的做法；和最终（但不能保证）释放囚犯。在此过程中，索尔仁尼琴详细记录了普通囚犯生活中的琐碎和平凡事件，以及古拉格系统历史上的具体和值得注意的事件，包括起义。

以前曾有过关于苏联监狱/营地系统的作品，并且自1930年代以来西方公众就知道了它的存在。但是，从未有这样的方式使普通读者与古拉格的恐怖生活面对面。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体系的理论，法律和实践起源置于列宁

而不是斯大林的脚下。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证词，斯大林只是扩大了已经建立的集中营系统。这很重要，因为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将苏联的集中营制度视为“斯大林主义的畸变”。

出版

该作品的第一版由法国出版社Éditionsdu Seuil于1973年圣诞节后几天出版（俄语）。他们收到了Solzhenitsyn的同意，但决定比他预期的提前十天发布作品。有关的新闻立即引起轰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随后又被翻译成许多其他语言。

索尔仁尼琴曾希望该手稿先在俄罗斯出版，但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这项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影响和反应

从2009年开始，俄罗斯学校指定这本书为学生必读书籍。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纳塔利娅·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第二任妻子）进行交流，称该书“非常必要”。而俄罗斯教育部表示，这本书显示了“20世纪国内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和文化遗产”。当时的人权组织纪念馆负责人Arseny Roginsky欢迎普京支持Solzhenitsyn教科书。

小说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表示，这本书“摧毁了一个帝国”，而迈克尔·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同样表示，这本书“给苏联国家带来了正面挑战，这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并要求革命家改变。” 汤姆·巴特勒-波登（Tom Butler-Bowdon）将这本书描述为“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的纪念碑，以纪念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50年代之间在苏维埃俄罗斯遭受酷刑和谋杀的数百万人。

心理学家约旦·彼得森曾说《古拉格群岛》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书。

2009年12月12日，俄罗斯频道Rossiya K播放了JeanCrépu和Nicolas Miletitch 制作的法国电视纪录片L'HistoireSecrètede l'Archipel du Goulag，并将其翻译成俄文，标题为Taynaya Istoriya“ Arkhipelaga” GULAG”（秘史：古拉格群岛）。该纪录片涉及与古拉格群岛的写作和出版有关的事件。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Black_Book_of_Communism

《共产主义黑皮书》

《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出版于1997年。斯特凡库尔图瓦，安杰伊·蓬奇科夫斯基，尼古拉斯·韦斯和其他一些欧洲学者记载了共产主义国家政治镇压的历史，包括种族屠杀，法外处决，强迫搬迁，杀死劳教所的人口和人为制造的饥荒。它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共产主义黑皮书》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售出了数百万本，同时被视为有关20世纪共产主义历史的最有影响力和最具争议性的书之一，特别是关

于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

概述

简介

斯特凡·库图瓦（StéphaneCourtois）在题为“简介：共产主义的罪行”的第一章中指出，“共产主义政权将大规模犯罪变成了成熟的政府体系”，与纳粹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政治体系的死亡相比，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

估计受害者人数

据介绍，共产党政府杀死的人数超过9400万人。受害人的统计数据包括死刑，人为饥饿，饥荒，战争，驱逐出境和强迫劳动造成的死亡。死亡人数细分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6500万

苏联有2000万

柬埔寨200万

朝鲜200万

埃塞俄比亚170万

阿富汗150万

东欧100万

越南100万

拉丁美洲150,000

10,000人死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行为所致”

根据Courtoois的说法，苏联犯下的罪行包括：

成千上万的人质和囚犯被处决

从1918年到1922年，数十万叛逆的工农被谋杀

1921年的俄罗斯饥荒造成500万人死亡

1917年和1933年之间系统性的镇压反对政策

成千上万人在集中营被谋杀

在大清洗杀害近69万人

1930年至1932年导致200万所谓的“驱逐富农”

1932年和1933年的饥荒中400万乌克兰人（Holodomor）和200万其他人死亡。

1939年至1941年以及1944年至1945年将波兰人，乌克兰人，摩尔多瓦人和波罗的海国家强迫搬迁

伏尔加河日耳曼人在1941年被强迫搬迁

1944年对克里米亚人的驱逐

分析

劳雷·纽马耶（Laure Neumayer）认为，这本书在冷战后的欧洲政治空间将共产主义定为刑事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纽马耶（Neumayer）的说法，“通过将共产主义作为犯罪的实质，《共产主义黑皮书》做出了贡献。这本书在前苏联卫星国家的‘反共产主义’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5%8F%B3%E8%BF%90%E5%8A%A8

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前者“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整风，后者“反右运动”主要结果是给中共党内外大量人员确定了“右派”身份。毛泽东发动并主导了反右运动，而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高层也参与其中并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反右运动中，按照中共官方在拨乱反正时期的统计数据，全中国大陆552973人被划为右派，包括“三钱”之一的钱伟长、知名经济学家顾准以及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此外，据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并下放到

农村或工厂中进行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遭到批斗和迫害，部分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

反右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该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导致了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也为中国大陆此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埋下伏笔。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导了拨乱反正并开始了改革开放，承认在反右运动的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即“反右扩大化”），而中国大陆政府也给大批“错划右派”者予以“改正”平反；96人成为未获改正的右派“维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其中中央点名确定5人，地方91人。

运动历程

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谈话，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次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

转为反右运动

期间由于有人提议：“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并且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共产党认为该言论出自章伯钧）；“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一党执政有害处”，要开放“海德公园”（注：英国伦敦的一个公园，人们可在此自由发表言论），各个民主党派，都有首脑人物向中共提出，既然是共同执政，中共有自己的武装部队，那么民主党派也要有自己独立的武装部队等等。毛泽东面对

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曾表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于是，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1957年中共开始了反扑的行动，这即是后来所谓的“反右运动”。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6月12日批发全党。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批评中共存在党天下思想。1957年6月6日，毛泽东阅读陆定一呈送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中提及北京大学有学生写文章表示中共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而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自己收到的匿名恐吓信，恐吓信作者在信中表示“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李仲公也表示，自己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匿名恐吓信。同样在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6月7日，毛泽东在会见胡乔木和吴冷西时表示，卢郁文收到的匿名恐吓信，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反击右派的绝好机会。毛泽东还表示，自己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动反击右派斗争。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其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提到给卢郁文的匿名信表明有人试图借整风运动进行阶级斗争，并指出“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同年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写道：“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注：指章伯钧、罗隆基）同盟……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既然他的言行同党外右派份子一样,就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同样划为右派份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党内右派份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那些同党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份子。”

右派的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主要政策的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反右的扩大化

与其它后来被中国共产党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官方最终仍然保留了极少的右派分子。但中共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分微右，中右与极右）；

复查核实改正错划（并未平反真正“右派”）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97％。但学界对此人数统计认识并未统一。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被归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至1986年，约剩下5,000余名右派；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趋于平静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移到了大跃进，反右运动逐渐停止。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为批评大跃进运动而受到批判，引发主要限于清洗军队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倾运动。

运动结果

右派受迫害

1957年的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右派的原则：一是“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一是“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邓小平在7月23日书记处会议上

提出，关于右派问题，“组织处理不忙，人大、政协、党团都不忙处理，等人大改选再说”，“但要积极做准备工作，统战、宣传、组织部赶快研究，12月必须拿出方案。政协、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统战部负责”。7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核批准。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决定，同时发表社论解释：

“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措施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万余人。

一党专制

自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中共也不再允许来自党外的批评，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在各个民主党派方面，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不复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一步一步愈发边缘化，造成了中共一党专制的局面。

运动影响

大跃进和文革

经过反右运动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它标志着从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几年内中国大陆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的结束，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

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毛泽东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反右运动为接下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将要实行的各种政策转变有效地消除了可能面对的来自中共党内或者农业专家的反对的声音。而大跃进运动则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直接原因。也有部分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与反右运动有直接关系。

“摘帽”与“改正”平反

“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市根据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已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后分5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人被称为“摘帽右派”。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的教师编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作为社论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这两篇文章在全中国大陆取得了空前的反响，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处理。在烟台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群众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视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平反关于右派的冤假错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认为，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终保守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1978年5月2日，上海市对本市尚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471人全部摘掉了右派帽子。

烟台会议后，胡耀邦继续推动对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因该文件编号为[1978]55号，有被简称为“55号文件”）的通知中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改正。”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1978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批转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公安局、劳动局、民政局关于贯彻中共中央《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单位做好改正工作。1979年，中共上海市委先后批转市委统战部等5部门《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后若干具体问题处理意见》和《关于对“中右分子”审查安置等问题的批复》等文件。到1980年9月，复查改正工作基本结束，上海市共改正16297人（1957年后，机构及人员变化很大，该数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上海市的与仍属上海市管辖的人员中的复查改正数），其中市级爱国民主人士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106人，改正104人。（彭文应、陈仁炳2人未被改正）。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

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在运动结束后，除了少部分被开除出队，全部进行经济处理。从发给每月十来元基本生活费到连降几级工资，所有右派分子的家庭经济都受到重大打击。家人因被牵连无法获得安排工作，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家庭陷入长期困境。右派分子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子女在升学就业受到政治歧视，教育程度很少超过初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对错划右派分子改正时，并没有给与经济补偿或赔偿。

未被平反人士

根据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

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未获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

历史评价

官方评价

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于1980年2月23-29日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时说：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1980年3月，邓小平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到（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

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谈论有关八六学潮的问题时再次提及此事。他说（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刘政认为：

“正当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健康发展之时，1957年夏季掀起了一场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从此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和有益探索中断了。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受到严重损害。”他认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加上采取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方式，而不是主要依靠法制去进行，这就使这场斗争严重的扩大化了。......由于反右派斗争极严重地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

其他评价

新华社原副总编穆广仁认为，“反右运动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毁了建设祖国急需的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给中华民族、给共和国带来沉痛的国殇。但它更加深远的影响，是铸成了阶级的（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党专政和领袖专政。”

徐贲教授认为，“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是留下最深、最持久社会创伤的两次灾难。”

学者高伐林认为，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摧残和扭曲、对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造成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元气大伤，阴影笼罩几代人”。

学者朱正认为，“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主张，如果1957年不是横加批判，而是认真听取，采纳其中可以采纳的部分，那么，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道德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既然“反右派”运动将这些言论作为打击对象，那就不难判断，这场运动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必要的还是有害的。”

学者刘宾雁认为，“反右派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历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报复。二十余年来连篇累牍的批判知识分子之软弱的文章，忽视了一个巨大的事实，那就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蒙昧在五十年代成为毛泽东

暴政的强大后盾......”

学者傅国涌认为，“如果说，毛泽东是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邓小平则是反右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具体实施者，他的头衔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因此，我们可以理解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号文件虽决定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却最后保留了几个标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确性”、“邓小平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反右’情结，这件事的决策者虽是毛，而他本人就是执行者，他连毛都不愿否定，何况否定自己。”

美国之音认为，“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人数来看，反右斗争成为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尤为不及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镇压活动”、“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一击，使得几十年后这两个群体基本上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和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李志绥认为：“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

有很多人认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提出的“引蛇出洞”、“阳谋”论只是后来的托词，并未有明确文献显示毛泽东在何时或何处用“引蛇出洞”一词来谈论反右运动，但运动当时已有不少省委书记级的中共干部使用此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2%A8%E5%AE%89%E5%B9%B3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学者、知识分子。出身望族，曾留学英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曾因批判国民政府政策而导致杂志被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响应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表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即“党天下”）一文。毛泽东对此不满发文反驳，并迅速发起了反右运动。储安平被作为右派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储安平遭受残酷迫害而失踪，后被宣布死亡。1978年后，55万右派被平反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生平简历

早年

储安平出身于宜兴望族。宜兴储氏为唐代诗人储光羲之后，自南宋以来，科名长盛不衰。储安平十二世祖储昌祚、九世祖储方庆、八世祖储大文皆为进士。储安平出生后六天即丧母，14岁丧父，依靠祖母、伯父储南强抚养成人。储南强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是同学，曾官南通知县。

1928年，储安平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学习，爱好文学创作，为“新月派”后起之秀，1932年毕业。

媒体生涯

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1934年，储安平与光华大学同学端木露西结婚。1936年赴英国采风，后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或受到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教授的影响。在英期间担任无薪酬、只领稿酬的《中央日报》驻欧记者。

1938年因抗战学业未完，回重庆，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由于不堪忍受写作“遵命文章”及拒绝入党等原因，离开重庆。1940年8月后，辗转于湘、桂之间。曾任国立师范学院教师（今湖南师范大学，学校时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在桂林担任《力报》主笔和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返重庆。1945年11月与张稚琴创办《客观》周刊，任主编。1944年或1945年，与端木露西离婚。

1946年春，储安平离开《客观》杂志社，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并使得《观察》成为国共内战时期著名的自由刊物。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杂志和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此后，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时亲自出面，以自己的影响力多方奔走，给当局施压。并于1949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数位《观察》进步人士出狱。《观察》是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是当时中国一面进步民主运动的旗帜。查封《观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悲歌。储安平曾批判中国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观察》复刊，储继续担任主编至1950年终刊。文章多以游记杂感为主，鲜见时评。1950年《观察》终刊后，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党天下"言论与遭迫害

1957年4月1日，经胡乔木推荐任《光明日报》总编。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再次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后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和意见。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据胡乔木儿子透露，毛泽东在文章发表后"一连几天没睡好觉"。

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然而对储安平的批判并未因此而结束。1957年11月12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储被残酷迫害。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储安平也成为被“扫荡”对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1966年9月上旬失踪，生死不明。同时对于其失踪也有不同的说法：出家说、出走说、自杀说以及被打死说等不同的猜测和怀疑。也有人说他是先在青龙桥投河自杀未遂，接着又跳海自沉了，然而何时何地都是未知。

言论

“　因为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　”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期第2页

“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

“　我们历观中国最近二十余年的历史，深感过去中国政治上的人物对于党争的兴趣太浓厚，排除异己，不择手段，一切施政，常以私党的利益为首要，对于真正有关民生的建国大业，大都缺乏兴趣，缺乏热忱。政治上这种人一多，国家即易陷入乱境，而不易纳于治途。因为政治不清明，社会无是非，秩序不安定，民生不改善，而却希望这个国家稳定，是诚难乎其难。所以就今后中国治乱而论，应当鼓励一切对于党争兴趣淡薄的人，出而参政，尽量减少磨擦的空气，多从事改善民生的工作。　”

——储安平《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安定因素》，《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 19页

“　过去外蒙之为中国领土，无人敢加否认，而共产党报纸竟公然刊载“外蒙共和国总理”某某人抵达莫斯科之消息。苏联东，共产党亦东，苏联西，共产党亦西；甚至苏联与中国有什么间题时，共产党报纸的论调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非中国人的报纸的论调。在许多地方，常常使人觉得，中国共产党较之苏联似尤“苏联化”，而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恐怕比苏联的报纸更象一个苏联的报纸。　”

——储安平《共产党与“国家”》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 23页

“　　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25页

“　　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共产党民主”与“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固为截然两事，两者之间实有极大的距离。　　”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 26页

“　　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　　”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28页

“　　在过去一年多的和谈中，共产党一直把持攻势地位。他们一再要求

和平。国共双方对于“和平”究竟有无诚意？有人认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我们认为国共两方面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自己打算，都是为私，绝不足以语“诚”。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既然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没有什么不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无条件停战”时，国民党不接受，国民党要求“就地停战”时，共产党不接受？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要求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共产党对于“和平”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要和平，从前是“无条件”的，现在是有条件的了；或者从前的条件低，现在的条件就高了。 ”

——储安平《中国政局》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31页

“ 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 ”

——储安平《中国政局》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32页

“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梢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

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 ”

——储安平《中国政局》《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34页

“ 共产党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 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

——储安平《中国政局》，《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 35页

“ 中国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来推动，使这个国家进入于法治境界。要讲法治，即须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不要制度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权。 ”

——储安平《国大评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44页

家庭

1933年，储安平与端木露西结婚，后离异，育有四子女。1949年后，与易吟先[14]结婚，1957年反右运动后离婚。

储安平子女有储望英（长子）、储望德（次子）、储望瑞（女儿）、储望

华（幼子，音乐家，现居澳大利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宪法、人大、政协、政府组织架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E%86%E4%BB%A3%E5%AE%AA%E6%B3%95

中国宪法列出在中国制定或施行过的宪法、宪法增修案、修正案或其他宪制性文件。由国家组织起草的重要宪法草案也一并列入。

当今媒体所称的“中国宪法”多指目前施行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清朝

清朝宪法

大清会典

钦定宪法大纲

十九信条

名称	起草时间	起草机关	通过时间	通过机关	公布时间	公布机关	注释
钦定宪法大纲		宪政编查馆	——	——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 1908年8月27日	清政府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	——	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 1911年11月3日	清政府	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宪政史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天坛

宪草　民三

约法　训政时期

约法

安福宪法　　五五宪草

曹锟宪法　　期成宪草

民国宪法案　政协宪草

中华民国宪法

–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 宪政研讨委员会宪法草案

– 宪法增修条文

名称　起草时间　　起草机关　　通过时间　　通过机关　　公布时间　　公布机关　　注释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1911年12月3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1911年12月3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8日　　　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　　1912年3月11日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913年7月12日-

1913年10月31日　　中华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　　——　——　——　　——　俗称“天坛宪草”。1913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但未经宪法会议通过。

中华民国约法　　　1914年3月18日-

1914年4月29日　　约法会议　　1914年4月29日　　约法会议　　1914年5月1日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俗称“袁记约法”

中华帝国宪法案　　1915年12月14日起　参政院推荐起草员　——　——　——　——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916年-1917年6月　宪法会议　　——　——　——　——　俗称“民六宪草”。1916年起由宪法会议起草，1917年6月因国会解散而停止起草。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919年8月12日　　中华民国国会　——　——　俗称“安福宪法”、“民八宪草”

中华民国宪法　　　　　　　　1923年10月8日　　中华民国国会　1923年10月10日　　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　　　俗称“曹锟宪法”、“贿选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案　　1925年8月3日-

1925年12月11日　　国宪起草委员会　　——　——　——　——　俗称“国宪草案”

训政纲领　　　　　　　　1928年10月3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1928年10月4日　　　中国国民党　1929年3月19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

中华民国约法草案　1930年10月27日完成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　——　——　——　——　称“太原约法”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1931年5月12日　　国民会议　1931年6月1日　　　国民政府　　蒋介石主导制定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936年5月1日　　　立法院　　　1936年5月5日　　国民政府　　简称“五五宪草”。1937年立法院修正，1937年5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草案　　1940年3月30日　　国民参政会　　——　——　称“期成宪草”

和平建国纲领　　1946年1月31日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次会议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946年11月22日　　立法院　　——　——　称“政协宪草”

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2月25日　　制宪国民大会　　1947年1月1日　　国民政府　　1947年12月25日施行，现行宪法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48年4月18日　　国民大会　　1948年5月10日　　1960年、1966年2月、1966年3月和1972年先后4次修订；1991年4月22日国民大会议决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1年5月1日总统李登辉公告废止。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1991年4月22日　　国民大会　　1991年5月1日　　总统李登辉　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次增修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1992年5月27日　　国民大会　　1992年5月28日　　总统李登辉　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次增修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1994年7月28日　　国民大会　　1994年8月1日　　总统李登辉　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次增修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1997年7月18日　　国民大会　　1997年7月21日　　总统李登辉　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次增修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1999年9月3日　　国民大会　　1999年9月15日　　总统李登辉　中华民国宪法第五次增修。2000年3月24日，司法院大法官《大法官解释字第 499 号解释》“该次修正条文

因违背修宪正当程序，故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原86年7月21日之增修条文继续适用”，增修条文失效。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2000年4月24日　　　国民大会　　　2000年4月25日　　　总统李登辉　中华民国宪法第六次增修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2004年8月23日　　　立法院　　　2005年6月10日　　　总统陈水扁　中华民国宪法第七次增修。2005年6月7日国民大会复决通过。

地方宪法

中国地方宪法

辛亥革命

鄂州约法

广西约法

江苏约法

浙江约法

江西约法草案

贵州宪法大纲

蜀军政府政纲

联省自治

湖南省宪法

九九宪法　　三色宪法　　浙江省自治法

四川省宪法草案

广东省宪法草案

福建省宪法

河南省宪法草案

江苏省制草案

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

名称　起草时间　　起草机关　　通过时间　　通过机关　　公布时间　　公布机关　　注释

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　　1911年10月28日至11月13日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总监察处　　　　　　　1911年11月底或12月初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　　简称“鄂州约法”。该约法草案由宋教仁起草，居正、张知本、汤化龙等共同审议。1911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总监察处发布了《关于议决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及官制草案的特别通告》，公布了该约法草案，并称“此项草案，现定于半月后即行议决执行”。1911月12月2日至6日，《民立报》逐日刊登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

广西临时约法　　　　　　广西省议会　　　　广西省议会　1911年11月17日[2]　　　广西军政府　简称“广西约法”。《广西临时约法》后公布于《广西公报》第1期（1912年2月25日）“法令”，第1-6页

中华民国江苏军政府临时约法　　　　　江苏临时议会　　　1911年11月21日　江苏临时议会　　　1911年12月7日　　　江苏都督程德全　　简称

“江苏约法”，1911年12月7日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于《民立报》。

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　1911年12月10日至12月20日　浙江临时议会　1912年1月22日　浙江军政府　简称“浙江约法”。1911年12月20日浙江临时议会通过《浙江军政府暂定临时约法草案》。1911年12月29日-1912年1月1日《民立报》刊登了《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 1912年1月22日，浙江军政府在《浙江军政府公报》创刊号上公布了《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

江西省临时约法草案　江西省参事厅　1912年1月24日　江西都督马毓宝　简称“江西约法”

贵州宪法大纲　1911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 贵州立法院　——　——　1911年12月25日　1911年12月25日，《贵州公报》公布《贵州立法院拟定宪法大纲》，以征求全省国民意见，再行修改。但后来因政变而未能据此制定宪法草案。

蜀军政府政纲　1912年1月18日　蜀军政府　1912年1月18日公布于《广益丛报》

湖南省宪法　1921年3月20日-

1921年4月20日　湖南省宪起草委员会　1921年9月9日（湖南省宪法审查会）

1921年12月（全省公民总投票）　1922年1月1日　湖南临时省长赵恒惕　1921年4月21日，湘军总司令兼湖南临时省长赵恒惕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1921年9月9日，湖南省宪法审查会通过该草案；1921年12月1日至11日全省公民总投票表决通过。

浙江省宪法　1921年6月15日至7月12日　浙江省宪起草委员会　1921

年9月7日　　浙江省宪法会议　　1921年9月9日　　　浙江省宪法会议

简称“九九宪法”。1921年10月第三届浙江省议会正式开会时，多数议员以该宪法未经全民投票表决为由，议决仅将其列为浙江省宪法草案之一，供进一步审查。

浙江省宪法草案　　1922年11月4日-

1923年1月26日　　浙江省宪法审查会审查　　——　——　——　——

简称“三色宪法草案”，因草案分红、黄、白三色而得名

浙江省自治法　　　1924年8月1日-

1925年7月9日　　　浙江省自治法会议　1925年7月9日　　　浙江省自治法会议　　　1926年1月1日　　　浙江省自治法会议　1925年7月9日浙江省自治法会议三读通过该法；1925年12月31日浙江省自治法会议三读通过该法的施行法及各种附属法。1926年1月1日浙江省自治法会议自行公布该法，并要求省议会通过议案敦促施行该法。后该法未得到省署公布和施行。

四川省宪法草案　　1923年1月10日-

1923年3月10日　　四川省宪起草委员会　　　——　——　——　——

广东省宪法草案　　　　　广东省议会　1921年12月19日　　广东省议会

——　——

福建省宪法　　　　福建省议会　　　　　　　1925年1月13日　　　福建省议会　　　1925年1月30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电复：“国宪尚未解决，省宪应暂缓。福建省宪碍难认为有效。”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福建省长萨镇冰遂宣告：“福建省宪法不合法，应加以否认。”

河南省宪法草案

江苏省制草案　　1921年　　部分江苏省议会议员拟定，未经省议会审查

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　1922年　　云南法制委员会　　1922年7月21日　　唐继尧

其他各政权宪法

名称　起草时间　　起草机关　　通过时间　　通过机关　　公布时间　　公布机关　　注释

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　　　　　　　1924年11月8日　　第一届国家大呼拉尔

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　　　　　　　1940年7月20日　　第八届国家大呼拉尔

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　　　　　　1945年9月9日　　内蒙古代表会议　　　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　　　　　　1933年11月20日　　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1933年11月22日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政纲　　　　　　1933年11月20日　　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1933年11月22日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满洲帝国宪法草案　1934年9月25日初稿完成　　　　——　——　——　——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940年6月27日-

1945年8月　宪政实施委员会审议　—— —— —— ——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1933年11月12日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施政纲领　1933年11月12日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宣言　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协助起草　1945年1月5日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　简称“九项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共同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四宪法

七五宪法

七八宪法　1979年修正案

1980年修正案

八二宪法

1988年修正案

1993年修正案

1999年修正案

2004年修正案

2018年修正案

名称　起草时间　　起草机关　　通过时间　　通过机关及场合　　公布时间　公布机关　　注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　　　1949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毛泽东、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　1954年9月2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4年9月2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称“五四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5年1月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5年1月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称“七五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8年3月5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8年3月5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称“七八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年12月4日　　　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1982年12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称“八二宪法”，现行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1988年4月12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88年4月12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1993年3月29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93年3月29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1999年3月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99年3月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04年3月14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2004年3月14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18年3月11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018年3月11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AE%AA%E6%B3%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1954年9月20日，首部宪法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宪法又经历了两次修改。现行的八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日公布施行。八二宪法其后又经过了多次修正，形成了宪法现行文本。

现行宪法全文共4章、143条，阐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彰显了民主集中制的理念，明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主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结构，明示了中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并明列其基本国策。

制宪历史

共同纲领的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条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取代正在行宪状态、但不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承认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规定了政权机关的组成和新政府的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政策、外交政策。

早在1949年刘少奇秘访苏联和1950年初毛泽东首次访苏之时，斯大林就已建议中共筹备制宪。1952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第三次督促正在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尽快制定宪法以解决合法性问题和“组织一党的政府”。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宪法。学者张鸣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极力建议中共制宪，除解决新政府自身合法性问题外，还有对中国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彻底断掉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的可能性，才是斯大林在中共明显表示不情愿的情况下，坚持要中国制宪的背后原因。”

五四宪法的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1954年）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认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准备制宪。1952年12月24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议起草宪法；政协通过了这一提议。1953年1月1日，中共中

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把制定宪法列为1953年的三项任务之一。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等三十余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形式上制宪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

毛泽东于1953年3月初在修改审定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指出："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从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等方面作出正确的适合历史需要的规定，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完成获有法律上的保证。宪法草案的主要努力，首先用在这个目的上。"因此，这部宪法实质上具有了一定的过渡性质。宪法序言即规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宪法初稿领导小组，毛泽东带领核心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南下杭州，亲自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这四人均非宪法学出身，只得搜集1936年苏联宪法、1952年罗马尼亚宪法等宪法，边学边写。其中也不乏独创，例如苏联等国宪法均没有的长篇大论式的宪法序言。

初稿小组于1954年2月提出初稿，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审议。195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伯达等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对宪法草案初稿的条文作最后的修改，提交中央讨论；同时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由李维汉为秘书长。总的程序是：宪法先是由毛泽东的起草小组起草，然后送交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党的宪法小组具体负责润色、并得到政治局确认。即实际制宪机关为中共中央。

随后的整个过程，基本按照毛泽东在给刘少奇信中规定的进度进行：

2月前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

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邓小平、李维汉两人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

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

4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

5月1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9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参与了首部宪法的讨论，提出的意见有138万多条。另有各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596万多名代表也发表了意见。毛泽东表示，“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甚么又要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甚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根据征求所得的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作了修改后，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讨论通过，形成了宪法送审稿。

1954年9月2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投票通过宪法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共投票1197张，同意票为1197张，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规定公民拥有迁徙自由、居留权等，还纳入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款，行文上颇具建设性。此时，由于民主党派尚能发挥监督制约作用，且捍卫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仍然是中共反对国民党政府有力的宣传武器，因此1954年宪法仍未远离8年前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精神和5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主原则，例如全国人大的设置、内阁制、国家元首统帅军队等等。有观点认为，这部宪法的诸多条款，例如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公民自由迁徙权，均达到了1949年以来各部宪法无法超越的高度。

事实上，这部宪法很快就被虚置，几乎成了一纸空文。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

修宪历史

七五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加上1957年发生反右运动与民主党派完全退出监督，原宪法的众多条文与形势愈加不合，也导致了包括宪法制定者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该宪法已经过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宪法所设置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处于囚禁状态，不能正常工作。1968年刘少奇被罢免后，国家主席长期空置，原有宪法体制已无法继续，修宪迫在眉睫。1970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议废除国家主席职务，遭到中共众多领导反对，爆发广泛争议，修宪陷入僵局。1971年，林彪叛逃苏联失败后，废除国家主席已成定局，修宪工作终于有所进展。故于1975年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第二部宪法正式通过，宪法中不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

这部宪法的合法性后来受到了质疑。因为通过该法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并非依照《五四宪法》和《选举法》规定，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而是由“民主协商”方式产生，即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军队等方面推选、指定或特邀的，其本身即违背了程序正义。同时，七五宪法没有由一个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也没有提交全民讨论，修宪的过程也并未公开透明，甚至直到该部宪法被通过四天后才由《人民日报》受权公布。

这部宪法首次在正文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大量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七五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导致了“党国不分”的现象。同时，宪法正文还写入了毛泽东思想，使得这部宪法实质上更接近于一部党章。

同时，这部宪法还废除了选举制度，改变由人民直接选举和下级人大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民主协商选举”的形式。

有人认为，七五宪法是起草者们对宪法基本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宪法完全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制定的，是对“文革”在法律上的总结，是对“无法无天”的法律认定。

七八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

1976年“文革”结束后，国家政治形势再度发生重大变化，重新修宪又提上日程。1977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该委员会完全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同时，其名单仅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而没有经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宪法修改委员会在事实上也并未投入运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指定的宪法修改小组直接承担了宪法草案的修改工作，使得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几乎相当于宪法草案的讨论，而当时详细记录讨论的档案至今尚未公开。宪法草案完成后，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征求党内外群众对修改宪法的意见”。这次征求群体主要以党内人士为主，也包括一小部分的非党群众和党外人士。不过，这次征求意见的实际价值却受到了广泛质疑，在“两个凡是”的倾向下，宪法讨论显得死气沉沉。

新宪法于1978年3月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新宪法修正了1975年宪法的一部分文革语调，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但仍保留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说法。此外，该宪法恢复了《五四宪法》部分公民权利条款，不过并未恢复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

这部宪法正文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关条款，仍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七八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同时，宪法正文继续写入了毛泽东思想，使得这部宪法实质上只是对七五宪法的小修小改，是《五四宪法》和《七五宪法》之间的折中妥协。同时，这部宪法恢复了选举制度，取消“民主协商选举”的形式，规定人大代表“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但加注了“应经过民主协商”的限制条件。

其后，七八宪法经过两次修正。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修改宪法条文，同意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原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八二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1982年）

1980年代初，随着中共“拨乱反正”的深入，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完全推翻，修改原宪法、使之适应形势再度成为迫切需求。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向全国人大提出全面修宪建议，强调：1）宪法应当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2）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要体现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4）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1980年，经全国人大决定，正式成立了由叶剑英、宋庆龄和彭真主持，包含民主党派、社团团体主要负责人和法学家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委叶剑英强调，“经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充分实现，在宪法修改中作出适当规定。”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运作，这次修宪酝酿讨论的广泛程度均超越前两次修宪。

在修宪讨论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曾提出将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削减至1000人，于全国人大下设立两个院，各500人，使全国人大成为常设机构，以改变人大“橡皮图章”的印象；另有委员提出，仿效苏联最高苏维埃设立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制度，“按地区产生的代表组成一院，按行业界别产生的代表组成另一院”。而以邓小平和叶剑英为首的反对者们认为，“如果两家意见不一致，协调起来非常麻烦，运作很困难”。最终双方达成折衷，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大为扩大，使之成为常设立法机关，有权制定绝大部分法律和审议应当由全国人大批准的法律。

此外，在修宪过程中，许多法学学者的专业意见也得到了采纳。如经济学者孙冶方就曾给宪法修改委员会写信，建议取消“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导思想”条款，得到了宪法修改委员会的肯定。同时，这部宪法也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款。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委彭真在有关会议上曾说明修改宪法的四个原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修改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

宪法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宪法只能写现在能够定下来的，最根本、最需要的东西。宪法要起到统一思想、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保证四化建设等工作顺利进行的作用。

以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为基础，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继承1954年宪法，发展1954年宪法。

经历2年多的修订，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新的宪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简称“八二宪法”）。该宪法建立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构成了现今宪法的主体部分，其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

删除了诸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语言

一定程度上理顺了党和国家，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将中国共产党党务机构分离出国家机构运作体系

取消了“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条款，不在具法律效力的宪法正文直接出现“中国共产党”字样

实现了党政分开，明确区分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规定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重新设立在七五宪法中废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职务，作为国家元首机构，但不再设立最高国务会议和国防委员会，国家主席成为虚位元首

对于关键的军队归属问题，废除七五和七八宪法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帅军队的规定，相对于五四宪法，该宪法采用了折中方案，即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并列，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是历部宪法中最为民主的，被评价为建国后“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宪法”，突出了宪政主义的精神、观点和思想。但也有观点认为，这部宪法也有其局限性，如“四项基本原则”的入宪，领袖、个人意志的权重显然是更大的。

修正案

1988年，顺应当时的改革形势，第七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允许私营经济出现，并准许土地使用权转让。

1993年，邓小平南巡后，为准许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第八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总纲大部分条款和序言部分，以及地方人大代表选举部分。正式确立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序言。

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为顺应形势发展，将宪法部分条文再度修改，修改后的宪法进一步提高了私有经济地位，并废止“反革命罪行”的条款。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再度修改了宪法。原条文中的戒严状态更改为紧急状态并授权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宣布紧急状态，另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说法也写入宪法，《义勇军进行曲》亦被明定为国歌。

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再一次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进宪法正文，赋予地级市地方立法权、设立国家监察机关、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从宪法层面上确立宪法宣誓制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分为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国旗、国歌、国徽、首都五部分组成。序言部分简介建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基本国策，以及国家的基本性质与基本形式，和宪法的效力。总纲则明确国体，基本国策等。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则阐述各项人权和公民应尽义务。国家机构部分则规定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同时作为立法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中央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全国人大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不负责政府工作，但可提名作为政府首脑的国务院总理人选交由全国人大通过。军事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独立于行政部门，对全国人大负责。最高国家司法机关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分别对全国人大负责，对行政部门独立。最后一部分则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标志，即国旗、国歌、国徽等。

司法部认为，五四宪法是“维护和实现百姓权益最根本的保护神”，是代表了工人阶级意志的宪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2年表示，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法律保障。美国普度大学及美国学者埃斯特斯等人则批评，该宪法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国家根本法”，但是历史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曾违反过该宪法的众多条款并对要求严格遵守宪法的呼吁进行了压制。

宪法解释与宪法实施监督

宪法解释

根据2004年修正后的最新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第六十四条更具体规定了修改宪法的程序；第六十七条第一项和第四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行使解释宪法和法律的职权，但宪法中并未说明在何种条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这一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二章第四节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国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合宪性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宪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后，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呼吁违宪审查，但国务院立即主动废除了收容制度，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违宪审查没有发生。2013年，劳动教养废止，69名学者和公民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要求废除违反宪法的劳教制度。此事至2007年12月20日止没有回音。2013年劳教制度被废除，违宪审查亦未发生。英国学者马蒂厄批评，中国法院不允许当事人主张其宪法权利遭受侵犯。负责违宪审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从未宣布任何法律法规违宪。

2019年12月1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4次委员长会议通过《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自2020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违宪审查工作。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差异问题违宪审查：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

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有公民对此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认为因计算标准不一致导致司法审判实践中出现不公平现象，与宪法有关精神不一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认为，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国家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将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差异也应当随之取消。201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开展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试点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建议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适时修改完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民航发展基金征收违宪审查：2020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对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进行合宪性审查。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认为，征收民航发展基金不属于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对私有财产的征收或者征用，不存在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但是，征收民航发展基金依据的是国务院文件和有关部门规章，与2014年修改后的预算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政府性基金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收的规定不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提出，如果需要继续征收民航发展基金，应当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依据。

民族学校民族语言教育违宪审查：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针对地方性法规中“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以及“经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有条件的民族学校部分课程可以用汉语言文字授课”等相关规定进行了违宪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认为，上述规定与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

引用宪法裁判争议

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宪法不能用来给罪犯定罪量刑。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另一个司法解释认为宪法不能适用于普通民事关系。在2001年的齐玉苓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依据宪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意见判决齐玉苓胜诉。2008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废止了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在内的27项司法解释。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其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中要求，“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2001年8月，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在《人民法院报》专门就齐玉苓案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指出中国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最高法院针对此案的批复首次打破了“沉默”，“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People%27s_Congress

中国全国人大是国家权力和国家立法机构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议会机构，拥有2,980名成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约两周的全体会议，并对重要的立法进行投票。成员被认为是兼职立法者，无需付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大约170名立法者组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举行全体会议的情况下连续举行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可以同时在政府和党的其他机构中担任席位，而全国人大通常包括中国政治中的所有高级官员。相比之下，人大常委会委员不得同时担任行政或司法职务。

根据中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院制的立法机关，具有法律权力来立法和监督政府，最高法院，专门委员会，最高检察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选举主要国家官员的运作。中国境外的媒体普遍将中国全国人大（NPC）描述为实际上的橡皮图章机构。

NPC选举为期五年。它每年春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年度会议，通常为期10至14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通常安排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CPPCC）的会议上举行。随着人大政协是中国的主要议事机构，它们通常被称为两会。

全国人大表示，其年度会议为国家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回顾过去的政策并向国家提出未来的计划。

历史

共和时代

呼吁国民议会是革命者的纲领之一，他们最终推翻了清朝。作为回应，清朝在1910年成立了第一届议会，但实际上无能为力，仅作为咨询机构。

继辛亥革命，全国选举产生的两院制的1913年国民议会。这不是一次全国性的选举，而是一系列于1912年12月开始的地方选举，多数选举于1913年1月结束。参议院由省议会选举产生。但是，这些选举有300多个公民团体参加，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竞争力的全国性选举。

选举结果给国民党带来了明显的多元化，在870个席位中赢得了392个席

位，但由于许多候选人同时是多个政党的成员，因此出现了混乱。大选后几位改党，国民党438个席位。按照席位顺序，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原宪政派）政党随后合并为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

北伐战争结束后，原立法院在原南京首府成立。它的51名成员被任命为期两年。由于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45年），第四届立法院的成员扩大到194名，任期延长到14年。根据国民党政治理论，这头四届会议标志着政治监护的时期。

当前的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12月25日生效，第一届立法会议于1948年5月18日在南京召开，共有760名成员。根据宪法，国民议会的主要职责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任期六年。如果总统和副总统未能履行其政治职责，它也有权罢免总统和副总统。根据《国民议会义务法》，国民议会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修正宪法，并有至少四分之三的议员出席。

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的内战中败北，退到台湾。国民议会通过了一系列临时规定，以向总统集结更多权力，并限制三院制议会的职能。1950年2月24日，有380名成员在台北的中山堂开会，一直任职到199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该会议的日期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945年中共与国民党的谈判

中，两党同意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改革展开多党谈判。这被包括在“双十协议”中。该协议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执行，该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组织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中共，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以及独立代表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会议。

1949年9月举行了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个友好政党的代表参加并讨论建立新国家的问题。这次会议后来改名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批准了《共同纲领》，该纲领成为了未来五年的事实上的宪法。会议批准了新的国歌，国旗，首都和国家名称，并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政府。实际上，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部宪法公约。这是事实成立后头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机关。

1954年，宪法将这一职能移交给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权力和义务

根据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中国的四部宪法都赋予了它巨大的立法权。中国境外的大多数媒体都把人大作为橡皮图章，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和中共已经做出的决定的橡皮图章。其成员之一胡晓燕（Hu Xiaoyan）在2009年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她无权帮助选民。引用她的话说：“作为议会代表，我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 2014年，中共承诺保护人大“监督政府”的权利，条件是人大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但是，这种表征是有争议的。

全国人大主要有四个职能和权力：

修改宪法并监督其执行

只有人大有权修改宪法。宪法的修正案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全国人大代表的1/5或以上提出。为了使修正案生效，必须以所有代表的2/3多数票通过。与其他将宪法实施视为司法权的司法管辖区相反，在中国政治理论中，宪法执行被视为立法权，而中国法院无权确定立法或行政措施是否合宪。因此，对合宪性的挑战已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责任，全国人大对宪法问题具有记录和审查机制。

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

全国人大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法律，并对有关刑事犯罪，民政，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问题的现行立法进行修正。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活动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行事。代表大会休会时，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或代表本人提出的所有立法。

选举和任命中央国家机关成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全国人大还任命国务院总理和中央政府机构的许多其他重要官员。全国人大有权将上述官员撤职。全国人大还选举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其他委员。

确定值得立法行动的主要国家问题

全国人大的其他立法工作是就中共中央，国务院或其代表向国会提出的重大国家重大问题制定和审查立法。

（以下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